

红星照耀印度

地球上的不幸者正在反抗

印象、反思和初步推断

【瑞典】扬·米尔达/著

集体编译



为了纪念

哈里·沙尔玛

1934-2010

朋友、学者、同志

导言*

这份报告是对国家“最大的内部安全威胁” [1]的政治分析。在春雷[2]的四十四年之后，纳萨尔巴里运动仍困扰着现状。尽管他们有很多缺点，但是他们并没有被摧毁，而是再度兴起，并且尝试维持他们非传统的社会结构和政治。作者扬·米尔达在人民政府[3]的主要人员中间待了两个星期之后，质疑军事处理手段是解决“罪恶”的万能之计。相反，他追溯历史并且证明了毛主义者到今天所坚持的是公正、平等和自由，总的来说是印度自由运动中被遗忘的篇章，尤其是在政府的各种决议中。你可以同意或者不同意作者的观点，但是你不能忽视它。

作者扬·米尔达（1927年7月19日生于斯德哥尔摩罗姆马[4]）是瑞典作家、左派政治作家和专栏作家。他是美国新泽西州厄普萨拉学院的名誉文学博士，也是中国天津南开大学的荣誉博士。他曾多次在美国、阿富汗、伊朗和印度生活。米尔达是一名兼收并蓄的作家，创作了一系列特殊的作品。他对许多人认为晦涩难懂的话题感兴趣，并试图将艺术、文学和流行文化置于历史和社会力量的政治背景中。他写过许多书关于不同的题材，如麦卡诺[5]、战时宣传海报和18世纪法国漫画艺术。

*译自《红星照耀印度》英文版封底的两段文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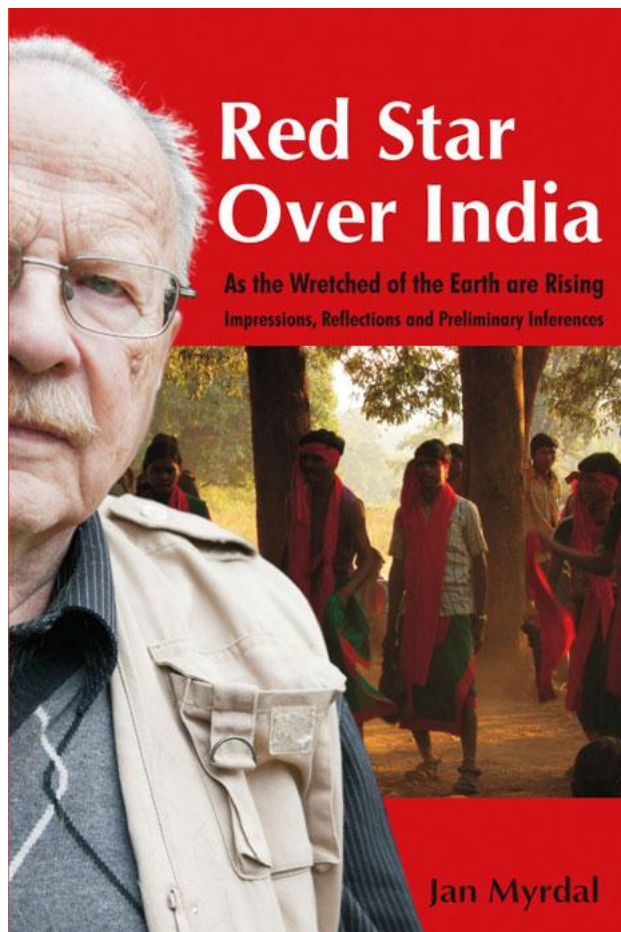
[1]时任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称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为印度“最大的内部安全威胁”。

[2]1967年印度西孟加拉邦爆发了纳萨尔巴里起义，纳萨尔巴里运动由此开始。起义发生后，中国《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印度的春雷》，对这一起义给予高度评价。

[3]Janathana Sarkar，意为“人民政府”，印共（毛）游击区的革命政权。

[4]扬·米尔达于2020年10月30日病逝，享年93岁。

[5]钢件组合玩具。



《红星照耀印度》英文版书影



《红星照耀印度》德文版书影



JAN MYRDAL
RÖD STJÄRNA
ÖVER INDIEN

Reflektioner
när jordens
fördömda
reser sig

Leopard förlag

《红星照耀印度》瑞典文版书影



内塔吉·苏巴斯·钱德拉·鲍斯[1]站在印度安达曼群岛的西海岸，隔着孟加拉湾眺望印度大陆。



在去群众大会的路上

[1]1897-1945 年，印度激进独立运动家、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



晚上的舞会开始了 摄影：扬·米尔达



各个年龄段的妇女都聚在一起观看舞蹈表演 摄影：扬·米尔达



游击队员们又开始了新的一天 摄影：扬·米尔达



早上连队点名，男兵和女兵在相同的单位。印度报纸报道人民解放游击军大约有 1.5 万到 2 万名士兵。



在去丛林里参加群众大会的路上 摄影：扬·米尔达



在去开会地点的路上。注意前面的旗帜！两颗星星和一副弓箭，这是新的革命政权的旗帜。 摄影：扬·米尔达



当地的舞蹈团已经就位 摄影：扬·米尔达



正在聚集开会，平民和士兵都参加会议。当地的人民政府和我们一起完成了这项工作。 摄影：扬·米尔达



人民政府的旗帜



印度各地举行集会支持阿迪瓦西斯人和达利特人的斗争。反对反人民战争的公约在会上引起了全体与会人员的注意。



悠闲的女游击队员



该做晚饭了 摄影：扬·米尔达



在一次会议上 摄影：扬·米尔达



人民解放游击军约有 40%是青年妇女，她们中间有很多是指挥员。
摄影：扬·米尔达

目录

第一部分 红星照耀印度

作为介绍的个人说明/2

第一章 关于当前印度内战的笔记/3

第二章 回到印度/17

第三章 提出问题/22

第四章 进一步谈原则/25

第五章 去丹达卡兰亚/29

第六章 独立是什么？/38

第七章 关于看法分歧的笔记/47

第八章 什么是恐怖？/50

第九章 唱人民的诗歌/58

第十章 论弱者政治与文化特性/65

第十一章 在营地/70

第十二章 长期存在的浪潮！/74

第十三章 小猫，小猫！/82

第十四章 离开游击区/85

第十五章 消极可能性/87

《红星照耀印度》附加文件的引言/92

一、与印度共产党（毛主义）总书记贾纳帕蒂的谈话/94

二、中央委员会发言人阿扎德关于对贾纳帕蒂总书记的采访的阐述说明/110

三、今天丹达卡兰亚的人民政府是明天印度人民民主联邦共和国的基础/114

四、采访穆拉里同志/121

五、采访索努同志/127

第二部分 相关作品

在叛乱中心的日日夜夜 高塔姆·纳夫拉卡/136

与同志们同行 阿兰达蒂·洛伊/171

附录一 印度的春雷/203

附录二 毛泽东在《关于同印共左派米斯拉联系问题的请示》上的批示/206

附录三 毛泽东主席接见印共左派大吉岭县委第二批学习代表团谈话记录/207

附录四 印度共产党（毛主义）《党的纲领》/215

附录五 印度共产党（毛主义）《党的章程》/233

附录六 瑞典汉学家扬·米尔达：向西方讲述中国故事/245

附录七 架起中瑞民间友谊的桥梁——记瑞典友人扬·米尔达 1962 年的中国行/248

第一部分

红星照耀印度

作为介绍的个人说明

1950年2月的一天清晨，我乘渡轮从敦刻尔克到多佛尔。我是唯一的乘客，移民官怀疑地看着我。我当时很年轻，所有的东西都放在一个箱子里，但是我有旅行支票和法郎。

“你此行的目的是什么？”

“去拜访我的岳父岳母。”

“他们叫什么名字？”

“卡利和葆拉·戈什。”

他盯着我。

“他们不可能是你的岳父岳母。那是个印度名字。”

“你可以打电话到伦敦问问他们。”我说。

“我是决定的人，”他说，“不是你。”

然后我被检查，他们剥了我的衣服。一个医生戴上橡胶手套，用手指摸我的直肠。

“什么都没有。”他说。

我不被允许给岳父岳母打电话，也不能和大使馆联系。

“我要驱逐你，”移民官说，“你是个不受欢迎的外国人。”

他小心地在我护照的第22页上盖了章。然后他笑了笑，先在上面印了一竖条，接着又把一个有“移民官（20）1950年2月16日多佛尔”字样的横条印在上面。

印度的叛乱战争

在一个五分之一的人生活在叛乱阴影下的国家，这是一场比克什米尔、伊拉克或阿富汗更为艰难的战斗。印度最富饶的土地，最贫穷的人的家园，将成为国家的主要冲突地区。在未来五年乃至更长的时间里，政府将在不可能地形和条件下，对毛派叛乱分子进行新的大规模打击。

印度终于决定直面这场42年的叛乱。就规模和地形而言，这将是世界上最艰难的平叛战争之一。主要的战场是恰蒂斯加尔邦偏远的、森林茂密的巴斯塔地区——世界上最好的铁矿石产地——面积是克什米尔谷地的十倍，并且大片地区被叛军控制至少有二十年。

《印度斯坦时报》

2010年7月4日

第一章 关于当前印度内战的笔记

“印度是一个穷人的国家，但它不是一个贫穷的国家。”

R·帕尔梅·杜特
《今日印度》，1940年

《印度斯坦时报》是对的，在印度确实有一场内战，一场始于1967年纳萨尔巴里农民革命武装起义的战争。

不足为怪，随着印度国内生产总值以每年8%的速度增长，牛津大学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印度11亿人口中有55%，即6.45亿人生活在贫困之中。世界上大约三分之一的贫困人口生活在印度。饥者更饥，在全球饥饿指数排名中，印度的排名低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印度的八个邦有4.21亿贫困人口，而26个最贫穷的非洲国家共有4.1亿贫困人口）。

印度政府官方并没有称其为内战，而是更倾向于使用“低烈度冲突”这个词，这是英国将军弗兰克·爱德华·基特森爵士根据他打击肯尼亚茅茅党、马来西亚叛乱分子和北爱尔兰爱尔兰共和军的经验创造的。而在2007年12月1日，印度军队成为世界上第一支提出“次常规战争”理论的军队，这为在城市和农村地区开展反叛乱行动制定了准则和策略。印度陆军总司令J·J·辛格在发表这一理论时说，陆军专家们凭借他们近四十年来在打击叛乱方面的经验为今后的行动制定了指导方针。从政府这一方来说，这场次常规战争是由政府武装部队、正规警察，以及令人恐惧的组织像和平行动[1]、绿色狩猎行动，或者更为官方的COBRA（Commando Battalion for Resolute Action，坚决行动突击队/眼镜蛇小队）发动的。

在印度社会最受压迫的是印度种姓社会中的“不可接触者”，达利特人。这些部落和阿迪瓦西斯人一起，他们占了印度人口的四分之一。对于现在作为印度统治阶级的封建残余、官僚买办资本家和土生土长的亿万富翁来说，这些印度公民/臣民是一个完全可以牺牲的群体。他们被压迫，并且像五十二年前，在1958年雨季期间我第一次来到印度时一样饥饿。当时我完全震惊了。

我依然在这里。

但是实际情况比这更加糟糕。我第一次阅读一本严肃的关于印度的书是在1941年春天，我13岁快14岁的时候。在我父母的图书馆里，我在他们的书桌上发现了一本R·帕尔梅·杜特的《今日印度》。他们刚从伦敦的一个朋友那里收到这本书。我开始阅读。R·帕尔梅·杜特七十年前关于英属印度的描写对于印度共和国来说仍然是真实的：

在印度目前的情况中有两个突出的事实。一个是印度的财富——自然财富，丰富的资源，现有全部人口所能达到的潜在繁荣，以及超过现有人口的潜在繁荣。另一个是印度的

[1]Salva Judum，萨尔瓦·朱杜姆。

贫困——绝大多数人的贫困，一种任何习惯了西方世界条件的人所无法想象的贫困。

在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印度现有的社会和政治秩序问题。

第 39 页，拉贾尼·帕尔梅·杜特《今日印度》，伦敦，维克多·戈兰茨有限公司 1940 年

R·帕尔梅·杜特是 20 世纪欧洲和国际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之一。七十年过去了，他的《今日印度》仍然是关于印度最好的书之一。尽管存在缺陷，但情况确实如此。它们过去是——现在也是——具有代表性的。

纳萨尔派以及当今大多数印度历史学家、政治家和作家说起 1857 年起义都称之为“1857-1859 年印度第一次独立战争”，尽管有不同的历史解读。像 R·帕尔梅·杜特这样的共产党人无法理解 1857 年战争的民族性，这就提供了解释上个世纪人民运动在我们——帝国主义的——国家失败和今天印度民主运动的问题的钥匙。

对于殖民主义的英国来说 1857 年起义曾经是——并且仍然是——“兵变”。最新的一本关于这个主题的英国书籍是伦敦魏登菲尔德和尼科尔森出版社 2007 年出版的朱利安·斯皮尔斯伯里的《印度兵变》。平装本背面的简介很有代表性，开头是：

1857 年的夏天见证了一场由数千名背叛了他们指挥官的印度士兵发动的令人震惊的兵变。他们杀害了他们的上级，追捕妇女和儿童，在去德里的路上杀人放火。

这已经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统治阶级官方的观点。二战期间——就像一战期间一样——德国人宣传的重点集中在英国人的罪行上。但是关于 1857 年起义，1942 年德军内部教材中“国防军最高统帅部”指出：

1857 年起义是第一次也是迄今为止唯一一次反对英国人的大起义。但这不是人民起义，部分是军队的哗变，部分是感到不满的上层阶级的叛乱，比如大地主和先前莫卧儿皇帝的官员。（第 48 页，F·J·费伦巴赫《印度》，“国防军最高统帅部，1942 年/第 71 段，只供军队内部使用。”）

而这不仅是帝国主义的观点，也是左翼作家、共产党人和其他人普遍持有的观点。1922 年 8 月 10 日在莫斯科，当时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的领导人之一马纳本德拉·纳特·罗易在共产国际第一本关于印度的书的导言上署名。他在里面说道：

在 1857 年起义中我们可以看到推翻英国统治的第一次重要尝试，但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不能把它定性为一场民族运动。他不过是将要灭亡的封建主义的最后一次挣扎。（第 120 页，马纳本德拉·纳特·罗易《印度》，1922 年共产国际发布，卡尔·霍姆·纳奇夫，汉堡）

这一点在 1940 年得到了 R·帕尔梅·杜特的呼应：

1857年起义的本质特征和占主导地位的是旧的保守势力和封建势力的反抗，他们为了自己在毁灭过程中所看到的利益而推翻了当权者。起义的反动性质阻碍了任何广泛的人民支持并且注定了它的失败。（《今日印度》第274页）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写了关于印度和这场战争的文章。他们强烈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马克思指出，真正残暴的不是那些西帕依[1]，而是“英国本身在印度的所作所为”[2]（《印度起义》，1857年9月4日）。但印度第一次独立战争的提法并不是他提出的，它出现于半个世纪之后的印度民族独立运动。据我所知是1907年即将成为极右势力头目的二十三岁的V·D·萨瓦卡首次使用。

但是在这里问题变得更复杂了，189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通过了《爱尔福特纲领》后，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那个时代不同的——而且非常复杂的——斗争中如何判断和写作在国际上转变为一种僵化的意识形态，一种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生前曾对此表示强烈反对，恩格斯继续指出这种僵化（一种超越历史变革的理论）是违背了卡尔·马克思的基本思想的。

在我能看到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中，他们也把1857年起义看作是“反抗”和“叛乱”。只是在1990年的MEGA 2[3]的编辑注释中我发现1857年起义被定义为“人民起义”。

而宪章运动的领袖厄内斯特·琼斯从一开始就表达出更为鲜明的立场。在7月4日他写道：

你们这些英国工人将被召唤去流血牺牲，为维护人类历史上最不公正的巧取豪夺付出代价。英国人！印度人现在正在为所有对人类来说最神圣的东西而战斗。波兰人、匈牙利人、意大利人、爱尔兰人的事业不仅是正义的而且也是神圣的……你们这些英国人将被号召用你们的鲜血和财富来镇压世界上最崇高的运动之一……同胞们！你们有比协助剥夺别人的自由更好的事情要做——那就是，为你们自己的自由而斗争。

当燕妮·马克思在1857年8月11/14日写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信中针对厄内斯特·琼斯说了一句颇具讽刺意味——或者有点儿以欧洲为中心——的话时，这种差异变得更加明显：

……他把所有印度人都变成科苏特[4]的拥护者，他赞扬印度爱国者。[5]（MEGA 2，3/8，第458页）

但是要使用马克思的论述方法就必须记住，他关于印度和印度社会的主要

[1]印度土著士兵。

[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6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34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二版。

[4]1802-1894年，匈牙利民族英雄。

[5]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31页。

信息都是从弗朗索瓦·伯尔尼[1]（1625-1688）、蒙特斯图尔特·艾尔芬斯顿[2]（1779-1859）的著作和当时英国的官方资料中获得的，而且他大部分关于印度的作品是在缺乏信息的情况下为报刊写的。1857年8月15日他写了一些每位职业作家都知道是写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文字，是关于他已经寄给《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有关德里情况的文章：

这里的前提是，目前为止的报告都是确实的。可能我会出丑。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应用一些辩证法总会有所帮助。我当然是把我的论点说得在相反的情况下也是正确的。[3]（MEGA 2, 3/8, 第140/141页）

这使得无论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还是自由民主主义者，比如贾瓦哈拉尔·尼赫鲁，都无法将1857年起义视为印度第一次独立战争，直到1942年退出印度运动、1946年海军起义和1947年正式独立之后。

而到了1957年，印度第一次独立战争在印度成为被接受的术语。如果你仔细地看一下有关当时人民反封建的起义和运动的材料，它也——正如我在《印度等待着》中指出的一样——是正确的术语。对于要走毛泽东的道路的共产党人来说，1946-1951年特伦甘纳的武装斗争澄清了对1857年起义的看法。

但是R·帕尔梅·杜特并没有看到这一点，他也没有真正理解达利特人和阿迪瓦西斯人的斗争。他对印度多民族的特点意味着什么没有清晰的了解，也低估了宗教思想的作用。这样的原因不仅仅是他是印度父亲和瑞典母亲生的那么简单。事实上他的父亲，乌彭德拉·克里希那·杜特是一位技艺高超的外科医生，一位与许多访问英国的印度民族主义领袖关系密切的进步人士，还在剑桥的贫困社区当过“六便士医生”。他的母亲安娜·帕尔梅出身于瑞典老牌金融世家帕尔梅家族，而且是将来的瑞典社会民主党主席、瑞典首相奥洛夫·帕尔梅的姑姑。尽管拉贾尼·帕尔梅·杜特拥有大量关于印度的知识，并且对印度充满热爱，但是他在英国出生和长大，他的印度是一个理论上的印度。由于政治原因，英国政府不允许他去印度，他无法亲眼看见印度的情况。

不管是好是坏，共产党人R·帕尔梅·杜特尽管在理论上坚定地站在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立场，但是实际上这却变成了西方化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传统的典型，这正是阮爱国（胡志明）1924年7月1日在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严厉批评的。

引述八十多年前的那次发言是很重要的，因为它解释了各国共产党随后面临灾难的原因。无论帝国主义国家还是殖民地和附属国的共产党都执行了莫斯科的路线：

[1]法国医生、旅行家，1656-1668年游历印度，旅印期间曾将其见闻写成六篇文章，后由英国史学家史密斯汇编成《伯尔尼游记》一书。

[2]英属印度文官、历史学家，著有《印度史》（1841）和《英国权力在东方的崛起》（1858，残稿）等。

[3]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52页。

因此，这样说也并不过分：英、法的共产党一天在殖民地的问题上，还没有施行真正积极的政策，还没有同殖民地各国的人民群众接触，那么，两党的全部庞大的计划就一天无法得到如期的效果。这些计划没有效果，是因为它违反了列宁主义……

根据列宁的意见，西欧革命要想取得胜利，就必须同被奴役的各个殖民地国家的反对帝国主义、争取解放的运动紧密地联系起来。同时，正如列宁所教导的，民族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问题的一部分。

……

各个殖民国家的资产阶级做了什么来把各个被奴役的民族的大人民群众控制在压迫的框子内呢？做尽了一切。在使用国家机器给他们的便利条件的同时，还以演讲、电影、报纸、展览等其他工具竭力进行宣传，把殖民思想灌输给“宗主国”的人民，向他们描绘光荣、富裕和惬意的生活景象，正在各殖民地等待着他们。

还有如英国、荷兰、比利时及其他国家，那里的资产阶级正在占夺殖民地，我们在这些国家里的共产党曾经做了些什么？这些国家的共产党自从接受列宁关于以真正的国际主义精神和接近殖民地国家劳动群众的精神教育本国工人阶级的纲领后，曾经做了些什么？我们的党在这方面所做的一切工作，仍然无济于事。我是生长在一个现在是法国殖民地的国家的人，同时是法国共产党的一个党员，我很遗憾，我必须说我们法国共产党为殖民地工作得太少了。[1]

二战后东欧和西欧的情形使我对这种“西方的”共产主义的传统记忆犹新。R·帕尔梅·杜特对莫斯科中央的忠诚始终如一，即使它已经从核心开始腐化变质。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当印度共产党在共产国际实际上归很小的英国共产党领导时，他对印度共产党人提出的建议在印度产生了政治上的破坏性影响。[2]

这并不奇怪。卡尔·马克思引用了弗里德里希·席勒[3]的话：“世界历史就是世界法庭。”——写于1870年4月9日，致在纽约的齐格弗里德·迈耶尔和奥古斯特·福格特，关于殖民地（爱尔兰）问题。他的话对解释目前欧美关于“移民”的冲突，新殖民主义时代的帝国政治和“左派”持续的不起作用仍有很大帮助：

……英国所有的工商业中心的工人阶级现在都分裂为英国无产者和爱尔兰无产者这样两个敌对阵营……

报刊、教堂讲坛、滑稽书刊，总之，统治阶级所掌握的一切工具都人为地保持和加深

[1]见《胡志明选集》第一卷，越南外文出版社1962年版，第44-45页。

[2]1950年在特伦甘纳农民运动遭遇挫折时，英国共产党建议印度共产党停止武装斗争，印共派出代表团赴莫斯科也仅得到了斯大林模糊的指示：“看来斗争再坚持下去是有困难，对印度共产主义运动不能保卫这个斗争表示遗憾，但是，坚持斗争还是停止斗争这个问题，只能由印度共产党中央作出最后决定。”1951年10月印共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停止武装斗争，采取合法的议会斗争。

[3]1759-1805年，德国18世纪著名诗人、哲学家、历史学家和剧作家，德国启蒙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这种对立。这种对立就是英国工人阶级虽有自己的组织但没有力量的秘密所在。这就是资本家阶级能够保持它的权力的秘密所在。这一点资本家阶级自己是非常清楚的。

祸害还不止于此。它还越过了大洋……它使两国工人阶级之间不可能有任何认真的和真诚的合作。它使两国政府能够在它们认为合适的时候用互相恐吓的手段，必要时用两国之间的战争去缓和社会冲突。[1]

不过事实就像魔鬼的脚一样，经常是一分为二的。在英国接受教育的非洲学生们，他们在未来将成为非洲独立运动的领袖。他们通过阅读 R·帕尔梅·杜特写在《劳动月刊》专栏中的文章第一次接受政治教育，并且即便在他们进入总统府之后，也仍阅读这上面的文章。是的，尽管在今天的官方媒体上很少得到承认，但 R·帕尔梅·杜特是二十世纪富有智慧的领袖之一。这使得他的书从 1940 年到现在仍然是非常好的介绍印度的书之一。

印度现在正式独立了，尽管印度中上层阶级以下的人民仍然生活在 R·帕尔梅·杜特说的“任何习惯了西方世界条件的人所无法想象的贫困”之中，但富人还是像以前一样越来越富有。36 位印度亿万富翁的财富占印度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他们极其富有，并且表现出和其他统治阶级一样的特征。当被压迫的和饥饿的人民要求实现自己的权利时，他们心里就会不安。在今天的印度，当统治阶级用私家暴徒或者正规武装——和平行动和绿色狩猎行动——通过杀戮、强奸、纵火来建立法律和秩序时，他们会——像他们在瑞典、英国或美国的同类阶级一样——在议会和媒体上谈论恐怖，仿佛是受害者似的，为自己辩护。

印度从来都不是“非暴力”的，无论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作为一场反抗统治者的运动，非暴力运动产生了一图书馆的书，但是迫使英国人（部分地）离开的并不是非暴力。被压迫的群众一直在进行斗争，当时和现在都一样，每一个看过未经删减的南亚历史的人都知道。而从帝国时代起，意识形态决定了对关于印度的作品的审查是如此彻底，以至于像标准英文版的儒勒·凡尔纳的《神秘岛》这样给年轻人读的公开的非政治性书籍，在英国也被清查了。儒勒·凡尔纳关于尼摩船长和 1857 年起义的原文也被认为带有颠覆性，于是由于政治因素而改写以符合大英帝国的利益。

英国人不得不在 1947 年放弃他们的公开统治，因为他们的统治被打破了，因为战争期间“退出印度”运动比当时官方审查制度允许公布的要强大的多，因为在德里红堡对前印度国民军军官的审判和孟买海军起义表明英国人无法再依靠他们的武装力量了。但他们留下了一个国家结构作为镇压人民从心底里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的工具。

甘地在历史上是有重大影响的。在很多方面他都是一个政治天才（例如“食盐进军”），但是“非暴力”在这些反抗统治者长期对南亚人民——通常是极端的——暴行的人民斗争历史中始终没有真正起到决定性作用。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在印度目睹官方那些旨在鼓励印度社会底层那 25% 不必要的人口的项目和政策不仅成为官话和空话，而且已经是空想主义的了。而

[1]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版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484-485 页。

空想主义在道德上有多么值得被称赞，在社会上就有多低效。我看到的实际情况是这些项目和政策为官僚、“援助工作者”（来自不同国家的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和印度国内外大量政治上卑躬屈膝的作家提供了令人愉快的生计（部分是直接的贪腐）。

我记得 1960 年的一个晚上，我和来自国际合作社联盟的朋友贝蒂尔·马松在他在桑达尔讷格尔[1]的住处。突然门开了，一个男子走了进来，他是刚从当时的东巴基斯坦[2]调来的瑞典援助官员。他看着我们说：

“我一年能拿到十万克朗（在那时是一大笔钱）。你们是做什么的？”

他自然是贪污了。我们沉默地看着他，我们是不在这个圈子里的。不是所有在印度的外国人都是这样，但是我见过很多像他这样的人。整个国际援助体系都散发着腐败的芳香。我记得 1959 年我们住在德里的职工保护区时，一位负责处理由甘·凯丝丽（图片）和我（文字）制作的关于亚洲的教育影片的加利福尼亚出版商来拜访我们。他想带我们去参加邻居正在举办的聚会。

他负责管理美国在印度的对等基金[3]，像是在钱海里游泳。我刚刚让他为一个用 IBM 穿孔卡片检索系统把所有类型的印度乡村陶器系统化的项目提供资金，那将让我在这件事上花几年时间。如果你有什么提议，只要他打开水龙头，钱就会源源不断地涌出来！

我和我的妻子甘·凯丝丽一起去了聚会，喝了很好的威士忌，见到的大多数人都是在德里为国际援助业务的不同项目工作，但我们很小心，没有向东道主要钱。

在印度的国际援助协会是以像在大英帝国那样的大城市为中心的，而当时和现在一样，在大城市之外自然还有一个真正的印度，英国人称之为“mofussil” [4]。

在乡下总是发生大大小小的叛乱，被压迫者进行了反抗。除了 1857 年那次如今被印度官方称为“第一次独立战争”的大起义外，这些不断发生的叛乱大部分已经从官方的历史中抹去。但是如果你自下而上，站在人民的角度看历史，英属印度的历史就是一部人民不断起义的历史。

在这些乡下的叛乱和起义中人民大多以传统的方式，用弓箭和刀与一一外国的和本国的一一统治集团进行斗争，有时会用枪和炸弹，并且是为传统的社会目标而战。在中央的和在乡下的人民社会斗争之间已经出现了差异。

这种差异说明了现在印度社会的两极分化，反过来现在印度社会的两极分化又解释了这种差异出现的原因。一方面是核武器、人造卫星和最现代化的工业，另一方面是大规模的贫困，约十万贫农因为无力偿还贷款而自杀。

印度是世界上文盲人口最多的国家，同时也拥有一些世界上最优秀的科学家和最好的大学。而且，根据我个人的经历，在新德里你会发现比斯德哥尔摩

[1]Sundar Nagar，印度喜马偕尔邦城市，“Nagar”是印度语言中“城”的意思，所以也可译作“桑达尔城”。

[2]1971 年独立，1972 年 1 月正式成立孟加拉人民共和国。

[3]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迫使接受美援国家用本国货币设立的同援款等值的基金。

[4]意为“乡下”。

好得多的书店，那里不仅堆满了进口书籍，而且除了所有以不同民族语言出版的印度作品外，你还会发现印度是英语图书出版的第三大市场。此外，在孟买或者加尔各答，你可能有幸参加水平远远高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乃至整个北欧的——工程学、历史学、文学、物理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等——学科理论问题的探讨。

这有政治上的影响。印度所谓的中产阶级（请注意，这不是处于中间的阶层）之间的政治讨论和行动是自由的，和一百五十年前的殖民国家英国一样。在当今的印度，一位社会学家可以坐在图书馆里，从政府的官方记录中寻找对周围社会进行有理有据的指责的材料，就像卡尔·马克思当年在大英博物馆查阅“蓝皮书”一样。

据我所知这是一份现在只有在印度才能查阅到的政府官方记录：

【印度政府农村发展部《国家土地关系委员会和土地改革未完成的任务》，第一卷（报告草案），2009年3月】结论——哥伦布之后最大的部落土地掠夺

恰蒂斯加尔邦南部的巴斯塔、丹特瓦拉和比贾布尔地区已经陷入类似内战的局面。交战双方分别是以前的人民战争集团[1]，现在称为印度共产党（毛主义）的由部落男女组成的武装队伍，以及由政府创建和鼓励，得到中央警察部队组织和火力支持的和平行动的部落武装。如果按剧本演下去，这场公开宣战的战争将成为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土地争夺战。这场戏的剧本是塔塔钢铁公司和埃萨钢铁公司编写的，他们想要数量为7个及以上的村庄，在每个村庄都能开采到印度最丰富的铁矿石的矿脉。

在今天巴尔干半岛、南欧、法国和德国的大部分地区——一直到最近在整个拉丁美洲——印度“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平常参与的讨论和行动都会为他们打开监狱的大门。现在很多——大部分——印度知识分子都没有意识到这个“印度的例外”。

在美国，“第一修正案”[2]的部分内容仍然受到尊重，这与欧洲的法律状况截然不同。在欧洲，正式的法律保障是不足或者存在缺陷的，这样的行为无论如何都会为他们关上“公开辩论”的大门，并且他们会遭受到社会上、知识和学术上的排斥。

在印度，这些“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可以公开发表言论，直到法律、“情报”和警察部门的这个或者那个统治阶级的代表发现他们已经越过了无形的界限。然后他们就会被多年监禁、殴打、拷问，甚至在所谓的“遭遇战”中被杀死。“遭遇战”，一个和“chapati”[3]一样的印度的词，指的是一个三十年代意大利或者现代毒品国家的任何一位警官都知道的程序：如果你能抓住所谓的颠覆分子而不被敌对的目击者看到，你就杀了他们并把他们丢在路边！（在第三帝国[4]他们把它叫做“试图逃跑时被击中”）

[1]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人民战争集团于1980年4月22日在安得拉邦成立。

[2]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是美国新闻言论自由的法律根源。

[3]意为“印度薄饼”。

[4]纳粹德国。

需要举个例子吗？那就拿克什米尔来说！印度官方认为克什米尔是印度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据我所知没有其他政府会公开和明确地同意，联合国也不会。出于外交原因，他们的代表会支支吾吾，闪烁其辞。但是原则上，四目相对时他们一致认为联合国克什米尔委员会 1949 年 1 月 5 日通过的决议（次日印度和巴基斯坦都接受了该决议）仍然是唯一合理的解决方案：

一、克什米尔加入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问题将通过自由和公正的公民投票的民主方式来决定。

我们这些当时有政治觉悟和积极性的人都记得的正是官方的外交官和政治家现在更喜欢忘记的，拥有军事实力的印度政府安排小的朱纳格特土邦和大的海得拉巴土邦“正式加入”的方式，和它用外交手腕安排克什米尔加入的方式是一样的。印度政府的代表有意地欺骗了联合国，无论发生什么事情他们都不会允许克什米尔人通过“自由和公正的公民投票的民主方式”决定自己的命运，原因是他们——和巴基斯坦政府一样——相信在这种情况下克什米尔人会决定独立，就像尼泊尔那样。尽管印度政府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是克什米尔人通过他们的行动仍然表明他们希望实行 1 月 5 日的决议，而印度政府没有。这就是为什么克什米尔人的鲜血在山谷中流淌了六十年。

如果你是一个著名的印度知识分子，你可以用更谨慎的语言来写这件事——并幸免于难。如果你不那么出名，你会被关进监狱或者被杀掉。作为一个外国人，我可能只会被吊销签证。

当然，政府有可能以“煽动叛乱”的罪名起诉那些知名人士，根据 1961 年《刑法修正法案》第 2 条，“质疑边界的领土完整”是煽动叛乱，而且根据最近的一次判决，这也适用于不在印度居住的外国公民。

在长达十年的合法斗争中，印度这个国家进一步表现出类似狄更斯笔下描写的奇怪特征，公正陷入了官方迂回曲折的说法中，然而当这个国家突然露出獠牙，表现出残忍和公开的阶级暴力时，却似乎没有受到任何法律约束。

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在今天 2010 年 10 月 28 日，《印度时报》可以报道：

前警察总监因 40 年前的纳萨尔谋杀案被判刑。纳萨尔派领导人 A·韦尔盖塞在一次“遭遇战”中被杀害的四十年后，本周四科奇[1]的 CBI[2]特别法庭判处前警察总监 K·拉克什曼终身监禁……奈尔回忆说，韦尔盖塞在蒂鲁内尔维利[3]的藏身处被捕后，拉克什曼对看守监狱的警察训话。

他要求任意四个想要射杀韦尔盖塞的人举起手来——韦尔盖塞戴着手铐，被蒙住了双眼。

奈尔说，当他拒绝举手时，拉克什曼说据报道许多警察也在遭遇战和意外事故中被杀，很快奈尔意识到危险并且同意了，最后，他被选中去杀死韦尔盖塞。

[1]印度南部城市。

[2]中央调查局。

[3]印度米尔纳德邦南部城市。

因此报纸报道说，经过四十年的法律和新闻斗争，一名犯了罪的凶残的警监被判谋杀纳萨尔派领导人的罪名成立。

但是该报纸还平静地报道说，7月2日，根据所有证据，印度共产党（毛主义）的发言人阿扎德[1]在一次遭遇战中被安得拉邦特种部队杀害，遗体被丢弃在阿迪拉巴德丛林中。他们能够抓住阿扎德是因为他们已经被告知，阿扎德将从此经过去参加为和平谈判做准备的党的领导人会议。双方的停火方案就是内政部长奇丹巴拉姆和党一直由2004年诺贝尔替代奖“正确生活方式奖”的获得者，德高望重的阿格尼韦什教师作为中间人交换信件。

这种双重的政治现实既给了印度政治运动巨大的力量，同时也削弱了他们的力量。

查鲁·马宗达[2]在六十年代末（通过现在所说的《历史性的八份文件》）为一种区别于当时以高种姓为主、具有软弱性的运动的另一类型的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从而引发了一种有新的政治意识的武装斗争。43年前的纳萨尔巴里起义确实是1967年7月5日北京的《人民日报》所写的“霹雳一声春雷，震撼着印度的大地”。虽然中国官方早就放弃了这一观点，但是从那以后，印度底层的人民不仅斗争，而且是有意识地、政治性地斗争。印度的阶级斗争已经有了质的飞跃。

1980年我在孟买与当时的纳萨尔派和共产党领导人钱德拉·普拉·雷迪[3]讨论了查鲁·马宗达的政治遗产，然后他把我送到了安得拉邦。可是不仅他的党武装力量相当薄弱——即使充满了斗志——而且他的派别与当时其他纳萨尔派组织的情形类似，正如他自己告诉我的那样，都是一个非常分裂的运动的一部分，没有任何一个领导人具有全印度的地位。

这一次，三十年之后，我和我的老朋友、来自德里人民民主权利联盟和孟买《经济政治周刊》的高塔姆·纳夫拉卡被邀请到丹达卡兰亚与总书记、印度共产党（毛主义）政治局以及军队领导干部进行讨论。

现在的情况与1980年大不相同，纳萨尔派中间的分歧正在被解决。该党现在是一个具有全印度地位的政党，是一个深深植根于印度历史的革命和民主的国家组织，人民政府这个人民政权在游击区现在正逐步取代统治阶级的国家机构，武装力量人民解放游击军——已经强大到足以使政府军遭受真正的重大损失。

自那时以来发生了许多事情，那里发生了许多变化。查鲁·马宗达早就已经死在了监狱里——被一些高级警官谋杀了——而他的言论和行动在历史上的重要性仍在不断提高。正如总书记在接受我们采访时所说：

[1]1951-2010年，原名切鲁库里·拉吉库马尔，“阿扎德”是“自由”的意思。

[2]1918-1972年，印度共产主义革命家，领导了纳萨尔巴里起义，后与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决裂，在1969年4月22日组建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担任印共（马列）总书记。70年代初纳萨尔巴里农民武装斗争失败后，马宗达因叛徒出卖被捕，死于狱中，印共（马列）也分裂为诸多派系。

[3]1917-1984年，时任印共（马列）临时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在1980年组建了印共（马列）雷迪派。

我们敬爱的创始人，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查鲁·马宗达同志和卡奈·查特吉[1]同志……领导了对印度共产党[2]和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3]的修正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长期不断的思想和政治上的斗争。

在这场斗争中，只有修正主义政党的骨干被打垮，从而使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取得突破性进展，由于查鲁·马宗达同志和其他真正的毛主义者在各个阶层进行这场伟大斗争，伟大的纳萨尔巴里农民武装起义如春雷般爆发，开启了一段新的历史。此后我们的两位伟大领袖高举纳萨尔巴里的红旗，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

总的来说查鲁·马宗达过去和现在都是“先行者”，当然他在他那个时代犯了错误。卡尔·马克思在写关于印度的文章的时候也犯了错误（比如那些一成不变的农村）。印度共产党（毛主义）已经纠正了这些错误，只是因为他们是纳萨尔派，并且视查鲁·马宗达为真正的毛主义者和党的创始人。

但是由于这些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在关于纳萨尔巴里运动的资料中仍然被引用，对它们进行讨论就是很重要的了。主要有三个：

（1）像“毛主席就是我们的主席”这样的表述是错误的、伤人的。没有一个外国领导人能成为任何其他国家的任何政党的领袖。毛主席本人也在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这种倾向作斗争。

（2）“以前在查鲁·马宗达同志领导下的路线是漠视群众组织的，后来我们又重新思考，经过认真的自我批评检讨，承认早些年犯了一些错误。并在此基础上，为了发展，我们重新进行了这场运动。自我批评检讨是在 1974 年进行的，到 1977 年 8 月，党内的力量才被说服。1980 年 9 月的安得拉邦党代会重申了这一点，实际上标志着一种新的做法的开始。”（总书记接受我们的采访）

（3）特别是从 1969 年 12 月起，查鲁·马宗达发展了一种理论——以及实践——通过武装集团的秘密行动歼灭阶级敌人中的个别重要成员来迅速取得革命的胜利，然后其他阶级敌人就会逃跑，一个解放的农村就会形成。作为一种政治理论和实践，这可以通过比较十九世纪俄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其他贫穷的农业社会中不同的无政府主义团体的路线来理解。

比如俄国的民粹派，后来组织了“Narodnya Volya”，民意党，使用了恐怖主义的手段。列宁的哥哥亚历山大·乌里扬诺夫就是参与刺杀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主要成员，并于 1887 年 5 月 20 日被绞死，年仅 21 岁。1925 年 1 月 22 日

[1]1933-1982 年，印度共产主义革命家，印度共产党（毛主义）的前身之一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的创始人。

[2]1920 年印度成立共产主义小组，1925 年召开的印度共产主义者第一次全国会议成立了印度共产党，1933 年 12 月建立全国性政党。印共在 1964 年公开分裂，以党主席丹吉为首的一派仍沿用“印度共产党”的名称。1981 年 4 月，丹吉因党内分歧被开除出党，印共再次分裂。

[3]1964 年以孙达拉雅和南布迪里巴德为代表的一派从印度共产党分出后成立了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1969 年印共（马）又分裂成了印共（马）和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印共（马）曾在西孟加拉邦、喀拉拉邦、特里普拉邦执政。

《真理报》登载了列宁的《关于 1905 年革命的报告》，里面写道：

他们发扬了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并且以自己英勇的、恐怖主义的斗争方法震惊了全世界。毫无疑问，这些牺牲并不是枉然的，他们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了以后的俄国人民的革命教育。但是他们的直接目的，即唤起人民革命这个目的，并没有达到而且也不可能达到。[1]

这条“歼灭路线”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也导致了巨大的失败，并且招致党内外的批评（而且当中国领导人读到查鲁·马宗达写的只有他才能成为一个准备用敌人的鲜血来洗手的革命者时，也感到震惊）。印度共产党（毛主义）早就通过讨论和自我批评，在维护马宗达伟大的革命者地位的同时纠正了这种偏差，并把“歼灭路线”定义为不符合“统一战线”和“持久战”的理论和实践。

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让全世界的读者了解一些关于这场斗争的事情，通过讲述我所看到的，以及根据我们过去七十多年的经历，我如何评价这场由地球上的被压迫者为了公平的生活而展开的不断扩大的战争。

但这是他们的国家和他们的战争，他们不需要任何善意的外国友人的建议。我尽量记住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动荡岁月期间，路易·艾黎[2]在北京对我说的话：

“记住，这是他们的国家！”

被压迫者总是有权利反抗他们的统治者，这在 2010 年的印度和在历史上都是符合事实的。但作为一名作家我的职责是尝试着去解释这场斗争，并让印度以外的读者，也许还有印度的读者，更好地理解为什么人民要反抗，以及人民是如何进行反抗的。我不是要告诉印度人民该做什么，怎么做。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读了 4 月 12 日的《印度时报》。我似乎还有其他的读者，是官方的：

随着毛派威胁要发动更多的丹特瓦达式的袭击，中央已要求各邦和中央后备警察部队保持警惕，并正在研究化名贾纳帕蒂[3]的毛派头目穆帕拉·拉克什曼·拉奥最近关于新的“战争策略”的评论。鉴于纳萨尔派的警告，新的警报在星期六晚拉响，并于星期天再次发出。

即使自 4 月 6 日 76 名安全部门的人员遭到杀戮以来，军队一直处于全面戒备状态，中央还是要求各战区的指挥官们采取足够的防范措施，因为他们意识到极端分子的警告可能不仅仅是简单的空话。

[1]见《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8 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322 页。

[2]1897-1987 年，新西兰教育家、作家，中国的“十大国际友人”之一。

[3]生于 1949 年，原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人民战争集团总书记，2004 年印共（马列）人民战争集团和印度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合并成印度共产党（毛主义），贾纳帕蒂担任总书记。2018 年 11 月，由于年事已高和健康状况恶化，贾纳帕蒂主动辞去印共（毛）总书记职务。

与此同时，中央后备警察部队的军事战略家们正在从贾纳帕蒂最近接受瑞典的作家和专栏作家扬·米尔达采访时说的话中“重温”这位毛派头目在关键问题上的罕见言论，包括纳萨尔派如何定位他们自己取得的进展。

一位高级官员说：“对任何威胁，在等着看它的真实性时，我们都不能对它掉以轻心。毕竟，这样的威胁与贾纳帕蒂在最近的采访中透露的大体上是一致的。”

贾纳帕蒂告诉米尔达，毛派游击队会像“蜜蜂”一样追击安全部队的大本营。军队现在正试图弄清楚这是什么意思。

谈到一月份在东高止山脉^[1]森林中的某处接受的长达 22 页的采访时，这位官员说：“如果我们想要对抗他们，了解他们是很重要的。”

现在我也在网上看到当今的印度统治者“不是徒然佩剑”（罗马书 13.4^[2]）。内政部长 P·奇丹巴拉姆在 2010 年 5 月 6 日星期四特意警告他所谓的“知识分子”，他警告的是像我、高塔姆·纳夫拉卡和阿兰达蒂·洛伊^[3]这样已经去了丹达卡兰亚，目的是报道那里情况的作家：

政府要求人民警惕印度共产党（毛主义）的宣传。

政府注意到一些毛派领导人直接与某些非政府组织/知识分子联系，宣传他们的意识形态，并说服那些人为印度共产党（毛主义）提供支持，这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根据 1967 年的《非法活动（预防）法》第 39 条，任何人犯下支持此类恐怖组织的罪行，特别是企图进一步推动此类恐怖组织的活动的，处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罚款，或者两罪并处。大多数公众被告知要对印度共产党（毛主义）的宣传保持高度警惕，不要无意中成为这种宣传的受害者。

这是为了公众的利益而发布的，以便大多数公众明白，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以及他们建立和领导的所有组织都是恐怖组织，其唯一目的就是武装推翻印度的政权，他们在印度的议会民主中没有地位。印度共产党（毛主义）继续冷血无情地杀害包括部落成员在内的无辜平民，并摧毁重要的基础设施，如道路、涵洞、校舍、村级潘查亚特^[4]的建筑等，从而阻止这些欠发达地区的发展。

我希望大多数读者能明白政府对印度共产党（毛主义）活动的描述完全是不正确的。但是我不确定印度以外的读者——或者甚至是印度的读者——是否知道政府提到的“第 39 条”是多么离奇，因此我将引用它。即使是法西斯也不会公然制定这样的口袋条款！（任何人都有可能成为“印度的叛乱分子”）

[1]印度德干高原的东缘山脉。

[2]罗马书是《圣经》新约的一卷书。

[3]生于 1961 年，印度著名女作家、社会运动人士及左派知识分子，代表作品《微物之神》。2010 年 2 月，印共（毛）纳萨尔派武装组织在她家门缝下塞进一片纸，邀请她去丛林，在丛林里待了两个星期后，她写出了新书《破裂的共和国》。

[4]或译作“格拉姆潘查亚特”，即“村级管理委员会”，印度潘查亚特制度下的乡村基层自治机构。

39、涉及支持恐怖组织的犯罪。

(1) 支持恐怖组织而犯罪的人。

(a) 为了促进恐怖组织的活动，受该组织邀请支持该恐怖组织的，该支持不限于提供第 40 条规定的资金或其他财产；

(b) 为了促进恐怖组织的活动，组织、指导或协助恐怖组织的；

(c) 为了促进恐怖组织的活动，在集会上发表言论的。

(2) 根据本款规定，任何人犯下支持此类恐怖组织的罪行，处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罚款，或者两罪并处。

但是无论印度统治阶级通过了什么样的法律，我现在都要写下《红星照耀印度——地球上的不幸者正在反抗，印象、反思和初步推断》，这是一种责任。

无论内政部长 P·奇丹巴拉姆会做什么，我都要给他寄去一份！

对于那些质疑这本书的书名“红星照耀印度”的人，我想说，我写这本书的灵感自然是来自于埃德加·斯诺和他的《红星照耀中国》。我很早就受到他的影响，1962 年我跟随他的足迹来到了延安郊外的柳林。但是请记住，1936 年他写《红星照耀中国》时在陕北待了四个月，而 2010 年我在丹达卡兰亚只待了十六天。

而且也要记住，1936 年埃德加·斯诺写下他的书，其间经过了二战的爆发，直到十三年后的 1949 年 10 月 1 日，中国的五星红旗终于在天安门广场上冉冉升起。

第二章 回到印度

我丧妻成为一个鳏夫之后，最近再婚了。2009年秋天我在马普托^[1]工作，试图了解莫桑比克从1975年独立到1977年至1992年的内战结束的复杂发展历程。

但印度在我的心里并不遥远。因此我在网上阅读并打印出了2009年9月29日《亚洲时报》上悉达特·斯利瓦斯塔维的报道：

印度政府正准备发动规模最大，组织最严密的攻势，打击长达四十年之久的纳萨尔派（共产主义叛乱分子）叛乱，这场叛乱影响了这个国家大片地区的数亿人民。

有计划让超过10万的联邦准军事部队参与这场战役，这些部队甚至是从暴力冲突不断的印控克什米尔地区撤出来的。印度计划让自己的国防军参与进来，并且已经就如何最好地铲除左派叛乱分子向美国安全官员征求了意见。

我刚回到瑞典，之后在除夕夜我和我的妻子安德莉亚·盖坦正在为新年准备传统的家庭晚餐时，我收到了来自印度共产党（毛主义）的一条消息。十二天后我将在东高止山脉巴斯塔地区的丹达卡兰亚森林见到总书记以及党和人民解放游击军的其他领导同志。

安德莉亚和我讨论了情况，然后我就开始在网上订购土耳其航空公司飞往新德里的机票。我是能去的，因为我可以用瑞典国家文学基金的拨款在印度作一个关于斯特林堡^[2]的讲座，这能为我提供买票的资金（后来我在德里的大学做了关于斯特林堡和瑞典文学的讲座）。

我在2009年的除夕夜收到这个邀请并不是那么离奇。从某种程度上说，在读到政府对纳萨尔派发动的战争愈演愈烈之后，我就一直期待着这个消息。

从我第一次去印度到现在已经五十二年了。当时我在那里住了几年，自那以后我经常在印度写关于古代艺术和现代政治的文章。

三十年前我报道了我和甘·凯丝丽以及我的女儿伊娃·米尔达在那时安得拉邦的“动乱地区”访问并跟随毛主义武装队伍的情况。当时并没有多少所谓的“西方”作家这样做。在那次访问之后我终于能够完成我1958年开始写的那本关于印度的书。

第一个印度版本的《印度等待着》（森格姆出版社1984年）在387页结尾处写道：

在我们从东高止山脉的营地下来的路上，我们正在戈达瓦里河边休息时，一位中年男子向我们走来。他是科亚部落的伐竹工，几乎全身赤裸，只围了一件小得可怜的缠腰布。他笑着张开双臂，精瘦而又强壮。

“Lal salaam! [3]”他说，“致以革命的问候！世界是我们的！”

[1]莫桑比克首都。

[2]1849-1912年，瑞典作家，瑞典现代文学的奠基人。

[3]意为“革命万岁”，是游击区的“红色敬礼”。

那本书在印度已经以英语和其他语言发行了好几个版本。正是那本书使我现在受到了印度共产党（毛主义）的邀请去丹达卡兰亚。领导同志们都读过《印度等待着》。

所以我在三十年前所写的内容和当时所持的立场就是我受到邀请的原因，也是我一收到邀请就知道，我必须回到印度去听印度共产党（毛主义）总书记贾纳帕蒂和其他负责的领导人讲话的原因。

我是有倾向性的，我们都有，没有一个社会性动物会是公正的观察者。我相信归根结底是人民（我在新政^[1]时期的纽约长大，那时称作“普通人”）的斗争产生和决定了历史，但是这一过程可能会很漫长。我没有水晶球，不能未卜先知。只有在我所处的时代很久之后的读者才会知道最终的答案，而不是我。

我现在八十四岁了。在丹达卡兰亚森林的一个早晨，当我刚醒来躺在睡袋里时，我意识到三十年之后我早就死了。事实上即使在十年内我也不太可能活着并且工作，所以我永远无法知道现在这场斗争的最后结果。

回顾过去八十多年中的人民斗争、希望和恐惧，我觉得自己就像传说中的老怪物：

我已经见过七片橡树林从生长到腐烂，但是至今还没有得到拯救。正因为我的倾向，我的信仰和希望，我不能看到只是一个乌托邦式的观点摆在我们面前。反乌托邦不是一种文学类型，而是一种非常真实的显示人性的可能。毕竟欧洲大陆从农民战争^[2]的失败到法国大革命的胜利不得不经历持续近三百年的压迫和不断强化的农奴制。

印度的精英们对他们的人民发动的战争并不是不久前的战争，甚至不是过去的战争，也不仅仅是后独立时代的战争。在过去几年中，随着人民以越来越大的规模保卫他们自己，反人民的战争也变得更加激烈。

印度人民在这场穷人与富人的长期斗争中从来都不是被动的受害者，他们已经进行了反击。他们在英国人来之前这样做，在英国统治期间这样做，并且现在仍在这样做。

但是在过去的四十三年里，自从查鲁·马宗达和他的同志们在纳萨尔巴里发动武装起义以来——斗争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一场人民武装斗争正在发展。我在三十年前描述的武装队伍已经成长壮大：他们现在是人民解放游击军和一个已经非传统的政府结构人民政府，正在丹达卡兰亚发展。不过路还很长，印度共产党（毛主义）并没有说明什么时候能够在旷日持久的人民战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或者作出在未来几十年中已经取得这样的胜利的假设。

我读到 2010 年 3 月 5 日联邦内政秘书戈帕尔·K·皮莱在一个关于“印度左翼极端主义形势”的研讨会上说，毛派计划在 2050 年到 2060 年赢得胜利。如果任何一位负责的纳萨尔派领导人真的已经用如此明确的措辞讨论未来，我会感到惊讶，这不是很马克思主义或毛主义！

在 2010 年我并不是东高止山脉游击区唯一的“外来者”，我和我的老朋友

[1]罗斯福新政。

[2]1524 年爆发的德国农民战争。

高塔姆·纳夫拉卡一起来到这里。后来在冬春之际，阿兰达蒂·洛伊也到了丹达卡兰亚。

我们都受到了邀请，来自印度政府所谓的国家的敌人：“毛派叛乱分子”。

因为印度政府已经关闭了他们称之为“红色走廊”的贯穿印度的战争地区，并试图审查消息，甚至散布关于“印度红色威胁”的彻头彻尾的谎言，所以对于印度共产党（毛主义）来说，让外国和印度的观察者来到丹达卡兰亚一直都是非常重要的。

因此不仅只有我在写作，目前至少还有另外两份来自丹达卡兰亚，关于毛主义者的斗争和工作的报道已经写成。不过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就是另外两份文稿是由印度作家阿兰达蒂·洛伊和高塔姆·纳夫拉卡撰写的。

阿兰达蒂·洛伊在 2010 年 3 月 21 日的《瞭望》杂志上发表了她的精彩的故事《与同志们同行》。她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与我们瑞典的萨拉·利德曼并无不同。来自孟买《经济政治周刊》和德里人民民主权利联盟的高塔姆·纳夫拉卡，曾和我一起去丹达卡兰亚，他于 2010 年 4 月 1 日在 Sanhati 网站上发表了他精心记录的一篇《在叛乱中心的日日夜夜》。

我的观点与高塔姆·纳夫拉卡和阿兰达蒂·洛伊不同，我是老一辈的人，而且也有着明确的革命、反帝和“支持第三世界主义”的传统。不仅两个世纪前的法国大革命、1871 年的巴黎公社和 1917 年的俄国革命在这个传统中起到了决定性的重要作用，从 1912 年开始的墨西哥革命也是如此，更不用说最近的中国革命了。

在我眼中，2000 年在安得拉邦和现在 2010 年在丹达卡兰亚遇到的纳萨尔派，明显类似于他们的前辈，在他们之前推动了伟大革命的农民和在法国传统中被称作“menu people”的小人物。

现在是 2010 年，我已年过八十。我在思想上和政治上都被这几十年的历史性成就和严重挫折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1945 年以后，我经历了规模很大的法国共产党由于不能站在反帝的立场上违背“法国的”利益（1945 年的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和阿尔及利亚大屠杀，1947 年的马达加斯加起义，阿尔及利亚争取独立的斗争）而烟消云散。1955 年在巴黎，我问一位曾和我在布达佩斯的 WFDY[1]总部坐在同一张办公桌上办公的法国同志，为什么只有左翼知识分子为阿尔及利亚独立明确地发声，而党却没有这样做，他对我说：“法国工人阶级把阿尔及利亚看作是法国的三个部门。”

从七十年前保存至今的大多数壁画上面的墨西哥革命和拉萨罗·卡德纳斯[2]的墨西哥有助于勾勒出我早年的生活情况。二十多年来，俄罗斯已经公开否定了俄国革命和列宁的言论，现在的俄罗斯政府甚至不想公开地纪念托尔斯泰逝世一百周年，因为俄国东正教会于 1901 年将他开除教籍。在墨西哥，就像在俄罗斯和战后东欧的人民民主国家一样，革命和社会主义的理想似乎已经被所

[1]World Federation of Democratic Youth，世界民主青年联盟。

[2]1895-1970 年，墨西哥总统，领导了 20 世纪 30 年代的墨西哥改革。

谓的现代窃盗统治[1]所取代。在中国，毛泽东所说的“两条路线斗争”的结果是他的革命路线失败了，而“走资派”可以在 1949 年以来他的政策所推动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上使中国成为一个全球化的经济超级大国，但是富人和穷人之间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差距却日益扩大，令人震惊。

但这些革命确实改变了世界。即使是 1814 年的“复辟”，也不过是对贵族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的失败以及 1789 年至 1805 年新阶级在法国掌权的合法性的一次确认。当我转身回顾过去的 19 世纪和 20 世纪整整两个世纪时，无论如何我只能借用伽利略说的：“但它仍然在动。” [2]

对于我关于印度的写作来说，更重要的是即使我在印度待了很多年，我也知道我不是印度人，我有非印度的民族和国家背景。五十年前，我相信——正如我们所有的“左派”在当时做的那样——民族和国家背景在大局中是次要的细枝末节。现在我很遗憾地了解得更清楚了。

访问期间，我和高塔姆·纳夫拉卡与三位领导党的代表进行了长时间的正式讨论：贾纳帕蒂，印度共产党（毛主义）总书记；索努，印度共产党（毛主义）政治局委员；以及刚从监狱获释的穆拉里，在被捕入狱之前，他是印度共产党（毛主义）负责西南地区局的政治局委员。

当我们要离开游击区时，我们得到了这些会谈的大量授权记录，最后的结尾是：

各地党的领导、人民解放游击军的同志们和人民群众热情地安排了欢送活动，衷心祝愿扬·米尔达同志健康长寿，并向扬·米尔达和高塔姆·纳夫拉卡同志致以最美好的祝福。两位同志也愉快地发言，感谢全体同志的配合，使这项任务圆满完成。

我引用这段话是因为我不想给人留下我过去和现在都是某种“中立观察者”的印象，这样的动物根本不存在。在读过马克思、列宁——还有埃德加·斯诺！——的书后，二战期间，我在 1943 年参加了我自己“组织”的反法西斯青年工作——正如我们当时所说的那样。因此，尽管因为看到了当时苏联周围的共产党的腐朽，近五十年来我一直是一个无党派的共产主义者，但在过去的六十八年里我一直是一位“同志”，这一点应该说清楚。

我将在我的写作中使用一些我离开丹达卡兰亚时得到的材料，但重要的是读者有可能确切地读到他们作为党的代表对我们说的关于这场运动的历史和现状的内容，而不需要我进行任何的改写。他们可以通过访问 <http://www.RedStaroverIndia.se> 中的“文档”来做到这一点，我将这些文件连同一份当时的中央委员会发言人阿扎德就总书记关于谈判的讲话的评论和一份总书记论新民主主义国家政权的文稿作为一个完整的文档上传到了那里。

重要的是明白我的“反思”和文档之间的区别！

[1]一种政治腐败的形式，又称黑社会主义，指在某个政府中，某些统治者或统治阶级利用政治权力，来让自己私人的财产增加，以及扩张政治权利，侵占了全体人民的财产与权利。

[2]据说这是伽利略在宗教裁判所聆听对他宣扬哥白尼日心说一案的判决时低声嘟囔的话。

丹达卡兰亚以疟疾和其他的发烧病症闻名。当我们离开巴斯塔的游击区时，我收到了一封来自阿吉拉的亲切的信，这位干部一直在和我讨论安得拉邦达利特妇女的处境。她写道：“这里的疟疾是很危险的，请带上三个月的预防剂量。”

她是对的，高塔姆·纳夫拉卡生病了，全靠医院及时的治疗才活了下来。我回来后产生了不良反应，但是据欣斯卡特贝里^[1]的医生所说，我得的不是疟疾，他们也不知道是什么。走出丛林后的第一个星期，在德里和孟买，我一直很好。但我肯定是被丛林里的什么东西感染了，回到瑞典的家中我就病倒了。当时我很不舒服而且一直流鼻血，有将近三个月在大部分时间里无法工作，并且在那以后我仍然非常疲倦。

[1]瑞典西曼兰省城市。

第三章 提出问题

印度政府是对的，印度共产党（毛主义）在印度各地都有完善的组织，甚至在大城市！当从伊斯坦布尔起飞的飞机抵达时，天还是黑的。但是我在机场遇到了一位之前从未见过的年轻的活动家，他带我上了一辆出租车，出租车在夜色中蜿蜒前行，把我带到了一个安全的地方。

我觉得没这个必要，我本来打算去酒店的。毕竟从印度官方的角度来看，我回到印度并不奇怪，我是要去作关于斯特林堡和瑞典文学的讲座。但这位年轻的同志说我现在是在“UG”，underground^[1]，他要对我负责。

他带我去了一家旧旅馆。它建于十九世纪末，即使在五月印度北部如高炉一般炎热时也被安排为耶稣会教士工作和睡觉的地方。房间很宽敞，天花板很高。但是我来的时候离热带季风引发高温天气还有几个月，此时还很冷，我快冻僵了。我当然知道德里的冬天很冷，毕竟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曾在我们职工保护区的小地方度过了许多个冬天，但是这次我没有准备好。我原以为我会先去德里的一家现代酒店，然后再往南去丹达卡兰亚森林，我已经相应地整理好了我的行李。

偌大的耶稣会教士房间阴冷潮湿，我试着穿上所有的衣服去睡觉，但是仍然瑟瑟发抖。而这位年轻的战士只披了一件雨衣，在他的帆布床上酣睡。他使我想起了将近七十年前我自己的青年时代，当时我们在青年运动中面对即将到来的考验时也曾试图使自己变得更加坚强。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现在我已经不再是十几岁的时候了，我的牙齿在打颤。这使得这位年轻的同志醒了过来，并且开始担心。

当负责的党代表正拿着一袋给我为东高止山之行做准备阅读的文献走过来时，他们都看着瑟瑟发抖的我，然后决定，这位年轻的同志应该到集市上给老人家买一件暖和的内衣、一件羊毛衫和一个小电暖器回来。

那天之后，我下楼去餐厅时，靠近门口那张桌子的另一位老人起身向我走来，他亲切地问我是不是一名教士。我并不是，但我知道了这个旅馆是一个耶稣会教士的旅馆，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我会被安排住在这里。在印度，耶稣会教士也受到解放神学的影响，因此他们往往是如今大致可以被称为的印度民主阵线的一部分。

在这间阴冷的耶稣会旅馆房间里，我躺在床上靠着新的电暖器看书。我穿着大部分是党为我准备的暖和内衣，阅读党为我提供的书籍、杂志和地下文稿，这使我更好地理解纳萨尔派当前的政策和工作。

我想起了餐厅里的老教士们，还记起 1967 年我在古巴和 ICAIC（古巴电影艺术和电影业研究所）合作为瑞典电视台拍摄一部关于国际援助骗局的电影（《帮助者》）的时候，当时晚上在酒店房间里热得睡不着，我拿出打字机写作《一个不忠的欧洲人的自白》（纽约万神殿出版社 1968 年）。

我们和 ICAIC 的朋友讨论了教皇保罗六世^[2]刚刚发布的反殖民主义和反帝

[1]地下。

[2]1897-1978 年，意大利人，1967 年 3 月 26 日发布“人民进步”通谕。

国主义的通谕“人民进步”：

……有些地区少数士绅享受高等文明，而其他民众则穷苦、散乱，几乎完全丧失了自己的进取心和责任感，且往往处于不合人性尊严的生活和劳动条件中。[1]

……

卡斯特罗曾表示，他更喜欢这样的教士，而不是对人民的真正需要不感兴趣的公开的共产党员，我到现在仍然同意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它也影响了《一个不忠的欧洲人的自白》，我在这本书中写道，温暖的古巴之夜，正如天主教徒所说，它变成了对良心的审视。

在这个阴冷的隐蔽所，我越是读印度共产党（毛主义）的材料，就越明白，在 2006 年一个全国性的政党实现统一后，印度的毛主义者基本上都努力地不搞在激进知识分子中可以被称为十九世纪落后的欧洲/北美风尚的宗派主义。在 1793 年的条件下（“我希望看到最后一个国王被最后一个神父的肠子给绞死”[2]）用德语来表达，这些革命者的政治行为似乎具有强大的威慑力，并有助于将所谓的“左派”从我们这些国家的劳动人民中间分离出来，在当今我们国家不断加深的危机中，他们相对缺乏政治能力。

但是印度的纳萨尔派也在努力克服限制他们的共产党传统上的狭隘性，这是对极端反威权的“左派”的反应，他们现在正试图采用一种平衡的方法。原则上他们着眼于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来开展政治工作，同时领导一场为印度“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进行的长期的人民战争。

六七十年代印度“左派”的朋友，年长的支持纳萨尔派的知识分子，并不真正相信现在团结的全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会成功，甚至不相信它正在认真尝试。这些老朋友近年来写信给我说，他们持怀疑态度。正如其中一位在我去游击区的路上写给我的一封信中所说，他们的观点是：“新成立的印度共产党（毛主义）在印度城市的工人中，无论有组织还是无组织，都很少或者根本不存在。就连城市地区的中产阶级也像往常一样犹豫不决。然后他们必须承认，其他不遵循他们路线的纳萨尔派团体不是敌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运用毛主义的统一战线策略来孤立反革命势力，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镇压革命的势力，仍然是一个紧迫的问题。”

在去丹达卡兰亚的路上，以及在游击区逗留期间，我翻来覆去不停地想着这些话。我仍然在想着他们，因为他们提出了一个真正迫在眉睫的问题。但是现在，因为我在巴斯塔的丛林里，我想我在丹达卡兰亚游击区讨论、经历和看到的至少部分地回应了我的印度传统左翼的老朋友们的担忧。

贾纳帕蒂总书记在与我们讨论这一问题时非常明确地指出：

我重申，目前没有一个政党或组织能够完全成为一切革命的、民主的、进步的、爱国

[1]沈鼎臣、天主教教务协进会译。

[2]启蒙运动的一位推动者归结该运动的诉求。见【澳】约翰·赫斯特著，席玉苹、石晰颀译《极简欧洲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年 6 月第 2 版，第 63 页。

的力量和人民的领导核心。

但是在此之前，他也说过现实是这样的：

目前，我国其他毛主义政党由于右倾和力量不足，无法领导群众。进步和民主力量缺乏革命的基本行动纲领，目前有影响力的领域也很有限。除了这些限制之外，没有一个政党拥有人民武装力量来保卫自己。

我尊敬他和他所代表的党，是因为我发现他对运动面临的困难和可能性都很诚实：

总体上，敌人以国内安全和毛派威胁的名义，向人民发动全面战争。我们在国内的几个农村地区是比较强大的，但是目前我们的力量还很薄弱，我们在城市地区很薄弱，在工人和小资产阶级中间也很薄弱，人民军队还很弱小，武器也不如敌人，总的来说，这些是我们的弱点。壮大人民军队和在城市地区的工作是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我们党的代表大会已经明确地宣布了一项战略计划，并为这些方面的改进提供了丰富的文件。另一方面，社会矛盾也在迅速激化，随着上述紧迫任务的完成，我们党正集中精力团结越来越多的人，如果我们在这方面取得成功，我们就可以在革命中实现飞跃。我们对统一战线的形成抱有希望，在新形势下，这是印度革命的首要任务之一，我们强烈地感到这不仅仅是我们的任务，也是所有革命、民主、进步的力量任务。

为了实现尽可能广泛的团结，我们不能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朋友采取宗派主义的态度。现在有好几支力量正在组织对抗敌人，我们也必须让他们发展。在统一战线的一些问题上，也会有压迫阶级的代表，我们不能指望他们加入我们的行列，这还有漫长的路要走。现在我们需要坚定不移地坚持我们的战略目标，为此我们需要在战术上继续保持灵活性。

更清楚的是，有两种不同的统一战线。一种是人民之间的，另一种是人民和敌人（敌对阶级的一些部门/集团/个人）之间利用敌人内部矛盾的。党必须这样做，这个范围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某些问题的，我们称之为革命的间接储备，可以谨慎地使用。如果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他们不是我们的阶级盟友，那么我们就不会有右倾机会主义倾向。为了革命的成功，我们需要这种统一战线。印度的左派多半是像印度共产党和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那样蜕化变质的，已经跟在资产阶级后面走了。

第四章 进一步谈原则

我是一个八十四岁的作家，在 1943 年春斯大林格勒战役期间，十五岁的我就有了政治意识，过去近七十年我经历的政治变革一直影响着我的观点。因此对我来说，现在写印度东高止山丛林里的毛主义革命者并不是写一般的游记。

印度国内外许多所谓的“左派”朋友都想知道纳萨尔派的故事，他们写信跟我讨论。有些原则问题不应由我泛泛的评论来回答，而应直接引用文件和正式声明加以澄清。我将在这里讨论四个问题，并试着引用党的正式文件来回答。

第一个问题是印度共产党（毛主义）如何看待民族问题。2004 年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代表大会制定的党的纲领指出：

二十、印度是一个多文化、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同样在印度，屈从于帝国主义的统治阶级在所谓的国家“统一和完整”口号下，已经使得这个国家沦为各民族的囚牢。在这样的背景下，今天印度各地接连不断地出现包括武装斗争在内的各种形式的民族斗争。克什米尔人、那加兰人、阿萨姆人、曼尼普尔人和活跃在东北部地区的其他民族的斗争已经采用了武装斗争的形式。这些被压迫民族的人民不仅是为了他们的身份认同在战斗，而且也为实现民族自决这一最为正义的事业在战斗，其中民族自决权中包括脱离权和脱离的要求。

这个表述是对列宁在 1917 年提议的对 RSDLP（B）[1]纲领第 9 条的修改[2]的发展。笼统的措辞“国内各民族都有自决权。”应该改为更具体的文字“国内各民族都有自由分离和建立自己的国家的权利。”[3]

这是传统的列宁主义的立场。之后的多年里我们经历了列宁主义传统在政治现实中是如何成为一句空话被写入苏联 1936 年宪法第 17 条的。“第十七条，每一盟员共和国均有自由退出苏联之权。”[4]

此外我们这些经历了二战创伤的反纳粹和反帝国主义者仍沮丧地记得，在战后的一段时间里，一个公开的共产党，比如法国共产党，对被压迫人民进行“武装斗争”（印度支那、阿尔及利亚）的权利做出了怎样的反应。随着岁月的流逝这变得更加明显，列宁主义在西方正如胡志明在 1924 年指出的那样——变质了。

党的纲领中的话不仅仅是口头上的列宁主义，但是在今天印度的土地上，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为现有的印度政府所不能容。中央委员会发言人阿扎德——被政府武装诱骗并杀害的三个月之前——在 2010 年 4 月 14 日答复《印

[1]Russian Social Democratic Labour Party（Bolshevik），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

[2]见《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9 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477 页。

[3]见《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29 卷，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487 页。

[4]见《苏联宪法（根本法）》，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 1950 年版，第 13 页。

度教徒报》关于统一战线的问题时明确表示：

我们认为，那加兰全国社会主义委员会、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曼尼普尔人民解放军和在克什米尔的查谟克什米尔解放阵线等民族解放组织是反抗印度政府的更广泛的民主力量的一部分。我们认为，各种非议会的工会组织，各种被有政府背景的印度教法西斯组织迫害的属于宗教少数派的进步组织，各种达利特及其他被压迫种姓、阿迪瓦西斯原住民和妇女的组织，为特伦甘纳、廓尔喀兰、维达尔巴、本德尔坎德等地区的独立要求而斗争的非议会组织，为经济特区、采矿和其他所谓的开发项目导致大量人民流离失所而进行斗争的组织，反对反动统治者的自由化-私有化-全球化政策的组织，那些敢于反抗日益增长的威权主义和肆无忌惮的国家镇压导致的假遭遇战、大规模谋杀和对人民所有基本权利的侵犯的人，等等，都是这个具有广泛基础的非议会的民主主义人民阵线的一部分。

第二个问题涉及西方的“反恐战争”，实际上是对阿扎德所说的支持克什米尔人和其他为争取他们的权利而反对印度政府的团体的详细阐述。不仅是印度，还有一切属于或靠近“西方”的国家——包括我自己的国家，直到几年前还是公开的不结盟国家的瑞典，然而现在其军队正在阿富汗为北约服务——都在参与美国主导的国际“反恐”战争。很多是——或者认为自己是一——“左派”的人要么在意识形态上参加了这场战争，要么至少视“圣战主义”为主要威胁。2009年9月10日《毛主义信息公报》就此事向贾纳帕蒂总书记提问：

《公报》：你们党对伊斯兰圣战运动的立场是什么？你认为这些运动的发展会有助于革命吗？

回答是原则性的。总书记提到了列宁从1920年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起一直反对M·N·罗易观点的言论，我们各国在团结运动中工作的人们最好牢记这一点：

总书记：今天的伊斯兰圣战运动是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侵略、干涉、霸凌、剥削和镇压西亚盛产石油的伊斯兰和阿拉伯国家，以及阿富汗、巴基斯坦、索马里等国，乃至迫害整个穆斯林宗教界的产物。作为其全球霸权计划的一部分，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鼓励和支持他们的代理国以色列发动的每一场肆意侵略和野蛮攻击的战争。美帝国主义曾直接发动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武装入侵，轰炸利比亚、索马里、苏丹、伊朗、巴基斯坦等国。此外，在911袭击后，全球各地的穆斯林群体几乎都遭到了猎巫和持续的迫害。战争中针对穆斯林的暴行已经达到了自希特勒迫害犹太人以来闻所未闻的可怕程度。关塔那摩湾[1]、阿布格莱布监狱[2]、巴格拉姆空军基地[3]等等，使我们想起纳粹

[1]美国在古巴境内的海军基地，阿富汗战争后，美军在关塔那摩海军基地设立专门关押塔利班战俘和“基地”组织成员的集中营，自设立以来因秘密操作、虐囚丑闻和无视被告法律权利而广受批评。

[2]萨达姆时期用来关押伊拉克平民的监狱，美军入侵和占领伊拉克后，在此大量关押、审讯和虐待囚犯，曾爆发举世震惊的美军虐囚丑闻。

[3]美国在阿富汗境内的空军基地。

统治下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在美帝国主义的煽动下，对穆斯林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大屠杀正被组织起来，类似于希特勒统治下对犹太人的大屠杀。

我们党旗帜鲜明地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及其反动走狗，以“全球反恐战争”的名义对阿拉伯和穆斯林国家以及广大穆斯林群体的任何攻击。事实上，穆斯林宗教的原教旨主义是帝国主义鼓动和助长的，只要他们服务于其利益，比如在沙特阿拉伯和其他海湾国家，科威特、阿富汗、伊拉克、巴基斯坦等国。

伊斯兰圣战运动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它们反帝国主义的方面，另一个是它们在社会和文化问题上反动的方面。我们党支持穆斯林国家和人民的反帝斗争，同时批判和斗争穆斯林原教旨主义反动的意识形态和社会观点。只有毛主义的领导才能提供正确的反帝方向，并在穆斯林和有其他宗教信仰的人中间实现阶级联合。随着共产主义革命者和其他民主世俗力量对穆斯林群体在意识形态上的影响力的提升，穆斯林原教旨主义意识形态和领导地位的影响力将被削弱。作为共产主义革命者，我们始终努力减少毛拉[1]和毛拉维[2]的蒙昧主义反动思想和观点对穆斯林群体的影响，同时团结所有反抗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敌人即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人。

第三个重要问题是印度共产党（毛主义）如何看待自己。它是统一战线——如果你愿意承认，它是主要的部分——的一部分还是与腐朽阶级的政府作斗争的唯一代表？阿扎德作为中央委员会发言人在他对《印度教徒报》的声明中强调了总书记说的话，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不是孤独且唯一的进步力量：

……事实上，共产主义革命者在政治上（就其纲领而言），是国内更广泛的一切反帝反封建民主力量的一部分。这是我们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本质，就是尝试着把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买办官僚资本主义的人团结到一个广泛的战线上来，去推翻这些敌人，并建立一个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四个阶级联合的政府。一旦你明白了我们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基础，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要尝试着形成许多战术上的统一战线，作为在多个邦和全印度层面形成战略上的统一战线的一部分。

要确定哪些组织或政党能称得上是进步（使用“民主”一词更加恰当）和爱国的，不仅要看它们的政治纲领中是否包含反帝、反封建、反政府或反专制的方面，还要看它们的实际行动。我们认为大多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力量是这条战线的一部分。

还有一大批关心人民幸福和我们国家主权的知识分子和其他民主人士通缉在逃，我们认为这些人是真正的爱国力量，他们深深地关心着我们国家的未来，关心绝大多数印度人民的幸福，而不是一小部分通过所谓的主流议会政党来实际控制国家的阶级的幸福。

我显然没有提到那些我们认为能够在我国向一个独立自主、真正民主的社会的革命性转变中发挥关键作用的组织和个人的名字。今天我们正在经历印度麦卡锡主义[3]的一个阶

[1]伊斯兰教职称谓，穆斯林宗教和圣法的教师。

[2]毛拉维教团成员的通称，毛拉维教团是 13 世纪波斯伊斯兰教神秘主义苏非派诗人哲拉鲁丁·鲁米创建的教团。

[3]1950 年至 1954 年间肇因于美国参议员麦卡锡的美国国内反共、极右的典型代表，它恶意指责、肆意迫害疑似共产党和民主进步人士乃至一切有不同政见的人，实质是疯狂地反共、政治迫害及排外。

段，它给任何形式的不同意见和任何质疑印度政府的威权主义的人都打上毛派的烙印，目的在于使它的政治迫害和残酷镇压合法化。

第四成问题是党如何看待其他“左派”政治组织。正如总书记所说，印度的各种规模较小的毛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和团体不是叛徒，而是这场斗争中在政治上还不够清醒的盟友——或者潜在的盟友。

但是在印度，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和传统的印度共产党以及在西孟加拉邦执政的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关系。后者的情况存在暴力，许多人指责“毛派杀害了印共（马）的干部”。在同一份声明中，阿扎德讨论了这个问题：

现在来回答你关于印度共产党和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具体问题。他们不是更广泛的民主和爱国力量的一部分吗？我会说“是也不是”。就这些政党的基层干部而言，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仍有一些为人民谋幸福的真诚和热情，然而领导层已经完全屈服于剥削统治阶级，并且奉行改良主义路线，尽管有一些表面上的变化，但是这只会有助于维持现状。在这里，我们也必须要区分一下印度共产党和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不要把印度共产党和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归为同一类。

印度共产党的领导层一直批评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政策，一贯反对反革命民团，如邦和中央政府支持的和平行动，并且正在反对由中央发起的绿色狩猎行动。人民可以看到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政策反动反人民的本质，特别是在其执政的邦，辛古尔、南迪格莱姆、拉尔噶和很多其他的名字已经剥去了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反帝国主义和反新自由主义的伪装。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甚至连一支彻底的民主力量都算不上，更别说是共产主义的了。然而，即使是这些修正主义者，如果他们在人民的基本问题上出来进行非议会的斗争，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维护民主价值观，我们也准备同他们联合起来。

说我们在暗杀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干部是不对的，我们正在进行顽强的抵抗来面对像 Harmad Bahini[1]那样的突击队和其他由他们党的领袖供养的武装（人员）的袭击。反抗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是人民反对剥削和压迫的阶级斗争的一部分。我们邀请他们就任何问题进行公开辩论。尽管他们灵活圆滑和机会主义的立场使其与毛主义者的斗争主要是政治性的，但是在印度统治阶级对毛主义者发动的战争中，他们站在了最前线。由于无法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与我们对抗，他们的领袖和发言人针对毛主义者发动了一场完全是谎言和诽谤的恶毒运动。

我们呼吁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和其他所谓的左翼政党的干部站出来，联合其他力量反对中央和邦政府灾难性的政策，联合其他人员反对美帝国主义唆使下反动统治者发动的针对毛主义运动和一切形式的民主异见的残酷战争。我们准备同这些政党中站在广大人民群众一边的一切真挚的、诚恳的力量联合起来。

[1]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专门为镇压毛主义者而组建的民兵组织，意为“雇佣打手”。

第五章 去丹达卡兰亚

当我得知要和高塔姆·纳夫拉卡一起去丹达卡兰亚时，我感到又惊又喜，大约三十年前他在瑞典的时候我就已经认识他了。据《印度时报》报道，印度知识界有一种看法，认为是高塔姆·纳夫拉卡安排了我前往丹达卡兰亚，但事实并非如此，与印度共产党（毛主义）现任领导人的联系是以另一种方式建立起来的。简单地说，他们读了我的书，而且那里有一些从 1980 年起就记住了我的同志，他们仍然健在并且还很活跃。

正如印度共产党（毛主义）总书记贾纳帕蒂在采访中说明的那样：

自从扬·米尔达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写了《印度等待着》一书以来，他在书中谈到的这场运动在政治和军事的各个方面都有了一些发展。正是从那时候起，我们看到了一种考虑到印度具体特点的观点的发展。查鲁·马宗达同志时代留下的有经验的领导人寥寥无几，许多人已经走向右倾，一些人走向左倾，只有少数人来到了这里。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新一代，一群新青年，要把他们培养成有经验的干部，必须投入大量的时间。当扬·米尔达你 1980 年来到这里时，党还在经历这个问题。

只有再过 6-7 年，在人民战争的背景下，才会出现真正的领导人。

关于我们从德里到丹达卡兰亚这一路的旅程，除了组织得很好之外，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但是在旅程的开始，让我担心的是从德里飞往赖布尔^[1]的早班飞机在起飞时延误了，我们在跑道上的飞机里坐了几个小时。

我们最后到达时，租来的汽车正在赖布尔机场等着我们。但是由于我们前面有 300 多公里的车程，我们明白我们到达商定会合地点的时间太晚，无法在当天进行接触。这意味着我们还不得不在杰格德尔布尔^[2]的一家旅馆过夜，这是我不太喜欢的。我知道根据警方对这一地区的规定，我作为一个外国人必须填写一张长长的表格，上面的问题是要去哪里，为什么要去，以及我要在巴斯塔逗留多久。在旅馆里我确实收到了这样一张表格来填，我写下了我的答案。

我没有写我是应印度共产党（毛主义）的邀请来到巴斯塔的，但是我也没有撒谎。对警察和当局撒谎总是很危险的，你很可能使你自己陷入圈套。相反，在这种情况下我做了我能做的。我写得很晦涩，很有艺术感，主要是关于我对阿迪瓦西斯艺术和文化的兴趣。巴斯塔的部落民是 *cire perdue*，脱蜡铸造^[3]艺术的大师，从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4]的印度河流域文化时代到今天，他们是这种流行的金属工艺传统的继承者。在这上面我并没有撒谎，即使我没有写但是这也再次证明了，推动历史发展的力量是人民而不是上层统治者，而哪怕

[1]印度恰蒂斯加尔邦首府。

[2]印度中央邦东南端的城市。

[3]玻璃加工成形方法之一。

[4]都是古印度文明的代表。

我写的时候保留了结论，我也没有写下任何警方可以利用的东西。

我当然担心我们会失去联系，尽管指示是如果第一次没有成功，就第二天再尝试取得联系，我们按要求做了。第二天，我们先在阳光下等了又等，我感到很疑惑。然后终于取得了联系，之后一切应该都会变得顺利，但是党已经决定了，我八十多岁的老膝盖使我难以在那时和其他人一起过河。他们离开了，我继续看着河滩上的一座新寺庙，这是印度教势力为了给阿迪瓦西斯人做圣事而修建的。

在等了一个小时左右后，我被一辆摩托车接走了。我紧紧抓住那个年轻的司机，把包放在大腿上。年轻的摩托车司机开了一个多小时左右，绕道穿过了英德拉瓦蒂河后也离开了，我不得不再次等待。我在路边的一个棚子里待了一段时间之后，被其他人开着吉普车从小路上接走。

驶向内地丛林的这辆吉普车上并不只有我们。从市场上回来的村民们，有男人也有女人，拦下它然后爬上了车。由于我看起来明显不像印度人，所以一直被他们半掩在身后。这条路不算很坏，甚至到处都在维修。我们在这条路上开了一段时间，时不时停下来让人们下车或上车。后来我们驶离了这条路，很快村民们离开了我们，我们继续沿着一条有车辙的小路行驶，开了几英里后，路况变得越来越糟糕，糟糕到连四轮驱动的吉普车都停住了，再也无法前进。我们下了车，在两位当地同志的带领下开始向前走。

为了避开警察的营地，我们不得不离开这条小路好几次，那时我们沿着一条几乎看不清的小径绕道穿过丛林，然后回到离我们要避开的营地很远的小路上。以这种方式行进了几个小时后，一名阿迪瓦西斯女子带领一队穿着整洁的新制服的人民解放游击军突然出现在丛林里的另一条小路上，她是带领他们来迎接我们的。

对我来说这是一段累人的步行，我感到膝盖开始疼了。我们继续走着，经过了几个村庄，我们往往绕过它们走，一直走到郊外。我试图跟上其他人，但是由于我比年轻的阿迪瓦西斯战士们年长两辈，当我患有关节炎的老膝盖给我带来太多疼痛时，我不得不时常停下来休息。我觉得自己正在成为他们的负担，向导们试图让我打起精神：

——只有几个小时了。

当我们要过第一条河时，他们想用竹担架把我抬过去。他们想要这样做，但是由于水位很低，我能赤着脚穿过去。当我们到达对岸，要进入一片更茂密的丛林时，他们生火煮了些茶。

——我们煮过了所有的水，喝生水是很危险的。

随着小路爬上丛林深处更陡峭的山丘，行进对我来说变得更加困难。人民解放游击军年轻的男女战士告诉我，如果我不想耽误他们太久的话，现在就必须让他们来帮助我。

——他们从昨天就开始期待我们的到来了。

我只好让他们做一个竹担架（我可以坐在上面），在地形对我的膝盖来说过于崎岖的时候可以抬着我。对于他们这四个年轻的男子——还有女子——来说，抬着我的负担并不比他们平常的装备更重，但主要是我自己能走路。当我们继续穿越丛林时，有时我直接看到了小路旁深深的陷阱，它们现在没有被盖

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它们而不会掉入其中。

我们这里的人都是猎人，一位同志说。几个世纪以来，他们用陷阱对付动物，也用陷阱对付入侵者。

这些传统的陷阱被用来对付像和平行动这样的由政府资助的恐怖主义武装集团。现在，在当前的绿色狩猎行动中，这些陷阱保护阿迪瓦西斯人和他们的村庄，抵抗政府官方的反纳萨尔派武装如 CRPF（the Central Reserve Police Force，中央后备警察部队）和 COBRA（坚决行动突击队）的入侵。由于这些人通常是进入丛林的外来者，他们很难避开伪装得很好的陷阱。当政府军在他们以为是可以被踩踏的小路上行进时，他们脚下的地面突然塌陷，他们就跌入陷阱被困住了。

我看着这些我们行进过程中绕过的暴露的陷阱，它们是很危险的。在丹达卡兰亚，持久的人民战争是一场人民的战争，也就是说，它是由当地的人民用传统的方式进行的。

一件在政治上很有代表性，而且非常重要的事是，丹达卡兰亚新的地方革命政权人民政府，拥有了自己的旗帜。红旗上的两颗金星象征着阿迪瓦西斯和达利特人民，而在星星的右边画着一副金色的弓箭，这是阿迪瓦西斯人传统的武器，它们无声而致命。

我们被告知不要和给我们领路的人民解放游击军走散了，丛林里布满了陷阱，不仅有现在我们能看见的没被盖上的普通陷阱，还有许多隐蔽的陷阱。以及地雷，与在阿富汗抵抗 ISAF[1]——美国和北约这样的一一部队使用的简易爆炸装置类型相同。印度的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一样，都是以传统和现代的方式和武器进行的游击战争。

夜幕降临时，我们继续前进。我以前从未到过印度的这一地区，我去过东北的奥里萨邦和南方的安得拉邦，而现在我在恰蒂斯加尔邦，或者更确切地说，我正在古老的巴斯塔地区步行穿过丹达卡兰亚丛林。

这不是印度的偏远地区，它不仅仅在地图上，这片丛林和山地地区正是这个国家的脊梁。我在十几岁的时候读到过这片丛林，它是恶魔丹达卡[2]的住所。当时我正在阅读不同文化中具有决定意义的史诗，其中包括《罗摩衍那》[3]。

在我们行进的时候，我尝试着更多地回忆起《罗摩衍那》的内容。如果我是在印度出生和长大的，那么罗摩、悉多和罗什曼那被流放到丹达卡兰亚这片恶魔之地的十三年将不可避免地成为我想象的中心。当然前提是我既不是穆斯林也不是基督徒，否则我就会下意识地想到其他宗教故事了。但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作为一个印度人，我也知道《罗摩衍那》的这些故事，我们行走

[1]International Security Assistance Force，驻阿富汗国际维和部队。

[2]丹达卡兰亚森林的传说中统治丹达王国的恶魔。

[3]印度古代史诗，与《摩诃婆罗多》并列为印度两大史诗，下文的罗摩、悉多和罗什曼那均为《罗摩衍那》中的人物。

的小路周围的丛林是印度人意识里的核心。

黄昏将近，所有与我同行的同志都知道罗摩的故事。尽管他们也知道，《罗摩衍那》并不是现在丹达卡兰亚处于印度革命红色地带中心的原因。

伟大的史诗仍然很重要。在传统上，我们这些所谓的欧洲左派低估了在我们成长过程中文化和传统对于我们形成的方式。毛泽东正确地看到了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使这些理论能够为中国人民所运用的必要性，欧洲很多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理解这一点。而在四十多年前我在印度生活的时候，我开始更仔细地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作品。

我这样做有双重的必要。1956年D·D·科桑比在《印度历史研究导论》中指出，马克思1853年写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的关于印度的主要表述是错误的，而且具有误导性。印度的社会状况并非“从遥远的古代直到19世纪最初十年……始终没有改变”[1]，还有“印度社会根本没有历史，至少是没有为人所知的历史。我们通常所说的它的历史，不过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入侵者的历史，他们就在这个一无抵抗、二无变化的社会的消极基础上建立了他们的帝国。”[2]也是不对的。

对于像D·D·科桑比这样的一位研究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科学家来说，马克思写的话有可能是错的并不奇怪。马克思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思想家，但是他的话并没有受到神灵超自然的启发，他和恩格斯都必须经常地弄清楚一些事。

以1848年《共产党宣言》第一章的第一句话为例：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恩格斯在1888年英文版上为这句话加了一条重要的脚注，后来这条脚注被加入了所有版本：“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在1847年，社会的史前史、成文史以前的社会组织，几乎还没有人知道。后来，哈克斯特豪森……”[3]

很多所谓的马克思主义者似乎忘记了这条脚注，马克思主义者是没有借助于“灵感”创作的文字的！半个世纪前我在德里，在我传统的北欧文化之外的印度文化环境中重读他们的作品时，我惊讶地发现一些神学方向的作家如理查德·布赫宾德和鲍勃·克莱森斯，将在学理上证明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来自《圣经》的典故、参考和引用与来自德国哲学家如黑格尔和康德、英国经济学家或希腊和拉丁经典著作的相比要更多一些。

正是在印度仔细地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时，我看到这些参考和典故在他们的文字里就像是竖起的大拇指，这是我在欧洲没有看到的。也难怪，我们在同一种文化中成长（马克思读过希腊语，恩格斯读过希腊语和希伯来语，而我没有），上的几乎是同一类型的学校。我们所有人，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很自然地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表达自己，这并不能证明基本原理是错误的。

毛泽东在他的侄女[4]谈话时提到了这一点：《与王海容的谈话》，1970

[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40页。

[2]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45-246页。

[3]见《共产党宣言》，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7页。

[4]此处是作者误记，王海容的祖父王季范是毛泽东的表兄，她应该是毛泽东的表侄孙女。

年 12 月 21 日。这是一份文化大革命期间在中国广泛流传的文本，现在在印度共产党（毛主义）的学习材料中可以找到：

主席：你们学校要不要你们读圣经或佛经？

王：不读，要读这些东西干什么？

主席：要做翻译又不读圣经、佛经，这怎么行呢？[1]

他还建议她不仅要读中国伟大诗人杜甫的诗以及《红楼梦》等小说，也要读明末清初蒲松龄的鬼狐故事集《聊斋》（“《聊斋》写的那些狐狸精可善良啦！帮助人可主动啦！”[2]他对她说）。如果他是德国人，他会以同样的方式建议他的年轻亲戚，不仅推荐给他们格里美尔斯豪森[3]和歌德，还会推荐格林兄弟的童话故事。

当黄昏很快地降临时，我想这些帮助我在丛林中艰难前行的同志们必须考虑到这种文化的特殊性。一个舵手会说，他们必须纠正偏航，就像毛泽东在中国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那样去做。他们必须像查鲁·马宗达那样，使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表达方式印度化。对于我们这些既理性又在伟大传统中的人来说，理解这一点是必要的。

然而更糟糕的是，历史证明我们很多自认为大概是理性的共产主义者和革命者的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此容易受到半意识文化传统的束缚和羁绊，往往会产生极为严重的后果，近来南斯拉夫的分裂就是个例子。这自弗洛伊德[4]以来就被称为过度决定[5]。

我们快到营地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最后几公里变得非常艰难。我们不得不沿着深谷前进，在凹凸不平的大石块之间寻找立足点。营地附近有岗哨，我听到护送我们的人在黑暗中与他们交谈。终于，我在黑夜里看到了遥远的灯光，我们走出峡谷时，有一长排人民解放游击军的男女战士欢迎我们。当我们经过他们身边时，他们一个个地举起紧握的拳头，用“Lal Salaam”红色敬礼向我们致意，然后同我们握手。

我们很疲倦，但是端上来的茶很温暖，它使我清醒起来。喝完第一杯时，我看到一群人从丛林里的另一条小路走出来。他们坐在我们的周围，闪烁的灯光下很难看清他们的脸。他们问我这次旅行是否艰难，还问我欧洲的情况。我克服了疲倦与膝盖和背部的酸痛，试图理性地谈谈日益加深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以及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人民运动。

[1]见《毛泽东思想万岁（1961-1968）》，第 135 页。

[2]同上。

[3]1621/22-1676 年，德国小说家，其代表作《痴儿西木传》被誉为十七世纪德国文学的巅峰。

[4]1856-1939 年，奥地利精神病医师、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

[5]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理论曾用过度决定来描述形象对梦思的表现机制，这些形象的特殊性在于它们可以把一组梦思凝缩在一个单独的形象中，可以将心理能量从极为潜在的思想转化为无关的形象。

在三十年代被称为“中间道路”的社会民主主义的阶级合作最终在二十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里破产了，“福利国家”也被取消了。[1]在瑞典和在帝国主义国家的其他地方一样，“劳工”和“左翼”政治家为此承担了政治责任。这并不奇怪，因为它们不再是以群众为基础并得到群众支持的组织，而是由资产阶级资助的，因此也成为了资产阶级国家结构的一部分。

当然，人民仍在斗争。社会上阶级分化正在变得越来越严重，客观上阶级斗争也正在激化。你每天都能从美国和瑞典读到这些斗争，从法国或德国也是一样，但大多是无组织、无意识、无领导的盲目自发的斗争。这不奇怪。在美国，工人阶级的组织在二战和麦卡锡时期之后已经被摧毁了；在我们所有的国家，工会和公开的“左翼”政党都被削弱了。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情况。

这对反帝工作也产生了影响。甚至在我的国家瑞典，直到十年前公开地不结盟这个词从政治风尚中消失了，现在它的军队正在阿富汗为美国的利益服务。但团结运动还是存在的，它是一个拥有广泛基础的阵线，主教和老的社会民主主义政治家都很活跃。我们希望这能够继续扩大，直到我们强大到足以迫使政府开始改变其政策。但这是有危险的，这样的危险是具有代表性的。

政治上公开的左派只是在口头上反对这场殖民战争，而一提到政治现实，社会民主党的领袖就直接告诉美国大使，无论该党作为反对党发表了什么样的公开声明，他们都是支持美国在阿富汗和巴尔干半岛的政策。或者再举一个例子——挪威公开地反北约的社会主义左翼党以“左翼”力量的身份进入政府，然后就承担了为北约部队派遣挪威军队的政治责任来支持美国在阿富汗发动的帝国主义战争，他们管这叫策略。自上世纪初以来，这种行为一直是欧洲“左派”的典型表现。

今天瑞典正在派遣军队作为北约部队前往阿富汗作战，我国团结运动斗争的一个重要部分始终是努力让这些军队回到家乡，我不能完全保证我们会成功。但是有必要记住，我们，或者更确切地说当时我们社会主义青年运动的前辈在 1905 年成功阻止了瑞典对挪威发动战争。[2]列宁把它作为一个例子指了出来。我们在阻止瑞典参加一战上发挥了作用（尽管有几位同志因此入狱），我们还参与组织了一个广泛的阵线，阻止瑞典在 1941 年加入纳粹的“十字军东征”。回想起年轻时的那场斗争我仍记忆犹新。

不过我担心，随着危机的加深和新的帝国主义战争的临近，我们这次将像 1914 年在法国和德国的同志们那样无能为力。但是在另一方面，1950 年我们为《斯德哥尔摩呼吁书》[3]在世界各地进行了大规模的动员，这在当时对于阻止美国发动世界原子战争具有重要意义，就像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反对美国在印度支那发动战争的国际反战运动一样。一个人既不应该沉溺于虚假的希望，也不

[1]瑞典社会民主党在 1932 年上台并执政数十年，在劳资关系上长期奉行阶级合作的策略。而在二十世纪末，其独创的“中间道路”和“福利国家”陷入困境。

[2]1905 年瑞典社会主义青年运动号召实行总罢工以阻止战争，支持挪威从挪威-瑞典联盟中和平独立。

[3]1950 年 3 月 19 日，世界保卫和平大会常设委员会执行局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发表了关于无条件禁止原子武器的呼吁书。

应该放弃所有的希望而变得悲观消极。

黑暗中坐在我周围的同志们没有对我所说的瑞典和整个欧洲的团结运动面临的困难和威胁发表评论。而真正让我感到意外的是，一位被介绍是“GS”的同志开始谈论关于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核心理论问题。

——通向技术上更高层次发展的道路不止一条。问题是，苏联和西方国家典型的大规模工业化与其说是一种纯粹理性的技术解决方案，不如说是一种资本主义现象。它是一种生产组织形式，其本身创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

他以一种在我记忆中是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方式讨论了这个问题。1976年毛主席逝世前，我和甘·凯丝丽在成都一起度过了一个夜晚，甘·凯丝丽采访“成都后街备件厂”革命委员会的党组书记，写了一本关于革命委员会的书。

他说，工业化有不同的道路，也有可能从头做起。1964年，我们在后街开始制造金属螺钉。我们这个集体总共有四名因呼吸道疾病（主要是肺结核）退休的工人，一名因哮喘不能下乡的学生和五名家庭主妇。但是我们有经验，仍然可以工作。我们逐步地发展生产，1971年我们成为了汽车行业的一家备件厂。现在我们有234人在这里工作，112名男工和122名女工。我们还把医疗保健作为一项合作服务组织起来。我们用民主的方式管理工厂，所有重要的决定都由集体作出。我们每个星期四都有一个会议，每个人都到场讨论然后作出决定。今年我们拨付了51万元的本金，毛主席已经为我们制定了目标，我们要成为真正的汽车制造商。所有的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做的。

我想到了成都的这位党组书记是因为“GS”同志讨论的是工业化的另一条道路。这是一位负责的共产党员，他现在很活跃，他不倾向于苏联和今天中国的“福特主义”^[1]，而是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和巴黎公社的传统。这一传统在欧洲受到了威廉·莫里斯的欢迎，并由毛泽东继承和发展。

“我们学习过党的学习材料，对此我们已经非常清楚了。”一位同志说，并拿出了一份文件：

修正主义路线即主张自上而下排序的路线，是一种永久性的分工体系，如主管干部、技术专家、工厂车间的工人，以及有地位和特权的等级制度，最重要的是，这决定了谁将控制和管理工厂的业务。中国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发起了一场群众运动来消灭修正主义路线，制定了“两参”路线，即干部参加生产劳动、工人参加企业管理。工厂里的党委被解散了，新的组织形式——工人领导小组——成立了，他们鼓励工人讨论管理层的提议和决定。工厂的生产计划要反复征求工人的意见，工人们参与其中，并且在最终通过之前要经过各个车间的审核，即“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技术创新和生产效率的提高只能由专家来实现的神话已经破灭，通过与工人三结合（党的干部、技术人员、工人）的密切合作，技术创新取得了巨大进步。他们执行毛泽东的政策，即“抓革命，促生产”和“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这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重要的经验之一。

[1]以市场为导向，以分工和专业化为基础，以较低产品价格作为竞争手段的刚性生产模式。

——我们有一位领导同志，GS 说道，他正在印度的背景下就这一问题撰写一篇深刻的论文。但是他的一次遭遇战中牺牲了，我们现在正在整理他的手稿，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我现在知道他是谁了。GS 是“General Secretary” [1]具有典型印度风格的缩写。

令我着迷的是，总书记和他的同志们在丛林里以开放的方式讨论了被“西方的”大部分共产党人置之脑后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不同道路的基本问题。它必须是由党中央、政府和国家计划委员会领导的指令经济吗？这样将保留并再产生毛泽东所说的“资产阶级法权” [2]。为什么不把这个过程倒置呢？人民不是愚蠢的，毕竟我们这个立场的人常说人民是创造历史的动力，这对资本主义之后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意味着什么？

而同样重要的是同志之间亲切地讨论的精神，这与我四五十年代在法国、东欧和苏联的共产党员中间所经历的截然不同。

在丹达卡兰亚的这几周，与印度共产党（毛主义）总书记贾纳帕蒂以及其他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同志的所有谈话，都给我留下了相同的印象。这让我感到充满了希望。

高塔姆特意给我带来了一个睡袋。在丛林里的第一晚，我躺在他和一位西孟加拉邦的年轻同志中间。我身下的地面覆盖着一张床单，头顶上有一个塑料盖，防止树叶和昆虫落到我们脸上。我尝试着整理了一下我对印度的看法。

夜深了，除了看不见的哨兵，大家都在睡觉。我想起了 1948 年，当时我的岳父卡利·戈什在瑞典南部的卡法托普跟我说的话，我和我的第一位妻子在那里有一座小屋。他试图解释 1947 年印巴分治引发不同群体的恐慌、暴力和凶杀背后的原因：

——英国人留给我们的就是这个。分而治之！他们沿用了传统的帝国政策，让南亚次大陆永远处于战争状态。

卡利是一位老孟加拉革命者，年轻时是孟加拉的恐怖主义者，正如他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样 [3]，而此时已经在英国生活了近三十年。他的妻子葆拉·维京是一名共产党员，是斯德哥尔摩的瑞典共产党党报《Ny Dag》驻伦敦的记者（在前一年 1946 年我作为一个年轻的记者在伦敦编辑过她的文稿）。他对尼赫鲁很尊敬，或者更确切地说是钦佩。

英属印度帝国的解体是一个重大历史事件，它给我们这一代的欧洲人也留下了印记。卡利和我详细地讨论了这件事，它是真正的独立，还是只是一个政

[1]总书记。

[2]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提出、用于描写社会主义经济特征的一个概念。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毛泽东开始了限制“资产阶级法权”、改变人与人的相互关系的探索，他强调领导和群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关系。毛泽东关于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思想，是他的社会主义平等观的重要内容。

[3]卡利“Kali”，亦即“迦梨”，是印度教中的一个女神，表现为黑暗和暴力。

治骗局，一个形似而实非的赝品？

我躺在睡袋里构思着。事实上，在无声的黑暗中我在脑海里写出了下一章：布巴内斯瓦尔^[1]的早餐。或者叫：印度的独立是什么？

[1]印度奥里萨邦首府。

第六章 独立是什么？

“如果一个本土政府取代了外国政府并保持所有的既得利益不变，这甚至不会有一点儿自由的影子……”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印度将何去何从？》，1933年

正式独立的印度在向贫困宣战。这个说法本身就值得怀疑，因为它是1964年林登·B·约翰逊^[1]为了在美国弱势群体中赢得民众的支持创造的，当时他正在加紧对越南的侵略战争。但是这句话听起来还挺好的，就像2009年西蒙·德尼尔在路透社的报道：

“印度庆祝成立60周年^[2]，呼吁向贫困宣战。”

路透社新德里8月15日电——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在庆祝脱离英国统治独立60周年时发表讲话，表示尽管印度经济高速增长，但是仍需要更加努力地与贫困、愚昧和疾病作斗争。

印度不能成为一个少数地区高增长而大量地区不受发展影响的国家，那样发展的成果只会惠及少数人。

星期三他站在新德里具有历史意义的红堡的城墙上，在一块防弹玻璃板后面如是说道。

辛格讲话时，附近的建筑物上安排了神枪手，而军队和武装警察则守卫着全国各地的道路和重要建筑物。传统上，这一天是以激进反对派或毛派叛军的暴力袭击为标志的。

“营养不良的问题是一个国家的耻辱，”他补充道，“我呼吁全国人民下定决心努力奋斗，在五年内消灭营养不良。”

曼莫汉·辛格不是第一个谈论发起这场战争的印度总理。尽管存在其他的政治分歧，但是自1947年印度正式独立以来，统治精英、总理和社论撰稿人都这么说。事实上，他们不过是用不同的措辞重申了1929年孟买全印度国民大会党委员会的决议：

本会议认为，印度人民的巨大贫困和灾难不仅由于外国对印度的剥削，而且由于外国统治者为了继续他们的剥削而支持的社会经济结构。因而，为了消灭贫困和灾难，为了改

[1]1908-1973年，1963年美国副总统肯尼迪遇刺身亡后，时任副总统的约翰逊接任美国总统。1964年他提出“伟大社会”施政纲领，内容包括所谓的“向贫困宣战”。约翰逊上台后的一系列做法迅速扩大了越南战争的规模。

[2]1947年6月印巴分治后，同年8月15日印度自治领成立，1950年1月26日印度共和国宣布成立。

善印度人民大众的状况，必须对社会的目前经济和社会结构进行革命性变革，消灭所有不平等。[1]

然而，尽管统治精英们善心大发，尽管有不同的官方发展计划和雇用的十万印度官员，尽管有多少空想主义者和纯粹为了盈利的非政府组织像蝗虫一样选定了印度，尽管有新的增长率，但是印度底层的达利特人和阿迪瓦西斯人仍生活在比所谓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弱势群体更为贫困的社会中，并没有什么变化。实际上，对于他们中的许多人来说，官方向贫困宣战就是向贫困者宣战，因为以发展为名，他们被赶出森林，失去土地。

对此的解释并不是印度的精英政客们特别邪恶，其中有一些人确实是，我们都知道，但总的来说他们的计划还是好的。然而，正如我们欧洲文化中克莱尔沃的圣伯纳德[2]之后的道德学家和神学家所指出的那样：“通往地狱的路，都是由善意铺成的。”

以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为例，因为他在政治和思想上与我的父母属于同一代人，所以他们也像他一样受到具有相同费边[3]色彩的盎格鲁-撒克逊式自由和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并且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也在类似的一一反帝国主义和反法西斯的一一国际圈子中活动。当然，我从小就听说过他，也读过他的书。

卡利·戈什在我二十出头的时候成为了我的亲戚，正是他让我对印度有了更深的了解。他说，作为一个孟加拉人，他从小就深受班吉姆·钱德拉·查特吉[4]的《阿难陀寺院》[5]的影响。

那不是微不足道的非暴力说教，通过阅读它，我开始以一种新的眼光来看待《薄伽梵歌》[6]中的克里希那[7]。通向社会和政治意识的途径有很多，对于我这个年轻的小伙子来说，在孟加拉的这些日子是一条通向觉醒的道路！

那时我还没有读过班吉姆·钱德拉·查特吉的小说，现在我想起卡利时，他已经离世很久了，而我本想和他确切地讨论一下他以及他的朋友和同志们是如何受到它的影响的。

像他的许多朋友一样，卡利在学生时代成为了“Anushilan”[8]的成员，捍卫孟加拉的完整。后来他在和正与“Anushilan”合并的恐怖组织“Jugantar”[9]

[1]见尚劝余《尼赫鲁与甘地》，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135 页。

[2]1090-1153 年，法国教士、学者，1115 年创立了克莱尔沃的西多会隐修院，1170 年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宣布他为圣人。

[3]费边精神的主要内容包括知识分子保持独立身份参与到社会改良之中和通过渐进主义的手段达到社会主义。

[4]1838-1894 年，印度孟加拉语小说家、孟加拉现代文学的先驱。

[5]班吉姆·钱德拉·查特吉在 1882 年写的历史小说，反映了孟加拉出家人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

[6]古代印度的吠檀多哲学诗，印度教的最高圣典。

[7]印度教诸神中最广受崇拜的一位神祇，佛教旧译为“黑天”，又音译作“奎师那”。

[8]“实践社”，民族革命团体。

[9]“时代变迁社”，民族革命团体。

关系密切的学生组织工作，并且活跃在国大党。

1928年12月，印度国大党年会在加尔各答召开。情况非常复杂，第二次在加尔各答主持会议的老尼赫鲁，莫蒂拉尔·尼赫鲁[1]，主张自治领地位是唯一真实的可能性，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则发言支持独立。甘地反对独立决议，因为它有可能分裂国大党，他希望通过一项提议来避免分裂，即如果英国在一年内不承认其自治领地位，国大党将要求完全独立并为之奋斗，必要的话还会发动国民进行不合作运动。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曾承诺卡利会为独立的要求发言，但是就在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要发表演讲的几个小时前他突然拒绝了，这使得卡利和另外两位活跃在国大党的党内同志花了两个小时去说服苏巴斯·钱德拉·鲍斯，他必须站出来公开反对莫蒂拉尔和贾瓦哈拉尔，但是鲍斯失败了。之后卡利开始在当时“Juguntar”的机关报《新世纪》[2]（后来从四十年代开始印度共产党重新使用了这个名字）上写作，布彭德拉·库马尔·杜特和阿隆·古普塔撰写了头版文章，卡利和约蒂什·布霍米克分担了编辑工作。

1930年4月，民族主义者占领了吉大港[3]军械库，这是英国自1857年以来最严重的失败，英国人立即开始大规模的逮捕。《新世纪》决定发表头版文章《好样的，吉大港！》，由于报纸无论如何都会被查禁，所以最好是在地下写一篇支持暴力武装起义的文章。

卡利现在参与破坏孟加拉的电报线路。国大党领袖、贾瓦哈拉尔的父亲莫蒂拉尔·尼赫鲁，曾秘密地为这次行动提供资金帮助，但是因为他没有保持沉默而走漏了风声，他不明白绝对沉默在密谋中的必要性。很多同志被逮捕了，可是莫诺兰扬·古普塔、拉西克·达斯和卡利没有被捕，并且看到了几乎所有的孟加拉电报线同时被切断。

卡利还和纳拉扬·罗伊博士一起研究炸弹，效果挺好，但是炸弹很难藏在衣服里。

当时他还不是共产党人，卡利说和那时他恐怖主义的同志们一样，共产党人只是在需要革命的时候谈论一下革命。但是对于卡利和许多像他一样的人来说，是密拉特密谋案使他开始转变成共产党人的。这是当时印度最大的政治审讯，1929年3月20日，共有32人被捕，其中包括社会主义者和工会成员，他们被指控是共产党人，阴谋“推翻英王兼印度帝国皇帝对印度的统治权”。随着案件的拖延，他们当中的共产党人把法庭变成讲坛，向印度公众传播他们的看法。他们中的31人在1933年春被定罪，但是上诉后这些囚犯于当年夏天被释放出狱。这起目的是镇压初创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案件结果适得其反，事实上只有在那次审讯后，一个集中制的政党才能在印度成立，实际上在1934年印度的党才开始成为共产国际的一部分。

现在卡利和他的同志们计划解放加尔各答中部的四分之一，并升起独立的印度的国旗。英国人不得不使用空袭和炮击，这将向世界表明，他们的帝国是建立在一盘散沙上的。但是8月25日，阿尼亚·森和迪内希·马祖姆达尔向加

[1]1861-1931年，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父亲，国大党中温和派的领袖。

[2]“Swadhinata”，后来是印度共产党的机关报。

[3]位于孟加拉湾东北岸的港口城市。

尔各答警察局长的车投了两枚炸弹却失败了，阿尼亚·森被抓获然后被杀，这种警察现在仍使用的手段就是我们所说的遭遇战。

1930年8月31日，卡利被加尔各答特别情报局的特工带走。警方围捕了3000名孟加拉恐怖主义者。而印度的特点是存在半封建的思想，当时和现在是一样的。情报局真正的负责人是卡利的亲戚，是他的堂兄。这位堂兄说：

——你真是家里的耻辱。

然后他说卡利将被判七年监禁，至少是五年，那将是可耻的。为了不让家庭蒙羞，卡利可以接受被驱逐到英国。1931年春，他被领到了一艘将要带他去伦敦的船上。

重要的是要明白，这不是一般的轶事，而是印度当局在独立的前后所采取的一项深思熟虑的政策。1967年担任《解放》[1]第一任编辑的苏尼蒂·库马尔·戈什在他的回忆录《纳萨尔巴里：前因后果》（新时代出版社2009年，加尔各答）中写道：

1971年8月21日至22日，在萨罗杰·达塔被捕牺牲几天后，我的妻子和大女儿被警方带到了位于洛德·辛哈路的加尔各答警察特别分局（Special Branch, SB）办公室。SB的副局长对我妻子说，像我这样有学问的人不应该把自己卷入政治暴动，我妻子应该说服我去英国，他们会做好安排（后来，阿希姆·查特吉的一名同伴在迪奥加尔[2]被捕，警方允许他去英国，而没有把他送进监狱）。我妻子说，如果我是一个有学问的人并选择了这条道路，那么让她说服我离开就是不可能的。她补充说，警方更是正在攻击人民。副局长说，这些攻击是为了报复。他对我妻子的回答感到失望，说会在三个月或者更短的时间内让她看到我的尸体。

当时和现在拉丁美洲或者南亚的许多国家一样，革命者被清除，在政治上活跃的农民或中下层知识分子很容易在“遭遇战”中被杀害，而像卡利或苏尼蒂·库马尔·戈什这样出身于统治阶级家庭的“黑/红绵羊”可能只会被驱逐出境。卡利接受了。

在英国，卡利成为了一名共产主义者，尽管我不知道他是否像他娶的瑞典/美国妻子那样，成为了一名真正的正式共产党员。卡利还曾为左翼的国大党和后来独立的新印度政府当过记者，并担任孟买《闪电》的通讯员。在此期间，他变得越来越崇拜贾瓦哈拉尔·尼赫鲁。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自己和尼赫鲁在新德里的不同场合会面时，我发现尼赫鲁在某种程度上是平易近人的。1959年1月1日，在布巴内斯瓦尔举行的全印度作家大会上，我和我的妻子甘·凯丝丽与他以及当时的印度副总统萨瓦帕利·拉达克里希南[3]共进了一顿丰盛的早餐。一开始还相当愉快。我详细地谈到了阿图尔·伦德克维斯特，他在1958年被授予“加强国际和平列宁奖”。

[1]1967年9月，查鲁·马宗达决定出版英文月刊《解放》，目的是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土地革命政策。

[2]印度贾坎德邦城市。

[3]1888-1975年，印度哲学家、政治家，1952年任印度共和国副总统。

1952年，在印度旅行并与印度作家会面后，他向瑞典的广大观众展示了印度小说，如穆尔克·拉吉·阿南德[1]的《苦力》[2]和巴巴尼·巴达查里雅[3]的《饥饿》[4]。

——通过这些小说，瑞典读者可以更好地了解印度的现实，尼赫鲁说。

这就是我要写一写阿图尔·伦德克维斯特的原因，作为一位作家，他在当时欧洲——或者美国——的左翼作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他们与印度以及所谓的“第三世界”有着密切的联系。他写了关于他在非洲、拉丁美洲、中国和印度的旅行的书，它们在当时的整个“东方阵营”出版。现在它们过时了，就像他从弗洛伊德主义的角度来写作，并看到了性压抑在印度和经济一样重要。

此外，他和贾瓦哈拉尔·尼赫鲁一样，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开始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他是一个出身贫农的男孩，曾去过斯德哥尔摩，在所有的学术生活之外，他已成为一位著名的评论家、诗人、小说家和现代主义文艺运动的组织者。他和我的父母活跃在同一个文学/政治团体，他是弗洛伊德主义者，有点马克思主义，非常的现代主义。我们家里有他所有的书，我在六岁的时候就学会了如何阅读他早期充满活力的诗歌。

作为一位从美国、欧洲、非洲、拉丁美洲和印度引进新文学的评论家，他对瑞典的几代人都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阿图尔和我互相认识，当我是一名年轻作家时，我们一起出现在不同的政治和文学集会上，他当时认为我很有前途。

在布巴内斯瓦尔的会议上，我谈到有必要像他那样去做，与工会一起组织一种能让世界更容易理解“普通人”的文学的传播，大众文学是文学和政治的必然。阿图尔·伦德克维斯特用自己评论家的身份，让相当冷淡的瑞典社会民主工会组织资助出版了6.5万至7万册巴巴尼·巴达查里雅等作家的作品。

之后在瑞典，我们有好几年关系很亲密。1967年7月4日，我们作为演讲者一起出现在斯德哥尔摩美国大使馆前的一个大型群众集会上。我们说，大使和聚集在大使馆里喝G水[5]和T水的人背叛了他们的革命，而东南亚人民为了争取自由与来自华盛顿的侵略军进行武装斗争，这甚至可以说是捍卫了这场革命。阿图尔·伦德克维斯特措辞强烈地支持公开焚烧星条旗。这是一个产生了预期效果的表示，他说，因为美国政府出于心理原因对它作出了激烈的反应。把那块破布烧了！不要管警察说什么做什么。

后来我们在政治上和文化上分道扬镳了，这也是极具代表性的。他成了世

[1]1905-2004年，印度杰出的英语作家，以如实和同情地描写印度穷人而知名。

[2]穆尔克·拉吉·阿南德1933年的作品，描写苦力孟奴受尽剥削、虐待的悲惨一生，还写了苦力的罢工斗争，是印度现代文学中以苦力生活为题材的第一部名著。

[3]1906-1988年，印度独立后涌现的一位著名的英语小说家，他的作品反映印度社会现实问题，具有揭露和批判的特点。

[4]写于1947年，描写1942年至1943年的孟加拉大饥荒，揭露了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罪恶行径，对劳动人民抱有深刻同情。

[5] γ -羟基丁酸（GHB），合成毒品，对中枢神经系统有强烈的抑制作用，无色无味并会导致暂时性记忆丧失、恶心、呕吐等症状。

界和平理事会的副主席，而此时我在莫斯科被指责为第三世界主义者。他还进入了瑞典科学院，并开始负责诺贝尔奖（就像我们说的，“帮国王握手”）。但是我们都不得不在同样保守的斯德哥尔摩报纸上发表截然不同的文字，我是因为社会民主党的《瑞典晚报》发现我对美国和苏联都持批判态度，阿图尔是因为自由派的《达根斯·尼赫特》发现他进入瑞典科学院后变得反动了。

2006年公开庆祝他的百年诞辰时，他的妻子、诗人玛丽亚·薇恩邀请我发言。他就是当时我所说的和想表达的，是他那整个群体的典型代表。是的，他是我们欧洲左翼知识分子中的一员，他也是一位伟大的人物和一位伟大的瑞典作家。但是不仅时代已经改变，欧洲知识分子的原则也随着新的战争发生了改变。他现在在科学院的保守派同事们没有来，他们现在就像在他年轻时一样把他当作一条死狗对待，这也是有代表性的。他和萨特[1]、拉克斯内斯[2]、德莱塞[3]和布莱希特[4]一样，是一位积极反对帝国主义的作家。

我也要感谢拉达克里希南博士。1953年，美国正式宣布“正在调查扬·米尔达”，他们在我的母亲——当时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社会科学部门助理总干事——从巴黎来到爱德怀德机场[5]的时候把她扣押了。他作为印度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代表为我的权利进行了辩护。

美国宣称正在瑞典“调查”我，这本身就很奇怪。我并没有住在美国，也没有申请去美国的签证。根据当时有效的瑞典刑法，外国政府对瑞典公民或居民进行这样的“调查”是一种犯罪行为，要被判处两年监禁。

使美国当局在瑞典雇用的代理人违反瑞典法律“犯罪”的原因是我当时正在参加1953年8月2日至14日布加勒斯特[6]第三届[7]世界青年联欢节的筹备工作。然后在爱德怀德机场，他们又把德国纳粹的“株连”和“亲属责任”用在了我母亲身上。

年轻的一代应该知道，在“冷战”最剑拔弩张的一年，有来自111个国家的3万多名年轻人参加我们。我们的座右铭是：“不！我们这一代人不会为死亡和毁灭服务！”这是一场专门反对美国对朝鲜人民发动战争以及法国殖民者

[1]1905-1980年，法国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法国无神论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西方社会主义最积极的倡导者之一，曾参加反法西斯斗争，支持法国革命群众运动，挺身保护《人民事业报》，在侵朝战争、侵越战争、阿尔及利亚战争上，都曾发表正直的言论。

[2]1902-1998年，冰岛作家、历史小说家、剧作家，1955年荣获诺贝尔奖。

[3]1871-1945年，美国现代小说的先驱、现实主义作家之一、美国共产党党员。德莱塞的作品贴近广大人民的生活，《嘉莉妹妹》真实地再现了当时的美国社会，《美国悲剧》则使人们清晰地看到了美国社会的真实情况，是德莱塞成就最高的作品，“至今依然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

[4]1898-1956年，德国戏剧家与诗人，1955年获列宁和平奖金。

[5]纽约国际机场，1963年12月24日为纪念遇刺身亡的美国总统肯尼迪更名为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国际机场。

[6]罗马尼亚首都。

[7]此处是作者误记，1953年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办的是第四届世界青年联欢节。

在越南和阿尔及利亚发动战争的有意识的团结斗争。

然后突然间早餐桌上的气氛就变了，尼赫鲁开始和拉达克里希南博士谈起中国人。在塔什干[1]举行的亚非作家会议上，一位中国代表谈到了在文学上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的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性，他还提到了反对种姓制度的必要斗争。尼赫鲁越是说起中国人谈论种姓制度，就越是愤怒和不友好。

——这些中国人，他们总是对我们唠唠叨叨！他们就是故意反印度！

这使我感到很惊讶。并不是说我真的相信万隆会议后“Hindi-Chini bhai-bhai”[2]的口号会变成政治现实，而是这是我第一次在最高层听到了当时印度和中国之间日益加剧的冲突。三个月后发生了西藏叛乱[3]，然后是公开的边境冲突[4]。

甘·凯丝丽和我讨论了为什么尼赫鲁对反对种姓制度必要性的讨论反应如此激烈，印度的种姓制度和令人震惊的种姓歧视是我们当时生活在印度每天目睹和反对的事情，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印度的种姓制度并不那么特别，如果你仔细地观察种姓冲突并对它们加以分析，你总会分析到阶级。事实上，我们与当时在印度遇到的知识分子和共产党人就是这样讨论这个问题的。

五十年代末的一个晚上，我提到像反犹主义这样的种族主义是如何被旧俄罗斯的沙皇政权工具化的一一分而治之！——当时萨拉达·密特拉首先谈到1947年加尔各答的集体屠杀是如何被组织起来的，然后开始讨论马尔瓦尔放债人和1875年的德干农民起义。我从1953年开始就认识他并与他共事，他是当时印度非常典型的公开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

印度的马尔瓦尔人和东欧的犹太人在社会历史上的角色以及统治阶层利用这些冲突的方式是相似的。

甘·凯丝丽接着指出，她刚刚读到在1936年印度国大党勒克瑙[5]会议上，担任主席的尼赫鲁发表的讲话已经说明了达利特人的真实处境：

贱民制度和哈里扬人[6]的问题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解决。对一个社会主义者来说这并不困难，因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不可能有这样的分化和迫害。从经济上讲，哈里扬人组成了无土地的无产阶级，经济解决方案会消除习俗和传统造成的社会障碍。

[1]当时苏联加盟共和国之一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的首都。

[2]印度诗人泰戈尔在1924年访问中国时提出的口号，意为“中印是亲兄弟”。中印关系“蜜月期”时，尼赫鲁推广了这句口号。

[3]1959年3月10日西藏地方政府和上层反动集团为了维护旧有的农奴制度和分裂祖国而发动的反动叛乱。中国人民解放军驻西藏部队奉命对叛乱武装进行反击，至1961年底，西藏叛乱全部平息。

[4]1962年，印度为了侵占中印边界地区，公然在边界东、西两段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大规模进攻，中国人民解放军奉命自卫反击，并取得了完胜。

[5]印度北方邦首府。

[6]“哈里扬”意为“神之子”，甘地主张解放达利特人，曾用这个词来称呼他们。

我们可以讨论和解释它们，但是 1959 年我们在印度各地看到的种姓冲突和种姓压迫的例子，与 1936 年尼赫鲁谈论它们时我们所能读到的一样令人厌恶且具有破坏性。不同的是，我们遇到的尼赫鲁似乎不再像它们真正存在于他的印度那样看待它们了，就好像他相信，或是想要相信，这些问题通过几条法律已经基本上被解决了。

印度现在正式实现了政治上的独立，但是正如尼赫鲁本人 1933 年在《印度将何去何从？》中所写：

如果一个本土政府取代了外国政府并保持所有的既得利益不变，这甚至不会有一会儿自由的影子……

他说的当然是对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达利特人在今天正式独立的印度能称得上是自由的吗？人们只需在印度四处看看，自由属于少数特权阶层，而不是广大印度人民，对他们来说，印度仍然是不自由的。这并不是很奇怪，这是一个阶级和阶级统治的问题，可以用印度独立的历史来解释。

是的，印度是如何从英国那里获得正式独立的？

英国统治印度的全部历史就是一部印度人民起义和反抗的历史。从统治者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传统，即措辞优美的法律条文外加法律之外的极端残忍和血腥镇压。尼赫鲁很清楚这一点，他在艾哈迈德讷格尔^[1]监狱服刑时读过的书中有一本是“自由印度”^[2]1943 年 1 月出版的一份具有颠覆性的小册子《印度被蹂躏》，里面说：

……1942 年 8 月 9 日印度领导人被捕^[3]后，英国政府打着镇压暴动的幌子在印度进行恐怖活动，这是一幅未加修饰的客观画面。

而且可以说，没有一种能被认为是“其他”文明政府所具有的形式的暴行是英国人在 1857 年、1919 年^[4]、1942 年 8 月至 12 月^[5]以及现在没有在印度通过报复行动的方式实施的。与政府一方 70 人丧生相比，人民一方在遭遇向毫无防备或完全无辜的人们的肆意射击时，丧生的人数估计为 2.5 万人。

但这读起来就像是纳萨尔派 2010 年发表的关于当前印度政府政策的文章！

为什么一场有着如此大量的民众支持、在政治上由像贾瓦哈拉尔·尼赫鲁这样在许多方面富有智慧的人领导的解放运动最终会变成这样？这场解放运动创建了一个印度共和国，而在独立六十多年后的今天，印度政府竟为自己在贫困的海洋中给少数人带来了 8%/9% 的经济增长而感到自豪？一个独立的印度，

[1]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西部城市。

[2]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亚扶植的政权，其目标是取代英属印度。

[3]1942 年 8 月 9 日，英国殖民当局逮捕甘地。

[4]1919 年，英国殖民当局制造了震惊世界的阿姆利则惨案。

[5]1942 年 8 月，甘地发起让印度急速独立的退出印度运动，英国殖民当局采取镇压措施，国大党各级领导人几乎全部被投入监狱，之后国大党被禁止活动。

政府竟以暴力和武装力量执行让大多数人保持贫困的政策，并为了自身利益而迫使大约四分之一的人口陷入接近于牛生活水平的赤贫状态之中？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在他的自传中描述了国大党的发展，事实上他自己已经解释了这一点：

我们的民族运动最初是由于我们上层中产阶级企求寻找自我表现、自我成长的途径而开始的，在这后面还存在着政治和经济的迫切要求。它扩展到下层中产阶级，在农村中形成了力量，于是，开始推动农民群众，因为整个说来，农民感到甚至越来越难以维持他们悲惨的最低生活水平。[1]

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在这方面是一位杰出的人物，因为他在很早的时候就足够的洞察力来观察和描述印度从英国继承来的阶级分化。在独立的印度，这个阶级直到今天仍掌控着政权。在理智上，他知道自己是他的阶级和获得的教养造就的，在英国的学习使他的思想定型了，而他无法跳出自己的局限：

我的政治思想是我的阶级——资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当时风行的政治思想全是中产阶级的政治思想（就在现在也多半是如此），稳健派和极端派都同样代表中产阶级，采用不同的方式谋求改善中产阶级的地位。[2]

[1]见【印】尼赫鲁著，张宝芳译《尼赫鲁自传》，世界知识社 1956 年版，第 319 页。

[2]见【印】尼赫鲁著，张宝芳译《尼赫鲁自传》，世界知识社 1956 年版，第 55 页。

第七章 关于看法分歧的笔记

统一世界观就像格林童话中灰姑娘的继姐想要穿上灰姑娘在国王的舞会上掉落的舞鞋一样困难，你必须切掉脚趾或脚跟，但是它仍然不合脚。我想到了那个故事，在我的视线离开键盘，看到旁边桌子上的杂志的时候：

1944年2月16日，日本官方“情报局编辑”的图画杂志《写真周报》第309期的封面（在西方这应该是封底）展示了内塔吉·苏巴斯·钱德拉·鲍斯（受人尊敬的领袖）站在安达曼群岛的西海岸，隔着孟加拉湾眺望印度。他身穿他所领导的自由印度临时政府（Arzi Hukumayt-e-Azad Hind）的印度国民军（Azad hind Fauj, the India National Army, INA）的制服。

那本杂志放在我为写另一篇文章打开的文件夹里。2011年的春天，斯德哥尔摩的远东文物博物馆举办了一场展览，展出了日本明治时代关于萨摩亚内战[1]和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政治浮世绘以及小林清亲[2]的漫画《日本万岁·百胜百笑》[3]。这是甘·凯丝丽和我捐赠的，不仅是因为博物馆缺少那个时期的印刷品，而且我们还想直观地说明一下普通的日本人是如何被长期灌输思想，以至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犯下极其严重的战争罪行的。适当地组织和展示某一时期流行的形象可以使当时的主流思想清晰可见地呈现在当今的公众面前。

当然，七十年前瑞典的大学就有了一门学科叫印度学——尽管这在传统上是由德国大学的传统决定的，研究外交政策的机构对印度也有一定程度上的讨论——尽管历来有着英国的偏见。但是在战争期间，一定程度上由国家控制的瑞典媒体并没有多少关于印度的真实新闻，自然也就没有多少关于印度独立的新闻。或者更确切地说，真正包含了对甘地和尼赫鲁在国大党中的地位、1942年退出印度运动以及1943年孟加拉大饥荒（一场为了军事及政治目的策划的种族灭绝，约三百万甚至更多的印度人死于饥饿和营养不良）等内容的描述的只有亲德报纸和公开的纳粹报纸（斯德哥尔摩的德国公使馆也分发了有关印度独立运动的材料，但是没有1914年到1919年上一次世界大战时那么多）。在被占领的欧洲：比利时、丹麦、法国、挪威，情况是类似的。

具有代表性的是当时瑞典享有盛誉的自由主义新闻杂志《当今世界视图》在1942年8月（第33期第6页）发表了一篇关于甘地和退出印度决议的文章，标题是“印度的苦行僧变成了卖国贼”，并且奉命写道：“……从苦行僧到卖国贼的转变，可能是七十三岁的圣雄日益衰老的结果……”战争期间据我所见鲍斯只被提到了一次（1944年7月21日第30期第6页）：“……日本溃败，印度头号卖国贼苏巴斯·钱德拉·鲍斯潜逃。”印度独立运动被这样被解释成了纳粹宣传的一部分。

[1]1886到1894年有帝国主义势力介入的由萨摩亚派系之间的冲突引起的战争。

[2]1847-1915年，日本明治时期极富盛名的版画家、浮世绘师，被称为“最后的浮世绘大师”。

[3]小林清亲绘制的关于日俄战争的政治讽刺漫画系列。

看着这张苏巴斯·钱德拉·鲍斯的照片，我知道他的肖像现在悬挂在印度议会，在不同的城市他都被作为爱国者竖立起了雕像（而且他的大理石雕像从斋浦尔[1]被运往全国各地），今天的加尔各答国际机场还被命名为“内塔吉·苏巴斯·钱德拉·鲍斯国际机场。”我也知道，现在不仅是印度官方，纳萨尔派也把他视作一位——像巴加特·辛格[2]那样——为自由斗争的爱国者。

但是他在战争开始的时候去了纳粹德国，然后（乘坐潜水艇，这本身就是一次冒险）去了日本。他的印度国民军在 1944 年日本进攻若开[3]时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到达了英国控制的领土并升起了他的自由印度的国旗，但是这在战争的后期无法继续维持下去了。

1944 年我已经知道了他在战前印度独立运动中发挥的作用，因此我并不认为苏巴斯·钱德拉·鲍斯是像法国的多里奥[4]、挪威的吉斯林[5]那样直接的卖国贼，而更像当时投靠日本侵略者还当了“中华民国”南京汉奸政府主席的汪精卫。

但我有这种看法本身就是由于缺乏信息，而现在这种看法早已被推翻了。缅甸的昂山[6]和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7]作为爱国者，也曾与日本帝国主义合作来反抗统治本国的欧洲帝国，他们现在也都像苏巴斯·钱德拉·鲍斯在印度一样，成为了民族英雄。但是汪精卫当时在中国受到了国民党和共产党的一致鄙视，他从 1944 年死了到现在，在中国都是被唾弃的。这不是同一种亚洲的看法。

“西方”与印度之间的差异比这还要深。英国统治的殖民地印度的很大一部分“左派”并不是《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条约》[8]那样具有决定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冲击（西方仍在仔细考虑这一点），而是“丘吉尔-斯大林协定”[9]。

[1]印度拉贾斯坦邦首府。

[2]1907-1931 年，印度独立运动中最有影响力的革命者之一。

[3]缅甸西部若开山脉以西沿海地区，当时缅甸是英国殖民地，属于英属印度。

[4]1898-1945 年，曾参加法国共产党，1934 年 1 月被法共开除，1936 年创建具有纳粹性质的法国人民党，1940 年法国陷落后与德国占领军勾结，并组建反布尔什维克法国志愿军赴苏联作战，1945 年 2 月被盟军飞机击毙。

[5]1887-1945 年，挪威国家统一党元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挪威首相，1945 年被处以死刑。因其在二战期间与纳粹德国积极“合作”，吉斯林（Quisling）这个名字已成为“卖国贼”或“叛国者”的代名词。

[6]1915-1947 年，缅甸独立运动领袖、将军，被尊称为“缅甸国父”。1940 年为反抗英国统治而与日本合作，1944 年 8 月见日本败局已定于是秘密成立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并担任主席，1945 年 3 月率缅甸国民军倒戈进攻日军，直至日本投降。

[7]1901-1970 年，致力于民族独立斗争，被称为“印度尼西亚国父”。日本占领印尼期间，曾幻想依靠日本实现印尼民族独立，并担任日本御用组织“民众力量中心”主席，同时又秘密与抗日组织联系。

[8]1939 年 8 月苏联与纳粹德国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里宾特洛甫是德方代表、纳粹德国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是苏方代表、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故又称《里宾特洛甫-莫洛托夫条约》。

[9]二战后期斯大林和丘吉尔在东南欧划分势力范围的“百分比协定”。

后来，我们可以分析出在纳粹入侵之前苏联的政策背后的决定性因素，还可以阅读外交文件来了解英法领导层是如何企图把对德国的虚假的战争变成对苏联的“真正的战争”的。

我们中间尤其是当时做反对希特勒德国的政治工作的那些人，也知道“人民战争”的口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是多么必要（当时还不是毛主义的“人民战争”概念，而是 J·V·斯大林在 1941 年 7 月 3 日的演说中指示的“各国人民争取自由、反对希特勒法西斯军队的奴役和奴役威胁而结成的统一战线”^[1]，共产党人将其作为一种概括性的政治构想）。在这种情况下，印度共产党却没有像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那样，根据自身国情制定出既有原则又独立自主的政策。

相反，印度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不假思索地遵循了莫斯科官方路线的措辞，将这场战争解释为英国和印度人民共同的斗争，就这样把与英国当局合作变成了人民战争的一部分（在退出印度运动期间，领导同志们甚至被通报为爱国者）。他们谴责苏巴斯·钱德拉·鲍斯，说他只是一个叛徒，这是使党脱离人民的政策的一部分。

苏巴斯·钱德拉·鲍斯可能在 1945 年 8 月 18 日因空难死于台湾。英国俘虏了 2.3 万名印度国民军士兵，同年 11 月，英国人在德里的红堡开始了审讯，首先是针对主要的军官。反对这些审讯的抗议随即爆发，1946 年 2 月和 3 月，印度皇家海军和皇家空军发动了起义。

[1]见《斯大林选集》第 1 版下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480 页。

第八章 什么是恐怖？

我们几乎每天都要搬到一个新的营地。不管政府怎么说，丹达卡兰亚目前还只是一个游击区，不是真正的解放区。因此出于安全原因，我们在每个营地停留的时间很少超过一到两个晚上。

夜里我们已经在第二个营地喝茶了，人民解放游击军年轻的阿迪瓦西斯女兵们讨论起了她们参与的武装斗争和突袭，什么地方成功了，什么地方没有。

她们中有两人参与了 2008 年 2 月的讷亚格尔^[1]行动，那是一次精心策划的军事进攻，目标不仅是袭击军械库、警察局和警察培训学校，还有获取武器。

清理完警察局后，我们隔离了城镇，切断了所有的通讯线路并封锁了所有的入口。然后我们让人们待在家里，我们把军械库里的东西搬空了。

但是我们估计错了，武器弹药的运量比我们预期的还要大得多，我们的这些 AK-47 就是从那里来的。我们把车都装满了，也没能把它们全部带回来。我们不得不舍弃了大约一半，这让我们很心疼。

她们参加了很多次战斗，并为这次突袭感到自豪。她们应该自豪，这些年轻的阿迪瓦西斯女子证明了自己是有能力的战士。人民解放游击军为她们的打印机和个人电脑配备了太阳能电池板，现在，年轻的女战士们用个人电脑给我看了一长串最近打死的印度男兵的照片和视频。

他们闯入了我们的伏击圈，我们就引爆事先准备好的威力极大的地雷，随后进行猛烈的射击。之后我们拿走了他们的枪。

没错，纳萨尔派在印度的这场内战中是杀人的。尽管数量上无法与美国及其自愿的盟友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杀害的伊拉克人和阿富汗人，或是与之更有关联的印度官方和非官方部队杀害的印度人相比。

但是这些死于纳萨尔派行动的年轻男子大多穿着官兵或警察的制服，还有其他的是私家暴徒、卧底线人和多拉地主。

我就从这些死去的印度士兵说起吧。印度政府官方的政策是，这些人是恐怖分子的受害者，纳萨尔派就是恐怖分子。

政府的这项政策将印度政府与美国当局捆绑在一起进行密切合作。丹达卡兰亚的武装斗争并不是远方丛林里的地方性斗争，因为华盛顿认为它属于美国全球“反恐战争”的范畴。这是很重要的一点，需要说清楚。

在我翻阅这份文稿时，美国总统贝拉克·奥巴马正在准备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不仅关系到中亚、南亚以及东南亚的外交政策和关系，还对丹达卡兰亚具有直接的重要意义。在 10 月 29 日的《印度斯坦时报》上我读到：

“反恐是奥巴马在印度的首要议程。”

[1]印度奥里萨邦城市。

白宫在周五宣布，贝拉克·奥巴马总统下周访问孟买和新德里时，将把美印反恐合作列为首要议程。……“我们与印度军方进行了前所未有的合作，我们现在做的训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而且我们在反恐和类似问题上的关系非常重要。”他说。

“这将是总统与辛格总理举行的一些会谈的主题，也是此行第一站的主题。”吉布斯在回答一个问题时说道。

这是世界上一个迅速发展的地方，亚洲和印度正在迅速发展——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它的经济增长很快。而我们的投资——我们的伙伴关系正在为我们提高出口创汇的能力带来好处——还将在美国提供就业支持。在总统此行中这些都将重点强调，吉布斯说。

美国插手丹达卡兰亚正在进行的战争不仅有意识形态上的原因（“反恐战争”），还有白宫发言人罗伯特·吉布斯说出的经济原因：“我们的投资”。

所以贝拉克·奥巴马总统阅读了2010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的报告《关于恐怖主义的国家报告——印度》，为他对印度的国事访问做好了准备：

印度仍然是受恐怖主义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2009年有超过1000人死于恐怖分子的袭击，主要发生在克什米尔、东北部和受毛派影响的“红色走廊”。

(1) 据内政部长奇丹巴拉姆所说，隶属于印度共产党（毛主义）的团体在20个邦都有一定的影响力，但主要是活跃在印度545个议会选区中的223个选区，这些选区横跨八个邦，被称为“红色走廊”，包括西孟加拉邦、比哈尔邦、恰蒂斯加尔邦、贾坎德邦、奥里萨邦、安得拉邦、马哈拉施特拉邦和卡纳塔克邦。

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告诉议会，毛派/纳萨尔派叛乱集团对国内安全构成了最严重的威胁。毛派/纳萨尔派多次袭击警察和地方政府官员，炸毁铁路，杀害平民，扰乱公共服务。在这一年中，没有美国公民成为与毛派/纳萨尔派相关的恐怖主义的受害者。据报道，外国公司是他们敲诈勒索的目标。6月，中央政府根据1967年《非法活动预防法》取缔了毛派/纳萨尔派团体。受影响最严重的邦的首席部长们同意与MHA合作，沿邦际边界发动针对毛派/纳萨尔派的联合行动。MHA在阿萨姆邦、比哈尔邦、恰蒂斯加尔邦、奥里萨邦和贾坎德邦为警察建立了反暴学校。中央政府在恰蒂斯加尔邦和奥里萨邦部署了更多的安全部队，并宣布了八个邦增加部署的计划。

美国和印度在这场战争中的特殊关系由来已久，但是在2010年夏天正式化了。2010年8月1日，马赛厄斯·韦尔默朗（马丁·谢宁的研究助理，欧洲大学研究所的联合国反恐中保护人权问题特别报告员）在《反恐作战中的法律问题》里提到：

“美国、印度签署反恐合作协议。”

7月23日，美国驻印度大使蒂莫西·J·罗默与代表印度的内政秘书G·K·皮莱签署了反恐合作协议（Counterterrorism Cooperation Initiative, CCI）谅解备忘录。这次签署是美国与印度在反恐、信息共享、建设能力等方面密切有效合作的最新证明。

印度政府的一份声明称，印美反恐合作协议呼吁两国的突击队和特种部队加强合作。印度政府表示，该协议还旨在促进“海岸警卫队[1]和海军在海洋安全方面的交流”以及建立程序来承担联合侦查的任务。

代表华盛顿签署了这份协议的美国驻印度大使蒂莫西·罗默说：

在接下来的几天和几个月里，将在炸弹搜查、特大城市治安和重大活动安全、网络和边境安全等问题上进行更密切的信息共享与合作。

这位外交官表示，该协议是在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去年 11 月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期间达成的。

罗默补充道，（贝拉克）奥巴马总统和（印度）总理已经承认，国际恐怖主义对所有人都构成了共同的威胁。

没错，在印度这才是真正的恐怖，但贝拉克·奥巴马总统和曼莫汉·辛格总理却在华盛顿达成协议要反对另一种恐怖。奥巴马总统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期间，2010 年 11 月 7 日在欢迎奥巴马总统的正式晚宴之前，奥巴马总统和曼莫汉·辛格总理在德里的总理府举行了私下会晤，随后双方巩固了该协议。

这份反恐协议实际上是统治者针对不服从他们的穷人达成的一份协定，在印度主要是针对达利特人和阿迪瓦西斯人要求实现自身权利对他们造成的威胁。

奥巴马总统和曼莫汉·辛格总理之所以同意这份协议，归根结底只是他们在当前印度内战这场争夺矿产资源控制权的战争中作为阶级代理人的社会角色的一种表现。在印度这不是秘密，尼尔士·米斯拉详细论述了纳萨尔派控制的地区并发表在了 2009 年 11 月 13 日的《印度斯坦时报》上：

“如果你绘制出印度森林财富、矿产资源和贫困地区的分布图，你会发现它们完全吻合。”科学与环境中心的负责人苏尼塔·纳拉因说。

由于毛派几十年来一直反对过度开采、森林破坏和土地征用，他们通过巧妙而激进的措施扩大了影响力，正在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

6 月，一小队毛派走到邦首府赖布尔以南 340 公里处罗汉迪古答村的每周集市，近距离枪杀了 42 岁的维马尔·马什拉姆。维马尔·马什拉姆是一位有影响力的部落领袖，也是塔塔公司项目的坚定支持者。然后他们在众目睽睽之下步行离开了。

据政府估计，部落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 9%，但是发展项目中用于开发的土地有 40%以上是他们的。

一份刚刚发布的政府报告指责政府和塔塔、埃萨等公司强行掠夺恰蒂斯加尔邦腹地的土地，并警告称这是“哥伦布之后最大的部落土地掠夺”。

“如果按剧本演下去，这场公开宣战的战争将成为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土地争夺

[1]印度于 1978 年 8 月 19 日通过海岸警卫法组建，是印度继陆海空军之后的第四支武装力量。

战，”由时任部长拉古瓦什·普拉萨德·辛格主持、农村发展部委托编写的报告写道，“这场戏的剧本是塔塔钢铁公司和埃萨钢铁公司编写的，他们想要数量为七个及以上的村庄，在每个村庄都能开采到印度最丰富的铁矿石的矿脉。”

两家公司都驳回了这一指控。

“这太荒谬了……这儿有一份正式的谅解备忘录，土地已经拨给我们了，整个过程都是以合法方式进行的，根本没有土地掠夺。”桑贾伊·乔杜里，《印度斯坦时报》

恐怖是当今的现实，但什么是恐怖？维马尔·马什拉姆这样的人被枪杀，是因为他们被视为塔塔钢铁公司等剥削集团的工具。而在印度真正的恐怖是政府组织的非常理性的恐怖行动。

政府的政策背后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经济原因，就是要把阿迪瓦西斯人从他们的土地上赶走，必要的话还会强奸妇女，烧毁村庄，杀死那些不服从、为保留他们祖先传下来的土地而斗争的人。这是一个确保公司利润的问题，换句话说说是阶级战争，就像 2010 年 4 月 7 日《商业周刊》所解释的情况那样：

毛派不择手段的袭击是米塔尔钢铁集团、浦项制铁公司在印度面临的重大挑战。

这起针对印度安全部队的袭击是发生左翼冲突四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突显出阿塞洛米塔尔钢铁集团[1]、浦项制铁公司和 NMDC 有限公司[2]等公司在矿产丰富的邦投资面临的挑战。

昨天，毛派叛乱分子在恰蒂斯加尔邦东部的一次伏击中打死了 76 名军官，那里是 NMDC 运营其最大的铁矿矿井的地方。在它的邻邦，由于对土地问题的抗议，世界最大的钢铁制造集团阿塞洛米塔尔钢铁集团和韩国的浦项制铁公司尚未启动它们 320 亿美元的项目。

据《商业周刊》报道，这导致了“印度超过 800 亿美元的项目陷入停滞”，而这些项目能使全国的钢铁产量翻一番。昨天的袭击事件是印度试图消灭东部各邦的左翼游击队并开放铁矿、煤炭、铝土矿和锰矿资源丰富的地区投资的挫折。

矿业部和工业部秘书桑塔·谢拉·奈尔 3 月 5 日在采访中表示：“印度大部分矿业资源现在都在毛派控制地带，因为这样的威胁无法进行采矿，也无法履行新的租约。”……“遏制纳萨尔运动对于提高印度能源和矿产自给自足的水平是不可或缺的，”德意志银行的阿比·拉贾瓦拉和阿努伊·辛格拉在 4 月 2 日的一份报告中写道，“除非纳萨尔派的反抗减弱，否则在纳萨尔影响的地区开展业务面临的高风险将阻碍投资。”……印度工商联合会（FICCI）在 11 月

[1]阿塞洛钢铁公司是总部位于卢森堡的世界第二大钢铁制造企业，2006 年被上文提到的印度裔亿万富豪米塔尔麾下的世界最大钢铁集团米塔尔钢铁集团恶意收购，于是阿塞洛米塔尔钢铁集团成为了现今全球规模最大的钢铁制造集团。

[2]印度国家矿业发展有限公司。

的一份报告中表示，印度需要打击阻碍工业增长的恐怖活动。

报告称，正当印度需要增加工业机器来保持增长的时候，正当外国公司参加进来的时候，纳萨尔派正和对印度的长远胜利至关重要的矿业和钢铁公司发生冲突。

但是国际矿业资本对这里的入侵也是一种古老的恐怖。那么，究竟什么是恐怖？

由于这个问题无论在本世纪还是在上世纪都不新鲜，所以我将回到一份决定我世界观的文本上去。1940年5月，“玛蒂尔达·索登”号为了摆脱德国潜艇，在格陵兰岛和冰岛之间穿过北极风暴一路向北的时候，我正躺在升降卧铺上读这本书。我们要把汽油、军火、飞机这些违禁品运往瑞典，就要去佩特萨莫^[1]这个唯一开放的港口。丹麦已经被德国人占领，盟军正在从挪威北部撤离，瑞典被包围了。

“玛蒂尔达·索登”号无论是遇到德军还是遇到盟军都不会安全，但是我的父亲决定我们必须乘着它回到欧洲，这是唯一的机会。

“英国贵族正在把他们的孩子送去美国，但我们家是农民，如果有危险我们要回家。”他说。

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好主意，但是作为青少年的我在这件事上没有发言权。第二年我的父亲经过苏联，我的母亲则经过英国和葡萄牙，都回到了美国。我和祖母一起留在了瑞典，而那就是另一个故事了。

当我们准备溜出纽约港时，拉尔夫·本奇^[2]上船来和我们道别，他是我父亲的助理。他给了我一本厚厚的书，扉页上写着“赠给扬，作为对美国的回忆”，这是一本马克·吐温的主要作品集。那场北大西洋风暴中我正躺在卧铺上读《康州美国佬大闹亚瑟王朝》，我看到了马克·吐温在1889年写的一段话，从此决定了我的世界观：

啊，这就好似是在书上读到的、处在那场值得纪念和备受敬仰的大革命之前的法国和法国人民。凭着一次——只有一次——快速汇集的汹涌血浪，这次革命将绵延千年的罪恶一扫而光。漫长的十个世纪，人民饱受炼狱般冤屈、羞辱和苦难的煎熬，从他们身上每榨出一大桶的血，倘若只用半滴来偿还，那么这笔古老的旧账这次才能得以算清。如果我们能够记得并加以思考，我们便会发现这里其实有两个“恐怖统治”：一个在火般的热情下大肆屠杀，另一个则在无情的冷血中杀人无数；一个维持了几个月，另一个则持续了上千年；一个导致上万人罹难，而另一个则使上亿人受死。但我们的战栗常常都是因为那个不太重要的恐怖——即转瞬即逝的恐怖。然而，与受饥饿、寒冷、凌辱、残暴以及心碎折磨一生而死相比，瞬间死于利斧之下又有什么恐怖？与被绑在火刑柱上受生煎慢烤之苦相

[1]今佩琴加，位于欧洲北部科拉半岛西北，当时是属于芬兰的港口，1944年被苏军占领，二战后并入苏联改名为佩琴加，现在属于俄罗斯摩尔曼斯克州。

[2]拉尔夫·约翰逊·本奇，1903-1971年，美国教育家、政治学家、外交家，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金的黑人，他在1944年与扬·米尔达的父亲冈纳·米尔达合写了《美国难题：黑人问题与现代民主》。

比，顷刻被雷劈死的痛苦又算什么？我们都曾受过这样的谆谆教诲，要我们对那次的短暂恐怖战战兢兢、心怀悲痛，可一处城市公墓就能容纳那次恐怖中所有死者的灵柩，而那个真正的、更加古老的恐怖所造成的死者，恐怕整个法国也难以埋下——这种恐怖才是真正难以名状的凄惨和可怕，但我们中却没有一个人曾被教导说要看清它的波及范围之广，以及对此要示以应有的怜悯。[1]

十八年后，1958年雨季期间我驾车行驶在拉合尔[2]到印度边境的大干道上。在印度待了一段时间后，我意识到自己与马克·吐温故事里的康州美国佬生活在同样的现实中。我的私生活甚至可以说是愉快而有趣的，妻子画画，我在打字。我们的房间在职工保护区苏巴达少校的房子顶层，下午我们去看了康诺特广场周围的书店，在外交官和买办聚集的富丽堂皇的查纳克亚普里使馆区与不同的朋友一边喝酒一边讨论，更重要的是和印度知识分子中的同志们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但是接下来……当我们走出这个令人陶醉的圈子，大多数印度人生活的“受饥饿、寒冷、凌辱、残暴以及心碎折磨一生而死”的残酷现实像巨浪一样将我们吞噬。

离开外国人、上层阶级和高种姓封闭的圈子，就是为了看到印度的现实：

我们看到某些胆小的野兽，有公的和母的，散落在田野上，黝黑，面无血色，一起受太阳的炙烤，牢牢地钉在地上，顽强不懈地刨地翻耕；他们好像发出一个清晰的声音，而当他们站立起来时，显出了人的面孔，的确，他们是人。夜里他们藏身于污浊的陋室中，靠黑面包、水和菜根过活；他们使别人免于为了生计而播种、耕耘和收获之苦，因此他们对自己所播种的面包应该没有匮乏之虞。[3]

但这并不是在写印度，而是让·德·拉布吕耶尔[4]写的1689年的法国。一个世纪后，法国爆发了一场“值得纪念和备受敬仰的”“凭着一次快速汇集的汹涌血浪将绵延千年的罪恶一扫而光”的大革命。

浪漫的印度是小说家、旅游从业者和电影制作人虚构的。但是即便如此，对于那些生在分裂的生活之上的个人和阶级来说，他们的生活也是有趣和愉快的（并且在理智上鼓舞人心），就像他们这个阶级在巴黎旧政权时期的生活一样。在那个时期的法国有很多关于这种生活的有趣的书出版。

但在印度的现实中还有另外一个印度，一个像十八世纪特权区以外的法国那样的印度。这并非是不可知的，老一辈印度作家——例如穆尔克·拉吉·阿南德——和许多优秀的当代作家像帕拉贾米·塞纳斯和阿兰达蒂·洛伊，都以令人震惊的细节描述了这种印度生活的普遍现实。饥饿、压迫，还有甚至是出

[1]见【美】马克·吐温著，高扬译《康州美国佬大闹亚瑟王朝》，重庆出版社2015年版，第90-91页。

[2]巴基斯坦第二大城市、文化和艺术中心，曾是莫卧儿帝国的首都。

[3]见【法】拉布吕耶尔著，梁守锵译《品格论》下，花城出版社2013年版，第386-387页。

[4]1645-1696年，法国作家、哲学家和道德学家。

于绝望的大规模自杀。

这些作家都是优秀的作家，但他们并不是孤独的见证者，绝对不是。印度被压迫者的处境已经不是秘密，如果你去看看或多或少是自由的媒体，你就会发现一篇又一篇关于达利特人和阿迪瓦西斯人艰难处境的报道，你会看到关于正规和非正规的政府军以及多拉地主的私家暴徒残害他们的日常暴行的详细描述。印度的阿迪瓦西斯人和达利特人就像刚果（金）^[1]的人民一样，统治者为了自己的利益和安全追捕并杀害他们，强奸残害他们的妇女。就像在十八世纪的法国，这些暴行对开明人士来说并不是秘密。

是的，在今年我听出的出于政治和经济原因的凶杀和诱奸事件与我 30 年前报道的事件一样，但是有一点不同，当时那些事件主要是自发的，常常是非常暴力甚至是残忍的——而现在党试图控制人民对统治阶级压迫的反应。

那些自发的个人杀戮违反了我们的政策，它们表明歼灭路线是错误的。但是在实践中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

三十年过去，这场革命已经在农村建立了自己的国家机构——人民政府。我们向总书记询问了新的合法性这一更广泛的议题：

“问：你们把民主放在党的工作中的什么位置？指的是罢工权、异议权以及言论自由的权利。

答：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过这在我们党内并不是不明确的。我们需要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除了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地主和帝国主义者外，其他所有人都将拥有真正名副其实的自由。除了人民的敌人，每个人都会拥有真正名副其实的民主。另外，我可以这样说在准备革命人民委员会/人民政府的政策纲领时，我们研究了历史上特伦甘纳武装土地革命中村政府的经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政策纲领、菲律宾的人民委员会、秘鲁的革命人民委员会、尼泊尔的联合革命人民委员会，也研究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根据上面所说的，我们拥有所有的基本权利，包括每个选民都有权提出罢免任何一个当选的人，甚至有权将任何一个损害人民利益的当权者告上法庭，以便起诉他们。

就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宣布的四大自由（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而言，除了墙上的大字报外，其他所有的自由都是革命人民委员会/人民政府的政策方案所保障的。随着人民政府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之后我们还会保障大字报的自由。根据宪法，不允许对政治上的反对派进行体罚，任何人都有权在政治上持不同意见和加入工会。印度政府正试图控制异议，因此人们希望革命，我们不会犯同样的错误。此外，对于诉讼中的任何错误，当事人有权向村或者更高级别的革命人民委员会甚至党提出上诉。例如，在一个扩红区发生了一起事件，来自两个村庄的 33 个村民与警察总监勾结，成为了敌人的特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同志去处理了这个问题，虽然村民们想给警察的特务头子判处死刑，但是党进行了调解，给那个人一个机会，让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1]刚果民主共和国，首都为金沙萨，自 1996 年起政局动荡，战乱不断，灭绝人性的屠杀频频发生。

但是社会现实仍使其难以在游击区之外或者周边的地区充分实施，就拿阿吉拉告诉我的安得拉邦针对妇女的战争的故事来说吧：

——人民法院[1]的问题是在反封建斗争中提高人民意识的问题。多拉地主有各种关系，他是官员的朋友。向当局抗议既无用又危险。例如一个多拉地主占用了所有输送到村子里的电力，只为照亮他自己的房子。但是有一个男人站出来说话了，他是穆斯林。多拉地主做了什么啊？他派他的打手去殴打那个男人，然后强奸了他的妻子。他的目的是通过践踏达利特人的尊严来惩罚他们。那时候，党来到了村里并进行了干预。人民法院听取了所有的证词并作出了判决，这些私家暴徒必须被痛打一顿才能得到教训，而在多拉地主死后他们得到了释放。人民认为这是公正的，它不仅增强了妇女和穆斯林的力量，而且提高了所有达利特人的自尊。他们重新获得了尊严，不再受到这样的对待。

——再举个例子，地主很有权势，又非常好色，全村只有一两个女人没有被她强奸。他被他的打手前呼后拥地围着穿过村子，他看上了哪个女孩或者少妇，打手们就在他强奸她的时候在旁边站岗。第二天早上，被强奸者的家人不得不穿过村子到他的家里，拿出被他弄脏的衣服。

——党随后就出面干预了。人民法院作出判决，这些打手必须被打断胳膊和腿，多拉地主必须被消灭。这并不意味着党纵容人身暴力和死刑，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判决不仅表达了人民的意愿，而且是帮助完全被压迫的人们重新获得尊严和意识到他们的权利所必需的。

是的，在残酷的阶级斗争的现实中这是很难得的，但是党现在在政治上控制住了对村里打手暴行的仇恨。我记得三十年前在科塔古德姆[2]，关于报复我在《印度等待着》里写道：

这里有个臭名昭著的打手，甚至连警察都怕他，他为地主管理村子已经有二十年了。他强奸了一个洗衣女工，以至于她羞愧难当把自己淹死在了井里。四名来自瓦朗加尔[3]的学生在这个镇上，他们把他叫到集市上去。他去了，他很鲁莽，谁都不怕，因为他对自己的权势和力量充满信心，而且 20 年来从没有人敢跟他作对。

当他到了集市的时候，学生们用套索抓住他并把他捆了起来，然后砍下他的手，钉在店铺的墙上。在被砍下的手的上方，他们放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这就是那些把手放在人民的妇女身上的人的下场。”

集市上的人们看到这一幕都惊恐地后退了，他们沉默地站在那里，在四个学生离开的时候给他们让出了足够的空间。他们的情绪中夹杂着恐惧。但是现在，这件事成为了一首歌的主题。

[1]Jan Adalat，意为“人民法院”。

[2]印度安得拉邦城市。

[3]印度安得拉邦北部的城市。

第九章 唱人民的诗歌

然而，当晚我在第二个营地看到被打死的印度士兵的照片和视频时，我仿佛听到了三十年前切拉班杜·拉朱在海得拉巴^[1]酒店的房间里唱《Ma Loni》。当时警察就在楼下大厅，他们在跟踪切拉班杜·拉朱，并对我们进行检查。我正在给他录音，他的声音很微弱，三十个月后他将死于脑瘤，而此时已经出现了这种疾病的症状。我录下了他的歌声，后来还发行了这张唱片。

在英迪拉·甘地^[2]的“紧急状态”^[3]期间，安得拉邦的三十五位诗人因为文字狱坐了牢，那时候他在狱中写下了这首歌。这是一首写给狱警和那些认为所有的警察和狱警永远都是敌人的同志们的歌，也可以是写给我在照片中看到的这些死去的印度士兵的一首歌。这段文字是三十年前苏巴·拉奥为我翻译的：

你是我们中的一员，你属于我们。你为了谋生，已成为一名警察。但是现在，你把子弹对准了那些为更好的生活而牺牲的人。亲爱的兄弟，这就是生活吗？老人们走向死亡，你年幼的兄弟姐妹们拖着石头，而你用子弹射穿他们的心脏。但是，你仍是我们中的一员，你属于我们。有人享受着奢侈而富足的生活，穷人却在赤贫和穷困中受苦，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所有的穷人都起来反抗。他们想让你在他们中间占有一席之地。做人要有尊严，当长官命令你闭嘴的时候，想想真相。今天，在一群恶魔的统治下，饥饿和贫困使你眼里充满泪水。你无立锥之地，因没有房子受苦。你是穷人，但不要让自己变成伤害自己肉体的凶器，你平凡的亲戚们都来到了森林。趁火打劫者统治了这个国家，给你来福枪的长官是背叛了你的国家和家庭的叛徒。你是我们中的一员，你属于我们。亲爱的兄弟，现在你正把子弹射向兄弟姐妹们的心脏，你正在做错误的事。

这首歌可以写给已死去的印度士兵，以及他们还活着的正在丹达卡兰亚追杀阿迪瓦西斯人和纳萨尔派的同伴。

它已经成为一首非常流行的歌。当时英迪拉·甘地在暴乱中动用军队镇压反对她的政策的警察，警察们在军队向他们发起进攻的时候唱了这首歌。政府用士兵来镇压人民，这首歌仍用来与贫穷的士兵进行直接对话。

切拉班杜·拉朱是独立后伟大的年轻泰卢固语^[4]诗人之一，一位现代主义者，所谓“自由诗”的代表。但是在纳萨尔巴里起义之后，安得拉邦的斗争变得更加激烈。他读了毛泽东的文章《为人民服务》，在成为一个用美丽的——

[1]印度特伦甘纳邦首府。

[2]1917-1984年，尼赫鲁的女儿，在1966年至1977年、1980年至1984年担任印度总理。

[3]1975年，时任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为打击政敌、镇压示威和骚乱，要求支持她的印度总统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在此期间把成千上万的政治对手投入监狱，推行严厉的出版审查制度和一系列限制个人自由的法律。

[4]泰卢固族是南亚印度民族之一，使用泰卢固语，主要分布在安得拉邦。

尽管是现代主义的一一辞藻取悦统治者的诗人和成为一个参与斗争并创作直接与群众对话的歌曲的诗人中间做出了选择。1970年，他成为“革命作家协会”的创始人之一，该协会被称为 VIRASAM——Viplava Rachayithala Sangham（现在这再次被政府宣布为非法）。

他最有力量的歌曲之一是形式上非常简单的《Padutam, padutam》，在英迪拉·甘地的“紧急状态”期间，它成为了属于这位政治犯自己的歌。当政治犯们被铁链拴着带到审讯室时，他们就敲打着铁链开始唱《Padutam, padutam》。现在印度监狱里的政治犯们仍在唱这首歌：

我们歌唱，我们歌唱人民是我们的领袖，人民的力量正在取得胜利，我们歌唱纳萨尔巴里写下的解放之歌。我们歌唱，我们歌唱人民是出血版[1]上的空白，但人民的斗争终将夺回劳动果实。我们歌唱，我们歌唱。

是的，切拉班杜·拉朱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泰卢固语诗人，也是一位属于“人民战争”集团的纳萨尔派诗人。复仇心切的卑鄙政府一次又一次地将他投入监狱作为回应，他们甚至在知道他即将死亡的时候想要快点把他饿死。

但他不仅是一位诗人，还是一位代表了纳萨尔派一直以来——在切拉班杜·拉朱牺牲二十八年之后仍然——在组织和领导的作为全印度社会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强大文艺运动的典型诗人。

2008年，党向国际上的关注者总结了过去四十年纳萨尔派斗争的经验：《印度毛主义革命的光辉轨迹》，然后引用了切拉班杜·拉朱演讲中的格言：

“饥民们眼中的希望之光
像沙漠里的小路那样消失
被风刮走的信仰的帐篷
早就已经成为了一片废墟
如今骨子里已忍无可忍
必须要用上战斧和尖锥
齐心协力铲除这黑暗之树

切拉班杜·拉朱，《不要让这个国家再次受骗》”

但是，组织和领导这些词汇可能是指向错误路线的。纳萨尔巴里运动是这样一场运动，它既是印度人民斗争的政治表现，又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影响，始终是人民文学中的决定性因素。为了解释这一点，我想引用我在二十七年前写的关于印度现代文学的这一方面以及纳萨尔巴里运动对文学的重要性的文章。我写了一篇关于最伟大的泰卢固语诗人希里·希里[2]之死的文章发表，他也启

[1]版面设计术语，广告一直延伸到版面边缘以代替标准白边的版面，经过裁切之后不留空白。

[2]1910-1983年，印度泰卢固语左翼诗人，进步派的代表。他接受马克思主义观点，突破传统格律，用自由体和口语写诗，20世纪70年代担任过泰卢固语革命作家协会主席。

发和引导了切拉班杜·拉朱。

在 1983 年 7 月 15 日炎热的下午，世界上一位伟大的诗人心脏病突发去世，享年 73 岁。然而在瑞典的媒体上连一个简短的通告都读不到，也许法国或英国报纸上的某个角落里藏着简短的信息，是我没有看到。

欧洲的沉默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因为这位诗人是亚洲人是印度人，在马德拉斯[1]去世。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共产主义者——而不是那些土豆烧牛肉共产主义者[2]、欧洲共产主义者[3]或其他各种胡萝卜政策下的共产主义者，他是一位在马德拉斯去世的真正红透了的共产主义者。他主要使用的语言是泰卢固语，用这种美丽而富有诗意的语言写出了大量文学作品，而这是一种亚洲的语言，其伟大而悠久的文化传统非法语、英语或美式英语可比。欧洲那些文化人，对这个或那个巴黎咖啡馆的蹩脚文人关于诗歌结构的看法感到不安，他们甚至不知道 4000 万印度南部人民用来表达他们的经验、知识和情感的语言叫什么名字。

讣告作者 D·安贾内于鲁 1983 年 6 月 16 日在《印度快报》上写出这样的文字来总结：

他之于安得拉邦，如同纳兹鲁尔·伊斯拉姆[4]之于孟加拉国，巴勃罗·聂鲁达[5]之于拉丁美洲，马雅可夫斯基[6]之于苏维埃俄国。他永远是革命的诗人，是未来转瞬即逝的预兆。

当然，歌德在 1827 年 1 月 27 日星期三与爱克曼[7]谈话时说的是对的，他

[1]金奈（泰米尔语：“Chennai”），1996 年以前被称为马德拉斯（Madras），印度泰米尔纳德邦首府。

[2]“古拉希”（Goulash）是世界名菜匈牙利炖牛肉，赫鲁晓夫访问匈牙利时在一次群众集会上说，到了共产主义社会，大家就可以经常吃“古拉希”了。中苏论战时“古拉希”被翻译为“土豆烧牛肉”，在当时特殊的国际背景下，“土豆烧牛肉”成了赫鲁晓夫鼓吹的“共产主义”的代名词。毛泽东在《念奴娇·鸟儿问答》中诙谐地写道：“还有吃的，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对赫鲁晓夫给予了辛辣的讽刺。

[3]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的一种新的社会主义思潮和派别，1977 年 3 月，意、西、法三国的共产党领导人在马德里会晤，并联合发表宣言全面阐述了“欧洲共产主义”的基本主张。“欧洲共产主义”在当时是作为既不同于社会党的“社会民主主义”，又不同于“苏联模式”的“第三条道路”提出来的，然而由于苏共的打压和阵营内部的分裂，“欧洲共产主义”在十年左右的时间内就烟消云散了。

[4]1899-1976 年，孟加拉语诗人，以反帝反封建的《叛逆者》一诗而闻名，被称为“叛逆诗人”。

[5]1904-1973 年，智利著名左翼诗人、外交家，智利共产党党员，1971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6]1893-1930 年，苏联伟大的革命诗人、剧作家，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歌手，激进的文学革新者，20 世纪世界诗坛上最著名的诗人之一。

[7]1792-1854 年，德国作家，歌德的助手，辑录了《歌德谈话录》。

说，“……我喜欢环视四周的外国民族情况，我也劝每个人都这么办。”

“……如果不跳开周围环境的小圈子朝外面看一看，我们会陷入……学究气的昏头昏脑。”“……因为自己写过一首好诗就觉得自己了不起。”[1]然而不幸的是，当他宣称世界文学的时代已快来临时，他错了。在那次谈话的一百五十年之后，世界文学的时代仍很遥远。人们可以有把握地认为，从事文学工作的欧洲人甚至没听说过1983年夏天在马德拉斯去世的那位伟大诗人的名字。

他的人民知道并热爱他的名字，希里·希里。因为他的语言，他也被他的阶级敌人不情愿地喜爱，他们认为他是一个叛徒，一个藐视宗教和破坏种姓制度的人。他的全名是希里伦格姆·希里尼瓦萨·拉沃，1910年1月2日出生在维沙卡帕特南[2]一个正统的中产阶级家庭，他在那里上了学。后来他在马德拉斯基督学院学习，并于1930年获得了动物学学位。那时候他已经有了诗人的名声，是一个有前途——虽然浪漫，但是有些反动——的年轻人。1928年，18岁的他写出了自己的处女作《Prabhava》，这是一本薄薄的小册子，里面是他充满自信地以传统形式创作的浪漫的宗教诗歌。

这是安得拉邦文学一个伟大的时代，在后来的印度文学史上，安得拉邦1915-1935年这二十年可与雅典的伯里克利时代或者英国的伊丽莎白时代相媲美。安得拉邦文艺复兴时期的诗人如维雷夏林格姆·潘丘鲁，使文学打破了僵化的书面语，重新使用口语。一群在欧洲不出名的伟大诗人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包括抒情诗、叙事诗、宗教赞美诗和主题诗。这也是泰卢固语小说和戏剧作品的一个黄金时期。

希里·希里的重大转变是在1933年和苏普塔什卡卢在一起的时候，他对正统和反动思想的拒斥表明了他对浪漫的现代主义的信仰，而且同时也表明他回归了通俗诗、宗教诗。

从此他成为了新技术和产业主义的诗人，生机论者和机器崇拜者，社会主义者和革命家。是劳动创造了这个世界和世界上所有的财富，劳动人民要自己解放自己，创造明天的世界。他结合民间语言、梵语和泰卢固语，用强有力的语言向年轻人传播了推翻旧国家、揭穿其谎言的思想。

同时，他也把注意力转向了外国诗歌，他广泛而深入地思考，就如同他深深地植根于他的人民和语言。他受到了纳兹鲁尔·伊斯拉姆和哈伦德拉那兹·查托帕迪雅亚[3]的影响，也受到了雪莱、斯温伯恩[4]、鲁伯特·布鲁克[5]、西格夫里·萨松[6]、波德莱尔[7]、帕斯捷尔纳克[8]和马雅可夫斯基等诗人

[1]这是1827年1月31日歌德和爱克曼谈话的内容，见【德】爱克曼辑录，朱光潜译《歌德谈话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第113页。

[2]印度安得拉邦位于孟加拉湾沿岸的港口城市。

[3]1898-1990年，印度诗人。

[4]1837-1909年，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最后一位重要的诗人。

[5]1887-1915年，英国空想主义诗派诗人。

[6]1886-1967年，英国近代著名的反战诗人及小说家。

[7]1821-1867年，法国十九世纪现代派诗人，象征派诗歌先驱。

[8]1890-1960年，苏联作家、诗人、翻译家。

的影响。

他以各种各样的职业谋生，但是很少在同一个地方待很长时间。他很爱喝酒，过着忙碌的生活。他在马德拉斯和海得拉巴当过记者，为新闻界和电台做自由撰稿人，还当过空军的文职雇员，然后到了四十年代，他在马德拉斯的南方电影行业以歌曲作词家和编剧的身份出现。

在三十年代，他的政治意识增强了。世界上法西斯主义的威胁越来越大，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正在实施五年计划的苏联——改变了他。革命浪漫主义发展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富有诗意的世界观变成了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使印度南部的农业工人与捷克的矿工、爱尔兰的水手以及美国南方种植园里摘棉花的黑人团结起来。

这时是阿拉贡^[1]影响了他的风格，对他未来的发展方向起到决定性作用。现代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运动有意识地转向了大众，从人民的语言和文化中学习其真正的根源。因此希里·希里从安得拉邦被鄙视的农民和被流放的人那里学习丰富多样的文化和非常流行的民歌：Bardi Burrakatha 的歌词（说唱歌手和解说员一起表演，用管弦乐器伴奏）和 madiga 的歌曲，被流放的人的诗也解放了他的诗歌。他在风格上变得越来越自信，同时他的诗歌也越来越清楚地谈到艺术诗人们认为低俗和不道德的主题：煤油灯、肥皂剧和小狗。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里·希里成为安得拉邦的共产党、民主作家协会和进步作家运动的领袖之一。1945年12月，他在拉贾蒙德里^[2]组织召开第三届安得拉邦进步作家年会，八十名泰卢固语作家参加了为期三天的讨论和表演，他们代表了整个安得拉邦（以及海得拉巴的尼扎姆）十六个部分的九百名作家。

希里·希里不仅是个知识分子，实际上他还参与政治活动。他参加了党的竞选活动，并当选为议会议员。他积极参与世界和平运动，访问过赫尔辛基、巴黎和莫斯科。

作为安得拉邦最杰出的革命诗人，他自然遭受了最猛烈的攻击。1955年安得拉邦竞选期间，他在新闻界和文化界遭到个人自由主义支持者如此猛烈的攻击，以至于他几乎精神崩溃。但是这些个人自由主义的支持者无法击垮他，希里·希里从疾病中康复，继续写作。他对印度公开的共产主义运动越来越失望，它正在与议会制度和中产阶级相适应，同时忘记了劳苦大众。

1967年，纳萨尔巴里起义爆发了，印度大地上春雷隆隆。不，这不是议会或中产阶级的事，也不是参加国际会议或和俄国人一起喝伏特加的事，而是印度的贫农起来造反了。真正的共产党人和腐败的党决裂，走向群众路线，走上了从瓦哈比运动^[3]、圣战者运动^[4]到1857年起义再到莫普拉^[5]起义、特伦甘纳

[1]1897-1982年，法国诗人、作家、政治活动家。早年参加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文学运动，后加入法国共产党，在文学创作上转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2]印度安得拉邦东部戈达瓦里河三角洲顶端的城市。

[3]19世纪上半叶印度穆斯林反对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复兴伊斯兰教的运动。

[4]近代印度伊斯兰教复兴运动之一。

[5]1921年8月至1922年2月英属印度马德拉斯管区马拉巴尔沿海地区爆发的穆斯林农民起义。

起义的革命道路。无论男女，他们都随时准备为人民的事业献身。他们来到了安得拉邦的斯里卡库拉姆县，农民起义正在这片土地上蔓延。如果有人寻找英雄，那就不要往远处找了——像查鲁·马宗达那样的英雄，正是革命的红领巾的编织者，还有安得拉邦璀璨的明珠维姆帕塔普·萨蒂亚纳拉亚纳和阿迪巴塔拉·凯拉萨姆，以及现在穷苦人歌颂的所有其他数千名不朽的烈士。

到了希里·希里 60 岁获得公开隆重的致敬时，学生们向聚集在一起的诗人提出了政治上的问题：

诗人们，你们站在哪一边？是和正在斗争的劳苦大众站在一边，还是和残暴的政府站在一边？

在德国，年轻的激进派学生亲眼看见他们喜爱的歌德变成了冷漠主义的诗人，希里·希里是伟大的，是他那个时代的歌德，也是属于他的人民的歌德，而他并没有变得消沉冷漠。1970 年是他六十大寿的纪念年份，这位贫穷的国民诗人从安得拉邦首席部长那里得到了丰厚的奖励，是大量的金钱和当权者的赞誉。但是希里·希里拒绝了荣誉和金钱，转而选择参与建立公开支持纳萨尔巴里道路的 *Viplava Rachayitala Sangham*，革命作家协会。

在那几年里他参与了革命作家协会的活动，并致力于建立印度革命作家协会。他公然反抗当局，他们甚至不得不把他关押一小段时间，企图使这位国民诗人消失，而这段时间里他也一直在写作。

对于安得拉邦的诗歌运动来说，对于数以千计的诗人以及数百万听众和读者来说，希里·希里 1970 年以后的作品收录在《*Maro Prasthaanam*》里，是印度文学中伟大的人性解放作品之一的一种非常适合青年人的创造性延续。

现在他去世了，即使从未听说过他，欧洲的工人和学生也为此感到难过。但是，他投身和引领的为了解放印度人民的革命诗歌运动，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

如今已是 2010 年，我本要再次前往海得拉巴，和瓦拉瓦拉·拉奥^[1]、加德尔以及其他的同志会面。但是今年我实在太疲倦了，去不了那里。事实上我已经生病了，在去孟买之后我不得不直接回到瑞典。

而在 1980 年，我曾和切拉班杜·拉朱以及其他来自不同革命团体的诗人和歌手一起，用一台小型录音机把他们的歌曲录制下来。几年后，现已去世的苏巴·拉奥帮我翻译了歌词。出于政治上的原因，它在瑞典的销量是很小的，而我们试图通过伦敦分销的国际版则根本没有售出。这些歌手是来自不同团体的，由于当时运动在各个互相敌视的团体中间陷入严重的分裂，所谓的“印度共产主义革命者”没有团结起来的可能，所以没有一个团体能接受我在我的小录音机上录制的所有歌手。我希望——见附件——现在的情况会有所不同，能让我注意到或听到在什么方面团结起来了！

[1]生于 1939 年，印度泰卢固语共产主义诗人，自 2018 年以来一直作为政治犯被关押在监狱里。

我记得三十年前我们在丛林深处的夜晚，和武装队伍一起围坐在戈达瓦里山的篝火旁。他们唱着阿加德·陈尼娅的挽歌，向 R·罗摩·纳拉桑亚致敬，这令人深深地感动。我把它录了下来，而苏巴·拉奥——现在已经去世很久了——在这群人唱歌的时候，把歌词翻译成英文写在了他的笔记本上。

我相信这些歌词说明了纳萨尔巴里运动的过往和当下：

R·纳拉桑亚同志永垂不朽，他就像指引群众的火炬。工人出身的他，努力为工人夺回劳动果实。他学习经典作品，追随列宁的脚步。他走上了毛泽东思想的道路，带领我们走向未来。他站在了前面，为了平等拿起武器。这片土地属于工人！他说道。他在卡马姆、瓦朗加尔、斯里卡库拉姆、卡里姆讷格尔^[1]和戈达瓦里两片区域的土地上闹割据。他唤醒了部落的人民，带领我们走上斗争的道路。敌人设下了陷阱，在一个日出前的清晨抓获了他。他们抓获了这位同志，这位同志手无寸铁。他们把他带去了海得拉巴的马拉克佩特，我们敬爱的领袖落入了警察手中。他们把他带到了奇哈尔古塔山中，带到了瓦朗加尔地区的马萨姆佩特。当他回答他们“我就是要走革命的道路”时，这帮婊子养的拔掉了他的指甲。他们在狱中无耻地枪杀了他，这位伟大领袖的鲜血洒满了大地，人民失声痛哭。当人民走上我们的同志指引的道路时，敌人不得不抱头鼠窜。不朽的他永远在人民心中，是我们杰出的榜样，我们的同志罗摩·纳拉桑亚。

[1]均是安得拉邦被纳萨尔派影响的县。

第十章 论弱者政治与文化特性

当我醒来时，夜幕仍笼罩着我周围的丛林深处。我能听到身边同志们均匀的呼吸，他们都在熟睡。一名哨兵正穿过丛林中的营地，我看见手电筒的光在晃动。

我在睡梦中写了一篇文章。我写道：在瑞典，好几个世纪里官方的意识形态被新教教会控制，对贫农来说，读圣经是强制性的。从十七世纪开始，（男性）人口的识字率普遍提升。而我们这些已经超过了圣经年龄限制——八十岁——的人就只好展望道德败坏的日子了。我真的赞同吗？

我在这个问题中醒来了，因为我不得不小便。这并不奇怪，到你年过八旬的时候，你通常每晚都会起夜几次。在家里这没什么困难，我侧着身，把脚放在地上，抓住书架，站起来走去，我这样悄悄地做是为了不吵醒我的妻子，但是现在我正躺在丛林地面的床单上。我想我可以盘腿坐起来，就像做瑜伽一样，这我能做到，但是接下来呢？

这里没有什么东西能让我把手放在上面，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用来把我自己拉到一个能站立行走的位置。即使我可以翻过身跪着移动，我也没法站起来，直到我拖着地上的床单在泥泞中爬到一棵树旁边抓住它为止。

我突然想起去年冬天，就在我的妻子飞往墨西哥看望她的家人的前一天，我走到花园里一个很好的瑞典卡森酒窖。那儿用来放葡萄酒，夏季炎热的时候温度不会超过 10 摄氏度，冬季寒冷的夜晚温度不会低于 4 摄氏度，最初它是 19 世纪中期的某个时候为贮藏土豆而挖掘的。现在我拿起了一瓶博若莱葡萄酒。那天很冷，过去三周一直在下雪，通向房屋的小路被一米高的雪墙包围了。然后我突然滑了一跤摔倒了，抓着酒瓶四脚朝天躺在被雪墙包围的小路上。如果我年轻一点，那我翻个身就爬起来了；如果前几周天气不是一直这么寒冷，那雪融化又冻结就会形成一个硬表面让我能抓住。现在我试着翻过身，但却做不到。我突然想起了 1939 年纳尔逊从佛罗里达州回来时带给我的小鳄鱼，如果你把它翻过来抚摸它的肚子，它也动不了。

我只好呼喊求助，我的妻子听到了，她过来拉住我的手扶我起来。

“记住，我在墨西哥的时候不要一个人去酒窖，”她说，“没人能听到你在森林里的呼喊。即使你有手机，并用它向医院或警察求助，他们也要开好几英里的车。在他们到达之前你就要冻死了。”

是的，年纪大了会有很多麻烦。我叫醒了睡在我旁边的来自人民解放游击军的年轻的阿迪瓦西斯同志，他理解我的意思并叫醒了另一个同志。我向他们伸出双手，他们抓住我的手拉着我站了起来。

只要站起来我就能走去小便了，但是我不能蹲下来拉大便，膝盖不允许这么做。也就是说如果我蹲下了，就没法再自己站起来。

——你和我爷爷一样，其中一个同志说，他的膝盖也有毛病。

然后他们就拿起斧头，很快地给我做了一个和瑞典军队里一样的厕所，一根粗树枝放在了浅坑上方两棵树的枝杈间。

接下来我在丹达卡兰亚逗留的日子里，同志们帮我洗澡。高塔姆·纳夫拉

卡长途步行回来告诉我，去同志们为营地挖的井旁打一桶水，到一边冲个凉，那感觉有多好。这对我来说却并不那么容易。

我不需要任何一本书来告诉我老年令人烦恼的一个细节是，当你年过八十，就有很多过去看来很简单的事变得那么困难，比如当你外出露营时要适当地洗澡。在家里我可以自己洗澡，尽管没告诉我妻子让她准备好如果发生什么事进来帮我一下我就不能进浴缸。

当然，我可以找一个没有太多蚂蚁和其他昆虫的阴凉处。尽管有些困难，但是我甚至可以自己提桶水拿到那里，然而由于我的膝盖不好，给我带来了疼痛，我实在无法继续这个过程并把水倒在自己身上洗澡。我不得不寻求帮助，在丹达卡兰亚丛林里，我得到了年轻同志们的帮助。

我写这篇文章有一个非常真实的政治原因，这通常不是由一般被称为“左派”的作家完成的。不仅因为它看起来过于私密，还因为通过关注经济和社会问题很容易忽略了非常真实的文化差异。我们转移视线也是因为所有“文化”差异的问题已经成了欧洲、日本、印度和南非极右势力的专属。但是实际上，这一事实让我们更应该仔细地观察。毕竟文化和民族的差异和特性是真实存在的。

如果你想要打个比方，那“文化”就像语言一样。它们最终是历史地社会地形成的，我们可以看到社会关系以及后来的阶级关系是如何使它们形成的。但是有这个事实还不够，要理解语言的发展并制定正确的现行政策，那眼光必须比我们现在阶级社会的时代更长远。在丛林里年轻的同志们帮我洗澡时，我想到了这一点。

以老年的观点为例，在老龄化方面，印度和瑞典处于两个极端。如果你出生在瑞典而不是印度，平均预期寿命大约会延长二十年。尽管婴儿死亡率让老龄化的数据失真了，疾病、饥饿和压迫也使印度许多老年人的生活很悲惨，但这并不是整体的情况。对老年人的态度有所不同，这是一种有着悠久历史的文化。

在瑞典人们普遍认为，过去家里有人年纪太大了，他们往往被他们的大家庭带到悬崖边上，要么自己跳下去摔死，要么被家人推下去。因为大家庭的所有成员都把手放在原木上，所以他们没有任何个人的罪行。关于这地方有个难以翻译的单词叫“ättestupa”，你也可以说是“gens precipice” [1]。文学上，它在13世纪末的《高特雷克萨迦》中被提及，这些传说主要发生在瑞典南部几个有神话色彩名字的小山上。

同一个故事的另一个版本是，当老人无法工作却仍想吃东西时，大家庭就会拿一根柄很长的棍子，叫“ätteklubba”，即“gens club” [2]，大家庭里的每个人都把手放在柄上，这样罪行就不会是个人的了，然后棍子就打到老亲戚的头上，砸碎头骨，让他/她死掉。据说瑞典南部的一些教堂还存放着这种棍子。

据说这样杀害老年人的原因是贫穷，村子里穷得一塌糊涂，小块土地几乎不够养活继承的儿子一家。当然，几个世纪以来由于瑞典农村的深度贫困，一

[1]意为“氏族悬崖”。

[2]意为“氏族棍”。

些人，也包括老年人都已经被杀害。有的人被给了“白粉”，也就是砷。在某个旧墓地被迁移时，你可能会在这里或者那里发现一块头骨，一块被铁钉穿过的头骨。

这并不是“遗传的”或者“天生的”邪恶的表现。在漫长的几个世纪里，欧洲北极边缘地带农村的深度贫困和经常发生的真正的饥荒（瑞典最后一次真正的饥荒在 1866/1867 年）产生了这种杀害年老者 and 体弱者的文化传统。它可能被视为一种社会习俗，使我的祖先在恶劣的气候里有生存下来的可能。然而这也给我们现在的生活留下了深深的文化创伤。

这里应该牢记两个事实。尽管进行了数百年的研究，但是并没有发现任何确凿的证据能表明瑞典曾经真的存在过“ättestupa”和“ätteklybba”，这似乎只是一个流传很广泛的瑞典民间传说，一种传统行为的合理化。同时，如果你去看北欧的《萨迦》[1]或印度的流行故事这些经典通俗文学，你会发现对老年人的描述有一定的不同，这让故事变得可怕。瑞典不是一个适合人变老的好文明，但这并不是说我们是仅以杀害老人而闻名的文明。我记得在中国有人告诉我，饥荒时期祖母们放弃了进食，这样才能让年轻人活下去。在泰米尔纳德邦南部，农村深度贫困的驱使下家庭对待老人和不能从事生产的人的做法被委婉地称作“油浴”，thalaikootal。

但是这也有一点不同，我们可以拿美国参议院的老人政治开玩笑。在瑞典，即使以前是重要的知名的政治家或记者，退休以后也会在社会上销声匿迹。哪怕他们能活到八十岁，也相当于不存在，在社会上不存在。

与其他的晚期资本主义国家一样，瑞典也有福利制度，这是改良主义的阶级斗争的结果。因此，在过去几十年里，市政当局为为老年人建造了漂亮的房屋，著名的建筑师们创造了奇迹，使这里有了供囚犯居住的单人房或小公寓，媒体对乐不可支并争相入住的老人们进行了报道。

老年人正式得到了照顾，但是社会表面背后的情况就不同了。实际上他们中间经常有人饿死。当他们双手颤抖无法照料自己时，我所知道的很多地方就不再允许他们和其他囚犯一起吃饭了。摆在他们面前的食物是无味的工业食品，往往是很久之前在欧盟的其他地方生产和包装的，然后他们就再没有兴趣吃下去了，于是他们死了。老年人住在费用昂贵的私人养老院里和住在社保院里是没有区别的。没有人杀了他们，但是他们得到的待遇就像印度穷人对他们所谓的圣牛的待遇一样。这些牛没用了就被栓在一棵树上，它们只能吃够得到的草，但是由于绳子很短，很快它们就没草吃了。没有人杀了它们，任何人手上都没有沾血，是牛自己选择了死亡。

瑞典社会福利机构视老年人死亡为正常现象，只是因为厌食而已。我们的社会公共服务系统里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老年人只是停止进食，然后就死了，这方面我们有准确的统计数据。瑞典的社会公共服务系统还有一个非正式的下属机构，有虚弱的老妇人从床上摔下来并按了警报器的按钮，然而员工们坐着闲聊、喝咖啡、吃蛋糕，完全无心处理。

——叫她打电话！

[1]13 世纪前后被冰岛和挪威人用文字记载的古代民间口传故事，包括神话和历史传奇。

战争期间我来到瑞典时，是我的姑姑埃尔莎照顾我。她是一位教师，一位当地的政治家，属于社会民主党。当她年过九十的时候，她被安置在了一套漂亮的老年公寓里，但是她经常摔倒。她去世后被放在自己的床上，很明显，这条亚麻布床单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换过了，她一直睡在自己留下来的干燥粪便里。在她的葬礼上只有一个从疗养院来的人，他是个叙利亚移民，曾经和她聊过天。对于瑞典的员工来说，她只是“老埃尔莎”。

在我们瑞典文化中，老年人在传统上是不受欢迎的。即使瑞典官方不愿谈论这一点，它也很容易从流行的谚语和故事中得到证明。近几十年来这种民间情感又被另外两种流行的政治趋势所强化：青年文化和女权主义。瑞典语中有关老年人的“gubbe”一词有着强烈的贬义色彩。当然，还有养老机构员工的工资过低，人们在那里工作，只是因为找不到更好的工作了，他们处于工人阶级的最底层。

很多瑞典作家都写过瑞典传统的虐待老人的丑闻。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伊瓦尔·鲁-约翰逊[1]在这个问题上的写作是如此有力，以至于他被迫进行了修改。但是在文明的政治社会中，仍没有人大声地谈论瑞典是如何对待老年人的，尤其是你自己还没有老到依赖社会公共服务的岁数。然而即便我们的媒体很少严肃地报道，对老年人的虐待也是很普遍的。工会——说起来都丢人——想闭上眼睛装瞎子，向对待老年人的普遍行为表示抗议的工会成员将被认为是不忠诚的。瑞典不是一个适合年老体弱者的好国家。

如果你不相信我，你只需去瑞典观察一下在瑞典乘公共汽车的老人是如何被对待的，并与在法国南部乘公共汽车的老人对比一下。

在中国、印度、伊朗、墨西哥及其他西班牙语国家，社会的情况往往非常困难，人均寿命也很短，但是在文化上老年人并不像在瑞典那样不受欢迎。

现在，当我半夜需要小便时，人民解放游击军年轻的阿迪瓦西斯同志就帮助我站起来，他们不知道他们的行为中有一种文化特性。他们认为这是很平常的，但我知道并不是这样。

我醒着躺在丛林里，现在还是晚上，我周围的同志们又睡着了，我试着阐述这个问题。这不仅是一个个人衰老身体残疾的问题，也许会有不同，但是对我们每个社区每个年龄段的大多数人来说，在死亡之前我们必须经历疾病和痛苦。

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衰老和死亡总是不舒服的。这可以通过艺术表现出来，比如中世纪欧洲的木刻死亡艺术或死亡之舞，还有通过佛教的诵经或基督教的祷告。

当然，在我们这些国家作为赤贫者变老，睡在巴黎的桥洞下（下曼哈顿的臭水沟或斯德哥尔摩的公园），和作为有钱有权的人变老是有区别的。这正是我们为一个更美好更公正的社会而奋斗的原因之一。

但是即便如此，我们知道在对待和看待老年人的方式上，文化和传统之间存在着差异。它就像语言（以及手势、面部表情和肢体语言）一样，这些传统也是如此，体系是由社会决定的，但是时间序列要长得多。

[1]1901-1990年，瑞典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

在一个完全社会主义的世界里，我更喜欢在一个有着南欧、中国、印度阿迪瓦西斯人或墨西哥土著的文化传统的社会中变老然后离世。一想到要在瑞典的养老机构里结束我的一生，我就不寒而栗。在可预见的未来，变老和死亡在瑞典——即使是社会主义的瑞典——将是一种冷冰冰的非常不愉快的经历！我希望我能及时找到出路！

我深信，在我国从事政治活动的朋友和同志们不会接受，甚至都不会理解我现在写的东西。

我周围地面的床单上有沉睡中轻轻的鼾声，我也不敢肯定如果我把这件事告诉同志们，他们会理解我。

但是我有可能错了。

我想，事实上我想的越多他们就会理解得越多。毕竟，他们像照顾自己的祖父一样照顾我！

第十一章 在营地

高塔姆去了阿布杰马德地区几天，往返的行程是很艰难的。政府军企图完全封锁这个地区，甚至连盐都不能进入。决定是我不能跟着一起去，我会成为一个妨碍他们的人。高塔姆将不得不从一条被严格巡逻的路上偷偷溜过去，而因为我糟糕的膝盖，如果我一起去会给整个队伍带来危险。

太阳能电池供电的印刷厂也跟随我们转移，我得到了一套党内文献阅读，以使我更好地了解党的历史和现存的问题。

当我们要离开丹达卡兰亚回到德里时，我们必须拿出所有的书面笔记，得烧了它们——但是在此之前它们已经被复制下来了，我们每个人都得到了一个很小的芯片。因为太小了，所以如果在回去的路上被抓住，我们可以把它吞下去。而这些书我就可以保存下来，即使它们是内部文献。

——敌人早就拿到副本啦！

在我们不用转移，也没有为我准备节目的时候，我就躺在丛林地面的床单上看书。关于该运动历史的两份文件是为 2007 年的“团结大会”准备的：

《印度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1]政治组织审查报告》（第 102 页）

《人民战争集团政治组织审查》（第 132 页）

这些关于该运动历史的报告是具体的、真诚的且勇于自我批评的。第三份文件是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团结大会通过的《印度革命的战略与策略》，它为党提供了当前的指导方针。我特别标注出来的要点有：

越来越多的民族可能与反动印度国家发生武装对抗，反动印度国家使他们保留在一个镇压和压迫的国家中，否定他们的自决权。由于敌人的相当一部分武装力量，不可避免地要镇压各民族日益高涨的斗争潮流，印度统治阶级很难动员所有的武装力量来反对我们的革命战争。（第 39 页）

在游击区和我们正在进行建立根据地任务的地区，我们应该把人民团结在以下具体口号的周围，组织人民进行斗争：这是通过革命人民委员会进行的，是夺取国家政权政治的一部分。

- 1、推翻封建当局，建立人民政权。
- 2、没收地主、政府和其他剥削机构的土地，分配给贫农和无地农民！
- 3、建立武装的人民民兵！
- 4、停止向地主和放债人偿还债务和利息！
- 5、停止向政府缴税！

6、森林的权利属于部落民和劳苦人民，停止帝国主义、买办资本主义和大承包商对森林财富的掠夺！

[1]2003 年 1 月由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和印度革命共产主义中心（毛主义）合并而成。同年 5 月 19 日，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第二中央委员会并入该党。2004 年 9 月 21 日，印毛共中心和印共（马列）人民战争集团合并成立了印度共产党（毛主义）。

7、发展农业和合作社运动！增加产量，在每一个领域自力更生！（第 62 页）

妇女、达利特人、部落民和宗教少数群体是无产阶级政党在印度当前具体条件下领导革命，所必须认识的最重要的社会群体。（第 117 页）……但除封建压迫和资本主义压迫外，她们（妇女）还遭受着大男子主义和父权制的支配、压迫。（第 119 页）……因此，要解放妇女，除了阶级斗争外，还要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进行争取妇女平等权利的斗争。我们应该支持或自发地，或在小资产阶级、女权主义组织领导下爆发的反对社会贬低、歧视、压迫和剥削的妇女斗争，但同时也要揭露这些领导的局限性。（第 120 页）/……/达利特或在册种姓（或贱民阶层）应被视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这是令人厌恶的种姓森严的印度社会所特有的。……在生活的各个方面他们同时也是社会压迫、高种姓暴行和歧视的受害者。这种社会压迫最令人发指和最不人道的表现是印度大部分地区仍然实施着的贱民制度。（第 120 页）……穆斯林、锡克教徒、基督教徒等宗教少数群体约占印度人口的 15%。他们往往是印度教沙文主义政党和印度教法西斯匪帮攻击的目标，并遭受偏向多数印度教信徒的国家政府的歧视。在宗教少数群体中，穆斯林在最近一段时间尤其成为攻击的目标。（第 123 页）

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应该通过在城市贫民中的政治活动来确保革命的阶级意识。我们必须同脱颖而出的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一起建立庞大的党组织网络，其中特别是要通过政治动员来进行。我们要建立秘密的武装防御小队和公开的防御队伍，从一开始就同工人阶级青年一起组织起对管理部门和其他剥削部门的匪徒和国家武装部队的袭击的抵抗。（第 130 页）

我特别感兴趣的是 2009 年印度共产党（毛主义）西南地区局的一份长达 192 页的材料《领导培训计划》，它的自我批评很直接，也很实际：

它引用了中央委员会的指导方针《城市工作手册》：“党组织应该是秘密的，越保密越好。然而，群众组织应该是公开的，越广泛越好。” [1]（第 21 页）

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布尔什维克化的党，其领导核心是掌握庞大地下关系网的职业革命家。没有这样一个庞大的关系网，领导和组织者就无法如鱼得水地在群众中间活动。不建立这样一个关系网以合法形式进行活动，我们就容易遭到敌人的袭击，难以生存下去。今天敌人收集情报的方法比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时先进得多，如果我们要在他们的围剿行动中生存和发展，我们就要进行比那时的水平更高的保密行动。没有大规模的地下关系网，这是无法进行的。我们必须在今天的背景和采取的具体措施中深入了解敌人的低烈度冲突战略。（第 66-67 页）

大部分培训计划都是关于“地下工作问题”的。

我们了解了印度尼西亚、希腊和其他不少国家的历史，在这些国家，反动派从未停止

[1]见《城市工作手册》，红色文献翻译组译。

对成千上万的共产党人的屠戮，甚至还杀害了更多的持不同政见者。实际上在拉丁美洲和中美洲的国家，以危地马拉的屠杀为例，就能使我们现在面临的镇压看起来微不足道。在我们熟知这段历史并公开宣布人民战争是我们的道路的时候，任何合法主义的思想都相当于自杀。在过去的许多年里，我们已经付出了沉痛的代价，在我们力量最强大的邦（安得拉邦），这场运动曾遭受重创。我们往往把“利用合法机会”这个表述解释为在敌人镇压之前合法地活动，这就相当于“合法地活动，直到一切活动都为时已晚”。共产党人必须有长远的眼光，不能盲目地行动，我们知道敌人会镇压我们，因此在事实上有合法机会的时候我们必须做好准备。利用“合法机会”恰恰意味着这一点，把大批新干部带到地下，大规模地进行这场运动。它还意味着保持群众组织的合法性以及地下关系网，以便在合法组织被摧毁时，地下组织可以继续发挥作用。（第 84/86 页）

我继续读，一直读到了晚上。第二天早晨，我们离开了营地。当我们穿过丛林转移时，我看着那些年轻的同志们。印度共产党（毛主义）是一个共产主义政党，但是作为一个毛主义政党，它也是一个不同于我所认识的和我成长时所在的党的共产党。举个例子：

马克思曾写道，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1]。这自然是我从十几岁起就在共产主义青年团里读到和听到的，但是在我们的学习课程中，并没有像《领导培训计划》里那样向我和其他青年或者——更年长的——“西方的”共产党员解释这一点：

我们说我们是共产党人，但我们是在盛行的统治阶级的价值观下出生和长大的，这些想法不会在我们入党的时候自动消失。况且，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封建和资产阶级价值观泛滥的社会，它们很自然地影响着我们。在这种情况下，需要通过不断地斗争来改造自己。我们的一些错误价值观深深地植根于我们的潜意识中，并围绕着一些不安全感建立起来。……尽管我们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压制住它们，但是它们在其他情况下会更加挑衅地强化自身。在印度，它们潜意识地决定着价值观，也与种姓制度和根深蒂固的优越感（及自卑感）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在这里每个种姓群体相对于等级较低的人都有一种优越感。封建主义、婆罗门教的意识形态根深蒂固，它折磨着包括这种制度的受害者在内的所有人，即便它在那些处于最高等级的人中间影响更为强大。随之而来的是傲慢、自负、偏狭、蔑视劳工以及其他各种形式的优越感。（第 184 页）

如果是我来写《领导培训计划》的这一章，我会指出这并不是印度特有的。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统治阶级的思想和价值观以其他形式展现。今天我可以在电视上看到八十年前狂热的法西斯价值观是如何在集体潜意识中再现的，还以物质形式出现在布达佩斯的街道上。身穿制服的游行队伍再次高喊‘nem, nem soha’——不，从不一一来反对 1920 年特里亚农[2]的叛国。（真正重要的是，这些组织是匈牙利现任政府的基础，而匈牙利恰好正在担任欧盟

[1]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版第 1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50 页。

[2]1918 年 11 月，奥匈帝国解体，匈牙利独立。1920 年 6 月 4 日，协约国同作为战败国的匈牙利在法国凡尔赛的大特里亚农宫签订了《特里亚农条约》。

轮值主席国！)

印度共产党（毛主义）向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毛泽东学习，并努力在做欧洲的共产党没有做的事情，与潜意识里形成的反动价值观进行斗争。在欧洲公开的共产党中间更糟糕的是，从三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这种必须要打击群众中潜意识里形成的反动价值观的想法被视为反党的弗洛伊德式和莱克^[1]式的意识形态。

“没有共产主义价值观，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就不会成为现实，而小资产阶级价值观将会腐蚀党，并慢慢地使其失去革命热情。”这种毛主义的观念也被当时占主导地位的正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认为是完全反动的唯心主义。

在我和年轻的同志们一起步行的时候，我的膝盖受伤了。我想起了当时苏联和所谓“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欧洲共产党”的所有理论家，他们把毛泽东当做一个唯心主义者，一个反动的唯心主义者，写了一本又一本书来指出这一点。他们中的一些人也许还活着，但是他们周围的整个社会却在走向衰败。

[1]弗洛伊德的学生。

第十二章 长期存在的浪潮！

我们即将结束在游击区的逗留时，同志们在巴斯塔丛林里离一个村庄不远的地方建立了新的营地。我不知道这个村庄的名字，也没有问。

——贾纳帕蒂总书记在第一天就对我说过，以后你如果要写信，最好不要写上村庄和场所的准确地址。

——别担心，我不会写我不知道的东西，我答道。

我们都坐在树荫下喝茶聊天，总书记一直在谈论着我们提出的问题，休息的时候同志们还谈到了他们收到的各种来自西方记者的信件。

——能收到他们的来信总是好的，邀请他们到这里来，大多数想要来这里的记者都是相当真诚的，即使他们有些人怀有敌意，也会让一些信息渗透到普通读者那里，我说。

接着，领导和负责民权运动的活动家高塔姆·纳夫拉卡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原则问题来讨论。他代表人民民主权利联盟询问总书记，印度共产党（毛主义）是否可以声明，会在当前事实上的战争中遵守日内瓦公约[1]。

总书记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这是一个重要问题，还会引出很多其他的问题，对此党会认真地考虑。

我没有参与对这个问题的讨论。

但是现在我要讨论一下了，这不是一个只与印度有关的问题，而是一个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的重要问题。

高塔姆·纳夫拉卡在理论上当然是对的。1997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确认日内瓦公约中有关国际性和非国际性冲突的规定是对所有国家有法律效力的习惯国际法规则。如果丹达卡兰亚目前冲突的各方能遵守日内瓦公约，这将对人民大有裨益。

但是这可行吗？在严重的社会冲突中，在被压迫阶级像现在毛主义者在印度进行“持久的人民战争”那样起来反抗的时候，官方人道主义的理想和理由在阶级社会中又能发挥什么作用？

就像毛泽东所表达的那样，战争不是茶话会，印度当前的内战是血腥和凶险的。

三十年前最后一次访问这个地区后，我写下了当时自己耳闻眼见的令人震惊的统治阶级暴行、大量的强奸和杀戮。这一次我听说了同样的事，我还在印度主流的或者那些多少有点左的报纸和杂志上读到了相当诚实的报道。今天印度的阶级暴行与1857年后的情况一样被很好地记录了下来。

同时，政府所说的“国家的敌人”毛主义者，被印度官方媒体和政府发言人指控滥杀无辜平民和破坏公私财产。

总书记在和我们的谈话中提到了对党的指控并予以驳斥。

——人民和毛主义革命者不希望与任何人发生暴力或武装斗争。只有在不

[1]1864年至1949年在瑞士日内瓦缔结的关于保护平民和战争受难者的一系列国际公约的总称。

可避免的情况下，他们才会拿起武器反抗敌人。

而由于阶级冲突中的暴力不是印度特有的，且印度的暴力也不是从 1967 年纳萨尔巴里的斗争才开始的，所以总书记和他的党面临的有关日内瓦公约、战争规则的问题并不是新的问题。为了对这一点有正确的认识，从而理解问题真正的复杂性，就有必要后退几步。

听了高塔姆·纳夫拉卡的话，我想起了 1871 年 4 月在巴黎的一次讨论，去年我前往非洲之前就计划要写关于这次讨论的文章，这预示了 2010 年我们在印度丛林里谈话的内容。

根据 1871 年 4 月 27 日星期四发表在《1871 年巴黎公社公报》（这是 1872 年的重印本，五十年代我住在巴黎时，从圣米歇尔码头的一个书摊上买来的）上的会议记录，古斯塔夫·库尔伯^[1]向公社会议提交了一封信，或多或少地说出了高塔姆·纳夫拉卡刚才所说的话。

古斯塔夫·库尔伯，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法国现实主义画家，实际上是最伟大的画家之一，他还是一位左翼政治人物，一位革命家，也是一位公社委员。4 月 27 日的会议由公民主席茹尔·阿利克斯主持召开：

公民主席宣读公民库尔伯提出的下列质问：

“梯也尔^[2]先生在凡尔赛政府^[3]本月 10 日或 12 日给各省长的一项通知中声称，对巴黎的斗争，今后要不顾一切牺牲以北美反对南方的战争中所表现的那种毅力进行下去。

姑且把这种不确切的比拟放在一边（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巴黎是为自由和人权而斗争的），我认为梯也尔先生在拿我们同美国的南部同盟分子相提并论时，没有考虑我们作为交战一方的权利。^[4]

库尔伯指出，在梯也尔先生的命令下，凡尔赛的军队正在处决囚犯。当杜瓦尔^[5]将军和 1500 人被俘时，这些人被处死了，杜瓦尔表示抗议，结果他也被枪杀了。库尔伯继续写道：

[1]1819-1877 年，法国画家，19 世纪法国现实主义美术代表。

[2]1797-1877 年，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资产阶级反动政客、保皇派、历史学家。

[3]1871 年 2 月普法战争后期，法军在色当战役中惨败的消息传来，法兰西第二帝国被推翻，梯也尔在波尔多召开的“国民会议”上被选为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首脑。3 月 18 日，在普鲁士大军压境的情况下，梯也尔企图解除巴黎工人自发组织的国民自卫军武装的阴谋被发现，巴黎人民发动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反动统治，建立了无产阶级革命政权，梯也尔和资产阶级临时政府成员逃到凡尔赛。

[4]见【苏联】莫洛克编，何清新译《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 1961 年版，第 561 页。

[5]1841-1871 年，原为铸工，法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巴黎公社军事领导人之一。巴黎公社成立后当选为巴黎公社委员，任军事委员会委员和执行委员会委员，并被任命为将军。1871 年 4 月 3 日，凡尔赛军队突然袭击巴黎后，杜瓦尔任进军凡尔赛三支纵队中一支纵队的指挥官，后被俘杀害。

因此，欧洲该承认我们的权利了，巴斯卡尔·格鲁塞也应当开始要求各国承认我们享有交战一方的权利。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首先建议对外联络委员会特别注意这个问题。

签字：古·库尔伯。

再启：简而言之，我们同凡尔赛政府进行的道义斗争和武装斗争，都已经有一百零一天了。” [1]

公民列奥·梅叶以对外联络委员会委员的身分指出：几天以前，也象接见几个其他南美共和国的公使一样，他荣幸地接见了厄瓜多尔共和国的公使；他还指出，据可靠方面的消息，为了迫使凡尔赛政府承认我们为交战一方，已经采取了步骤。 [2]

在 4 月 28 日的会议上，公民 P·格鲁塞表示，他负责的对外联络代表团已经讨论过向欧洲和全世界提出呼吁的问题：

……但那不是恳求，而是抗议凡尔赛政府玷辱自己的那种卑鄙的破坏战争公法的行为……

……

……现在，真相大白，由报刊报道出来，所有的文明国家都有了明确的看法……

……谁又能责备我们、公社及其保卫者呢？

我们，而且正是我们，采用着合法的手段进行战争！我们在斗争中并不使用卑鄙的手法！ [3]

从巴黎公社到现在已经快 140 年了，但是公社民主制度的成就（丹达卡兰亚新的国家结构人民政府，就是在政治上受到了公社以及阿迪瓦西斯人自己流行的传统的启发）和导致其失败的合法主义错误在今天仍具有重要意义。更重要的是，要始终铭记 *la Semaine Sanglante*，流血周 [4]。当时，梯也尔对巴黎人民进行疯狂的报复，大规模处死了超过 3 万名男性、妇女——还有儿童。此后，他的凡尔赛政府继续进行合法的镇压，3.7 万人被捕，1.8 万人被判死刑，被杀害、监禁、驱逐出境的人不计其数。

法国大革命历史学家、自由派政客阿道夫·梯也尔完全是冷酷无情的，此

[1]见【苏联】莫洛克编，何清新译《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 1961 年版，第 562 页。

[2]同上。

[3]见【苏联】莫洛克编，何清新译《巴黎公社会议记录》第一卷，商务印书馆 1961 年版，第 574 页。

[4]1871 年 5 月 21 日至 5 月 28 日，巴黎公社的社员战士们为了捍卫公社的胜利果实，与敌人进行了一周的激战，这场巴黎公社保卫战即历史上著名的“五月流血周”。5 月 27 日，战斗中的公社战士退到城东区的拉雪兹公墓，在这里，200 名公社战士与 5000 名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搏斗，最后在公墓的一堵墙前全部英勇就义。5 月 28 日，巴黎全部被凡尔赛军队占领，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共同镇压下，震撼资本主义世界的巴黎公社革命失败了。

外，当统治阶级的特权遭到当时法国人所说的“little people” [1]攻击时，他也作出了统治阶级典型的和传统的反应。拿小小的芬兰做个例子，1918年，当“白军”在瑞典和德国援军的帮助下取得芬兰内战的胜利时，大约有2万名“赤色芬兰人”在集中营监狱里被处死或者饿死，他们都是贫农和工人。取得胜利的资产阶级——以及他们在瑞典的阶级兄弟——甚至过了几十年才承认屠杀的事实。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当公民P·格鲁塞认为“所有的文明国家”都知晓了事实并会谴责梯也尔和凡尔赛军队的暴行时，他的想法是错误的。除了少数例外，马克思及其追随者、老宪章派、一些自由派、桀骜不驯的作家如奥古斯特·斯特林堡以及俄国流亡者普遍指责公社犯的这个错误。

但是当时和现在有所不同，如果你将1871年的巴黎和2010年的印度进行比较，就会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1871年，只有一些像库尔伯那样的艺术家，以及少数作家如兰波[2]、瓦莱斯[3]、魏尔伦[4]和维利耶·德·利勒-亚当[5]，还有维克多·雨果在一定程度上也或多或少地同情公社及其目标。

后来，被称为“知识分子”的这一整个群体中的其他人，都对他们怀有敌意。像小仲马[6]和马克西姆·杜刚[7]这样公开的保守作家不喜欢公社是不奇怪的，但是也有在1848年革命[8]中曾是社会主义者的乔治·桑[9]，她不仅抛弃了这种信仰，还谴责公社。在今天看来，其他那些备受尊敬的作家对公社的民主措施作出的反应可以叫作资产阶级发自内心的仇恨。福楼拜[10]发现对公社的镇压太温和了，而且有必要停止普遍选举，他甚至坚持认为，公社停止向地主支付租金九个月是犯下了侵犯自然权利的罪行。不那么嗜血的左拉[11]写道，公社不允许面包师夜间工作的决定是荒谬的，废除对非婚生子女和合法婚姻所生子

[1]小人物，平民、百姓的统称。

[2]1854-1891年，19世纪法国著名诗人，早期象征主义诗歌的代表人物，超现实主义诗歌的鼻祖。1871年2月第三次离家出走，参加巴黎公社运动。

[3]1832-1885年，法国作家。1871年创办工人阶级的报纸《人民呼声》，巴黎公社起义爆发后当选为公社委员，出任教育委员会委员，曾参加“五月流血周”的英勇战斗。公社失败后被判处死刑，后越狱流亡到英国和美洲。

[4]1844-1896年，法国反叛既有传统的象征派诗人，象征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5]1838-1889年，19世纪法国象征主义作家、诗人、剧作家。

[6]1824-1895年，法国剧作家、小说家。

[7]1822-1894年，法国作家、摄影师。

[8]1848年欧洲各国爆发的一系列武装革命，是平民与贵族间的抗争，主要是欧洲平民与自由主义学者对抗君权独裁的武装革命。

[9]1804-1876年，法国小说家。1848年革命时曾积极参加政治活动，后来慑于工人暴动的声势，不再过问政治。巴黎公社运动期间，她对巴黎公社革命很不理解，但反对残酷镇压公社社员。

[10]1821-1880年，法国著名作家，西方现代小说的奠基者。

[11]1840-1902年，法国自然主义小说家和理论家，社会活动家，自然主义文学流派创始人与领袖。

女的区别对待只是为那些生了一群杂种的人服务。

2010 年印度的情况和 140 年前的法国截然不同。尽管公开的毛主义知识分子很少（宣传毛主义被政府视为犯罪），但是大多数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学者都以不同的方式支持为达利特人和阿迪瓦西斯人争取权利的政策。不仅是像《经济政治周刊》和《边疆》这样被认为是“左翼”的杂志，《泰海卡周报》这种普通的新闻杂志也报道了对村庄的烧杀抢掠和大量的强奸事件。

1871 年，正规武装部队在巴黎实施了大规模的屠杀。在 2010 年的印度，他们想要不参与也不公开承担对“红色地带”不断升级的镇压任务。

印度相当一部分所谓的中产阶级知道，和平行动在丹达卡兰亚针对阿迪瓦西斯人的以及绿色行动或 COBRA 在整个印度的做法，都是不可能符合国际红十字会规定的同样对印度国家也有法律效力的习惯国际法的。

将主流杂志上关于丹达卡兰亚发生了什么的新闻报道与日内瓦四公约第 27 条的条文进行对比就足够了：

被保护人之人身、荣誉、家庭权利、宗教信仰与仪式、风俗与习惯，在一切情形下均应予以尊重。无论何时，被保护人均须受人道待遇，并应受保护，特别使其免受一切暴行，或暴行的威胁及侮辱与公众好奇心的烦扰。

妇女应受特别保护以免其荣誉受辱，尤须防止强奸、强迫为娼或任何形式的非礼之侵犯。

冲突各方对在其权力之下的被保护人，在不妨有关其健康状况、年龄、性别之各项规定之条件下，应同样待遇之，尤不得基于种族、宗教或政治意见而有所歧视。

但冲突各方对被保护人得采取由于战争而有必要之管制及安全之措施。[1]

在这种情况下，总书记声明印度共产党（毛主义）和人民解放游击军将遵守日内瓦公约，然后要求印度政府也命令其部队这样做，这在政治上似乎是合理的。

即使这可行，也有可能被公众视为纳萨尔派做出的一种空洞而狡猾的姿态。印度的每个人都知道，印度政府会拒绝接受阿迪瓦西斯人、达利特人以及他们作为交战方的政治朋友，或者有权受到保护的丹达卡兰亚平民。他们继承国家权力的来源大英帝国，在殖民战争中就一直拒绝接受适用的习惯国际法。美国也是如此，他们在西亚和中亚发动的战争已经打了近十年，他们自己的损失也与日俱增，但是美国政府仍未释放出任何正式接受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适用于日内瓦公约的情形的信号。

尽管如此，2010 年的印度并非 1871 年的法国，从理论上的可能性来说，高塔姆·纳夫拉卡也许是对的。

但是当我写下这句话的时候，我在电脑上打开了 2010 年 7 月 2 日的《印度教徒报》。我看到一张照片，一名死去的男子仰面躺着，尸体旁放着一把 AK-47，看起来像是在一个丛林地区。文章开始了：

[1]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九四九年八月十二日日内瓦四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中文文本，第 114-115 页。

安得拉邦警方周五表示，他们在靠近该邦与马哈拉施特拉邦边界的阿迪拉巴德地区的交火中击毙了化名为阿扎德的纳萨尔派头目切鲁库里·拉吉库马尔，以及一名身份不明的同伙。

但是双方并没有交火，村民们什么也没听到。验尸报告显示，他是被近距离枪杀的。真实的情况——在接下来几周里变得清晰了——是他在前往一个政府推动的由斯瓦米·阿格尼韦什斡旋的政府与印度共产党（毛主义）高级领导人就和平条件进行的商讨的途中，被政府的特工杀害，丢弃在了丛林中。

当我看到死者照片的时候，我知道我——还有高塔姆——对他的死负有责任。他的血流到了我们头上，我会解释这一点。

在我们发表对总书记的采访时，我们决定写一篇引言：

我们请读者尤其要注意，由于联邦内政部长 P·奇丹巴拉姆散布印共（毛）“嘲讽”印度政府的谈判提议的虚假消息，所以总书记简要阐述了党在谈判问题上的立场。实际上他告诉我们：

简而言之，党对于（印度）政府提出的任何谈判的主要要求是：

- (1) 必须停止全面战争。
- (2) 解除对党和群众组织参与民主事业的禁令。
- (3) 必须停止对同志们的非法拘禁和严刑拷打，并立即释放他们。

如果这些要求能得到满足，那么获释的领导们将代表党参加谈判。

这引发了印度媒体的普遍讨论和党内的讨论。4月14日，《印度教徒报》刊登了一篇长达 12262 词的《印共（毛）中央委员会发言人阿扎德的回应》，我引用一下该文章的相关部分：

“印度共产党（毛主义）发言人阿扎德接受《印度教徒报》的独家采访，以书面形式回答了该党对与联邦政府对话的态度相关的问题。

毛派也有他们谈判的前提。在最近接受扬·米尔达和高塔姆·纳夫拉卡的采访时，贾纳帕蒂就谈判问题作出了以下表述：

（见上文）

我的问题是这些前提是否现实。例如，“全面战争”在“停止”之前可以暂时中止，也就是说停火，那么为什么在一开始就要坚持停止呢？你们是在要求停火还是其他的什么？

其次，你们希望解除对党及其群众组织的禁令，并释放囚犯。一般来说，世界各国政府和叛乱团体之间的此类谈判中，解除禁令是目标之一，而不是前提，释放政治犯也是中间的步骤。毛主义党提出一些政府可能难以接受的要求作为起点，而不是将其作为拟议对话的终点之一，这难道不是颠倒了顺序吗？

阿扎德：我同意你论点的逻辑。这些要求可以在实际谈判的过程中解决，而不是作为谈判的前提，从逻辑上讲这是一个合理的论点。但是你也必须理解贾纳帕蒂同志接受扬·米尔达先生和高塔姆·纳夫拉卡先生采访时的讲话精神。这里需要一些澄清，我将试着阐述清楚贾纳帕蒂同志所说的话。

第一，当他说政府应当停止全面战争时，他的意思不过是暂停这场战争，或者用他的话说，是相互停火，在这方面不能混淆。奇丹巴拉姆想要的是毛主义者单方面的停火，同时政府继续其残暴的恐怖行动。与之相反的是，印度共产党（毛主义）希望双方同时停止敌对行动，这就是第一点的意义。双方的停火不能被称为前提，这只是交战双方愿意为下一步的谈判创造有利氛围的一种表现。

第二，如果毛主义者必须像几个组织和民间社团的成员所期待的那样开展和平的合法工作，那么解除禁令就成为了一个先决条件。不解除对党和群众组织的禁令，我们如何以自己的名义组织合法斗争、集会等活动？如果我们这样做了，由于它们是受一个被明令禁止的政党领导的，难道不会被称作是非法的吗？按我们的观点，这种禁令本身就是一种专制、不民主和法西斯的行为。因此，解除禁令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的，而且如果得到满足，这将大大促进公开的民主形式斗争，并为对话创造出有利的氛围。

第三，贾纳帕蒂同志要求的是，政府应当遵守印度宪法，结束以遭遇战、拷问和逮捕为名的非法谋杀。我们必须把第三点中缺失的“谋杀”一词包括进来。要求政府遵守自己的宪法并没有错，也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关于释放政治犯，就该要求的性质而言，这可能是一个中间的步骤，但是为了举行谈判，政府有释放一些领导人的必要。不然的话，整个党都是非法的，那就没有人可以来谈判了，我们不能为了谈判使我们的领导人暴露。”

而接下来《印度教徒报》又开启了另一个问题。印度共产党（毛主义）同意参加谈判后，几乎在安得拉邦被镇压殆尽，它的追随者也惨遭杀害。

“如果政府认为毛派‘滥用’了安得拉邦的谈判，你们党就认为是当局滥用了那里的谈判，来识别和锁定你们的领导人。那么，你们希望如何应对再次与印度政府展开对话所面临的风险呢？”

阿扎德：我们在安得拉邦与国大党政权举行的谈判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教训，这些教训将指导我们今后同剥削阶级政府的一切谈判。如果说警方可以利用谈判的间歇来识别和锁定领导人，那就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利用了它，就像我们利用它在邦内外的人民中间传播我们的政治观点一样。我们在安得拉邦大部分地区遭受了挫折并不是因为谈判的失败，而是由于我们党在安得拉邦的一些内在弱点，以及我们未能采用适当的策略来应对敌人的策略。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可以其他时间再谈。

与此相关的是，安得拉邦的谈判给了我们丰富的经验和重要的教训。如果谈判的情况再次出现——我们没有预料到将来的情况，公司对政府连蒙带骗要求通过强占的方式完全控制矿产丰富的地区——我们就要指示我们被关在各个监狱的领导们承担责任。我们的总书记在接受扬·米尔达先生和高塔姆·纳夫拉卡先生采访时说明了这一点。在安得拉邦与政府谈判期间犯下的错误将不会重演。”

当时的错误导致了党公开暴露地与政府进行讨论，有十多人参加了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当时政府做出了回击。正如阿吉拉所说：

——我幸存了下来。我一直藏在一个土窖里，就像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

因一样，但是他们没有找到我。

但是错误在 2010 年重演了，印度共产党（毛主义）的代表阿扎德的尸体就是证据。2010 年 7 月 1 日，他在前往与政府商讨可能的和平的路上，在一次“遭遇战”中被杀害。

第十三章 小猫，小猫！

我从 1940 年起就记得，纽约 127 街附近一些十来岁的街头小孩喜欢杀死流浪的小猫。他们过去常常利用小一点的天真无邪的呼唤来抓住那些小猫：

——小猫！小猫！

当小猫深信不疑地走向面带微笑的孩子时，大一点的孩子就伸出双手，不顾小一点孩子的抗议，抓住小猫把它掐死。印度政府想用同样的方式处理掉纳萨尔派。

我们采访中的话被用来设下一个圈套。接下来 P·奇丹巴拉姆只要等待着，直到他伸出肮脏的双手开始按计划行事。因此：

斯瓦米·阿格尼韦什与其他关心印度的知识分子一起，积极寻求共同停火的解决方案。2010 年春，他担任和平调解人，印度共产党（毛主义）的中央委员会发言人“阿扎德”和印度政府的内政部长 P·奇丹巴拉姆通过他进行联系。

印度政府利用了斯瓦米·阿格尼韦什，就像他们利用我们的话作为诱饵一样，其目的在于能够抓住并杀死“阿扎德”。

当你阅读这些信件的时候，这一点就显而易见了：

内政部长 P·奇丹巴拉姆致萨瓦米·阿格尼韦什

2010 年 5 月 11 日

亲爱的萨瓦米·阿格尼韦什，

我了解到在 2010 年 5 月 6 日至 8 日，你领导了一群社会活动家从赖布尔到丹特瓦达的和平游行。我还获悉，你呼吁“任何一方在继续推动和平进程之前”停止暴力行动 72 小时。我向你表示祝贺并感谢你为此付出的努力。

我尊重你的意见，并支持你继续帮助找到解决方案。但是我想澄清一下政府的立场，供你考虑：

(1) 印共（毛）应该宣布他们将放弃暴力行动。首先他们可以说，从某个特定日期开始，比如说 2010 年 6 月 1 日（这只是举个例子，也可以是更早的日期），他们不会再参与任何暴力行动。

(2) 一旦他们宣布了，中央政府将与受到影响的邦的首席部长们商议，并在规定日期内做出回应。回应将包括邀请印共（毛）举行谈判。

(3) 在确定的日期（比如说 6 月 1 日），我们希望印共（毛）停止一切暴力活动。我们会密切观察印共（毛）是否在 72 小时内保持“停止暴力行动”。不用说，在这 72 小时内，安全部队将不会针对印共（毛）进行任何行动。

(4) 我们希望谈判在“停止暴力行动”的 72 小时内开始。

(5) 一旦谈判开始，我们希望印共（毛）能继续坚持“停止暴力行动”的立场直到谈判结束。

如果你能对这封信的内容保密，我将不胜感激。这与几天前我们见面时我告诉你的一致，但是，我鼓励你们与印共（毛）接触，并说服他们接受政府的

谈判提议，唯一的条件是印共（毛）要放弃使用暴力。

谨致问候。

内政部长 P·奇丹巴拉姆
印度，新德里

这封信被转给了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中央委员会发言人“阿扎德”，他对斯瓦米·阿格尼韦什作出了答复。

关于 P·奇丹巴拉姆先生在给斯瓦米·阿格尼韦什的信中提出的谈判建议

2010 年 5 月 31 日

亲爱的斯瓦米·阿格尼韦什，

我们听说你和其他民主知识分子在 2010 年 5 月的第一个星期里，冒着人民党和国大党的暴徒破坏的危险，在丹特瓦达举行了和平游行。你可能已经意识到，邦政府和中央决心破坏任何能给这个地区带来和平的尝试，并且阻止任何人朝这个方向去努力。我们感谢像你这样善良的知识分子和社会活动家为给这个地区带来和平做出的努力，我们也感谢你为说服联邦政府与我党走向停火和对话做出的努力，这促使联邦内政部长说明了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

我们已经读过了 2010 年 5 月 11 日联邦内政部长 P·奇丹巴拉姆写给你的信，信中提到了政府对和平进程的立场及其对印共（毛）的谈判提议。他的信的实质是，“印共（毛）应该宣布他们将放弃暴力行动”并选定一个不会再参与暴力活动的日期，自该日期起 72 小时内应该“停止一切暴力活动”，安全部队也不会组织任何针对印共（毛）的行动，“谈判”将在“停止暴力行动的 72 小时内”开始，而且印共（毛）应该“继续坚持停止暴力行动的立场直到谈判结束”。

过去我们已经多次公开表明了我党对停火以及与政府进行谈判的立场。

我们再次感谢你和其他许多真正渴望实现和平的人做出的努力。

我们希望你能仔细思考一下我们在信中提到的这些建议，继续坚持履行实现和平的使命。我们期待你善意的努力能取得积极的成果。

谨致问候。

印共（毛）中央委员会发言人阿扎德

作为对 2010 年 5 月 31 日这封信的回复，萨瓦米·阿格尼韦什采取了行动，并在 6 月 26 日通知了“阿扎德”：

“在中央政府的同意和推动下，我最近分别与甘迪（被捕入狱的高级中央委员会委员和政治局委员科巴德·甘迪）和桑尼亚尔（被捕入狱的中央委员会委员纳拉扬·桑尼亚尔）会晤了大约 90 分钟，讨论如何在毛主义者和政府之间达成谅解。……我与甘迪先生和桑尼亚尔先生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他们对和平与对话进程的反应非常积极。”阿格尼韦什说，并补充道，甘迪谈到了需要采取能够建立信任的措施，包括保护部落的权利和释放政治犯。（《印度斯坦时报》2010 年 9 月 18 日）

就这样，安得拉邦警察特别分局组织设下了陷阱，俘获并杀害了他们的主子所认为的国家的敌人。

尽管斯瓦米·阿格尼韦什及其他自由主义者和民主人士做出了各种努力，但是现在内战还是继续打下去了。

党的发言人金尚吉在电话里告诉印度报业托拉斯[1]：

阿扎德在前往丹达卡兰亚参加中央委员会讨论内政部长 P·奇丹巴拉姆致斯瓦米·阿格尼韦什的关于和平谈判的信的会议的途中被杀害。党得出的结论是，这起谋杀证明了总理曼莫汉·辛格、联邦内政部长 P·奇丹巴拉姆和安得拉邦首席部长科尼杰蒂·罗塞赫是毫无诚意的：“很显然中央并不想要谈判，因为他们说着要对话，却在杀害我们的成员。”

在某些阶段，纳萨尔巴里运动有必要与政府进行谈判。而我希望领袖们能更谨慎一点，比在安得拉邦时更谨慎，比在政府杀害阿扎德之前更谨慎。

[1]路透社的附属机构，印度最大的通讯社，为半官方性质。

第十四章 离开游击区

离开这片区域所花的时间比进入时要长得多，政府的巡逻队正在该地区搜查，有两次我们不得不掉头，悄悄地在丛林里露营过夜。在我们等待时，年轻的阿迪瓦西斯同志们正在读书和学习。第三次尝试的时候，我们终于避开了巡逻队，趟过一条现在几近干涸的河流，走到了小路上。我们向同志们道别，我知道，我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们了。一辆四轮驱动的吉普车等着载我们。吉普车不得不在泥泞的小路上蜿蜒前进，直到开到了通往贡德冈的国道上。

在那里我先坐一辆当地的出租车找一些能用我的美国运通信用卡取款的自动取款机，而高塔姆试着为我们预定第二天从赖布尔飞往德里的航班。带我们去赖布尔的司机愿意帮忙，但是他喋喋不休地说自己不喜欢纳萨尔派。在赖布尔，我们就像我以前在这种情况下做的那样，只要待在一家足够豪华的酒店里，我们就不会受到当局的骚扰了，这种情况下通常是去马尤拉酒店。第二天，我在德里作了关于奥古斯特·斯特林堡和瑞典现代主义的讲座。然后我坐飞机到孟买，回家之前我在那里谈论了罪恶的阿富汗战争。

从我写下的内容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不仅是印度人民，我也希望自己能活着看到印度沿着纳萨尔派的路线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但是我不会活到那个时候了，这是不可能的了，我八十四岁了，年龄不允许了。我会在印度这场必然的变革前离世。

虽然这不仅仅是个人年龄的问题，但是在过去的八十多年里我经历了很多的希望和很多的震惊，这是有代价的，你不得不了解我们正在经历的时代。

为了解释清楚这一点，我将回溯到上个世纪。1907年，杰克·伦敦^[1]写出了《铁蹄》^[2]，那时他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同辈人们认为他过于悲观。结果，那些认为他不够乐观的社会主义读者后来不是死在了战壕里就是在西班牙大流感^[3]中死在了家里。

1923年，阿纳托尔·法朗士^[4]向法国公众介绍他的书时写道：

[1]1876-1916年，美国现实主义作家。

[2]杰克伦敦创作的长篇小说，用爱薇丝的回忆录手稿形式写成，爱薇丝的手稿叙述了1912年到1932年这二十年间劳动人民对抗财阀阶级的斗争史，在七百年后“大同世界”的第四世纪被发现与整理出版。《铁蹄》是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幻想小说之一，作者通过幻想小说的形式，描写了20世纪必然要发生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武装斗争的历史，预言到美国财阀阶级的寡头政权（他称之为“铁蹄”）走向法西斯统治的必然发展道路，着重指出了所谓美式民主的真相，至今看来仍不乏重要的启示意义。

[3]1918-1919年爆发的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传染病，造成全世界约10亿人感染，2500万至1亿人死亡。

[4]1844-1924年，法国作家、文学评论家、社会活动家。在1894年法国政府捏造德雷福斯叛国案后，法朗士看到资本主义的黑暗和反动统治阶级的卑鄙无耻，从此逐渐接受社会主义。俄国革命期间，他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成为法国社会党成员，赢得左翼知识分子和工人阶级的敬仰。1921年法朗士参加了法国共产党。

这两次暴动可算作我向读者介绍的这本书的素材，是多么的血腥……有人问自己，它们是否可能发生……如果没有 1871 年 6 月镇压公社的例子在提醒我们，任何对穷人的暴行都是被允许的，我自己也不会相信他们会这么做。每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已经证明了铁蹄的引诱。……财阀统治终将走向灭亡。就其本身的力量而言，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它毁灭的迹象。它将要灭亡，因为一切社会等级制度的政府都一定会灭亡；它将要灭亡，因为自己的不公正而灭亡；它将要灭亡，因为骄傲而膨胀然后在权力的顶峰灭亡。这就像已经灭亡了的奴隶制和农奴制一样。……我不能告诉你们，寡头政治会不经过斗争就立即灭亡。它会斗争，它的最后一场战争也许会持续很长时间，它的发展趋势也会千变万化。

我第一次阅读《铁蹄》是在 1940 年的夏天。那时我十三岁，刚刚回到黑暗岁月中的欧洲，希特勒似乎战无不胜。书里的一些细节当然已经过时了，但是主要的叙述没有，现在仍是如此。1907 年杰克伦敦和 1923 年阿纳托尔·法朗士写的东西在我已经八十四岁的本世纪仍是有效的，时代是相同的！

我非常幸运，能有机会在 2010 年前往丹达卡兰亚，在那里我亲身体会到了一个属于人民的印度的开端。但是我也意识到，按照杰克·伦敦的说法，铁蹄将统治和奴役世界几个世纪！

第十五章 消极可能性

对我来说，回顾七十多年里我一直想要了解的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就像在看 1938 年纽约林肯学校的科学老师教我制作的万花筒，变化是唯一永恒可见的状态。

在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改良主义者的“福利国家”正在崩溃，欧洲的极右翼原法西斯组织死灰复燃，它们不仅从失去地位的中产阶级中吸收成员，还从工人阶级中吸收成员。对于这些群体来说，在社会原因导致当地人口生育率较低时作为廉价劳动力输入的“移民”（“穆斯林”），是一个令人憎恨的威胁。这种现象并不新鲜，卡尔·马克思早就对此进行了描述。

五十年后，列宁在 1920 年 7 月 26 日向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作民族和殖民地问题委员会的报告时说道：

我还想指出，共产党不仅在本国，而且在殖民地国家，特别是在剥削民族用来控制殖民地各民族的军队中进行革命工作具有很大的意义。

英国社会党的奎尔奇同志在我们委员会里谈到了这个问题。他说，一个普通的英国工人会认为，援助被奴役的民族举行起义反对英国的统治是背叛行为。[1]

列宁认为这不是普通工人的立场，而只是“工人贵族”的立场。这是 M·N·罗易和列宁在委员会中已经讨论过的问题，M·N·罗易最初写的是：

“帝国主义列强历来对殖民地和弱小民族的压迫，在被压迫国家劳动群众的心中不仅播下了仇恨，而且播下了对整个压迫民族包括对这些民族的无产阶级的不信任。”[2]1920 年 7 月 25 日，列宁将“无产阶级”改为“工人贵族”。回顾自那次讨论以后的九十年，我不确定奎尔奇和 M·N·罗易是不是错了。

而且，如果你看一下代表大会的会议记录，就能发现列宁的报告和 M·N·罗易宣读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几乎没怎么经过讨论就通过了，欧洲代表们基本上对此不感兴趣。

列宁非常了解——并写下了——之前的国际的情况，他们把一些反帝国主义和反殖民主义的套话与在实际上支持“自己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政府相结合。第三国际将有所不同。但是回顾这九十年，1922 年 M·N·罗易写的显然是对的：

世界上不只有欧美，没有什么比这更需要我们牢记了。资本主义把现代文明的中心变成一片荒地之后，它就要寻找新的地方发挥作用。如果它在这方面取得了成功，那么欧洲无产阶级就有可能陷入最可怕的堕落，而不是起来发动一场胜利的革命。（第 12 页，《印

[1]见《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9 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233-234 页。

[2]见《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9 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165 页。

度》，共产国际发布，卡尔·霍姆·纳奇夫，汉堡）

M·N·罗易在工作了九年后与共产国际决裂，成了苏联大百科全书和官方共产党中的边缘人物。但他最早是在孟加拉恐怖主义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然后是在墨西哥革命中，接着在共产国际，后来回到印度，出狱后先加入了国大党，之后又被国大党开除。读懂他是很重要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幸地——被证明是对的。

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二战的残酷和之后所有的种族灭绝战争，以及所谓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政党完全不起作用，都表明了这一点。

近九十年前 M·N·罗易的那番话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我认为我小时候所见的世界已经不复存在了。曾经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现已解体，不再有任何联盟、苏维埃或社会主义了。在重生的俄罗斯，东正教正式复兴，并宣布将相当愚蠢和反动的俄国末代沙皇追封为圣徒。

但是曾经强大的苏联的命运并不比 1815 年之后的 1792 年法兰西共和国[1]的命运更令人感到奇怪。无论哪种情况都不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这样的必然是不现实的——而且历史并没有终结于 1815 年或 1989 年，也没有随着中国的毛泽东逝世和邓小平上台而结束，人们不应该草率地作出判断。当我忍着膝盖的疼痛穿过丛林时，我试着回忆起我曾读到的，周恩来被问及如何看待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作用时，他给出的回答：

——下结论为时过早。[2]

很多人认为这个回答是虚构的，我们见面时我也曾想过要问他，但是我没有问过。

不过这自然是一个恰当的表述，后来在营地中，当我看着正在熟睡的年轻阿迪瓦西斯同志时，我想到了它。他们太年轻了，甚至比我的孙辈还小，以至于他们听说我真的和毛泽东、周恩来这样的历史伟人见面交谈过时，感到十分的惊讶和好奇。

但是，他们所参加的斗争与革命如果要在丹达卡兰亚以外取得成功，那么现在这些非常年轻的共产党人就必须掌握当时关于他们自己历史的公开真相，及其起源和社会作用。

因此甚至可以说，他们——在印度乃至全世界——取得胜利之后，也应该记住 1853 年 9 月 10 日卡尔·马克思在《人民报》上写的关于巴枯宁[3]不该扮演的角色仍存在的争论：

[1]1792 年 9 月 22 日建立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是法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1804 年 5 月拿破仑称帝之后，为“法兰西第一帝国”所替代。

[2]西方人最常引用的周恩来名言，有关这句话的典故流传最广的版本是，1972 年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华期间，询问周恩来总理对发生在 300 年前的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作用有何看法，据说周总理沉吟了一下，然后回答说：“下结论为时过早。”

[3]1814-1876 年，俄国早期无产阶级革命者，著名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理论和政治纲领在 19 世纪欧洲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如俄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国有相当的影响，给工人运动造成了很大的损失，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它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有人不知道争论必然包含相反的意见，历史的真实只有从相互矛盾的论断中才能得出，却为发现这一点而大惊小怪……[1]

在这里我想提到一下你可以在 <http://www.RedStaroverIndia.se> 网站上找到的“文档”。我们发表的在丹达卡兰亚丛林里对贾纳帕蒂总书记的采访中，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如何看待成为印度的国家政权？”

《印度时报》2010年4月12日援引了政府消息人士的话，说他们正在仔细研究他对我们的回答。

没错，“铁蹄”会像过去几个世纪里在很多其他的国家那样，在印度使用它杀戮的力量践踏任何对其权力的威胁，这是显而易见的。我当然希望印度共产党（毛主义）能在这次进攻中幸存下来，总书记的发言和我读到的像《领导培训计划》这样的文件给了我些许希望。

在我的访问快要结束的一天，我们驻扎在一个新的地点时，总书记向我讲述了巴斯塔部落起义的历史及其对当前斗争的重要意义。整个游击区的人们都在庆祝1910年邦卡尔部落大起义一百周年。

——我建议你读一读H·L·舒克拉教授的一些作品，它们能使你了解到背景。就从这两本开始读，你能在德里找到它们。

接着他写下了：

H·L·舒克拉，《巴斯塔人民的历史——对部落起义的研究》，德里沙拉达出版社，1992年。

H·L·舒克拉，《邦卡尔，巴斯塔部落起义——冈达·杜尔及其运动的故事》，德里沙拉达·普拉卡珊，1991年。

他说的对，舒克拉教授将巴斯塔的历史描述为连续不断的十二次反抗英国压迫的武装起义，1910年邦卡尔大起义是其中最为著名的一次：

计划是非常仔细、非常秘密地制定的，因此密探们没有找到任何即将爆发起义和袭击不同政府机构的线索。该计划包括一个建立以冈达·杜尔为首脑的“独立的革命政府”的方案，通过使人人憎恨的外国行政体系瘫痪并摧毁它，将巴斯塔从外国的征服奴役下解放出来。（舒克拉，《巴斯塔人民的历史》，第228页）

邦卡尔起义是一次典型的贫农起义。舒克拉教授描写了其中的一位起义领袖：

佩达斯作为革命者的特殊性也体现在他对行动方法的选择上。我们从贾米里人那里了解到，他攻击的目标是英属印度的统治。但是，由于他选择了丹达米·马利亚的年轻小伙子们作为他的战友，所以在开始阶段他就要对目前直接压迫他们的村里的放债人发起袭击。于是他开始了他的武装行动，对放债人发动闪电式的袭击，并强行收缴了他们的钱、

[1]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34页。

首饰和武器。而且——这一点意义重大——在他的指挥下，武装队伍在每个村庄的中心地带把所有的账册、公文和债务契约堆成一摞，在受压迫的阿迪瓦西斯人的欢呼雀跃中一把火烧了它们。这样巩固了他在阿迪瓦西斯人中间的地位，成了他一生中的传奇事迹。（舒克拉，《邦卡尔，巴斯塔的部落起义》，第 77 页）

英国人留下了记录和秘密文件，但是正如舒克拉教授所指出的那样，起义军及其领袖冈达·杜尔的真实故事可以在口耳相传的传说和革命歌曲《邦卡尔吉特》中找到。

“听！听！哦，可敬的人啊
我们将高唱起义之歌”

然而这个问题还有第二个方面。在丹达卡兰亚，党以达利特人和阿迪瓦西人为基础，他们已经站起来了，但是这只意味着约 25% 的人口。如果他们的反抗失败了，如果党不能组织起这个地区以外的广大人民群众，不能把起义变成一场真正的革命，那么这 25% 的人还得面临其他地方与他们处于同样地位的人的命运，绝灭的现实摆在眼前。

印度的铁蹄将向同类的资本家、美国和欧盟的投资者以及印度国内外被称为“左派”的组织寻求帮助，并解释说由于阿迪瓦西人阻碍了采矿和水电的发展，必须采取一些激烈的行动。了解这一论点将会产生的效果很重要。西孟加拉邦的印共（马）不仅勾结垄断资本，还把这作为理论写入党纲，就像英国的工党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由国家官方资助的社会主义和左翼的政党一样。

历史是可以再重演的。墨西哥原住民征服者的大屠杀随着 1830 年安德鲁·杰克逊^[1]总统签署种族灭绝的《印第安人迁移法》^[2]发展到了一个更高的阶段。在接下来的六十年里，直到 1890 年翁迪德尼之战^[3]土著的武装抵抗结束，贫穷的欧洲移民们组织起来，把“印第安人”从他们的土地上驱向死亡，并占有他们的土地。他们被告知——而且他们相信——这就是自由。

一个人永远不该忘记消极可能性，他应该转身回顾一两个世纪，体验一下

[1]1767-1845 年，美国第七任总统（1829 年 3 月 4 日-1837 年 3 月 4 日），美国民主党创建者，印第安人排除政策的倡议者。他采用专制手腕颁布的印第安人迁移政策招致众多批评，还疯狂镇压原住民的反抗活动，被原住民称为“屠刀”和“印第安杀手”。杰克逊和他的朋友将切罗基族印第安人的部分土地占为己有，将它们变为棉花种植园谋取利益，并役使奴隶耕种。

[2]美国政府印第安人迁移政策的一部分，于 1830 年 5 月 28 日由安德鲁·杰克逊总统签署为法案，法案授予联邦政府权力，将印第安人从密西西比河以东迁移至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印第安领地”。该法案的通过标志着美国强迫印第安人迁移的制度化，从法律上剥夺了印第安人部落在美国东部居住的权利，迫使约 10 万印第安人从南部故土迁移至密西西比河以西。迁徙开始于炎炎夏日，历经气温达到零下的冬天，每日徒步 16 英里，成千上万人因饥寒交迫、劳累过度或疾病瘟疫死于途中，印第安人数量锐减，强迁之路化为“血泪之路”。拒绝迁移的部落则被美国政府发兵征讨、暴力迫迁甚至屠杀。

[3]发生在 1890 年 12 月 29 日，又名“伤膝河大屠杀”（Wounded Knee Massacre），标志着印第安人反抗移民的武装起义结束。

巨大的恐惧。

是的，丹达卡兰亚充满了希望，而铁蹄的丧钟已在华盛顿，在北约，在德里政府敲响。欧洲人或美国人不必问丧钟为谁而鸣，他们此刻应该已经知道了。

《红星照耀印度》附加文件的引言*

从位于“印度红色地带”的丹达卡兰亚回到德里，感觉就像七十年前从陕北的延安回到西安一样。

但是我没有在那里待了四个月后再回来，我只在印度丛林里待了两个多星期。

无论当时在陕北干旱的黄土地上的中国革命中心与今天在巴斯塔丹达卡兰亚丛林里的当前印度武装革命斗争的营地有什么区别——也无论目前的斗争将会是什么结果——所以重要的是不仅要给读者提供个人的印象，还要从负责的革命斗争领导人那里得到被授权而且值得引用的文件。

在丹达卡兰亚期间与三位领导干部进行了长时间的正式讨论：贾纳帕蒂，印度共产党（毛主义）总书记；穆拉里，刚刚出狱，他被捕入狱前已经是印度共产党（毛主义）政治局委员，负责西南地区局；还有索努，印度共产党（毛主义）政治局委员。

当我们准备离开时，我们得到了这些谈话的授权记录。贾纳帕蒂总书记在提供这三次采访的记录时指出：

“您可以把这个全部或者部分地当做我们的公开信息。”

对来自丹达卡兰亚的这三份印度共产党（毛主义）官方文件，我又添加了中央委员会发言人阿扎德关于贾纳帕蒂总书记给我们的采访文件中的某些方面的“阐述”，以及总书记写的一份关于在丹达卡兰亚游击区正在形成的新政府形式的文稿。

其中的三份文件已经在《人民进行曲——印度革命之声》上发表，有两份是文字整理稿。

在最后我添加了关于印度政府有针对性地消灭/杀害个别“纳萨尔派领导人”的总体政策，以及2010年7月1日印度共产党（毛主义）的代表阿扎德在前往与政府讨论和平可能的路上于一场“遭遇战”中被杀害的政治背景的文件。

重要的是，这些较长的授权文件全部未经编辑，可以在网站<http://www.RedStaroverIndia.se>上找到并下载。

为了方便非印度读者阅读，我已经写出了节略本的大部分内容。

扬·米尔达

*这篇引言和接下来的五份文件均译自作者扬·米尔达在书中提到的网站<http://www.RedStaroverIndia.se>中的内容。

目录：

一、与印度共产党（毛主义）总书记贾纳帕蒂的谈话 扬·米尔达和高塔姆·纳夫拉卡，2010年1月/94

二、中央委员会发言人阿扎德关于对贾纳帕蒂总书记的采访的阐述说明/110

三、今天丹达卡兰亚的人民政府是明天印度人民民主联邦共和国的基础 文章来自贾纳帕蒂同志/114

四、采访穆拉里同志/121

五、采访索努同志 印度共产党（毛主义）政治局委员，据媒体报道又名马洛朱拉·科特斯瓦拉·拉奥，而且是丹达卡兰亚特区的负责人/127

与印度共产党（毛主义）总书记贾纳帕蒂的谈话

人民进行曲——印度革命之声

第 11 卷第 1 期，2010 年 1-2 月第 3-13 页。

2010 年 1-2 月

扬·米尔达和高塔姆·纳夫拉卡，2010 年 1 月

在东高止山脉的丛林深处，我们与原名为穆帕拉·拉克什曼·拉奥的印共（毛）总书记贾纳帕蒂会面。在欢迎并询问了我们，特别是扬·米尔达，是否面临不得不穿越崎岖地形的难题之后，采访开始了。以下是对他的采访的总结，我们保留了他提供的经过审阅和批准的采访的形式，只在语言上做了一些细微的改动。我们请读者尤其要注意，由于联邦内政部长 P·奇丹巴拉姆散布印共（毛）“嘲讽”印度政府的谈判提议的虚假消息，所以总书记简要阐述了党在谈判问题上的立场。实际上他告诉我们：简而言之，党对于（印度）政府提出的任何谈判的主要要求是：

- （1）必须停止全面战争。
- （2）解除对党和群众组织参与民主事业的禁令。
- （3）必须停止对同志们的非法拘禁和严刑拷打，并立即释放他们。

如果这些要求能得到满足，那么获释的领导们将代表党参加谈判。

而且我们认为，对所有希望更多地了解这个被印度政府认为是最大内部安全威胁的党，以及他们的政策的人来说，采访的全文是很重要的。

问：你如何看待这场斗争与印度总体的阶级斗争之间的联系？1935 年长征到达延安之后，毛主席创建了全国抗日根据地，作为与蒋介石的统一战线的一部分，从而成为中国主要的国家政权。你如何看待成为印度的国家政权？

答：在中国，长征到延安、创建根据地和与蒋介石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条件，与我们印度新民主主义革命现在的情况有所不同。中国革命发生在 20 世纪上半叶，从那时起，世界发生了几次重大的变化。第一，社会主义阵营的兴起及其之后的衰落；第二，殖民主义的衰落和新殖民主义的出现；第三，所谓的议会制度作为全世界共同政治制度的兴起；第四，尽管越南、柬埔寨和老挝这些国家有过一些革命高潮和具有重要意义的斗争，但是在革命成功后的革命高潮中仍显示出较大差距。

纵观整个世界历史，地球上的工人阶级自出现以后，就是同资产阶级和其他一切反动势力对抗。先是在巴黎从他们手中短暂地夺取了政权，然后在俄国、中国和几个欧洲国家经过长期斗争夺取政权，震撼了整个世界。在这条轨道上，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经历了各种起伏，但是斗争仍在继续。它就像波浪一

样，有时会减慢速度，但是从未停止。因此我们必须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一个国家的任何革命。

关于我们的革命，首先我想简单地介绍一下我们的历史，以便正确地认识当前的情况。我们统一的党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于 2004 年 9 月 21 日由印度的两股毛主义革命力量——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人民战争集团和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合并而成。我们敬爱的创始人，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查鲁·马宗达同志和卡奈·查特吉同志领导了对印度共产党和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的长期不断的思想和政治上的斗争。

在这场斗争中，只有修正主义政党的骨干被打垮，从而使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取得突破性进展，由于查鲁·马宗达同志和其他真正的毛主义者在各个阶层进行这场伟大斗争，伟大的纳萨尔巴里农民武装起义如春雷般爆发，开启了一段新的历史。此后我们的两位伟大领袖高举纳萨尔巴里的红旗，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运动如同燎原之火，以不同的规模蔓延到全国几乎所有地区。在这一短暂的革命历程中，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两个党分别于 1969 年 4 月 22 日和 1969 年 10 月 20 日在查鲁·马宗达同志和卡奈·查特吉同志的直接领导下成立。当时由于一些历史原因，我们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毛主义政党，但是我们的思想和政治上的基本路线、革命道路和革命战略，以及在同期面临的几个重大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是大体上相同的。

从纳萨尔巴里农民武装起义开始，印度统治阶级对所有革命运动进行恐怖镇压。1972 年底查鲁·马宗达同志被捕牺牲之后，甚至在此之前，我们有大批领导干部落入敌人之手。由于这些损失，我们遭受了全国性的挫折。在查鲁·马宗达同志牺牲之前，1971 年党内开始了反对萨蒂亚·纳拉扬·辛格右倾极端机会主义集团的激烈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由于我们严重的战术失误、政府的恐怖镇压、损失过大、缺乏正确的领导以及中国共产党内部两条路线斗争的负面影响，党分裂成了几个小集团。从 1972 年 7 月到 1980 年，我们党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被几个小集团支配，其中大多由右倾或左倾冒险主义领导，导致混乱局面蔓延开来。而另一方面，在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的领导下，坎克沙爆发了农民武装土地革命斗争，由于政府的恐怖镇压，斗争在短期内受到挫折，但是稳步扩大到比哈尔邦，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到了阿萨姆邦和特里普拉邦。

我们坚持真正的毛主义政党在思想和政治上的基本路线，吸取实践中的教训，认真参加阶级斗争，在面临国内外一些思想和政治上的问题时坚持正确立场。由于这些立场只来自于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支，即 1978 年成立的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统一和 1980 年 4 月 22 日成立的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人民战争集团，因此，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人民战争集团和党统一这些政党再次在全国各地，特别是在安得拉邦和比哈尔邦，发动了武装土地革命运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大大加强了党、革命群众运动和武装斗争的力量，最终在 2004 年 9 月实现了大联合并组建了我们的新党。自 1977 年以来，大量真正的毛主义力量团结并在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人民战争集团、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和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党统一中，而且在新的党成立后，这一进程在一定程度上仍在继续。而在

这一时期，大多数左倾和右倾的毛主义团体已经逐渐瓦解和消失，一些右派团体虽仍存在但很弱小，还有一小部分毛主义力量长期受到宗派主义影响。

我们认为，我们与印度共产党和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是以毛泽东同志直接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为首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进行的伟大斗争的组成部分。我们还认为，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发生长达数年的内部斗争，与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逝世前后的内部斗争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现代修正主义的邓集团在中国夺权，不仅对我们的党和革命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对世界革命也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我们坚定不移地坚持毛泽东思想，反对邓集团和林彪集团。我们的经验清楚地表明，印度革命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积极的和消极的发展都产生了很大影响。

长期以来，我们印度毛主义政党走过了一段曲折的道路。统一的党成立后，最有利于革命发展的局面出现了。在 1969 年到 1972 年之间，我们失去了这样的好机会。这次合并最大的好处是综合了超过 35 年的印度革命的经验，在战略、战术和政策等方面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基本文献。我们的合并带来了一个重大的变化，从两个分别在遥远的相互独立的小块地区工作的不同政党，变为一个具有全印度地位的政党。在合并之前，尽管两党都有中央委员会，但是从全印度的角度来看，它们作为中央机构的职能受到严重的限制。而合并之后，我们现在对国家发展的不平衡和革命运动发展的不平衡有了更丰富的认识。现在我们可以用更好的方式在全印度层面进行规划，它还没有十分完善，但是至少缺点已经被消除了。无论是在印度还是在世界范围内，都已经出现了一条更清晰、更丰富的路线。这种优势的另一个方面是它在国际上也产生了影响，在此之前我们基本上看不到这么多的国际支持。但是，它仍处于萌芽阶段，尽管它已经得到了发展。

最近几年，我们遭受了一些损失。尽管如此，我们必须思考如何避免这么多的损失。而且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已经说过，我们应该避免因为错误造成损失，勇敢地面对敌人，继续前进。

目前，我国其他毛主义政党由于右倾和力量不足，无法领导群众。进步和民主力量缺乏革命的基本行动纲领，目前有影响力的领域也很有限。除了这些限制之外，没有一个政党拥有人民武装力量来保卫自己。我重申，目前没有一个政党或组织能够完全成为一切革命的、民主的、进步的、爱国的力量和人民的领导核心。

因此，在当前这个时期，我们党能够在团结一切革命的、民主的、进步的、爱国的力量和人民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党具有全印度地位，在几个邦有良好的政治军事群众基础，有一支人民解放游击军在与敌人作战，还在丹达卡兰亚（印度中部的一个地区，主要由印度的安得拉邦、恰蒂斯加尔邦、中央邦、马哈拉施特拉邦、奥里萨邦这五个邦的部落领地组成）、贾坎德邦和印度其他的一些地区建立了新民主主义的人民政权。我们有一个明确的共识，就是要团结一切革命的、民主的、进步的、爱国的力量和包括被压迫民族在内的一切被压迫的社会团体，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官僚资本主义。我们的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由四个民主阶级组成，即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如果我们想要建立一个强大的统一战

线，那么它必须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建立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如果我们想要建立一个强大的统一战线，那么它必须有人民军队来支持和保卫。没有人民军队，人民就无法实现目标，无法受到保护。因此，敌人正企图消灭我们党的领导层，其目的是摧毁印度人民革命和民主的中心。所以，团结在一个中心周围的条件已经进一步成熟，革命可以在印度共产党（毛主义）的领导下进行。

与此同时，世界经济危机、印度统治阶级反人民亲帝国主义的政策以及日益疯狂的政府镇压激怒了全国人民，在目前只有一个革命政党的情况下扩大了革命的范围。长期以来，由于查鲁·马宗达同志的牺牲，印度缺少一个统一的革命纲领。即使在国际舞台上，毛主义运动也存在许多分歧。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我们党的兴起给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

我想说的是，党对所谓的议会制度不抱任何幻想。我们清楚地知道印度国家的强大力量，就如同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自己的局限和缺点。即使在统一【印度共产党（毛主义）成立】之后，我国和国外的毛主义力量也仍存在着许多不足。

有利的革命条件、印度社会普遍爆发的阶级斗争以及武装斗争的发展，都受到敌人的高度重视和密切关注。所以，同时也是帝国主义买办的印度统治阶级没有给这些斗争任何机会。因此，在世界革命的背景下，结合菲律宾、秘鲁、尼泊尔和印度的经验，帝国主义最关注的是印度爆发的激烈阶级斗争的发展。在当前的世界形势下，如果印度的毛主义革命能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它将成为对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严重威胁。这就是为什么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会把这些发展看得如此严重。

所以，一方面是革命的条件更加有利，另一方面是敌人全面进攻镇压革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整个计划就是充分利用有利条件抵抗敌人，而我们的计划将由敌人来决定。

在这样的背景下，目前印度革命道路上的主要障碍是敌人发动的全面战争。这场战争主要是针对毛主义运动的，但是又不只针对这一运动，其目的是针对我们社会上所有革命的、民主的、进步的和爱国的运动以及包括被压迫民族在内的被压迫群体的运动。在这个关键时刻，所有这些力量必须共同思考如何面对这个强大的敌人，如何为此团结起来继续前进。

我们怎样才能解决全面战争的问题？要解决任何问题，我们都必须对其进行深入分析，找出问题的根源。首先，为什么要打这场战争？它是谁强加的？要强加在谁的身上？这场战争的性质是什么？它要持续多久？我们能不能接受这场战争？谁应该反对它？如何反对它？抗战的目的是什么？等等。

这场战争的目的是摧毁革命，因为国家现在的反动政权从阿迪瓦西斯人民和拉尔噶到苏姜格阿尔的其他当地人民的广阔土地上掠夺了大量矿产和其他丰富的自然资源，而取代它的非传统政权正在逐渐兴起。他们把这场战争强加给那些反对这场战争的人，即占人口 95% 以上的毛主义革命者、阿迪瓦西斯人和广大森林地区的当地人民、工人、农民、城市中产阶级、中小资产阶级、达利特人、妇女、宗教少数群体和被压迫民族、民主团体、进步和爱国力量。这完全是一场非正义的战争，这场战争是这个国家的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封建势力，以及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国强加给我们的。他们是真正的抢劫者、掠夺者、

腐败者、敲诈者、囤积者、骗子、杀人犯、阴谋家、暴君、镇压者、独裁者、法西斯、最大的反动派和头号卖国贼。这些反动派打算长期进行这场战争，直到达到他们的目的。

毛主义者、民主人士、进步人士、爱国者和人民都不会接受这场统治者强加的非正义战争。人民将彻底反对这场非正义的、最残酷、冷血和危险的战争。它将遭到我国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一致鄙视。这场非正义战争完全违背了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人民将团结起来，通过发动一场正义的战争来对抗这场非正义的战争。人民永远不会容忍任何形式的非正义战争，在整个阶级社会的历史上，人民从来没有容忍过任何形式的非正义战争，而且他们以自己的鲜血为代价反击了每一场非正义战争，并最终取得了胜利。这场正义战争的直接目的是彻底挫败非正义战争，然后朝着改变目前这种为非正义战争提供空间的社会状况的方向前进。如果我们看一下这个国家政治的发展，这场不人道的全面战争正在给广大人民群众团结起来提供一个极好的机会，而且肯定会对统治阶级产生反作用。

1947年8月15日以后，我们从未见过印度的经济、国防、内部安全、政治、文化乃至整个国家与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如此一体化。核协议和几项国防协议，2008年11月26日孟买发生恐怖袭击后的公然干涉，以及联邦内政部长奇丹巴拉姆对美国的访问，还有与内部安全有关的重要协议，都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由于在这一重大变化中，印度扩张主义者在南亚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帝国主义和印度人民之间的根本矛盾变得更加尖锐，这将给人民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提供一个好机会。

几十年来，整个克什米尔和东北部都处于军事和准军事控制之下。另一方面，由于军队在内部安全中的作用，内部安全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印度军队是在历史性的特伦甘纳武装土地革命（1946-1952年）期间部署的，1967年伟大的纳萨尔巴里农民武装起义之后的一段时间（1971年）里部署在西孟加拉邦的一些地区。但是长远来看，今天印度军队正在进行重组。在全球反恐战争的要求下，三年前印度军队宣布了新的政策（次常规战争理论），以应对内部安全和其他国家现代战争的需要。根据这一重组计划，印度军队正按照普遍的平叛行动的需要训练大量部队。现在，印度军队正以内部安全的名义，在我国的广大地区对本国人民使用武力。如果它（印度政府）真是一个人民的政府，它怎么能用自己的军队来对付自己的人民呢？印度政府在民主的外衣下扮演着独裁和法西斯统治的角色。革命和民主的人民斗争所取得的一切成果都受到了法西斯的挑战。但是这也会迫使广大人民群众团结起来，用一切方法保卫成果，进行反抗，最终也会对统治阶级产生反作用。

我们还必须谈谈当前的世界经济危机，特别是美帝国主义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危机。这场危机在某些方面甚至比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还要严重。但是，但是没有革命，资本主义不会自行消亡。现在，为了摆脱这场危机，帝国主义将试图增加对本国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剥削，还要增加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掠夺。跨国公司和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帝国主义的合作者集中在了从西孟加拉邦的拉尔噶到马哈拉施特拉邦的苏姜格阿尔的大片土地上。为了开发这个富饶的地区，主要是阿迪瓦西斯（部落）的地区，邦政府和中央政府签署了上

百份 MOU（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谅解备忘录）。不分青红皂白的掠夺将破坏这一地区的环境并带来长期的生态变化。印度社会中最受压迫的群体，阿迪瓦西斯人和当地人民面临着巨大的威胁。如此庞大的土著人口受到威胁，恐怕是世界上第一次。一个新的局面正在形成，这些被压迫的群体必须有一个具体的方案才能得到发展。很显然，没有这些人的解放，我们就无法前进，印度革命也无法成功。我们党正在解决这个问题，越来越多的人将团结起来，对印度人民的主要敌人，即帝国主义、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封建主义和法西斯政府做出反击。

东北部被压迫民族和克什米尔人民为他们的解放斗争了几十年，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进展，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苦难，而他们并没有成功，他们仍在继续斗争。当我们在游击战中取得了一些胜利的时候，他们（被压迫民族）在毛主义者身上看到了一些希望。新的希望是，如果毛主义革命取得进展，它也将推动民族解放斗争。在这样的背景下，依照马列毛主义，党始终坚持自决权的立场，包括所有被压迫民族退出国家的权利。他们（被压迫民族）理解这一政策，而且他们的斗争需要加强，必须用这一点来团结他们，并试着建立统一战线。举个例子，当那加部队部署在恰蒂斯加尔邦或米佐营部署在这里时，士兵自己的家人和民主人士分别在那加兰和米佐拉姆邦进行了一些抗议。他们说，他们反对反人民的战争，他们不想为了镇压别人而把自己的孩子送走。从战略上讲，这正在为团结各族人民、工人、农民、中产阶级和民族资本家创造更好的条件，而各地对人民的镇压正逐渐对统治者本身产生反作用。

总体上，敌人以国内安全和毛派威胁的名义，向人民发动全面战争。我们在国内的几个农村地区是比较强大的，但是目前我们的力量还很薄弱，我们在城市地区很薄弱，在工人和小资产阶级中间也很薄弱，人民军队还很弱小，武器也不如敌人，总的来说，这些是我们的弱点。壮大人民军队和在城市地区的工作是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我们党的代表大会已经明确地宣布了一项战略计划，并为这些方面的改进提供了丰富的文件。另一方面，社会矛盾也在迅速激化，随着上述紧迫任务的完成，我们党正集中精力团结越来越多的人，如果我们在这方面取得成功，我们就可以在革命中实现飞跃。我们对统一战线的形成抱有希望，在新形势下，这是印度革命的首要任务之一，我们强烈地感到这不仅仅是我们的任务，也是所有革命、民主、进步的力量任务。

与此同时，敌对阶级内部的矛盾也在激化。这可以在南迪格莱姆看到，拉尔噶的斗争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一点。我们正在利用这种矛盾，必须在各地利用它来推进阶级斗争。我们还与其他民主团体和人民，以及一些属于统治阶级的个人，在关乎群众的不同问题上形成战术上的统一战线。我们和一切战斗着的党派、组织和人民都必须明白团结起来和建立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我们推动人民的团结，建立战略和战术上的统一战线。这个战略上的统一战线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官僚资本主义的被压迫人民之间的统一战线。尽管帝国主义和印度人民之间的矛盾加剧了，但是我国没有受到任何帝国主义国家的进攻，也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成为直接的殖民地。因此，我们目前的情况不同于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中国共产党建立反帝统一战线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情况。

问：党如何应对建立统一战线过程中的以及客观条件上的困难？在今天的情况下，党如何看待主观条件？

答：同志们，第一个方面，毛主义党希望成为全国人民的中心，他们的壮大代表了他们的愿望。我们代表了 95% 以上的人口，团结人民是一个更有利的客观条件，人民也想要一个为他们的利益服务的政党。我们不在资产阶级剥削体制内搞局部改良，我们是在为人民的社会经济需求和社会基本结构的质变而战。如果我们能成功地把它向人民解释清楚，我们就能成功地在战争中动员和组织他们，并取得胜利。

无论是持久的人民战争还是民族解放战争，经验都表明，没有群众基础、军队和解放区，人民就不能形成强大的统一战线。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形成几个战术上的统一战线甚至是战略上的统一战线，来创建军队和建立根据地。我们要在战争中努力动员群众反抗敌人，创建自己的军队，建立稳定的根据地，进一步建立强大的统一战线。

问：赢得朋友的方法和途径是什么？

答：为了实现尽可能广泛的团结，我们不能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朋友采取宗派主义的态度。现在有好几支力量正在组织对抗敌人，我们也必须让他们发展。在统一战线的一些问题上，也会有压迫阶级的代表，我们不能指望他们加入我们的行列，这还有漫长的路要走。现在我们需要坚定不移地坚持我们的战略目标，为此我们需要在战术上继续保持灵活性。

更清楚的是，有两种不同的统一战线。一种是人民之间的，另一种是人民和敌人（敌对阶级的一些部门/集团/个人）之间利用敌人内部矛盾的。党必须这样做，这个范围在一定程度上是存在某些问题的，我们称之为革命的间接储备，可以谨慎地使用。如果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他们不是我们的阶级盟友，那么我们就不会有右倾机会主义倾向。为了革命的成功，我们需要这种统一战线。印度的左派多半是像印度共产党和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那样蜕化变质的，已经跟在资产阶级后面走了。

最后一个方面是，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独立的阶级利益和世界观，从这个意义上讲，统一战线也是一个斗争战线。但是总的来说，如果斗争是为了反对主要敌人，那么这种斗争就是次要的，而团结是主要的。真正的问题是如何平衡和有效地利用这种斗争和团结。敌对阶级永远不会站在人民一边，即使在夺取政权之后，社会内部的斗争仍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所以，统一战线和阶级斗争应该同时进行。因此集中精力对群众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工作。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做到这一点，那么我们就可以赢得这些群体的支持，并让他们也加入到我们的行列。这些政党也有腐败的领导人，如果我们能够通过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斗争赢得人民的支持，我们就能够争取到他们大量的基层党员。革命性的突破与这个过程有关，中国和尼泊尔的党也是通过同样的方式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无论是干部队伍还是军队，都可以通过这个方法在政治上和思想上得到发展。如果能认真处理好统一战线与政治和意识形态斗争的

这种辩证关系，我们就能成功地建立一个强大的统一战线，孤立主要敌人。

在思想上，以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历史经验为基础，可以消除资产阶级的影响。这样做我们可以赢得人民的支持，甚至改变他们的世界观，并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改造他们。

我们已经谈过了我们对统一战线的基本认识。至于主观条件，革命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是站在对人民有利的立场上的，但这必须是实际上真正的有利。第二个问题是，面临残酷的镇压，如何实现这一切？

我们认识到我们仍然是一个小党，但是我们真正的力量在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它所代表的阶级，它的路线和政策。实现统一战线的方法是什么？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地主和帝国主义是广大人民群众需要在群众路线和阶级路线的基础上团结起来反抗的敌人。只要我们坚持群众利益，正确运用群众路线和阶级路线，我们就一定能取得成功，从较小的力量发展成为强大的国家力量。

问：但实际上你们是如何做到的呢？

答：我谈到了我们的力量，尽管我们的力量还很弱小。我描述了我们的主要优势在哪里。但是战斗也需要体力，我们需要强大的军队，强大的群众基础以及强大的党。这些都是必须的，如果没有这些，无论我们在意识形态上多么强大，最终都会失败。所以，我们必须发展壮大。为此，在面对敌人的镇压时，我们必须使用正确的策略。根据我们的判断，敌人正在进行全面战争，但是这正在为他们自己制造陷阱。如果我们能认识到这一点，并有效地进行我们的游击战争，我们就会成功。

实际上是两个问题。

第一、统治阶级的矛盾：社会上存在着旧的矛盾，统治阶级中间也会出现新的矛盾，必须也应该利用这些矛盾来为人民谋利益。这不仅是为了打败敌人获得眼前的利益，而且是为了更长远的革命目的，这是必要的。我们应该加强我们的群众基础和统一战线，这是我们力量的主要保护。毛泽东同志说，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1]。我们必须动员广大群众反对敌人，利用敌人的矛盾逐个击破。

第二，在安得拉邦进行游击战时，我们遇到了挫折。尽管遭遇挫折，但是我们没有完全放弃。从戈达瓦里山谷（在安得拉邦）到马哈拉施特拉邦、奥里萨邦、比哈尔邦、贾坎德邦再到西孟加拉邦的边界，我们必须加强和扩大游击战。我们的军队必须抵抗敌人，但是也必须要根据具体情况，根据我们的优势。总的来说，目前我们要巧妙地运用打了就跑的战术。我们必须把游击战发展成运动战，把游击军发展成正规军。我们需要人民的积极参与，我们的力量在于人民。敌人会把我们限制在武装对抗中，他们想把我们限制在一个有限的区域。他们把我们的区域划分成不同的部分，把我们包围起来。但是我们也可以通过动员人民，像蜜蜂一样追击他们的大本营。在敌人营地所在的地区，甚

[1]见《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69页。

至在那些村庄，我们都有革命人民委员会，那里的工作仍在继续。有数百人对营地里安全部队的情况了如指掌，他们挖起了池塘。

因此，在敌人割裂我们的群体时，我们也在扩大我们的根据地，并试图包围敌人的营地/基地。我们必须牢记游击战在战略上的重要性。他们带来了 10 万士兵，决定从查谟和克什米尔抽调拉什特里亚步枪队（印军平叛部队的一支特别分遣队）部署在这里。但是从拉尔噶到苏姜格阿尔还有上千万群众，如果我们能积极动员群众反击敌军，我们就可以成功地把这场战争变成革命性变革的基础。这无疑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挑战，但是我们认为，从长远来看，这样的优势是无法在短时间内达到的。而我们并不像敌人想的那样，要在短时间内结束这场战争，我们要延长这场战争，把形势转变成对革命有利的。

他们企图限制我们的区域，而我们则尝试扩大。他们正在建立村级苏拉克沙·萨米提斯，以打击所谓的反社会分子，从而尽他们最大努力来遏制我们。但是人民在邀请我们，即使是新来的、经验不足的、装备简陋的干部，也被人民邀请参观这些地区。例如，奥里萨邦的索尼巴德拉，村民们主动来邀请我们。此外，我们计划以索道行动的形式从赖佳德扩大到讷亚格尔，在此计划下，讷亚格尔突袭行动得以在短短 8 至 10 个月内扩大到这片地区。因此，讷亚格尔突袭不仅具有军事意义，而且还具有政治意义，因为突袭背后有战略上的原因，此后维卡斯行动扩大到了平原上的马恩普尔（恰蒂斯加尔邦）地区。人民正在邀请我们，他们信心十足。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扩大，我们一定会发展壮大并扩大游击战。如果我们这样继续下去，成功地延长战争，那么从长远来看，政治和经济形势必发生变化，在压力之下，政府将会崩溃。目前，国家有意在军事开支上花钱，但是随着战争的持续并扩大到更多新的地区，从长远来看，花费越多，就越会导致失败。我们正在按照这个战略计划进行我们的战争。

我在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时已经解释了这个问题的第二个方面。

问：在这个节骨眼上，党有可能成为统一战线的中心吗？例如，在德里，党是弱小的，那么它在德里工作时如何看待统一战线？

答：保持党在统一战线中的中心地位是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我在回答你的第一个问题时已经回答了你问题的第一个方面。

关于你问题的第二个方面，在德里，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工作会变得更简单，但这不是现在的情况。因此，党在分析了形势之后，决定通过其他各种可能的方式保持党的中心地位。其他的方式——通过其他毛主义力量，其他民主和进步的力量。因此，在像德里这样党的直接活动范围有限的地方，我们必须通过其他方式开展工作。我们的部队必须顺应形势，为统一战线部署有能力的力量，确定最可靠的力量，并在任何重要的地方达成共同的协议。我们需要做出不同的安排。其他民主的、进步的和毛主义的力量需要联合起来，在过渡期间，应该由他们领导。

问：拉尔噶运动早期的情况是大批知识分子站出来支持拉尔噶运动，但是后

来，他们在运动的后期出现了分歧，重点转移到了反对《非法活动（预防）法》等法律问题上。你如何看待这种情况？

答：如果我有国家委员会的最新报告，我回答这个问题会更容易一些。但我还想说的是，最初城市知识分子中有很多人支持我们，现在取决于敌人的进攻和斗争的性质，它也将导致支持基础反应的变化。一些人也可能转而投靠拉尔噶运动的反对派。在西孟加拉邦，我们在公民自由团体和城市地区的影响力不是很强。我们需要做更多的事来扩大影响，我们需要加强我们在城市地区的工作。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在那里的工作，以及拉尔噶运动发展到一个更高的阶段。在基层群众中的工作和在知识分子中的工作有很大的不同，因为后者涉及到一些复杂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知识分子能够在任何问题上团结起来，甚至反对《非法活动（预防）法》，认为这与更大规模的斗争不矛盾，对我们来说就是有利的。那些不直接支持运动暴力阶段的人可以在其他类似的问题上团结起来。所以，要求可能会改变，但这些必须是代表人民的口号。拉尔噶和新口号都需要保持平衡。

我要说的是，党一定会接受任何人积极的批评，即使是那些不认同我们的基本路线，但是为人民挺身而出的人。我们欢迎人民批评我们，帮助我们党纠正错误，加强我们党的建设。反对《非法活动（预防）法》的运动，必将符合人民眼前与长远的利益。总的来说，在这方面的任何动员，从长远来看都不会与党的利益相矛盾。

问：你们把民主放在党的工作中的什么位置？指的是罢工权、异议权以及言论自由的权利。

答：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过这在我们党内并不是不明确的。我们需要一个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在这个国家里除了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地主和帝国主义者外，其他所有人都将拥有真正名副其实的自由。除了人民的敌人，每个人都会拥有真正名副其实的民主。另外，我可以这样说在准备革命人民委员会/人民政府的政策纲领时，我们研究了历史上特伦甘纳武装土地革命中村政府的经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政策纲领、菲律宾的人民委员会、秘鲁的革命人民委员会、尼泊尔的联合革命人民委员会，也研究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根据上面所说的，我们拥有所有的基本权利，包括每个选民都有权提出罢免任何一个当选的人，甚至有权将任何一个损害人民利益的当权者告上法庭，以便起诉他们。

就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宣布的四大自由而言，除了墙上的大字报外，其他所有的自由都是革命人民委员会/人民政府的政策方案所保障的。随着人民政府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之后我们还会保障大字报的自由。根据宪法，不允许对政治上的反对派进行体罚，任何人都有权在政治上持不同意见和加入工会。印度政府正试图控制异议，因此人们希望革命，我们不会犯同样的错误。此外，对于诉讼中的任何错误，当事人有权向村或者更高级别的革命人民委员会甚至党提出上诉。例如，在一个扩红区发生了一起事件，来自两个村庄的 33

个村民与警察总监勾结，成为了敌人的特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同志去处理了这个问题，虽然村民们想给警察的特务头子判处死刑，但是党进行了调解，给那个人一个机会，让他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问：在统一战线中，每个人都有可能不会加入，一些毛主义团体和民主团体甚至会脱离在外，你们将如何应对？

答：这些反对派是人民的敌人，95%以上的被压迫人民会反对它们。但是在印度，即使只有5%，也是一个很大的数字。我们党认为，在旷日持久的人民战争中，帮助许多追随者进行改造，就有在文化上直接摧毁敌人政权的余地。在中国，孙中山夫人直到最后一天仍在参政，尽管她一直不是党员。只要它们为人民服务并得到人民支持，就可以留下来。当它们在社会和政治上变得无关紧要时，它们就会自动消失。如果这些政党得到人民的支持，它们就有可能在选举中获胜。我们革命人民委员会的政策纲领中也有这样的规定，属于其他党派和组织的成员，如果他们是选民并有权被选举为革命人民委员会委员，也可以参加革命人民委员会。这是我们的认识，它也必须真正地得到实践。我们必须发展这个方面。尼泊尔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

我们给中小资产阶级一定的发展空间，又要限制他们的发展，使他们不至于反人民，这样黑市交易、股票囤积和投机倒把也可以得到控制。我们只限制大资本，即买办官僚资产阶级和外国资本家。例如，在1998-1999年，政府禁止Khirjas（小商贩）经营森林产品，因此当地商贩抗议时，我们为他们进行了一场运动。尽管我们制止了高利贷，并控制了肆意的开采，但是我们并没有阻止外来产品进入。这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我们正在控制它。它是发展人民经济所必需的，如果商人们不合作，我们怎么生存下来？在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贸易和工业部门正在处理小商贩的问题，这样外面的资产阶级就不能占便宜。所以，即使有通敌者试图争取到他们，他们仍是完全自由的。只有面临生死攸关的情况，才允许体罚。然而现在，当我们面临镇压和战争时，不得不承认我们正处在一个复杂的环境中。

问：你们党对谈判持什么样的立场？

答：总的来说，人民和毛主义革命者不希望与任何人发生暴力或武装斗争。只有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他们才会拿起武器反抗敌人。他们学习历史，发动了解放战争。因此，我们认为这是一场自卫战争。在全面战争的背景下，我们必须认识到，安得拉邦有13万军队，恰蒂斯加尔邦有4.5万军队（不久将增加2万多军队），马哈拉施特拉邦有16万军队，而且每个邦都有一支警察部队，比一些欧洲国家全国的军队都要多。最残忍和最危险的特种部队都是由邦训练的，各邦还制定了各种反人民的严酷法律。西孟加拉邦、比哈尔邦、奥里萨邦、贾坎德邦、恰蒂斯加尔邦、马哈拉施特拉邦、安得拉邦以及北方邦和中央邦共有70万到80万的警察部队，其中有25万到30万警察部队直接与人民交战，在这些地区还部署了10万中央准军事部队。在这里，人民正在与一支比镇

压东北部和查谟-克什米尔运动的军队更强大的部队作战。这是一场残酷而暴力的镇压战役，旨在镇压人民的政治运动，以及开采矿产资源。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希望能得到一些喘息的机会。喘息的时间越长对人民越有利，民主工作需要这样的背景。但是，当政府单方面拿着自动步枪时，人民没法讨论这个问题，人民会继续战斗。在子弹射来的时候，人民永远不会放下武器，也永远不会投降。一切民主的、进步的、爱国的力量都需要团结起来，反抗中央和邦政府反人民的全面战争。简而言之，党对于政府提出的任何谈判的主要要求是：

- (1) 必须停止全面战争。
- (2) 解除对党和群众组织参与民主事业的禁令。
- (3) 必须停止对同志们的非法拘禁和严刑拷打，并立即释放他们。

如果这些要求能得到满足，那么获释的领导们将代表党参加谈判。

党的发展概论

自从扬·米尔达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写了《印度等待着》一书以来，他在书中谈到的这场运动在政治和军事的各个方面都有了一些发展。正是从那时候起，我们看到了一种考虑到印度具体特点的观点的发展。查鲁·马宗达同志时代留下的有经验的领导人寥寥无几，许多人已经走向右倾，一些人走向左倾，只有少数人来到了这里。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新一代，一群新青年，要把他们培养成有经验的干部，必须投入大量的时间。当扬·米尔达你 1980 年来到这里时，党还在经历这个问题。

只有再过 6-7 年，在人民战争的背景下，才会出现真正的领导人。1980 年扬·米尔达访问安得拉邦时，那时只有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全国委员会和泰米尔纳德邦委员会。虽然也有一个中央委员会，但自然是仅限于这两个邦，其范围是有限的。当时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活跃在西孟加拉邦和比哈尔邦，只不过在西孟加拉邦的实力很弱小。同样，人民战争集团也活跃在安得拉邦和泰米尔纳德邦，但是在特伦甘纳邦实力很弱小。这是对两个中心和在两地的工作的回顾总结。科巴德·甘迪同志和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其他同志后来加入了人民战争集团。在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卡奈·查特吉同志在包括阿萨姆邦在内的地区开展了一些工作，但是方式非常有限。现在我们遍及 20 个邦，但是党在有些地区的力量仍然非常薄弱。因此，在旷日持久的人民战争中，发展是不平衡的，根据我们的实力，不同地区的运动水平是不同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观察革命政党的发展和作用，我认为这非常重要。

同志们，在 20 世纪 80 年代，党试图摆脱挫折，试图合并重组。一方面是宗派主义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失去了大部分群众基础，所以我们的一切都必须从群众斗争和军事斗争上恢复。相应地，我们的策略也发生了变化。当时主要是反封建斗争和反帝宣传鼓动，在城市地区制造反政府的舆论和公开的运动。

以前在查鲁·马宗达同志领导下的路线是漠视群众组织的，后来我们又重新思考，经过认真的自我批评检讨，承认早些年犯了一些错误。并在此基础上，为了发展，我们重新进行了这场运动。自我批评检讨是在 1974 年进行的，到 1977 年 8 月，党内的力量才被说服。1980 年 9 月的安得拉邦党代会重申了

这一点，实际上标志着一种新的做法的开始。

正是从那时候起，我们看到了一种考虑到印度具体特点的观点的发展。查鲁·马宗达同志时代留下的有经验的领导人寥寥无几，许多人已经走向右倾，一些人走向左倾，只有少数人来到了这里。所以，在很大程度上他们是新一代，一群新青年，要把他们培养成有经验的干部，必须投入大量的时间。当你们来到这里时，党还在经历这个问题。只有再过 6-7 年，在人民战争的背景下，才会出现真正的领导人。

第一，一个革命政党需要一个领导层来认识国内和国际形势，以及经济和政治形势来制定相应的策略。我在 80 年代后期谈到过一些观点，如果我们再加上这些经验，就会看到，在之后的几年里，我们在这个认识领域取得了一些进展。

第二，革命政党需要组织人民，领导阶级斗争。从战略角度来看，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党的领导下人民斗争取得了一些具体的发展。

第三，对于一个革命政党来说，组织武装斗争是很重要的。钱德拉·普拉·雷迪集团以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为名，是萨蒂亚·纳拉扬·辛格领导下的临时中央委员会的一部分。当时他们在你访问过的戈达瓦里地区只有一些小队。人民战争集团开始也是一些农民小队形式的武装小队，那时他们已经有 60-70 名武装干部。

后来，我们按照根据地区巧妙地夺取地方政权的思想发展阶级斗争，建立人民军队，这边的人民战争集团和那边的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开始建立 5、7、9、11 级武装游击队，一些排和游击区由此出现。在 2004 年合并之前，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连。过去的人民战争集团有人民游击军，而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有人民解放游击军。在合并过程中，我们成立了印度共产党（毛主义）领导的人民解放游击军。下一阶段是在营的基础上逐步建立人民解放军。根据这些基本原则，我们已经逐步发展了更高阶段的政治和军事力量，以及人民的政治力量。这种愿景甚至在此之前的八十年代就已经存在，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也是这样做的。但是实际上，只有在合并之后才在具体方面实现了发展。

我还想指出另外两个发展。一个党，如果要在实践中不断发展涉及广大群众的政策或策略，就必须在实践中走到成千上万的人民中去。在实践中，在面对问题和纠正错误的同时，存在着痛苦的内部和外部斗争。只有通过这种痛苦的思想和政治上的斗争的过程，我们才能到达今天的位置。经过 70 年代的整顿和审查，人民战争集团已经出现，而它不得不面对的严重的内部危机的形式有：1、80 年代中期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2、90 年代初孔达帕利·西塔拉迈亚同志领导下造成的困难。

接下来又是一次，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和人民战争集团之间的冲突是一段痛苦而难忘的经历，是历史上黑暗的一章。为了面对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挑战，党在策略上形成了两种途径：讨论、检查和斗争。这三次党都成功地摆脱了危机，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也以同样的方式摆脱了自身的内部危机。其中有一部分打算继续斗争，出现的这些派别也不同于毛主义和教条主义。党统一也通过同反对持久人民战争和土地革命的势力进行斗争，成功地建立了。即使在这个阶段，人民战争集团和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也变得越来越小，而维诺德·

米斯拉和萨蒂亚·纳拉扬·辛格集团变得越来越强大和有影响力。然而维诺德·米斯拉转向左倾机会主义，萨蒂亚·纳拉扬·辛格转向右倾机会主义。实际上他们分裂了，并最终面临清算，在今天已经完全有名无实。

早些时候，在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我们的路线只谈夺取政权，其他政治问题，如国籍问题、妇女问题、达利特人（不可接触者或在册种姓）问题和宗教少数群体问题，将自动得到解决。然而，后来我们纠正了这一立场，把直接的口号和终极的口号结合在一起。这是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和向它发展的必要条件。当时其他各种马克思列宁主义团体只是提出了直接的口号，从而转向改良主义，而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提出了终极的口号。但是现在，通过把直接的和终极的口号结合在一起，我们朝着更好的发展迈进。

在党的教育方面，中央、邦和地区各级都有党刊。其中大约有 25 家是党的，其他一些是群众组织的杂志。例如我们正在出版的：《人民战争》，以英语、印地语和其他语言出版的一本思想政治杂志；《Awami Jung》，以不同语言出版的一本军事杂志；《毛主义信息公报》英文版。在丹达卡兰亚我们出版了以下杂志：

- 1、《Prabhath》（印地语党政杂志）
- 2、《Viyukka》（冈德语/科亚语思想政治杂志）
- 3、《Padiyora Pollo》（冈德语/科亚语军事杂志）
- 4、《Sangharsharath Mahila》（印地语 KAMS 杂志）
- 5、《Jhankar》（多语种文学与文化杂志）

分区/地区级的冈德语/科亚语杂志：

南巴斯塔分区：《Pituri》（《起义》）；

西巴斯塔分区：《Midangur》（《火种》）；

达尔巴分区：《Moyil Gudrum》（《闪电》）；

加德奇罗利南北分区：《Poddhu》（《太阳》）；

MAAD 和北巴斯塔联合分区：《Bhoomkal》（《地震》）；

东巴斯塔分区：《Bhoomkal Sandesh》（《起义消息》）。

除此之外人民政府也出版了一本杂志《人民的国家》。

还有一些学习班是按照学习笔记和教学大纲来组织的。在各级组织了政治班，在讨论中国、菲律宾和秘鲁的革命历史的时候，有时还要组织 4-6 个月至一年的整风运动来进行政治和思想上的培训。军事学校有军事指导员队伍，中央委员会出版的军事杂志是《Awami Jung》。

党在丹达卡兰亚地区面临着文盲和缺乏初等教育的问题，因此我们组织了 MAS（流动教育），对党的干部进行初等学历教育。自成立以来，已有数百名干部接受了培训。群众组织也根据自己的教学大纲制定教学计划，他们的教学大纲是与领导层和委员们协商制定的。

人民军队发展概论

我请你们查阅我们的中央文件，全面了解我军在具体国情和国际形势下的发展状况。我请你们关注这一点，因为它在任何革命中都是具有生命力的。

统一战线发展概论

在群众组织方面，多年来农民、妇女、学生、青年、民权团体、文学和文化团体、儿童、民族、工人、雇工等群众组织发展起来了。一个邦的党越强大，组织和阵线就越强大。在党力量薄弱的地区，邦一级的群众组织较少。目前，党在邦和全印度都有各级群众组织，其构想是有符合四个阶级联盟原则的代表四个阶级的组织和其他团体。基于对群众组织的重视，目前我们有 30-40 个群众组织在各条战线上工作。在 80 年代，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很少有群众组织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秘密工作。在安得拉邦，农民、学生和文学文化团体以及青年都受到了一定的影响，而现在随着我们对村级到邦级再到全印度存在的不同群众组织的认识的发展，人民战争集团第九次代表大会决定发展群众组织和统一战线，这是以问题为基础的和策略性的。在某些问题上，甚至可以和敌对阶级以及地方领导人短期或中期地联合起来。这些在合并以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因此，阶级斗争需要在地下和地上两个层面进行，需要利用合法的机会，有些群众组织在马列毛主义基本原则指导下工作，而其他有些群众组织需要完全隐蔽起来工作。

论国际关系

20 世纪 80 年代初，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和人民战争集团的活动都是区域性的，因此我们在很大程度上未能与更大规模的国际运动建立联系。然而，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开始，特别是在两党合并、印度共产党（毛主义）成立以后，党也开始在国际上发挥作用。我们正在参与国际辩论，并派代表团参加国际论坛，但是在这方面还需要取得很多进展。尽管如此，情况仍然比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要好。至于革命国际主义运动[1]，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 2002 年加入了它。但是人民战争集团反对加入革命国际主义运动，因为它认为，只有经过彻底的思考、认识和讨论，才能形成一个避免宗派主义做法的国际纲领。因此，人民战争集团没有加入革命国际主义运动，而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加入了它。合并之后，新的党的任何决定都将付诸实践，这是确定的。从那时起，全党作出决定，不再参加革命国际主义运动。我们退出了革命国际主义运动，而革命国际主义运动现在已经几乎不复存在了。

积极捍卫马列毛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支持世界各地的阶级斗争，并得到国际毛主义政党/组织/力量、无产阶级和人民的支持，是印度革命作为世界社会主义伟大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为此，我们要与毛主义和反帝力量保持兄弟般的关系。我们认为，对任何革命的成功来说，提供援助和接受国际援助都是很重要的，而且因为我们正受到镇压。总的来说，我再次强调我们坚持马列毛基本原则。我们欢迎任何毛主义政党/组织提出批评意见。

我们认为印共（毛）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支分队。如果它成功了，我们可以说世界的一部分成功了——它不是孤立的，它将成为世界社会主义革命

[1] 一个支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国际共产主义组织，于 1984 年建立，寻求“基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争取形成一个共产国际的新类型”。

的一部分，它与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败密切相关。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斗争更多，将对印度革命产生有利的影响。

扬·米尔达是瑞典作家、政治作家、记者，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和人民解放运动的倡导者；高塔姆·纳夫拉卡是《经济政治周刊》的编辑顾问，也是德里人民民主权利联盟的主要民权活动家。

根据这些会谈的授权记录，贾纳帕蒂总书记在会谈结束时还说：

关于党和统一战线发展的概论，我还没有编辑。尽管如此，您可以把这个全部或者部分地当做我们的公开信息。我请你们参考我们党的基本文献，了解更多的信息，并提出对印度革命的看法。

我觉得有必要写一本关于印度革命的书。

二

中央委员会发言人阿扎德关于对贾纳帕蒂总书记的采访的 阐述说明

人民进行曲——印度革命之声

第 11 卷第 2 期，2010 年 3-4 月第 28-39 页

印度共产党（毛主义）发言人阿扎德接受《印度教徒报》的独家采访，以书面形式回答了该党对与联邦政府对话的态度相关的问题。

.....

3、毛派也有他们谈判的前提。在最近接受扬·米尔达和高塔姆·纳夫拉卡的采访时，贾纳帕蒂就谈判问题作出了以下表述：

“简而言之，党对于（印度）政府提出的任何谈判的主要要求是：

（1）必须停止全面战争。

（2）解除对党和群众组织参与民主事业的禁令。

（3）必须停止对同志们的非法拘禁和严刑拷打，并立即释放他们。

如果这些要求能得到满足，那么获释的领导们将代表党参加谈判。”

我的问题是这些前提是否现实。例如，“全面战争”在“停止”之前可以暂时中止，也就是说停火，那么为什么在一开始就要坚持停止呢？你们是在要求停火还是其他的什么？

其次，你们希望解除对党及其群众组织的禁令，并释放囚犯。一般来说，世界各国政府和叛乱团体之间的此类谈判中，解除禁令是目标之一，而不是前提，释放政治犯也是中间的步骤。毛主义党提出一些政府可能难以接受的要求作为起点，而不是将其作为拟议对话的终点之一，这难道不是颠倒了顺序吗？

阿扎德：我同意你论点的逻辑。这些要求可以在实际谈判的过程中解决，而不是作为谈判的前提，从逻辑上讲这是一个合理的论点。但是你也必须理解贾纳帕蒂同志接受扬·米尔达先生和高塔姆·纳夫拉卡先生采访时的讲话精神。这里需要一些澄清，我将试着阐述清楚贾纳帕蒂同志所说的话。

第一，当他说政府应当停止全面战争时，他的意思不过是暂停这场战争，或者用他的话说，是相互停火，在这方面不能混淆。奇丹巴拉姆想要的是毛主义者单方面的停火，同时政府继续其残暴的恐怖行动。与之相反的是，印度共产党（毛主义）希望双方同时停止敌对行动，这就是第一点的意义。双方的停火不能被称为前提，这只是交战双方愿意为下一步的谈判创造有利氛围的一种表现。

第二，如果毛主义者必须像几个组织和民间社团的成员所期待的那样开展和平的合法工作，那么解除禁令就成为了一个先决条件。不解除对党和群众组织的禁令，我们如何以自己的名义组织合法斗争、集会等活动？如果我们这样

做了，由于它们是受一个被明令禁止的政党领导的，难道不会被称作是非法的吗？按我们的观点，这种禁令本身就是一种专制、不民主和法西斯的行为。因此，解除禁令的要求是合情合理的，而且如果得到满足，这将大大促进公开的民主形式斗争，并为对话创造出有利的氛围。

第三，贾纳帕蒂同志要求的是，政府应当遵守印度宪法，结束以遭遇战、拷问和逮捕为名的非法谋杀。我们必须把第三点中缺失的“谋杀”一词包括进来。要求政府遵守自己的宪法并没有错，也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关于释放政治犯，就该要求的性质而言，这可能是一个中间的步骤，但是为了举行谈判，政府有释放一些领导人的必要。不然的话，整个党都是非法的，那就没有人可以来谈判了，我们不能为了谈判使我们的领导人暴露。

.....

6、如果政府认为毛派‘滥用’了安得拉邦的谈判，你们党就认为是当局滥用了那里的谈判，来识别和锁定你们的领导人。那么，你们希望如何应对再次与印度政府展开对话所面临的风险呢？

阿扎德：我们在安得拉邦与国大党政权举行的谈判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教训，这些教训将指导我们今后同剥削阶级政府的一切谈判。如果说警方可以利用谈判的间歇来识别和锁定领导人，那就把问题看得太简单了。他们在某种程度上利用了它，就像我们利用它在邦内外的人民中间传播我们的政治观点一样。我们在安得拉邦大部分地区遭受了挫折并不是因为谈判的失败，而是由于我们党在安得拉邦的一些内在弱点，以及我们未能采用适当的策略来应对敌人的策略。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可以其他时间再谈。

与此相关的是，安得拉邦的谈判给了我们丰富的经验和重要的教训。如果谈判的情况再次出现——我们没有预料到将来的情况，公司对政府连蒙带骗要求通过强占的方式完全控制矿产丰富的地区——我们就要指示我们被关在各个监狱的领导们承担责任。我们的总书记在接受扬·米尔达先生和高塔姆·纳夫拉卡先生采访时说明了这一点。在安得拉邦与政府谈判期间犯下的错误将不会重演。

.....

12、在贾纳帕蒂接受扬·米尔达和纳夫拉卡的采访中，他说：“我重申，目前没有一个政党或组织能够完全成为一切革命的、民主的、进步的、爱国的力量和人民的领导核心。因此，在当前这个时期，我们党能够在团结一切革命的、民主的、进步的、爱国的力量和人民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这表明你们把毛派看作是更广泛的进步和爱国人民力量的一部分。你认为这些力量中还有谁？你认为哪些组织或政党是这些进步和爱国力量的一部分？这难道不包括印度共产党和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吗？那么为什么西孟加拉邦的毛派要参与暗杀其他共产党，比如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干部？

阿扎德：不仅是现在，我们一直认为自己是其他革命、民主和爱国人士的更广泛力量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首先，我们是世界无产阶级国际队伍中的几支革命队伍之一，我们把自己看作是国际上广泛的反帝阵线的一部分。我们的群众组织是国际人民斗争联盟的一部分，站在了反对美帝国主义斗争的最前线。

在印度，我们的党诞生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的革命高潮，特别是光荣的纳萨尔巴里起义中。因此，我们是印度所有革命的政治潮流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也是伟大的特伦甘纳武装农民起义（1946-1951 年）、1946 年特巴加起义以及共产党自 1921 年诞生以来领导的所有革命斗争的继承者，尽管在我国革命政治历史上的每一个关键转折点，共产党的中央领导人都有过背叛。

第二个，也就是和你的提问更相关的，事实上，共产主义革命者在政治上（就其纲领而言），是国内更广泛的一切反帝反封建民主力量的一部分。这是我们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的本质，就是尝试着把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买办官僚资本主义的人团结到一个广泛的战线上来，去推翻这些敌人，并建立一个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组成的，四个阶级联合的政府。一旦你明白了我们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基础，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我们要尝试着形成许多战术上的统一战线，作为在多个邦和全印度层面形成战略上的统一战线的一部分。

要确定哪些组织或政党能称得上是进步（使用“民主”一词更加恰当）和爱国的，不仅要看它们的政治纲领中是否包含反帝、反封建、反政府或反专制的方面，还要看它们的实际行动。我们认为大多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力量是这条战线的一部分。

我们认为，那加兰全国社会主义委员会、阿萨姆联合解放阵线、曼尼普尔人民解放军和在克什米尔的查谟克什米尔解放阵线等民族解放组织是反抗印度政府的更广泛的民主力量的一部分。我们认为，各种非议会的工会组织，各种被有政府背景的印度教法西斯组织迫害的属于宗教少数派的进步组织，各种达利特及其他被压迫种姓、阿迪瓦西斯原住民和妇女的组织，为特伦甘纳、廓尔喀兰、维达尔巴、本德尔坎德等地区的独立要求而斗争的非议会组织，为经济特区、采矿和其他所谓的开发项目导致大量人民流离失所而进行斗争的组织，反对反动统治者的自由化-私有化-全球化政策的组织，那些敢于反抗日益增长的威权主义和肆无忌惮的国家镇压导致的假遭遇战、大规模谋杀和对人民所有基本权利的侵犯的人，等等，都是这个具有广泛基础的非议会的民主主义人民阵线的一部分。

还有一大批关心人民幸福和我们国家主权的知识分子和其他民主人士通缉在逃，我们认为这些人是真正的爱国力量，他们深深地关心着我们国家的未来，关心绝大多数印度人民的幸福，而不是一小部分通过所谓的主流议会政党来实际控制国家的阶级的幸福。

我显然没有提到那些我们认为能够在我国向一个独立自主、真正民主的社会的革命性转变中发挥关键作用的组织和个人的名字。今天我们正在经历印度麦卡锡主义的一个阶段，它给任何形式的不同意见和任何质疑印度政府的威权主义的人都打上毛派的烙印，目的在于使它的政治迫害和残酷镇压合法化。

今天，印度的革命战争有极大的可能性取得迅速发展，革命政党的任务在于如何有效和巧妙地利用当前形势，团结所有成为统治我国的封建买办势力和反人民的帝国主义政策受害者的人，努力形成社会各阶层和全国一切革命民主爱国力量的广泛的统一战线。要完成这项任务，就必须打赢我国反动统治阶级在帝国主义，特别是美帝国主义的援助下发动的这场遍及全国的全面战争。

如果我们不能实现所有这些力量的更广泛团结，其后果将对大多数印度人民造成灾难性的影响，因为这些残酷的武装袭击的目的不仅是镇压毛主义运动，而且还镇压任何形式的民主异议以及人民反抗印度国家和社会政治制度的封建专制独裁结构的斗争。正如我们的总书记贾纳帕蒂同志在最近的同一次采访中所说：“这场战争主要是针对毛主义运动的，但是又不只针对这一运动，其目的是针对我们社会上所有革命的、民主的、进步的和爱国的运动以及包括被压迫民族在内的被压迫群体的运动。在这个关键时刻，所有这些力量必须共同思考如何面对这个强大的敌人，如何为此团结起来继续前进。”

现在来回答你关于印度共产党和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具体问题。他们不是更广泛的民主和爱国力量的一部分吗？我会说“是也不是”。就这些政党的基层干部而言，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仍有一些为人民谋幸福的真诚和热情，然而领导层已经完全屈服于剥削统治阶级，并且奉行改良主义路线，尽管有一些表面上的变化，但是这只会有助于维持现状。在这里，我们也必须要区分一下印度共产党和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不要把印度共产党和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归为同一类。

印度共产党的领导层一直批评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政策，一贯反对反革命民团，如邦和中央政府支持的和平行动，并且正在反对由中央发起的绿色狩猎行动。人民可以看到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政策反动反人民的本质，特别是在其执政的邦，辛古尔、南迪格莱姆、拉尔噶和很多其他的名字已经剥去了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反帝国主义和反新自由主义的伪装。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甚至连一支彻底的民主力量都算不上，更别说是共产主义的了。然而，即使是这些修正主义者，如果他们在人民的基本问题上出来进行非议会的斗争，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维护民主价值观，我们也准备同他们联合起来。

说我们在暗杀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干部是不对的，我们正在进行顽强的抵抗来面对像 **Harmad Bahini** 那样的突击队和其他由他们党的领袖供养的武装（人员）的袭击。反抗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是人民反对剥削和压迫的阶级斗争的一部分。我们邀请他们就任何问题进行公开辩论。尽管他们灵活圆滑和机会主义的立场使其与毛主义者的斗争主要是政治性的，但是在印度统治阶级对毛主义者发动的战争中，他们站在了最前线。由于无法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与我们对抗，他们的领袖和发言人针对毛主义者发动了一场完全是谎言和诽谤的恶毒运动。

我们呼吁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和其他所谓的左翼政党的干部站出来，联合其他力量反对中央和邦政府灾难性的政策，联合其他人员反对美帝国主义唆使下反动统治者发动的针对毛主义运动和一切形式的民主异见的残酷战争。我们准备同这些政党中站在广大人民群众一边的一切真挚的、诚恳的力量联合起来。

.....

三

今天丹达卡兰亚的人民政府是明天印度人民民主联邦共和国的基础

贾纳帕蒂同志代表政治局致丹达卡兰亚人民政府杂志的信

人民进行曲——印度革命之声

第 11 卷第 1 期，2010 年 1-2 月第 22-26 页、第 13 页、第 18 页

2010 年 1-2 月

在我们党的领导下，人民战争正在丹达卡兰亚发展着，新民主主义政权由此在那里出现。我们党正在为这个以人民政府形式出现的新民主主义政权而努力奋斗，以健全躯体，日益壮大，实现了作为丹达卡兰亚地区级别人民政权的质的飞跃。人民政府领导层创办这份杂志，旨在将其作为这一革命实践的有力工具。政治局在第一期刊物出版之际，向人民政府的领导致以衷心的祝贺。政治局衷心祝愿人民政府领导层的这一努力取得成功。

丹达卡兰亚发展的新国家政权具有战略意义，有着具体的历史背景，是当今世界社会主义革命形势复杂时期具有重大意义的国家政权。

在包括印度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内的任何社会革命中，最关键、最核心和最主要的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我们党正通过政治动员人民参加持久的人民战争，建立人民军队（以游击队的形式），摧毁敌对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来努力建设地区民主政权，在丹达卡兰亚建立人民政府正是作为这个革命进程的一部分。人民政府彻底地反对帝国主义、买办官僚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它们是通过摧毁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形成的，是在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领导下，大多数有觉悟的农民在农村建立起来的。它们在政治上代表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它们努力地对人民实行真正的民主，对敌人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它们决心从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彻彻底底地改造当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凭无穷的毅力夜以继日地奋斗。作为未来将在全国范围内完全建立起来的人民民主制度的雏形，它们在丹达卡兰亚出现，并不断地发展壮大。它们代表了未来的制度。

基于这个新政权，党、军队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层正努力地大规模动员人民参加人民战争，把它们巩固好，加强人民军队，完成生产、防御、训练等任务，把运动扩大到邻近地区，从而扩大游击战和新政权，通过协作配合帮助邻邦的新政权完成政治任务。总之，党、军队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层正在努力进行政治、军事和组织工作，立足于这一新生政权以解放丹达卡兰亚。他们在完成这些任务的同时，也将丹达卡兰亚作为一个促成质变、加快印度革命发展步伐的战略着眼点，这就是为什么在丹达卡兰亚发展的新政权和人民政府具有战略意义。丹达卡兰亚发展的人民政权能否得到捍卫并发展成根据地，取决于我们

的领导层能在多大程度上动员全国的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主革命力量，以及这些力量能在多大程度上发挥其革命作用。鉴于此人民政府的战略地位将发生变化。

在历史上的特伦甘纳农民武装革命斗争中，三千个村庄建立了“村政府”。共产党的领导层向印度统治阶级投降，放弃武装斗争，极大地背叛了革命，结果村政府被扼杀在萌芽状态。查鲁·马宗达同志和卡奈·查特吉同志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反对议会经济改良主义路线领导的印度共产党和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并与它们决裂。在查鲁·马宗达同志和卡奈·查特吉同志根据我国具体国情，创造性地应用持久人民战争的路线，点燃了农民武装革命的星星之火之后，“革命委员会”和“革命农民委员会”作为革命农民的权力机关应运而生。但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们被镇压下去了，印度革命暂时受挫，革命农民委员会没有及时发展到更高的水平。正是在总结村政府、革命委员会和革命农民委员会的经验的基础上，人民政府在丹达卡兰亚建立起来，作为他们更高级、更巩固的形式，以实现更高的目标。2009年9月21日，印度革命两大主流的合并，印度共产党（毛主义）的成立，为新权力机关的建设、发展和根据地的建立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有利条件。这就是人民政府的历史背景。

而这一历史背景清楚地表明，领导层在战略、路线和政策上应该非常坚定，它应该坚决保卫和发展权力机关，应该通过击败敌人的进攻来努力保护新政权和主力部队，应该及时推进更重要的工作并有效地领导根据地建设。只有牢记这一宝贵历史背景，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层才能高效、娴熟地领导完成我们的团结大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制订的建立丹达卡兰亚和比哈尔邦-贾坎德邦根据地的任务。

1976年，我们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导师毛泽东同志逝世后，中国共产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反动修正主义集团立即篡夺了权力，结果，世界无产阶级最后的根据地崩溃了。但是，革命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正在以各种形式和规模反抗帝国主义和反动统治阶级。这种反抗在菲律宾、秘鲁和尼泊尔达到的层次较高，由于内外原因，这些革命经历了起起伏伏。秘鲁面临着长期的挫折；菲律宾革命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但是通过纠正错误再次恢复了过来；尼泊尔人民战争进入战略进攻阶段后，面临着机会主义领导的严重危险。尽管世界上许多国家虽然已经成立了革命政党，正在组织人民，但是在他们国家还没有发展到同帝国主义和本国统治阶级进行激烈对抗的阶段。在我国，虽然我们党已经建立了人民解放游击军，正在发展人民战争并形成了新的权力机关，但是我们还没有建立根据地，党正在为之努力。总的来说，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主要力量还很弱小。

另一反面，世界上所有国家，包括美帝国主义，都因为严重的经济危机而深陷困境。世界上的基本矛盾进一步激化了，巨大的沮丧情绪正在工人阶级、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中间沸腾，客观条件正在变得非常有利于社会革命的爆发。

今天，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正在经历一个客观条件非常有利、革命主要力量却很薄弱的复杂阶段。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把丹达卡兰亚变成根据地，我们党正在动员数十万阿迪瓦西斯农民，努力把人民解放游击军发展成人民解放

军，把游击战发展成运动战。在从村级到分区级建立的人民政府的基础上，努力建立丹达卡兰亚地区级别的政权。在这样的情况下，帝国主义和他们的印度买办正在制造巨大的障碍阻止我们实现目标。能否通过抵抗印度统治阶级的进攻来解放丹达卡兰亚，还取决于我们党的领导层能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进步力量那里得到多少支持，以及这些力量会担负起多少国际责任，这就是为什么丹达卡兰亚的新政权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复杂局势中越来越重要的原因。随着丹达卡兰亚的解放，这一重要性将大大增加。

大幅度增加人民对所有国家事务的参与，将成为保卫、巩固和扩大人民政府的最重要的问题。

在我们解放丹达卡兰亚的革命过程中有两个基本的方面——破坏和建设。在这两个方面中，第一个是主要方面。只有把这两个方面协调起来我们才能解放丹达卡兰亚。人民的积极参与是这一过程从开始到胜利的决定性因素。如果我们不唤醒人民去夺取政权，我们就不能把他们武装起来，使他们投入到阶级斗争当中去；我们就不能有效地动员他们参加游击战；我们就不能使他们团结起来；我们就不能把他们的巨大能量和创造力发挥出来，使他们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我们就不能有效地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建立起来的政权不仅有可能变得不稳固，而且还可能被摧毁。这意味着，如果我们不从政治上动员人民，人民不积极参与，我们不仅不能在建立根据地的过程中取得一个相当大的胜利，而且甚至可能失去我们已经取得的胜利。

如果我们希望加强人民对国家事务的积极参与，就必须有广泛的人民民主。在管理国家事务中，只有当我们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时，只有当我们能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国家机器和管理部门时，才能有效地实行人民民主专政，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确保人民民主政权不会变得不稳固。

为了加强人民民主，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层应该在政治上不断地动员人民，并遵循规定的民主方法。我们要确保人民政府的村民会议、人民委员会、人民的各部门和人民常委会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运行。即便发展到了更高水平，我们也应该在组织上确保人民政府的群众性，而非仅仅依靠党和军队专业人员，他们的工作态度应该是代表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社会阶层的利益。我们应该以有助于发展人民内部团结的友好方式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我们在一切活动中都要坚持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我们必须把握阶级斗争的意义，并为人民谋发展谋幸福。一般来说，我们不能对持反对政治观点的人采用体罚的手段，我们应该用正确的政治和民主的方法来争取人民。在纠正错误的问题上，要贯彻“治病救人”的方针。我们必须确保人民积极参与内部斗争，批评党内和人民政府内的错误倾向和错误做法。在教育问题上，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发展教育，使之有助于带来转变、增进团结、解决问题和实现更高的目标。

在扩大人民民主的过程中，它的缺陷将会导致党和政府的领导人以及管理政府事务的干部中出现腐败、渎职、铺张浪费、追求名利、自私自利和官僚主义的错误倾向。如果这样，党和政府领导人脱离人民的危险就增加了。我们有与这种错误倾向作斗争的经验，所有领导人应该始终在劳动人民持续的监督和制约下为人民服务。我们必须努力加强人民民主，确保人民广泛参与政府事务，这对解放丹达卡兰亚至关重要。

为了通过巩固人民民主政权，在丹达卡兰亚这一级别建立这样的政权，我们也必须培养能够在同一级别和同样广泛的各个领域工作的干部、专业人员、技术人员和专家。

讨论政权意味着赋予它实际的形式，发展它并创建一套非传统的制度。在任何一个国家采取夺取地方政权的路线，领导层都应认真考虑这一点。因此，依靠我们想要建立的根据地的当地人民是基本方针。建立根据地，依靠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是次要的。对于一个国家整体的革命来说，依靠外国进步革命力量的援助是次要的。当我们考虑丹达卡兰亚的社会条件和在这里发展运动的历史进程时，虽然方针是一样的，但是来自其他地方的援助会具有更大的意义。

党的中央领导人应该牢记这一点在丹达卡兰亚发展新政权。关于政权的发展，即在建立最低限度和必要的机制方面，我们迄今为止所做的一切还远远不够。

通过增加人民对人民政府事务的参与，通过扩大人民民主，通过在更高层级的人民政府中增强群众性，通过增强我们在人民团体中的政治工作，通过开展专门的组织培训活动，通过提高这一领域的干部和专家的能力，通过创造性地积累资源，以及制定这一领域的干部政策，我们就能确保人民政府得到建设和长足发展。

人民正在通过打败敌人，摧毁当地敌人的政权来建立人民政府。由于这一现象，阶级斗争已经直接或间接地加剧了，并没有结束。阶级斗争已经扩大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现在不仅在政治和军事领域，而且在思想、经济和文化领域也都在进行。

当地的土豪劣绅、部分部落首领、反动坏分子、一小部分寄生虫、与剥削阶级政府勾结起来依靠其财富反人民的富人，已经向人民政府夺取了政权的地区的人民投降。他们企图以各种方式在内部密谋反对人民政权，但是都失败了。随着中央和邦的军队对丹达卡兰亚的进攻更加猛烈，随着反动的和平行动的发动，他们大多加入了和平行动或与敌军联手，正对人民采取最残酷的攻击来摧毁人民政权。人民与其敌人、新生政权与敌人政权之间的阶级斗争空前激化。这些敌人正在加倍复仇地攻击，为了夺回他们失去的权力，并再次继续他们的剥削和压迫。即使在公开发动袭击的同时，他们也在利用各种政府改革计划，并秘密利用他们与其亲属、朋友或部族的联系，企图进行奸诈阴险的活动。政府正在依靠人民的敌人在人民中间建立情报网。

因此，为了保卫政权并发展到丹达卡兰亚地区级别的水平，人民政府不但要在当地进行斗争，还要在各个领域同政府进行尖锐的阶级斗争。在这样的背景下，非常需要坚持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积极地动员人民。只要我们旗帜鲜明地进行阶级斗争，只要我们在斗争中积极地动员人民，我们就能够镇压人民的敌人，挫败政府的进攻，保卫新政权。

在我们形成了新的权力机关并在当地建立了政权后，它们努力把农村生活中的经济、文化领域转变得亲民和民主。它们进行了进行革命性的土地改革，进一步形成了农业发展、森林保护、教育、健康和文化的互助小组。这项革命工作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也有助于实现发展人民战争的主要政治任务，我们需要在这一领域加倍努力。

我们可以说，近年来我们在这方面取得了相当大的进展。由于中央和邦政府及其警察、准军事部队进行反动的和平行动扫荡运动，丹特瓦达和比贾布尔地区（南巴斯塔和西巴斯塔）的数百个村庄连同人民的经济一起被摧毁。人民解放游击军、人民政府、一切人民团体和人民在我们党的领导下动员起来了，并在击败敌人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在游击区和人民政府形成的地区，人民解放游击军在民兵和人民保卫力量的武装协助下，重新开始了农业生产。许多民兵、人民解放游击军各部队的战士、人民政府的领导人、委员和人民在保卫战中牺牲了。

此外，敌人完全关闭了市场，阻断一切供给，完全破坏了人民的经济生活，还企图迫使人民投降。他们要停止的不仅是对人民的供给，还是不断增强的人民武装和人民政府的补给，并以此摧毁革命阵营的主动权。我们在丹达卡兰亚对抗了这种前所未有的严重局面，并在很大程度上取得了胜利。

毫无疑问，从长远来看，敌人将来会进行最残酷的进攻。因此，有必要制定一项计划，以满足人民、人民武装和人民政府的日益增长的需求，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阻止强制移民，发展生产（农业、林业、手工业等），并在丹达卡兰亚发展贸易。有必要根据人民、人民武装和人民政府日益增长的需求和相互依存的情况，推动人民经济的必要发展。如果我们希望通过牢记这些需求来制定计划，那我们将不得不对整个丹达卡兰亚的情况作出平均估量。如果我们可以依靠当地人民政府对该地区的情况进行估量，地区级别的人民政府就可以根据这些实际估量做出正确的估计。如果我们可以全面、正确地利用人民正掌握着自己的命运这个局面，并能够制定和实施一个协调需求、生产、消费、市场和资本的计画，即使目前处于初级阶段，我们也能在经济领域实现飞跃，这一飞跃势必将巩固人民政权。对于夺取地方政权和进行人民战争来说，这种经济方面的努力是十分必要的。从政治上动员人民参与经济事务，加强他们的参与和发挥积极作用将是决定性的。

人民解放游击军作为新型人民军队的形成，是我们党为了增强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把马列毛主义运用到我国具体国情中去的结果，是我们在人民群众中进行思想、政治和组织层面的工作的结果。从人民解放游击军成立的那一刻起，它就成为了革命运动的骨干力量。它正在进行游击战争和政治、组织工作。正是由于这一努力，新的人民政权被创造出来，人民政府在丹达卡兰亚成立了。人民政府正在发展壮大，反过来又帮助了人民解放游击军发展壮大。这意味着，党在向人民传播马列毛主义的同时，人民创建了人民军队，人民军队帮助建立了人民政权，而人民政权帮助党和军队发展壮大。随着党、人民军队和人民政权的不断壮大，人民越来越多地参与政治工作和人民战争。在丹达卡兰亚，这一战略实践继续作为我们的基本和核心实践。这一战略上的努力应该成为我们所有实践的重点。

在帝国主义和印度统治阶级深陷经济危机无法自拔的灾难性局面中，他们正受到国内发展中的人民战争的威胁。他们正在实施低烈度冲突政策来对付人民战争。

就丹达卡兰亚的情况而言，他们正在迅速改变战术，因为他们之前用来反对人民的每一种战术都失败了。在帝国主义的大力支持下，在印度军队的全力

协助下，在安得拉邦灰狗小队的帮助下，他们得到了准军事部队和邦警察部队前所未有的协调配合，对我们发起攻击。反动统治阶级采取镇压新生政权的策略，选择了丹达卡兰亚作为进攻的重点。

反动统治阶级为了有效地执行其低烈度冲突政策，利用现代手段建立了特种部队、专门的情报机制和恐怖团伙。他们正在进行心理战，从思想上和政治上分散人民的注意力，把人民和革命阵营搞混，再把它击得粉碎。他们正在采取无休止的欺骗手段。为此，他们正利用改革、媒体、或旧或新的虚假非政府组织、宗教团体和一切反动团伙。他们调动一切资源，将政府所有部门置于警察部门之下，在各个领域组织集中攻势。他们残酷地镇压那些提出革命要求的人，他们自己也虚伪地关注这些要求。他们从微观上研究可能有利或不利于反革命战争的每一个细节，努力把有利因素发挥到极致，把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或彻底铲除掉。为了使他们每次的反动行动都正当合法，他们把任何支持革命的行动都说成是非法的并加以镇压。他们正高速实现所有领域（武器、通信、运输、安全、记录的保持、宣传、决策、实施、协调等）的现代化，以便通过发动高科技战争取得有效成果。如果我们必须用一句话来解释低烈度冲突政策，那就是一种利用高科技和无尽的欺诈以最残酷的方式进行镇压的反动战争。

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敌人把低烈度冲突发展成一场彻底的反动战争，作为他们战略和战术方针的一部分。然而，在我国的反人民战争中，他们根据我国的具体情况对低烈度冲突政策进行了修改并加以实施。为了解放丹达卡兰亚、保卫和壮大丹达卡兰亚建立的人民政权，我们也应该在各个领域努力发展我们的战争，以适应如今新的战争形势。安得拉邦革命运动给我们最大的教训之一是一一我们应该根据新的战争形势做好准备。由于我们没能在安得拉邦做好准备，运动在那里遭受了挫折。或者说，这也是我们在安得拉邦受挫的主要原因之一。

我们将必须进行一场全面战争以对抗敌人在丹达卡兰亚的低烈度冲突战。如果我们想要有效地对抗敌人，解放丹达卡兰亚，就必须根据新的战争形势，在思想、政治、军事、心理、组织、经济、文化、生态等全方面发展战争。目前，我国的人民战争处于战略防御阶段。在这种情况下，要把我们今天的战争发展成一场有正确、全面计划的全面战争是不容易的。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和丹达卡兰亚特区委员会必须非常努力地解决这个最复杂的问题。不过，如果我们中央和丹达卡兰亚得领导层动员全党、人民解放游击军、人民团体、人民政府和人民来解决这个问题，这并非不可能。这是我们党今天面临的一项至关重要的政治、军事、组织任务。

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另一项至关重要的政治、军事、组织任务是把人民战争的骨干力量，即人民军队（目前是人民解放游击军），发展成一支有效对抗敌人反动战争的战无不胜的军队。

我们党、军队和人民政府的领导层在执行这些重要的政治、军事和组织任务时所取得的成功或失败，将对丹达卡兰亚的革命运动产生长远影响。因此，为了成功地推进人民战争，解放丹达卡兰亚，我们必须根据新形势把人民战争发展成全面战争，来对抗敌人反动的低强度冲突战。目前，丹达卡兰亚的条件

对这此有利。

同志们！

到目前为止，我们在当下以解放丹达卡兰亚为目的的人民战争中取得的成就是相当大的。丹达卡兰亚的解放将带来印度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巨大变化，为了取得解放丹达卡兰亚的更大胜利，我们必须从全印度的角度明确分析我们的新政权面临的有利和不利条件，并制定策略。

有助于推动丹达卡兰亚解放斗争的有利条件如下：丹达卡兰亚人民已尝到了政权的好处；革命的主要力量相对较强；斗争处于更高层次；安得拉邦的正面和反面经验摆在我们面前；这个国家的人民战争仍在继续。不仅如此，我国和世界上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以及工人阶级进行的斗争对我们争取实现目标取得胜利是非常有利的。

虽然存在这些对运动的推进有利的条件，但是我们在以下方面面临着局限：人民政府的力量、群众基础、军事实力、我们运动的范围、这场运动从全国和其他国家获得的帮助和支持、我国运动较强大的区域。此外，安得拉邦运动的挫折、我们党遭受严重的领导层损失、丹达卡兰亚成为敌人进攻的重点等，都是制定战术时应该牢记的实际情况，我们应该做好艰苦战斗的准备。

我们已经从战略角度确定了解放丹达卡兰亚的以下任务：扩大和加强党、人民军队、人民团体和人民政府，并提高它们的质量；统一战线，利用敌人之间的矛盾，把自发的群众斗争发展为巩固的斗争；教育、训练、武装、保护我们的主要力量；整风等。所有这些任务都应该有计划地执行。我们必须努力把一切政治、军事、组织、教育等活动更协调地开展起来，我们必须利用新政权——人民政府成功地完成这些任务。

同志们！

我们必须学习我国革命历史上无产阶级领导的夺取政权的一切积极经验，特别是政权机关的积极经验，以获取巨大的力量。让我们为丹达卡兰亚的解放而英勇斗争，汲取所有为了夺取政权而牺牲了宝贵生命的有名和无名烈士的牺牲精神。我们的目标是崇高而伟大的，我们的道路是曲折、艰难、遥远的，但是我们接受的马列毛主义是科学的，我们选择的持久人民战争道路是战无不胜的。我们所有的力量，在于人民的力量。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统治者不过是纸老虎。让我们在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毛主义战略战术原则，即战略上以一当十，战术上以十当一，坚定地争取丹达卡兰亚的解放。我希望你们正在推出的《人民政府》杂志将成为实现这一崇高目标的有力工具。我衷心祝愿你们的事业取得圆满成功。

致以革命的问候！

印共（毛）总书记贾纳帕蒂
2009年，列宁的生日（4月22日）

四

采访穆拉里同志

穆拉里同志最近刚从监狱获释，入狱前他是印度共产党（毛主义）政治局委员，负责西南地区局。

这是经过授权的副本。

在纳萨尔巴里、卡里姆讷格尔和阿迪拉巴德遭受挫折后，农民运动于 1978 年在安得拉邦开始。在此期间，党决定在 1977 年组织一次“下乡运动”。因此，1978 年在特伦甘纳邦和安得拉邦沿海地区，安得拉邦学生联盟和激进青年团的青年学生以及党的专业人士组织了以“下乡运动”为形式，为期 10 天的政治学校。在村一级，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被提上议程，通过小册子、海报和集会向村民发出呼吁。封建地主和农民之间存在着以阶级斗争为形式的强烈矛盾，长期的人民战争需要朝着建立解放区发展。

根据丹达卡兰亚（阿迪拉巴德，东戈达瓦里和维沙卡的机构，早些时候都在丹达卡兰亚之下，现在随着运动的扩大，从战略角度着眼，阿迪拉巴德，东戈达瓦里和维沙卡从丹达卡兰亚分离了）的计划建立解放区，为此目的出动了 7 支队伍。

队伍进入瓦朗加尔后，坎曼和尼扎马巴德的阶级斗争随着卡里姆讷格尔和阿迪拉巴德的斗争加剧。在队伍的领导下，阶级斗争在丹达卡兰亚展开。1984 年，我们试图在丹达卡兰亚设立一个委员会，即森林联络委员会，来协调这一运动。1987 年选举出了一个邦级委员会，但是由于没有中央级别的委员会，它在安得拉邦委员会下面工作。在现在的丹达卡兰亚成立之后，我的意思是在 1995 年，有一个叫做特区委员会的森林委员会。

在丹达卡兰亚，四个地区即东部、阿迪拉巴德、巴斯塔、加德奇罗利的情况各不相同，因为不同的邦剥削的程度不同。

1、在阿迪拉巴德，在冈德阿迪瓦西斯地区，那里有马哈詹，他们通过放高利贷收取高额利息并攫取农民土地。

2、加德奇罗利那里没有太多来自放债人的剥削，但是它来自林业部门。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矛盾，但最主要的矛盾是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矛盾。

3、在巴斯塔，有土地问题。这里有人民内部矛盾，也有和林业部门之间的矛盾。这里的剥削比阿迪拉巴德少。虽然部落中存在阶级分化，但是这里的矛盾并不像特伦甘纳平原地区那样尖锐。这里已经是阶级社会，但是由于部落传统，不同于平原地区的剥削，穆基亚/教区的剥削不那么尖锐，因此主要的矛盾是政府与人民之间的矛盾。

4、维沙卡/东戈达瓦里——在这里，地主与人民的矛盾和政府与人民的矛盾是显而易见的。在土地问题方面是穆基亚与人民之间的矛盾，人们会说，部落酋长凭借他们的地位总是拥有最好的土地，而人民只有不太肥沃的土地。因此，在 1987 年，党发出号召，领导了分田地的斗争。

正是在这一时期，人民被发动起来，政府的干预也增加了。

先是佩迪·尚卡尔同志在 Moinbinpet 的加德奇罗利牺牲，然后在队伍进攻之后，镇压也随着人们被逮捕而愈演愈烈。不同地区的防备程度有所不同，但尽管如此，镇压在东部和阿迪拉巴德很常见，而在巴斯塔和加德奇罗利比较少，党不得不在深呼吸般的镇压中前进。

群众组织开始建立，最初有农民组织，妇女也参与其中，后来还建立了独立的妇女组织来解放她们。党动员人民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关于收集天度叶的劳动率。在这个落后地区，承包商过去支付的费用比政府规定的要低得多。与此相反，1981 年以后，党开始进行大规模动员。后来，党还围绕封建主义和马哈詹在这一地区的剥削问题进行了动员。这样，党把斯里卡库拉姆和纳萨尔巴里斗争的光辉历史发扬光大了。

禁止非原住民在阿迪瓦西斯地区购买土地的 1/70 法案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闹剧，因为当时非部落的富农或地主已经获得了数千英亩土地。阿迪拉巴德和其他地区在这个土地问题上发生了激烈的斗争。正是在这段时间，随着阶级斗争的推进，党领导下的数千英亩森林土地也被重新占领。

镇压也在同期进行，1981 年 4 月，邦警察无情地向因达拉维利集会开火，许多人在那里牺牲。但是，尽管受到了镇压，这场运动还是在逐步地推进。所以，在各个领域就各种不同问题开展了动员和斗争，如林地、造纸厂工作的劳动率、马哈詹的剥削等。

直到 1985 年，在许多地区斗争已经扩大，因此政府为了镇压这场正在兴起的运动，制定了更大的计划来破坏它，特别是在安得拉邦，是未经宣战的反人民战争。大约在同一时间，在丹达卡兰亚地带，我指的是安得拉邦部分地区，警察的镇压以不分青红皂白的遭遇战和逮捕的形式开始，导致了巨大的损失。但是运动在丹达卡兰亚发展，在这种镇压下呼吸。

特别是在丹达卡兰亚委员会和安得拉邦委员会的领导下，夺取帕塔土地的运动在 1991 年愈演愈烈。随着围绕土地问题形成势头，政府制定了镇压、酷刑、消灭武装队伍的计划。

（此处文本已损坏：……

……1990 年，面对政府的各种攻击，这场运动继续推进，甚至得到了扩大。最终中央组织委员会解散了，成员们最后加入了人民战争集团。）

特别是，如果你看看加德奇罗利运动，大量阿迪瓦西斯人民被动员起来。这最终导致马哈拉施特拉邦警方逮捕了数百人，甚至包括知识分子。到 1993

年，随着党的发展，农民运动和妇女运动得到加强，数以千计的群众被动员起来。当时的首席部长沙拉德·帕瓦尔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镇压来对付人民。在一年之内，有 60 名成员牺牲。与此同时，在巴斯塔，政府的镇压和遭遇战也在增加。最终，安得拉邦和马哈拉施特拉邦的镇压都加剧了。

在这种背景下，东戈达瓦里和维沙卡有超过 106 个村庄在这里被烧毁，造成了白色恐怖的气氛。在许多地方，安得拉邦公民自由委员会和安得拉邦的知识分子试图募集资金，并通过派遣事实调查小组来帮助部落。尽管 N·T·拉马·拉奥凭借民粹主义的口号上台，自诩为民主主义者，并向纳萨尔派示好，但是在成为首席部长之后，他仍像以前的政府一样，继续进行猖獗的镇压和恐怖行动。

在党来到这里号召进行人民战争之后，运动就朝着建立解放区的方向发展。但是直到 2000 年，党才更具体地作出了加强人民战争的决定，从那时起，农村游击战争发展迅速，革命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1980 年，扬·米尔达同志熟悉的钱德拉·普拉·雷迪集团分裂成了 Prajapantha 和 Janashakti，后来又分裂成 Pratighatana 和 Prajapratighatana，到现在这个派系的一些集团到处都是。印共（马列）新民主主义变成了一个合法的政党，实行修正主义的政党路线。它在议会选举中只有一个席位，现在连这个席位都没有了。Janashakti 在被残酷镇压后遭受了损失，此后也在路线上裹足不前。

监狱——革命的另一战场

政府多管齐下的进攻已经消灭了我们的战略领导，为此政府已经制定了许多计划。他们的计划多半是利用假遭遇战。有些逮捕行动如果是在公共场所进行的，那就难免碰上遭遇战，戏剧、法庭和司法部门都是精心策划的，由于邦和中央彻头彻尾的合谋，整个司法体系和刑法条款都显得无足轻重。特别是，毛主义者囚犯面临大量压迫和酷刑，甚至被锁链拴住超过 24 小时，或者根据法院判决关押在单人牢房中。马哈拉施特拉邦、恰蒂斯加尔邦、安得拉邦的情况大体相似，不过后者监狱和法院系统相对好一点，其他地方则普遍存在着不人道的条件。特别是在马哈拉施特拉邦，那里有数以百计的监狱，队伍成员、党员、民兵和邦委员会委员仍然留在狱中，有些甚至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被关押了 3-5 年。钱德拉普尔、阿马拉瓦蒂、那格浦尔和孟买这些地方是最臭名昭著的。

在恰蒂斯加尔邦，赖布尔、杜尔格、杰格德尔布尔和比拉斯普尔是最臭名昭著的，500 多名毛主义者，包括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分区委员会和其他的同志被关押在监狱里。除了安得拉邦有一些支持人民的律师，其他邦的大多数律师只是警察体制的附庸。

在基础设施方面，比如食物和饮料，监狱里的条件非常糟糕。为了在心理

上持续施压，他们不被允许与外界交流。男性和女性囚犯被分开关押，并拒绝为他们提供笔、纸等物品。在监狱条件和逮捕期限方面，不同邦之间进行了协调，一旦规定的监禁日期将满，囚犯就被转移到其他邦，并对他们提出新的指控。囚犯不得与他们的亲属见面，而亲属也会受到骚扰并被遣返。来自外界的信件无法送达，犯人也没有权利给自己的通讯员写信。例如，党给被关押在博帕尔的五名同志写了几封信，但是在过去的三年里，他们连一封信也没有收到。尽管有一些囚犯被释放，但是根据第 110 条，他们又被再次逮捕，在加德奇罗利被释放的人就是这样被抓回监狱的。

更值得注意的是，冈迪亚分区的地区委员会委员曾 5 次获释出狱，每次都再次被抓捕入狱。这样的案件有六起，邦委员会委员马丹拉尔同志被关押在恰蒂斯加尔邦，期满后被转移到了马哈拉施特拉邦，再次期满后，他又背负着 14 个新罪名被带回到恰蒂斯加尔邦。

案件还没有得到审理。我和阿伦·佩雷拉同志在那格浦尔监狱绝食抗议了 27 天，最终迫使高等法院下令加快审理我们的案件。但是两年半之后，即使主要案件已被宣判无罪，在规定的日期到 12 月 16 日之前，阿伦·佩雷拉的其他 8 至 10 项罪名仍被推迟审理了。

现在，由于安得拉邦阶级斗争、群众斗争和公民自由斗争的推进，人们可以看到情况有所不同，但是政府的性质和特点并没有什么根本的不同。对于普通囚犯和纳萨尔派囚犯面临的问题，一个论坛建立了起来，并在其领导下发起了几场运动。当国大党政府发布释放令，泰卢固之乡党通过高等法院下达了中止令时，这一做法遭到了毛主义者和 Janashakti 囚犯的强烈抵制。正是因为这样的斗争，安得拉邦监狱的情况才有了一点变化。2008 年 9 月、10 月再次发生了斗争，在瓦朗加尔监狱，几名普通囚犯因缺乏维生素 B1、B2 而死亡。赢得单独厨房权利的毛主义者囚犯以及同他们在一起的 Janashakti 囚犯的饮食条件较好，而普通囚犯的口粮却被剥夺，导致 22 名囚犯饿死。一个全监狱的罢工号召引发了一场大规模运动。11 名普通囚犯被处置后，2008 年在巴利梅拉又爆发了另一场运动，是在反纳萨尔派的灰狗小队遭到伏击之后。大规模的罢工和运动最终迫使政府承认绝食抗议，绝食直到派出了一个代表团后才停止。

因为这样的运动，一些监狱的条件有所改善，但是其他监狱的条件仍极其艰苦，甚至连最基本的设施都被剥夺了。就法庭每日提供的资金而言，安得拉邦的囚犯只能拿到 40 卢比，其他邦的囚犯甚至连 20 卢比都拿不到，这还得按 10 到 15 年前的币值来算。特别是毛主义者囚犯，他们不仅受到莫须有的指控，而且被关在单人牢房里受到严刑拷打。即使在获释后，通过邦之间的合作，他们还是会被再次逮捕，然后送往其他邦的监狱。甚至连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权利也被剥夺，这使得情况变得极其困难。

在全印度的层面上，铭记对毛主义者和纳萨尔派囚犯的镇压，我们必须通

过发动普通囚犯进行全国性的战斗。这样的动员可以解决一些问题。

在选举期间，所有政党都承认纳萨尔派出于社会经济原因而战斗的现实，但是上台后他们全都不肯承认政治犯的地位。

中央委员会委员维杰达同志、巴伦达同志、舒巴迪同志和许多其他同志即使在保释后仍被拘留。巴伦达同志被拘留了 3-4 次，甚至在《非法活动（预防）法》还不存在的时候，就把《非法活动（预防）法》里的罪名强加给他。舒巴迪同志甚至在她从鲁吉拉案中获释后，仍被扣押回贾坎德邦。维杰达同志在海得拉巴案中获释后，再次被转移到恰蒂斯加尔邦的赖布尔监狱，并在狱中度过了 6 年，现在他已经 70 岁了。维杰同志、钦坦·基肖尔同志、贾纳德汗同志和阿舒托什同志都还在隔离牢房里受苦。

在纳萨尔派面前，政府宣称的所有民主都变成了笑话。监狱里的同志们面对酷刑，只是在为基本的权利而战，马拉蒂同志和吉塔同志被残忍地殴打，但是他们仍然勇敢地继续抗争。对尼玛拉蒂的指控是虚假的，她被关押在杰格德尔布尔监狱，受到 139 到 140 起案件的指控，多到以至于地区警察总监甚至公开威胁说，有许多案件对她不利，相当于宣判她终身监禁，还有大约 40 起案件的指控是针对她丈夫的。帕德玛同志在杜尔格被逮捕，并在谋杀案中被宣判无罪，但是又有五起新的不实指控对她提出，她被关押在杰格德尔布尔监狱。即使是最高法院或高等法院的命令也从未得到执行。

安得拉邦、西孟加拉邦、比哈尔邦和贾坎德邦的情况令人感到非常痛苦。斯里尼瓦斯同志在安得拉邦被捕，遭受酷刑，双手都被打折了。法官冷酷无情地说，这样的事情在审讯过程中是会发生的。有 27 起针对他的不实指控，其中包括对他在狱中策划阴谋的指控。潘杜·兰加·雷迪同志，地区委员会委员，有 40 起针对他的指控。在安得拉邦有 50 到 70 个案子，他们已经在监狱里待了 3 到 4 年。

司法系统的状况就是这样，即使是出类拔萃的律师也会受到威胁，他们的晋升也会遇到障碍。安得拉邦发动了一场法西斯压迫，而在其他邦，情况则更加明显的是法西斯主义。5 名同志被荒谬的同科拉普特袭击联系在一起，从奥里萨邦转移到了泰米尔纳德邦。安得拉邦的一名律师前往博帕尔时遭到严重骚扰，但是当他坚定要去时，酒店老板受到了威胁，要清空他的房间。多年来，印度政府继承的殖民遗产在其刑罚制度中得到发扬光大。在所有的邦，都有一个共同的故事，那就是不实的指控被提出，并通过授权要求法院羁押某人，裁决受到影响，很容易羁押。之后，这个人被带到另一个地方，以调查为借口在那里被迫接受审讯。当他被带回法庭的时候，他又因 20 到 25 项指控被关进了监狱。

很明显，警方对它的这些不实指控并没有信心。在我被捕之后，我同样被带到了法庭上，警察总监提出了 21 条罪名。我以拘留的名义被带走，并被指控在比哈尔邦、贾坎德邦、西孟加拉邦和卡纳塔克邦犯有重大阴谋和谋杀罪。

所以，另一份详细的清单被列出，没有任何一件在安得拉邦发生的案子。我甚至被指控在贾坎德邦谋杀苏尼尔·马哈托，罪案调查科的人找我进行审讯，他们完全清楚我根本没有参与，只是因为他们的上司要求他们这么做。

所有这些障碍和武器都被用作印度革命道路上的阻碍，这是政府的全面阴谋。即使最高法院下令，一旦犯人被判无罪，就不能再对他或她提出新的指控；即使高等法院下令加快审理案件，它们也不会得到执行。

一套实际上的警察统治和法西斯制度正在运转，尤其是针对监狱里的毛主义者囚犯，同志们甚至不被允许自由发言或发表声明。当我的母亲来到法庭时，她要求我立即回家。在我告诉她我已经为革命工作了 30 年，不能立即回家的时候，所有媒体都在报道这件事。所以媒体的声明是由政府决定的，在安得拉邦或者其他邦都是如此。

2004 年团结大会通过的党的章程的第五章“党的组织制度”中解释了穆拉里在接受采访时没有正式职务的原因：

“（i）如果会员被逮捕，他/她将被免除所有责任，并对其进行观察。根据其在被敌人拘押期间、监狱中或释放后的行为，决定是否保留或取消其党员资格。如果保留，他/她将被他/她在被捕前所属的党委接纳进入，除非该党另有决定。”

但是由于穆拉里受到党的正式委托，向我们介绍党的早期历史，这段观察期似乎已经结束。

五

采访索努同志

据媒体报道索努又名马洛朱拉·科特斯瓦拉·拉奥，而且是丹达卡兰亚特区的负责人。

这是经过授权的副本。

无论扬·米尔达和高塔姆·纳夫拉卡同志走到哪里，都首先受到当地同志的热烈欢迎，并作了介绍。

丹达卡兰亚包括安得拉邦、恰蒂斯加尔邦、奥里萨邦和马哈拉施特拉邦，村庄和森林覆盖了组成丹达卡兰亚的这4个邦的边界。丹达卡兰亚这个名字不是党起的，这个名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神话里。据说（《罗摩衍那》里的）罗摩被流放时就住在丹达卡兰亚森林。当前在丹达卡兰亚，党有10个分区正在工作。到目前为止，党正在向丹达卡兰亚以外的地区扩张，例如曼普尔和马恩普尔分区。直到2004年，只有老巴斯塔和加德奇罗利属于斗争地区。后来，曼普尔和马恩普尔加了进来。为了方便协调，巴斯塔地区被划分为6个分区，而加德奇罗利被划分为2个分区。这些分区同曼普尔和马恩普尔一起，形成了总共10个分区。在整个丹达卡兰亚地区，科亚、多拉部落是主要的阿迪瓦西斯社区。其他部落包括亥比、巴特拉和普拉丹。一些达利特地区以及马哈拉施特拉邦的马哈尔社区也属于这一地区。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非阿迪瓦西斯社区，如萨胡。科亚和多拉社区统称为冈德，这就是为什么叫冈德瓦纳。中央邦、恰蒂斯加尔邦、马哈拉施特拉邦、安得拉邦和奥里萨邦的冈德人口总计有700万。在这里，我们丹达卡兰亚正在工作的10个分区的总人口约为450-500万，分布在约6万平方公里正在进行运动的土地上。

从公元前的历史开始，这里的人民一直是具有反抗精神和敢于斗争的。在历史上，甚至在英国人到来之前，当然也是在殖民时代，这些人民发动了几次大规模起义。从1825年到1964年，人民在各种力量的领导下起义了10到11次。1964年，在他们王公统治下的巴斯塔人民最后一次与尼赫鲁政权作斗争。在经历了10-15年的平静之后，我们在20世纪80年代初进入了这个地区。纵观其历史，这个地区的人民反对对他们土地和生计的剥削。他们按照印度盛行的部落传统过着民主生活。

穆拉里同志已经对这里自1980年以来的党的早期历史进行了充分的介绍。1989年，一个全丹达卡兰亚地区的阿迪瓦西斯农民组织成立了，叫做“丹达卡兰亚原住民农夫和劳工协会”。在这个组织的领导下，男人和女人都为土地权利而战，尤其是无地农民，他们团结在了“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下。目前，它的成员人数接近10万。后来在1991年，旨在解放妇女的妇女组织“革命部落妇女组织”成立。目前，它有10万名成员。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成为丹达卡

兰亚最重要的党。2004年，意识戏剧论坛成立。现在它的成员人数超过了1万，我认为它是印度最大的革命作家和艺术家的组织。

我们在这里努力团结群众，取得了很大的成果。由于这里的人民受邦森林部门和部落首领压迫的历史很长，他们自然表现出了兴趣。不过一开始花了一些时间使人民建立了对党的信任。但是最终一旦实现这个目标，就是巨大的成功。在这个地区发起的第一场斗争是反对森林部门，主要问题是土地问题。森林部门凭借它们的权力拥有大量的土地。最初，尽管部落首领和人民之间存在矛盾，但是人民还不愿反对他们，因为他们对党没有信心。他们担心党如果抛弃了他们，他们将面对部落首领的报复。因此，在最初的几年，我们把整个部落与森林部门的矛盾作为主要问题。当他们观察到我们在与政府斗争的过程中付出的牺牲和体现的诚意，人民就把他们的内部矛盾告诉了我们。由于土地问题是最严重的问题，所以这也是党最重视的问题。今天这里几乎没有失地的农民，但刚开始的时候是有相当多失地农民的，他们赢得了30万英亩的林地。所以村里的第一场斗争是仅仅围绕土地运动展开的。部落首领掌握着大量的土地，但是一旦这些土地与林地分给了人民，该地区的生活水平就会上升。在最初的几年里，这里的食物都有污垢，而现在他们一天吃两顿饭还拥有土地。反对森林部门的斗争和反对部落首领的斗争结合在了一起。

但是与此同时，政府的镇压也在加剧。那时候村民们已经确信农会是他们自己的组织，每个村民都以一种传统的形式参与其中。阿迪瓦西斯人集体参与的老传统被党运用来实现革命目标。既然他们自己开始认识到组织和党的优越性，那么人民的思想水平就得到了提高，达到了能清楚地划分人民与部落首领之间的矛盾和人民与政府之间的矛盾的程度。因此，他们也非常清楚联盟关系，首领们站在政府一边，而党站在人民这一边。

这时，人民意识到，如果他们要维护这片土地上属于自己的权利，他们就必须战斗。否则，政府和首领们不会放过任何夺回它的机会。因此，党也明确指出，只有武装起来，才能保持自己的权利。

就在那时，1990-1991年“一月觉醒”运动几乎不出意外地开始了。部落首领失去了土地以及他们的传统地位，农会逐渐取代了他们。因此自然的，政府和部落首领一起密谋，以“一月觉醒”运动的形式组织了第一个白色恐怖运动。同时这是党的招募人数增加的好时机，这表明了所有这些发展都是相关联的。

因此，这是丹达卡兰亚运动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期。白色恐怖始于1990-1991年，丹达卡兰亚达到地区层次的农民和妇女组织以民兵形式招募的人数也在增加。就在1991年的一年之后，马哈拉施特拉邦开始了严酷的镇压。1991年至1994年，数十人在加德奇罗利和巴斯塔未经宣战的战争中牺牲。

政府显然不打算容忍人民运动。就在这个时候，党作出了反抗政府的决定。正是从那时起，开始进行反抗政府军的行动。1987年，反抗政府的行动在安得拉邦开始。到1991年，它已经始于丹达卡兰亚，游击区开始发展。同时党的计划也相应地再次扩大，因此在1989年，15-20名同志被派往印度中部。到1995年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时，党在丹达卡兰亚的招募民兵和设置埋伏方面已经取得了极大的进展。传统的酋长们或多或少受到了压制，到目前为

止，所有的农村问题都被交给了农会，这是一种以最明确的形式进行的权力转移。传统的首长制度和政府的潘查亚特制度都在崩溃，甚至连 patwaris（村级土地记录官员）也不再来村里收租子。目前唯一活跃的系统是农会。党察觉到了权力真空，一个新政权必须填补政府的空白。

到 1994 年，建立人民权力机关的决定正式出台。后来在 1995 年举行了全印度特别大会，党统一派了一个兄弟代表团来。党也批准了建立权力机关的决定。到 1996 年，建立一个新的人民政权的工作已经开始。农民发展农业生产的速度迅速提高。当时的人民政府在该地区集中力量解决的主要问题是极度落后的农业。之所以集中力量发展农业，是因为在整个巴斯塔和加德奇罗利地区，根据政府记载只有 2%的土地进行过灌溉。村里也开始建造灌溉水池用于农业发展。这也促成了人民之间新的团结。随之出现了一种新的现象，即合作制度的发展。3-4 个家庭开始一起耕作。即使在建房或者做其他工作时，也会出现由 11 名成员组成的互助组。除了农业活动外，这些劳动互助组还开始参与其他集体工作，如拾柴和其他 10-12 项工作。

这些劳动互助组，是按阶级成分组建的。如果把贫穷农户和富裕的农民组在一起，就意味着当贫农耕种自己的土地时，季风就已经过去了。合作制度使得农民逐渐有了集体和团结的意识。现在农民有土地了，还有了一些灌溉设施，这样就可以显著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招募到的人数也会成倍增加。

随着人民政权的巩固，政府以名叫“一月觉醒运动”的第二次白色恐怖运动作为回应。马亨德拉·卡尔马，他的父亲是英国人的走狗，也是一个大地主。他在 1990-1991 年领导了第一次白色恐怖运动，1997 年这次他又领导了这场运动。正如列宁正确指出的那样，随着权力从掌权的旧封建领主手中失去，阶级敌人也以十倍的力量进行反击，这是我们在这里清晰目睹的。

2001 年，在和党统一共同召开的党的九大上，全党对根据地和人民军队建设的认识有了新的发展。经过充分讨论，决定让我们建立游击根据地。基于 2000 年 12 月 2 日早已形成的相同观点，人民游击军成立了。2001 年以来，第一个根据地的建设必须从更具体的角度进行分析，对此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思考。相应地，在游击区内，游击根据地开始建立。因此，依靠地形和群众基础的支持，人民政权的建设终于有了具体的形式。村里的 500 到 3000 人组成了革命人民委员会。人们认识到，没有人民军队，就无法保卫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人民政权是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进步的认识，对人民军队和人民政权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帮助。每个分区有 2 到 3 个据点，10-12 个据点组成游击根据地。MAAD 地区成为中央游击根据地。

在作出这一决定之后，就开始朝着这个方向努力。第一步是创建村级革命人民委员会，第二步是在每个地区的根据地创建地区革命人民委员会。2004 年的 12 月，第一个地区革命人民委员会成立，到了 2005 年 2 月，第二个地区革命委员会成立了。从 2005 年开始，直到 2008 年，地区革命委员会覆盖了所有据点。

党的决定是在每个正在发展的分区至少建立三个地区革命人民委员会，现在还建立了分区政府，第一个分区政府成立于 2007 年 3 月。在游击根据地发展初期，相应的军事编队是排，现在随着分区政府的发展，连在军事层面形成。

为了促进这一过程，我们已经建立了地区级别的政府筹备委员会，地区级政府将要形成。同时在军事方面也有所进展，营级单位正在建设中，第一个营于2009年8月10日组建。

在村一级，成年人拥有人民政府的选举权，之后在更高级别上是间接选举，同样的过程也适用于地区级委员会。考虑到丹达卡兰亚地区主要居住着阿迪瓦西斯人民，他们在新政府的治理经验有限，2008年2月召开了第一次关于这个问题的研讨会。这是一次非常成功的尝试，因为党和人民可以自由地交流经验和意见。另一方面，更高级别的人民政府正在形成。

我们现在正在更积极地呼吁抵制议会选举。在2008年11月的恰蒂斯加尔邦议会选举、2009年4月的第15届人民院选举和2009年10月马哈拉施特拉邦议会选举中，我们看到了在人民政府领导下，人民积极地集体抵制选举的运动的稳步发展。所有革命人民委员会在其所在村庄召开公开会议，并告诉人民，他们已经选出了自己的政府，怎么能同时在外面的选举另一个政府呢？所以，所有人都自发抵制了资产阶级议会选举。

在这些人民政府发展的同时，以保卫人民政府为目的的人民民兵也在稳步发展。我们的军事力量在不断增强，因此，在每次选举中，政府的准军事部队都试图对群众施加压力和威胁，而群众实际上已经登记加入了人民解放游击军和民兵。

最近在整个巴斯塔的斗争地区，只有2%-5%的选民投票。例如，在戈贡达，选举期间有700名选民和1000名准军事人员。正如资产阶级媒体自己展示的结果那样，即使经过了这样的安排，也只投了10张票。这也是在第三次投票后，完全暴露了资产阶级议会选举与该地区的人民毫不相干。

随着人民政府上台，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议会选举。这是克什米尔以外唯一一个投票率很低的地方。抵制选举如此成功，这无疑对该邦构成了威胁。

在征兵方面，人民解放游击军从2001年起一直在征兵。然而，随着人民政府的出现，招募的职责已经移交给革命人民委员会，因为人民军队现在由人民政府负责。如今，村一级正在鼓励人民加入人民军队。例如2008年12月，甘加卢地区的革命人民委员会在两个不同的地方举行了两次公开会议，有超过一万人出席，地区革命人民委员会主席号召参加人民解放游击军。仅在这两次公开会议上，就有近100名青年志愿加入人民解放军游击军，并在党审核后从中招募了60-65名成员。

丹达卡兰亚地区的所有发展现在都由人民政府负责，它正在集中精力解决人民的问题，衰弱的资产阶级议会政府正在被不断强大的人民政府所取代。革命人民委员会原来有7个部门，后来又增加了两个工商和公共关系部门。我们还努力确保妇女参加人民政府并且确保妇女在政府中占50%的名额，我们仍在这方面努力。虽然到目前为止进展不大，但是我们正在努力扩大它。革命人民委员会的每个部门负责不同的领域工作，主要是农业部、教育文化部和医疗部最有效地促进发展。现阶段我们不会向人民征税。按照四个阶级联盟，目前中小资产阶级正在为农业发展、医疗以及学校建设纳税。我们现在依靠的是从人民那里筹集的资金，这些资金是从农业生产和林业生产中累积的最低份额。尤其是国防部，它为民兵提供闪光灯、火药、弓箭等基本防御物资，人民政府正

在承担责任。我们都处于战争状态。所以为了保卫人民和保卫人民政府，我们把重点放在了国防部和民兵上。

随着穆基亚的传统特权和政府的潘查亚特制度的衰落，人民政权正在扩大。这两个政权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1997年，马亨德拉·卡尔马在政府的全力支持下，直接与村里的首领结盟。在这场白色恐怖运动中，许多当地同志遭受酷刑，许多房屋被烧毁，人民收到公开的威胁电话被威胁投降。例如，我们当地的一位同志在公众集会上被公开杀害，制造出一种恐怖气氛。

我们也发展了一支小队级别的军事力量，并采取行动打击人民的敌人。维迪尔村的马萨是一个凶残暴戾而臭名昭著的村长，他被作为人民的敌人消灭了。就这样，选定一些敌人杀死，这让其他人犹豫不决，而许多人向人民投降，这一阶段持续了6-8个月。

同样在1997年，第二次白色恐怖运动也是由反动势力在政府的充分保护下发动的。又一次地，被选中的敌人受到了惩罚，而其他人在人民面前被揭露了出来，许多人投降了。

然而于2005年6月5日开始的，被称为“和平行动”的袭击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与上两次运动不同。上两次运动基本上是当地政府组织的，而这次运动则是当地政府，邦政府和中央政府协调规划的产物。邦警察和中央准军事部队，以及当地和平行动的暴徒分子都被派来对付人民，并且将持续很长时间。自2004年党合并以来，人民运动不断发展壮大，于是成为了政府的主要目标。正是在这个时候，曼莫汉·辛格将毛主义政党视为国家唯一的最大威胁。因此，和平行动完全是一场预先考虑、协调和计划好的进攻，以粉碎正在崛起的人民政权。

从2005年6月5日到12月，白色恐怖达到了顶峰。特别是巴伊拉姆加和比贾布尔是主要的袭击目标，整个过程中至少有644个村庄被摧毁。按照政府的记录，有30万人流离失所。只有6万人占被安置在33个集中营或所谓的“救济营”中。而剩下的人怎么样了，政府仍没有给出说法。大部分人民支持我们。当被迫进入集中营的人们过着悲惨的生活时，一场毁灭性的运动正在外面发生。而那些敢回到自己村庄的村民们大部分到了丛林里，因为以不分青红皂白的掠夺、杀戮和强奸形式进行的法西斯镇压仍在继续。

早些时候当我们使用“法西斯”这个词的时候，人们还不能理解它是什么意思。但是和平行动的镇压展开后，人们就理解了什么叫法西斯。党也试图打击恐怖行动，2006年1月，一个具体的反击和平行动的计划开始执行了，人民解放游击军开始有计划地把反动势力作为攻击目标。在这一时期，随着人民民主力量在很大程度上的合作，全国范围内在很多方面取得了积极的进展。政府把和平行动宣传成一场民众独立的自发的运动，一次民主革命，但是党通过开展反击和平行动的行动，彻底揭穿了政府的虚假宣传。

和平行动长期以来一直被政府作为一种反纳萨尔派的有效手段，这在全国范围内受到了成功的挑战。在这里，这是一场关乎阿迪瓦西斯人生死存亡的战争，党明确呼吁人民为了生存下去加入民兵。作为其中的一部分，科亚·邦卡尔民兵组织本着1910年邦卡尔起义的精神于2006年2月10日正式成立。成千上万的人民加入民兵组织，为他们的生存与和平行动开展斗争。人民、人民

解放游击军、党、群众组织、各种运动形成了一个总的大运动，在国内和国际上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党将此归功于国内的民主力量。最后，和平行动在 2006 年 5-6 月正式停止了。

和平行动是政府发起的，旨在于掠夺这一地区的自然资源。随着人民党在 2004 年执政，到 2005 年已经签署了几百个协议。例如在恰蒂斯加尔，德克萨斯电力公司已经投资了 500 亿卢比。在罗汉迪古答，塔塔公司已经获得了大量的土地，在金达莱集团在班西也是如此。最终，这将威胁阿迪瓦西斯社区的生存，这是过去经验证明的，比如 1970 年政府引入日本企业开采拜拉迪拉矿山，结果是日本公司获得了利润，而土著群落的生存环境却受到了损害。政府这一掠夺自然资源的政策是萦绕在阿迪瓦西斯社区的最大威胁。曼莫汉·辛格称毛主义者最大的威胁，但是真正面临威胁的是阿迪瓦西斯人和自然资源。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人民反抗和平行动。事实上，远到那加兰邦和米佐拉姆邦的人民都在抗议政府将他们的部队如那加营、米佐营部署到这片地区。

我们在 2007 年和 2008 年看到的是政府军士气低落。到 2009 年 10 月，奇丹巴拉姆和马亨德拉·卡尔马以及和平行动的其他设计师最终不得不开声明废止和平行动。但随着恐怖行动的失败，政府马上开始动员其镇压性力量，对人民掀起了另一波更加强大的攻势，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绿色狩猎行动。在和平行动期间，政府部署了 1.8 万-2 万部队。而今天，有近 10 万安全部队已被集结来对付人民。所以绿色狩猎行动只不过是和平行动的进一步扩大。这样的恐怖行动不仅仅针对丹达卡兰亚地区，也针对贾坎德邦和比哈尔邦，还有森德拉。

因此，从拉尔噶到苏姜格阿尔，整个原住民地区被矿藏和自然资源环绕着，虽然这片区域被外界称作“红色走廊”，但实际上是一个资源走廊。他们感觉受到了崛起的人民政权的威胁，因此，他们发动了一次又一次攻势。和平行动失败了，现在我们看到绿色狩猎行动又来了。总结一下，白色恐怖开始于 1990-1991 年，那之后我们决定成立人民政府，紧接着是在 1997 年第二次白色恐怖。这之后，我们巩固了革命人民委员会，形成了人民政权的具体形式。然后是和平行动，自那时以来，我们逐渐形成了各级的政府权力机关，通过这些年的发展，在军事上，我们的规模已经从排级扩充到连级，并正朝着营级的规模发展。

关于妇女问题：

在阿迪瓦西斯传统中，妇女就像在平原上一样，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尽管印度教的传统势力还未完全渗透，但是压迫的做法依然盛行。例如，这里的许多地区甚至不允许妇女婚后穿上衣，还有在身上 godna 或 mars 的习俗。但是自从这场运动展开以来，新一代已经停止了这种做法。总的来说，人们可以看到女性比男性做了更多方面的工作，她们不仅帮助耕种，还煮饭烧菜、照顾婴儿、收集丛林产品，因此她们的参与度和支持度要高得多。还有一些有害的传统和社会弊端仍然盛行，如强迫婚姻。

在一些地区，哥图的习俗一直保持到上个世纪末，那里的年轻人晚上还进行公开的性行为。随着党开始在这一领域的开展工作，1986 年不同的妇女组织开始在该地区建立。1991 年，考虑到这个地区的妇女是社会上最受压迫群体的

情况，革命部落妇女组织成立了，她们也感兴趣并参与其中。在人民解放游击军和党里，已经有 40% 是妇女。与克什米尔的 *Daktari Millath* 一起，革命部落妇女组织拥有超过 10 万名成员，是全国最大的具有战斗性的群众组织。当妇女们开始把她们的信仰寄托在党身上时，这场运动开始走向为妇女争取政治权利。至少像强迫婚姻这样的做法已经被制止了，今天，人们也许会说，妇女生活得很有尊严，她们知道，如果有什么问题，有党和人民解放游击军可以帮忙解决。随着这些巨大的变化，我们现在也在努力给予她们更多的政治权利。

剥削妇女和对她们的性侵一直被反动派和安全部队作为镇压的工具，但是这些妇女已经成为了革命性的角色，勇敢地面对所有的攻击。她们不仅送儿女入党，还在家里努力工作打理家务，同时也积极参加了党的工作和其他斗争。

问：有一些非常古老的传统，即使存在恶劣的影响，也需要非常小心地处理。你们是如何处理传统而又不破坏其自主性的？

答：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每当党面对这样的困难时，就会进行自我检讨，并立即向人民道歉。例如，有一种把月经期间的妇女留在村外的文化。村里革命部落妇女组织的妇女们决定让她们留在村子里，这激怒了人民。因此革命部落妇女组织立即对这个问题进行自我反思。每当我们从错误中吸取教训时，我们都会道歉。

关于哥图的性问题，我想说的是，在 21 世纪有一些部落的传统或文化并没有保持其原始和纯粹的形式。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即市场的渗透和随后的剥削已经成为现实。在今天的时代，外人经常利用部落传统剥削妇女，也有使妇女怀孕了，而外人对此毫不负责的案例。受外界影响，纯粹的阿迪瓦西斯传统形式也变得异常了。数千名妇女出来抗议。还有约 5000 名妇女集会抗议这一传统。党立即介入，思考和讨论了这个问题并废止了这种习俗。因此，我们必须在思想和教育层面耐心地处理传统。

例如，这里有一种重视姓氏的传统，同姓婚姻是严格禁止的，因为他们认为是同一位女神。这在很大程度上类似于恩格斯研究的非洲部落。在这里，如果两个马达维人相遇，就会立即产生兄弟般的感觉。党内出现了困难的局面，两个同姓的同志相爱了。我们查阅了与我们情况大体相似的中国的宪法后发现，五代以后可以结婚。但是我们没有进行足够的巩固，而且我们今天遇到的与中国的情况有所不同，我们当时也没有革命人民委员会。这是一个麻烦的插曲，因为它可能使我们脱离群众。我们走近全党和人民，根据大多数意见，我们没有支持。

这个地区也有随意和不计后果地花钱结婚的传统，因为这与地位有关。这导致了浪费和破产。所以党指示，家庭应该在一天内完成庆祝活动，而不是持续两到三天。再说一个，对于每一种食物，无论是蔬菜、*makai* 还是 *mahua*，阿迪瓦西斯人都用来组织庆祝活动，这妨碍了生产关系。所以党召集了这个地区的所有僧侣，询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建议。传统的僧侣们立即合作，建议每年举行六次主要的节日庆祝活动。此外，被迷信习俗裹挟的传统医学知识和各种草药，现在已经被人民政府的医疗部门开发，形成了丰富的资料库。我们

必须记住，取信于民只能通过教育和思想，而不是通过武力。

问：如果战争无法避免，也就是说，如果国家想要矿产资源并企图粉碎人民政权，那么，一直试图让政府退出战争的公民自由组织会扮演什么角色呢？

答：公民自由组织已经达到了伟大的高度，特别是在紧急状态之后和 1977 年以来，他们在这个国家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因为多年来这场运动在这个国家的特点发生了变化，在人民斗争和政府镇压的方面得到了迅速发展。为了有效地介入和做出有意义的贡献，公民自由团体在他们的观点和思想上也必须跟上发展情况的变化。我们还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努力与他们合作，以实现这个目标。现在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发生在民主圈子里，是关于发展的问题。真正的民主人士支持人民的发展，其余的则支持帝国主义或者统治阶级的发展。在我看来，他们是假的民主人士。现在我非常希望，我们以正确的方式做了所有的事情，将赢得真正的民主人士的支持。这也是对他们自己的考验期，谁的思想提高了，谁就会与人民站在一起，反之亦然。

结语：

各地党的领导、人民解放游击军的同志们和人民群众热情地安排了欢送活动，衷心祝愿扬·米尔达同志健康长寿，并向扬·米尔达和高塔姆·纳夫拉卡同志致以最美好的祝福。

两位同志也愉快地发言，感谢全体同志的配合，使这项任务圆满完成。

第二部分

相关作品

在叛乱中心的日日夜夜*

高塔姆·纳夫拉卡

2010 年

在印度，毛主义者一直被外界妖魔化，各种不实的谣言和诽谤充斥于媒体，但我们想要了解真实的毛主义者。对于毛主义者以及他们与政府的这场战争，我们需要回答以下问题：爆发这场战争的原因是什么？这些毛主义者是谁？他们真的是印度内部“最大的安全威胁”吗？他们的政治观点是什么？为什么他们认为自己的暴力行为是合理的？他们如何看待“人民战争”，看待他们的政治目标，看待他们自己？他们打算如何将其影响力从目前森林中的根据地扩展到外面的世界？

多年以来，我一直想了解真实的毛主义者，而要实现这个目的，就不能单从政府宣传和媒体报道途径获得关于他们的信息，而是要直接前往他们的根据地实地考察获得一手的信息。过去有两次我差点成行了，第一次因为两位和我约定同行的年轻记者爽约而作罢，第二次时间太仓促，我来不及做准备。但是这一次我不会错过机会了。于是在 2010 年 1 月，我和瑞典作家扬·米尔达在印共（毛）的游击区域进行了一次为期两周的长途旅行，他们在那里建立了人民政府。目前，印度政府已经被毛主义者逐出这里的游击区，但仍然不断集结军事力量，试图夺回这块区域的控制权。

介绍

战争首先蒙蔽真相。因此我们并不奇怪印度政府否认这场正在对毛主义者进行的战争。相反，政府声称他们只是在执行“警务行动”，维护公民权利。这给人一种假象，即根本没有战争，只不过是警察们在维持治安，结束一场暴动，以恢复秩序。然而事实上，政府为了对付毛主义者，已经调动了 75 营受过丛林战训练的中央准军事部队，以及超过 100 个营的武装警察、预备营和特别警务队，而且这些部队都装备了重武器[1]。印度内政部长帕拉尼亚潘·奇丹巴拉姆声称，印度政府拥有“合法权利”来使用“必要的武力”对付毛主义者（2010 年 3 月）。现在，民众进出毛主义者游击区都要遵守特别的制度，携带由政府警务处警司签署的身份证明，否则无法进出该区域。游击区与外界的商品流通也被限制，每周一次的集市已经被政府转移到部队营地，集市内的商家必须注册，提供需要购买口粮的人员的名单，并且一次出售的口粮只能维持一周。过去森林里的居民步行到达集市需要几小时，现在则需要一天甚至二天的时间，因为路程更远，而且又多了许多麻烦的事（办理身份证，通过检查站时的检查，在营地登记等等）。

虽然毛主义者为了推翻印度政府已经奋斗了将近半个世纪[2]，但是政府现

*本文选自《印度共产党（毛）文献集》上册，收录时将原题“在叛乱中心的日子”改为“在叛乱中心的日日夜夜”，并在一些具体译法上对原文进行了修改。

在对毛主义者发动战争，主要的不是因为毛主义者要推翻政府，因为毛主义者的军事实力仍然弱小，借用印共总书记的评价：毛主义者的军事实力很一般。而且他们自己也承认，要实现推翻印度政府的目标，还需要再奋斗 50-60 年。

在我看来，政府发起这场“绿色狩猎”行动，是因为政府和国内的大企业以及外资企业签署了在印度的部落区域发展采矿业的协议，而毛主义者在这些地区受到人民的拥护[3]，他们强烈抵制这些协议的执行。如果不消灭毛主义者，政府发展矿业，吸引外资的政策就无法实现。我们应当了解，在国会，人民党和印共（马）已经达成了共识，要削弱左翼极端主义的影响力，用印度总理的话来说，这是为了创造“有利于投资”和“经济快速发展”的环境，而这就是这场自印度独立以来最旷日持久的流血冲突的直接原因。政府一心要消灭“左翼极端主义”，而毛主义者则决定武装保卫自己，因此这场战争没有和解的可能，很可能变成一场长期的消耗战。政府在这次战争中投入巨大，丝毫没有妥协的迹象，事实上，政府甚至不顾公众意见，以“商业机密”为借口拒绝公开各邦政府和企业签订的协议。毫无疑问，政府肯定隐瞒了很多真相。

我们这些民主人士反对政府以任何借口镇压人民，任何政治主张或诉求，都不应该用武力去镇压，而且在每场战争的背后，都是长久的和平和公开的斗争。印度独立的 62 年之中，有 15 个政党进入国会，然而民众依然贫困，生存艰难。过去的经验是，在“内部安全”的名义下，政府不仅可以将民众的合法行为当成是犯罪，也可以把自己的非法行为合法化。这意味着，一旦当局取缔了某个组织，限制他们的活动，包括宣传、组织等，那么任何给这些被取缔的组织的成员提供过帮助的人（例如，医疗救助，法律援助，甚至帮助该组织的成员就业或与他们会面等）都属于犯罪行为。这样，在“内部安全”名义下，最无害的行为都可以被政府当作犯罪行为。除此之外，当局为了让那些批评政府的人闭嘴，还伪造证据，扭曲事实，对这些人进行打压。

我们已经目睹了政府对权力的肆意滥用，除了逮捕，酷刑，当局还无耻的将所有持有异议的人们当成是“纳萨尔派的同情者”进行打压，好像成为纳萨尔派或毛主义者本身就是犯罪[4]。最高法院的法官应该提醒政府同情毛主义者并不是犯罪。最近我们又目睹了中央和恰蒂斯加尔邦政府的官员在 2010 年 2 月 9 日恰蒂斯加尔邦丹特瓦达地区的“伏击事件”中是如何在最高法庭误导法官的[5]。此外，一个因涉嫌轮奸而被地区治安官通缉的逃亡犯，竟然在巴斯塔地区警察的包庇纵容下肆无忌惮的犯罪：警察们威胁，攻击独立的社会活动家和社会团体，阻止他们前往战争地区了解真相，政府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防止有关这场肮脏战争的消息被公众所知。政府内政部长曾经在采访中承诺参加在丹特瓦达的听证会，告知民众真相，但是最后却拒绝出席。政府安全部队殴打，驱逐甚至逮捕这些社会团体成员和社会活动家，并且偏袒涉嫌犯罪的暴徒，这些行为，使得我们觉得有必要自己深入战区去了解毛主义者。

初入游击区

进入巴斯塔的“游击区”后，首先让我们印象深刻的，是在人民政府区域里，人们进行问候的方式。每个人，老的少的，男人和女人，村民或党员，互相问候的时候，先是握手，然后举起拳头向对方说一声“Lal salaam”。第二件

印象深刻的事，是妇女在毛主义政权以及在人民解放游击队和民兵当中的数量。许多队伍中有女性指挥官。事实上，负责护送我们的那个排就是由一位女性领导的。她们不仅负责指挥，也要执行危险的任务，而男人也和女人分担同样的责任：收集木材、水、生火，做饭。他们每个人都携带 20-25 公斤的负荷，里面有他们的武器，口粮和衣物。队伍中的男女都擅长修补缝纫，他们不仅擅长修补，还会缝纫自己的背包，他们把他们的衣服、书籍、弹药、杂志和卫生用品放在里面。我的背包的带子坏了，它被队伍里的一个手艺很好的年轻人修好了。事实上他们肩上的工具袋也是他们自己缝的，里面有两件衣服，卫生用品，弹药等。军服是“游击区”统一定制，鞋子和卫生用品则从外面的市场上买来。第三件让人印象深刻的是卫生情况。他们一直饮用开水，还在离营地不远的地方挖了一个洞作为厕所，我的同伴米尔达对此印象深刻，他说这让他想起了瑞典军队的野外厕所。第四，也是最深刻的事情是，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只要完成了工作，几乎所有的队伍成员都拿出书本，读书和写作。每个分区的政府都出版自己冈德语杂志[6]。总共有 25 本杂志在丹达卡兰亚地区定期印刷。所有这些杂志都是内部出版和发行的。事实上，我发现了一本一周之前印刷的小册子，主要内容是介绍 2010 年 1 月 25-27 日的罢工情况。大体上人们看得懂新闻报道，但是有些比较复杂的内容就不容易理解了。那么这个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呢？小组讨论是解决这个问题方法。他们首先把一篇文章读一遍，鼓励队伍中每个人都发言说出他们自己对文章的理解，然后进行讨论，这样文章的概念和意思就在讨论中逐渐清晰起来。教育是优先和受鼓励的。人民政府已经为一到五年级的学生准备了四本教材，数学、社会科学、政治和印地语，还有四本正在准备中，它们是文化、生物学、科学以及丹达卡兰亚地区的历史。

连队中每个人都轮流做杂活，从放哨到做饭。我们由于是客人，自然没有活让我们干。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水烧开。一旦他们完成了早晨的仪式，就到锻炼时间了。到了早上 8 点，他们开始吃早餐。早餐主要是灯笼果，大米和亚麻籽等，里面混合着花生，配着茶。午餐和晚餐主要是米饭配一些木豆。食物很简单，但营养丰富。他们每周吃一次肉，除非革命人民委员会（RPC）另外提供鱼和猪肉（RPC 是选举产生的权力机构，负责管理 3-5 个村。14-15 个 RPC 组成一个地区的 ARPC。3-5 个 ARPC 去构成一个分区政权）。在阿布杰马德的时候，我们只能吃大米，亚麻籽和花生，虽然食物很简单，但是美味营养。当然，每餐都有绿辣椒，富含维生素 C。牛奶在他们那是很稀缺的，奶粉往往被用来泡茶，而香蕉、木瓜等水果在当地却是很丰富的。他们没有固定的睡觉时间，但一般到晚上 10 点左右，每个人就休息了。营地不是固定的，而是在不断转移。睡觉的时候，他们就展开一块塑料布，把毯子盖在自己身上。对于他们的客人，也就是我们，他们铺了一条围巾在塑料布上，在我们的头上又展开一块塑料布，以遮挡晨露，当我们醒来时，我们就可以躺在床上喝茶。他们在森林里生活了很久，已经习惯了森林中的生活。

他们喜欢观看精选过的电影。我们在那的时候他们正好有两部电影在放映，分别是《芭萨提的颜色》和《抗暴英雄》。但是只有在一些级别较高的党员带着笔记本电脑过来的时候，才能用笔记本放映电影。笔记本电脑？那他们

如何给笔记本电脑充电？每个连或排的队伍，都携带有太阳能电池板，用于给电灯电脑等供电。他们也有办法可以访问互联网，还从 YouTube 下载了一些电视辩论节目观看。我很惊讶地知道，很多我参加的电视辩论节目过他们都看过。有人认为我在电视上看起来更健康！当然，永远受欢迎的是阿兰达蒂·洛伊。但是她说英语，他们怎么听懂她的话？他们说一些懂英语的同志会翻译她的话。我被问了很多关于她的问题。是的，她在丛林里也有很多的追随者！他们也听收音机，在一个排中，几乎每三个人就有一台收音机。人民解放游击军的成员非常喜欢收听一个广播节目，里面会播放一些按士兵要求进行特殊演奏的印地语电影歌曲。但是，永远受欢迎的是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他们每天早晨和晚上都会收听。而当地电台的总是在播报他们的负面消息，但他们认为即使是负面的消息也是消息，因此也一直收听。报纸和杂志要在出版几天之后才能到达他们手中。书籍主要是从网上下载下来打印的。在夜间，太阳能灯使得他们能够聚集在一起读书，或围坐在火边聊天。

里面喝酒和吸烟的情况怎么样？在巴斯塔地区，所有部落的原住民都酿酒。虽然党不允许在其区域内销售印产洋酒，但他们不阻止民众酿造传统酒。但是党员很少喝酒。我预计党员他们既不喝酒也不抽烟。虽然他们不像禁止喝酒那样禁止吸烟，而且当地盛产烟叶，但是他们仍然提倡戒烟。人民政府也进行宣传活动。当我在那参观时我被告知有两人将在民众集会上公开宣布戒烟，并鼓励其他人效仿他们。事实上，在营地的时候，没有一个游击队员愿意陪我们抽烟或喝酒。

开始了解他们

在最初的几天里，游击队员们不怎么和我们交谈，可能是因为他们还不信任我们。他们也许在想，我是印度人吗？如果是，我为什么和扬·米尔达用瑞典语交谈？他们的印地语也不太流利，而且他们也不确定我是否能理解他们更熟悉的恰蒂斯加尔语，当然他们知道我肯定也不懂冈德语。但是几天之后，好奇心战胜了戒备心理，他们开始和我们交谈。当他们发现我懂印地语，而且是一个住在国外的印度人，现在就住在德里，他们开始对我好奇。当我们开始一起唱歌后，他们就逐渐信任我了。他们向我询问德里民众的情况：他们有工作吗？挣多少钱？他们是怎么生活的？他们还问我，为什么马克思和恩格斯健在的时候，欧洲革命没有成功？欧洲现在还有阶级斗争吗？为什么塔利班和其他圣战者用炸弹袭击清真寺，把自己的民众而不是美国军队当成袭击目标？为什么克什米尔人没有一个政党为自己争取解放？每个问题都需要回答，不能敷衍了事。但是这些问题有些我了解，有些不了解。三十年的斗争，让他们逐渐了解了森林外面的世界。他们知道在巴勒斯坦、伊拉克、阿富汗、斯里兰卡、克什米尔、曼尼普尔邦和阿萨姆邦，受压迫人们正在为了自由而抗争。斗争中的人是敏感的，因此尽管他们被封锁，但是思想并不封闭，他们居住在丛林中，但他们的心却与其他地区的人民连在一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相比生活在革命人民委员会领导下的森林居民，住在城市里的印度知识分子思想反而更加狭隘，他们对其他地区民众的斗争熟视无睹。

在与游击区以及毗邻区域的土著农民交谈后，我找到了最近巴斯塔地区民

众运动蓬勃发展的三个原因。首先，政府发起战争，是为了让大公司夺取当地人的土地。当地农民被警告说，如果他们不同意出售土地并接受现在的补偿，那么他们不仅会失去土地，而且可能不会得到补偿。我听到这消息时很好奇，问他们“可能不会得到补偿”是什么意思。我被告知，公司的“代理人”警告他们，如果他们现在不接受补偿给他们的钱，那么这些钱将会转给他人。他们解释说，这意思就是公司会签发空头支票或将支票签发给非土地所有者，这种事情现在很常见。第二，货币补偿能否体现土地的公允价值，因为这土地的不仅是他们现在赖以生存的依靠，也是他们后代生存的唯一保障。除此之外，他们指出，不仅仅是土地，还有土地上的树林的价值，也应该体现在补偿中。第三，他们在看到发生在拜拉迪拉（恰蒂斯加尔邦的一个地区——译者注）的事情后，就意识到了政府整天谈论的“发展”都是假话。过去那些年来，部落民生活贫困，勉强维持生计，而政府仅提供微不足道的帮助。而现在，当有公司希望占有他们的土地，政府就提出“发展”。他们希望政府能让他们就这样过下去，不要折腾他们。一个当地老农民说，如果“政府如此热衷于‘发展’，那么为什么这些年来他们不帮助部落民发展农业？”

在一次会议上，一些老人的言论让我们震撼，“我们已经很老了，生命已经快要结束，所以为了阻止政府夺走我们的土地我愿意献出性命，我会这么做，因为我必须确保我们的孩子仍然能够保留这片土地……我们所有老人都会这么做。”他指着他的后代说，“我们就呆在这里战斗，让我们看看有多少人会被军队杀害。他们认为他们可以杀死我们所有人吗？”“我们知道如何战斗。”愤怒是显而易见的。我问我们应该告诉外面的人什么？“请告诉他们政府对他们撒了谎。今天他们拿走我的土地和森林，明天将带走我的生命。”我说这是什么意思？“森林和土地就是我们的生命。”

我对他们复述了印度内政部长说的话：“除非一个国家充分利用自然和人力资源，否则不可能发展。矿产资源是财富，必须开发并为人所用。为什么不呢？你们想让部落永远过狩猎和采集的原始生活吗？我们应该让部落成为人类学的博物馆吗？是的，我们可以继续保留这些矿藏一万年，但这会给这些人们带来发展吗？我们可以尊重部落民崇拜奈彦吉利圣山，但这会让他们有鞋穿，让孩子有学校可上，改变孩子严重营养不良的情况吗？这样能获得医疗保健服务吗？对于采矿业的争论已经持续几个世纪了。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但他们说，我们现在并不在挨饿。但是，外面的人们呢？“如果允许人民政府接触他们，他们也可以受益。”“所以你们不想发展？”我坚持问他们。“现在我们不希望这些外面的大资本家掠夺我们。我们知道在拜拉迪拉发生了什么。”这是一句关键的口号，“看他们在拜拉迪拉做了什么。”（见高塔姆·纳夫拉卡和阿西什·古普塔所著《巴斯塔的真正分歧》，第30卷四十四章，2009年，8月15日）

他们如何看待杀戮行为

我向我们的同伴提出了很多问题。我告诉他们，外界说毛主义者喜欢滥杀无辜，村民哪怕有一点“告密”的嫌疑就会被杀害。但和我一起的同伴们反驳说“我们从不杀人，抢劫或强奸”，我们只会帮助人。切图说，我来自南丹特瓦

达，在那里“和平行动”的军警肆意强奸和杀害女性。他们专门针对无助的平民。他们为什么不来找我们战斗，而去杀害村民？苏克莱尔说，他的弟弟在监狱中被残酷虐待，仅仅因为参加了印度农民协会。这是否意味着他们从来没有杀戮？“不，这不是我们说的，我们只杀‘人民的敌人’。”但人民的敌人又是谁？凡是反对党的人就是敌人吗？“不，不是。对我们来说，敌视，反对和批评党并不重要，但如果你帮助政府军队，那么你就是人民的敌人。”我问你们怎样惩罚这样的人？“我们并不杀掉的所有被认为是敌人的人。党会阻止人们杀害告密者。只有被一再被警告却屡不悔改的人才会被处死。”

我记得 2010 年 1 月毛主义的总书记在我和扬·米尔达对他的采访中讲到：

“……在一个我们还没有完全控制的地区，曾经发生一件事，两个村子中有 33 个村民与警察勾结，成为他们的特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同志去处理这个问题。虽然村民想给特务头子判死刑，但是党给那个人说情，让他有机会认识到错误。”如果在自己的政权控制区域内，毛主义者处理这些事情的方式会有不同吗？还是他们只是选择性的提起这件事以表明死刑是不受欢迎的？还是我多虑了？我不知道。但我认为如果毛主义者滥杀无辜，那么他们的政权不可能在这片区域坚持这么久。

苏克莱尔问我，“你看到那些高压电线了吗？”“是的。”我说，“你应该知道，去年当地的民兵组织炸掉了一些输电塔，党为此召集了一次会议，批评了他们。”党说了什么，民兵又为什么这样做，我问。“党告诉他们，他们这样做，城市里的穷人将会比富人受更多的苦，因为富人有发电机，供电不会受很大影响，停电造成的损失主要由穷人承受。”那么民兵组织的成员说了什么？“他们认为这样做可以把警察引诱过来，然后伏击他们。”这意味着民兵可以擅自采取伏击行动？“不，他们会先通知人民解放游击军。”

“如果党是不主张伏击的，那么怎么会频繁发生伏击，爆炸事件？”我对人民解放游击军指挥官拉穆抛出这个问题。

他说：“当然，我们会组织伏击，但每个伏击是精心策划的，需要很多时间来计划，因为我们弱于敌人。我们不能随意发动不计后果的进攻。除非我们做好准备，否则我们通常避免与敌人交战。而且我们发动这样的袭击主要是为了得到武器。”他说，几天前，有两人据说因为加入政府军队被杀，根据 2010 年 1 月 21 日内政部长 P·奇丹巴拉姆的说法。“这件事与我们无关，我们并不知道这件事。”

他说：“只要是我们做的，我们就会承认，即使这对我们不利，这就是为什么类似你们这样的人喜欢批评我们。”他补充说，他们认为这是“积极的批评”。但是对于不是他们做的事情，他们无能为力。“如果我们做错了，我们道歉，但我们不能为与我们无关的杀戮受指责。”他说，“我们处于战略防御阶段，这不仅是军事意义上的，也是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因此每一个行动都是计划好的。”

“那么毛主义者的斩首事件或在贾坎德邦火车爆炸事件呢？也是计划好的吗？”“这是我们的失误，”他说，“党已经承认了错误。”我指出，每次你们犯下这样的错误，即便事后道歉，但对你们的运动有何帮助呢？这些事情难道没有暴露出组织纪律的问题吗？他说：“这些事情不是发生在这里，我了解

丹达卡兰亚地区，但不了解其他地区的情况。”

我质疑他们杀害印共（马）成员的行为。为什么要杀害他们？他们是腐败分子还是压迫了人民？还是仅仅出于一些毛主义成员的报复欲望？如果是这样，党有没对他们指出，不计后果的杀戮只会伤害党，而不会帮助自己赢得朋友？如果城市中产阶级反对这些杀戮，他们将如何去争取他们站在革命的一边？如果革命的战士不能遵守纪律，该党打算如何赢得人们的支持？他们认真的倾听我的话，但没有回答，只是说：“我们不支持盲目的暴力。”我也把这些问题抛给一个高级领导人，他说在阅读委员会的报告核实情况之前他无法回答。他们拒绝在没有核实事实的情况下接受批评，即便这批评来自一个“支持者”。但是我注意到，他没有轻视我的批评，我告诉他，如果党不能维持纪律，那么他们应该重新思考他们的军队是否在政治组织上已经为进行一场“人民战争”做好了准备，他问这是我的观点还是其他人的观点。我说这是许多人的观点，他点了点头。

但是我仍然想知道，何时何地以及如何进行一个行动的决定是由谁做出的？是由党来决定，还是由游击队或民兵组织的指挥官决定？如果一支队伍在没有党的允许进行行动会被给予什么处罚？例如是谁批准了加木伊的屠戮行为[7]？或是袭击塔塔比拉斯布尔客运列车[8]？如果党是反对一些行动的，为什么不能阻止他们？我提出了这么多问题，但是他们没有回答我，但是一直强调他们会考虑我的批评。他们告诉我，也许公众可能不知道，但是他们一直对违纪行为进行处罚。但是对于我提出的这些问题，并没有得到任何清晰的回应。但他们也坚持认为他们所在的丹达卡兰亚丛林地区与比哈尔-贾坎德地区不同，所以我不能妄下结论。事实上他们中的一些人似乎很沮丧，因为我不停地提到发生在其他地区的事情。我同意我可能是错的，和其它地区不同，党在丹达卡兰亚丛林地区建立政权已经超过 20 年了，因此他们通过赢得民众的认同而不是暴力来维持领导地位，这也反映在他们政权的宪法里。每个地区都有不同的斗争经历，我相信这可以解释丹达卡兰亚和其他地区之间不同的现状，但是这差异有多大，以及是否会由此产生了截然不同的结果？只有我去过比哈尔-贾坎德游击区域后才能回答这些问题。

尽管如此，我仍然得到了一份 2009 年 4 月 28 日丹达卡兰亚丛林地区特别委员会的公开道歉声明：写给那些在 2009 年 4 月 16 日爆炸事件中丧生的人的家属。声明上写道：

“我们知道说对不起也不能挽回您家人的生命，我们的道歉也不能抹去你们的眼泪。但是我们想告诉你们，我们党对你们的家人没有敌意。那是一次意外。政府公务员包括警察和普通军警以及准军事部队并不是我们的敌人……你们会问我们为什么袭击警察和准军事部队？为什么我们安置地雷？或者我们为什么要使用‘暴力’？这是制度的问题。你们都很清楚，每一次和平的鼓动和抗争，我们都遇到政府的镇压。我们不是剥削阶级的政府宣传的那样是极端分子或恐怖分子。我们是工人，农民和中产阶级的孩子……我们在落后的部落地区组织民众反对政府的剥削和压迫，帮助他们为自己的权利而斗争……”

他们继续指出，2009 年 1 月 4 日在南巴斯塔的辛格拉莫地区，19 个原住民被杀，包括四个妇女，她们被轮奸和杀害。在西巴斯塔的明卡帕利，6 个原住

民被杀害。自 2005 年以来，至少有 1000 原住民丧生，数百名妇女被强奸，700 个村庄被烧毁。“这样做是为了向跨国公司和外国资本家移交矿产资源。正是在这种暴力下，我们不得不以‘暴力’给予回应。我们如果不反抗，他们的目的早就实现了。虽然政府士兵和警察来自普通农民，工人和中产阶级家庭，但他们已经成为剥削者的工具，攻击他们的乡亲。杀人、抢劫、强奸、非法逮捕、受贿……这是警察……的惯例。我们经常分发宣传册，呼吁他们不要攻击穷人，剥削人民。这就是我们使用炸弹袭击警察和武装部队的背景。”

声明所体现的态度和那些叫嚷着“我们早就说过会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毛主义者批评者或嘟囔着“阶级战争免不了发生这种事情”的毛主义者支持者完全不同，他们都脱离了日常的斗争，不懂得斗争需要细致的工作，不断改正错误。对于我所有尖锐有时甚至不留情面的问题，他们没有一次表示轻视。虽然他们谈论其他地区很谨慎，但是非常乐于谈论他们自己在丹达卡兰地区的工作。他们向公众进行公开的道歉是正确的一步。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他们要赢得人们的支持，那么他们必须采取负责任的行动。

他们为什么不害怕？

我询问每个遇到的战士，政府军队人数众多，他们处于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中（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这已经是一种战争行为），为什么不害怕？我得到一个回答是“我们将依靠人民的力量，反抗政府的镇压。”“但是你们不害怕吗？”“如果我们害怕了，政府将更加得寸进尺，为所欲为。”他们的信心来自哪里？我向一个年轻女战士苏克玛蒂问道，我看到在一次任务中她前去侦察一条道路，路两侧是政府安全部队的营地，她带领部队通过这条路，并且最后一个离开。“承担这么危险的任务你不害怕吗？”她笑了笑说：“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看到警察进入我的村庄威胁我们。但我不害怕他们。”“但你们如何与政府这么强大的武力相对抗？”我的同伴告诉我，他们不担心战斗，因为他们在自己的地区作战，这是一个优势，而且警察和政府部队的抢劫强奸行为，让民众更加团结在毛主义者周围。

当我对负责丹达卡兰地区的索努同志提出这个问题时，他说，在 2005 年政府展开“和平行动”6 个月后，也有人问过同样的问题。“那时候，村庄被政府军队袭击并被烧毁，党员和支持者被捕杀，人们问我们怎么办。一些人认为我们应该撤离这里。许多村落的首领，商人和教师开始相信，政府这次将取得胜利，并开始传播这种思想。但是在六个月内局势就反转了。”

那么，那时发生了什么？

到了 2006 年 2 月，党开始反击。最重要的工作是动员民众，首先，党尽最大努力，组织森林里那些失去家园的民众，动员他们，提醒他们之所以流离失所因为是政府要把这片土地交给矿业公司。党提醒民众不要忘记，在党的领导下，他们过去曾经成功的对政府林业部门，警察，森林商人以及部落首领进行抗争。党提醒他们如果不坚持战斗，就无法保卫自己的斗争成果。于是党要求民众加入民兵组织，抵抗“和平行动”。这听起来似乎不难做到。但是要庇护那些躲避“和平行动”暴徒的民众，为他们提供住所，使他们恢复过来，给他们希望与勇气，这需要大量的工作，当时党组织本身也遭受了残酷的清洗，还

要面对“中立”人士的诽谤，他们试图为“和平行动”辩护，声称这是毛主义者咎由自取。然而，如果党不充分动员群众，就不能成功反击“和平行动”。

这就是党总书记所指出的，他在采访中说：“……人民欢迎我们。即便是年轻的，缺乏经验的干部都被人民要求前往他们所在的地区开展工作。例如，在北方邦的索尼巴德拉地区，村民们自发邀请我们前往开展工作。我们计划向拉耶加达和讷亚格尔地区发动进攻。于是我们开展了‘索道’行动，精心安排了对讷亚格尔的袭击，这使我们在8-10个月内能够控制这个地区。突袭讷亚格尔不仅有军事意义，而且有政治意义，里面有战略的考量。然后我们进行了‘维卡斯’行动，把我们的势力扩大到平原地区的恰蒂斯加尔邦的曼普尔。按照这样的方式，我们能够迅速发展，扩大游击战争的规模。如果我们继续像这样行动，把战争拖延下去，并且不断向新的地区扩展，那么政府的军事负担会越来越大，而国内政治和经济形势必然变化，政府最终将会在压力下崩溃。我们就是按照这个战略来进行战争的。”

因此，我相信索努所说的，“和平行动”期间毛主义民兵和人民解放游击军的人数反而大幅增加。他还指出，“过去更早时候，在1990-1991年和1997-1998年，当地的权贵、警察和政府发起‘一月觉醒计划’镇压我们时，我们的运动反而一天天壮大起来。”我问这是否意味着面对目前部署在丹达卡兰亚的约2.5-3万部队，他们希望同样的事情再次发生？这让人想起总书记关于“蜂巢”的比喻，如果数百万群众起来反抗，少数的部队的确是无法抵抗的。但是民众会响应他们的号召吗？毛主义者干部对此非常乐观，他们认为民众会奋勇战斗，当然他们也承认遭受了很多损失，有大量的领导干部被逮捕，许多积极分子被杀害。

那么是什么支撑他们走到今天？他们如何面对挫折？是什么给了他们信心和勇气坚持下去？是“人民的热爱和信任”。这是最常见的回答。这种说法也不时出现在他们用于宣传的小册子上。丹达卡兰亚特别委员会为罢工（2010年1月25-27日）制作的宣传册包含了一份给警察和准军事部队的信，希望他们思考为什么政府发起“绿色狩猎行动”。这本小册子首先提醒他们，他们是在为资本家和外国跨国公司的利益作战，他们是为了钱去杀害民众，接着小册子提醒他们的阶级来源，要求他们不要将枪口对准自己的阶级兄弟。另一个主要为人民解放游击军进行招募工作的（从2009年12月到2010年2月10日）宣传册，呼吁巴斯塔地区的失业男女不要加入政府的部队。传单上说，当你加入人民解放游击军，“虽然你不会得到任何薪水，但食物，衣服，以及你的个人需要将会得到满足，你们的家人会受到游击政权的帮助。你将获得人民的热爱和拥戴。而那些加入政府武装部队虽然有薪水，还有抢劫，杀人和强奸的权利，但会被人民永久唾弃。”另一个传单告诉政府武装部队的人员，他们参加的是外国侵略者针对人民的战争。传单上末尾写着：“政府只把你们当成牲畜和奴隶”。

这种信心和力量不会在一夜之间产生。事实上，通过三十年的牺牲、奉献和艰苦的工作，党才将一场少数人的运动发展成大规模的群众运动。现在在丹达卡兰亚地区，他们的第二代仍然坚持以这样的方式进行工作，他们主要都是原住民。第二代？一个高级党员微笑着告诉我：“第三代也已经准备好了。”

我不能理解他是什么意思。我希望他进行解释。他说，自去年以来，党已经开办了一个共产主义基础培训学校，对 25-30 个年龄在 12-15 岁的孩子进行六个月的严格培训。培训中会向他们介绍马克思列宁毛主义的基本概念，教授语言（印地语和英语）、数学、社会科学、电脑和一些武器的使用方法，还要加入革命人民委员会进行实践锻炼，然后才能结业。今年他们计划在其他地区引入这个制度。毛主义者也主要是原住民，他们与当地部落人的语言、生活方式无异。当然，也有党员来自其它地区，我也见过他们。据说如果一个人长期处于另一个群体里，他的说话语调也会逐渐发生变化。在这里，我很难知道谁是谁，谁是本土人，谁来自外邦，每一个人口音都相似，他们都讲冈德语。除了印地语，我不懂冈德语或其他印度语言，但是我可以听懂一些孟加拉和旁遮普语。这里人们普遍说冈德语。我很少听到人们用泰卢固语交谈，尽管出于某些原因，泰卢固语和印地语在丹达卡兰亚地区都不是一种外来语言。

因此，信心也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大多数党的干部是本地人。总书记告诉我们，外来的党员在丹达卡兰亚地区不容易适应艰苦的生存环境。我回忆穆拉里告诉我的，在 1980 年进入丹达卡兰亚地区的两队人中，只有两个成员，即他和古萨·乌森迪依然留了下来，其他人要么被杀，要么放弃，或者适应不了森林里的生活。总书记说，许多来自外面的同志在这工作几个月后就想放弃党内的职务，离开森林。这也意味着，党的主要支柱不是外来的干部，而是当地干部。有了如此广泛的吸引力，党不想公开合法地斗争吗？穆拉里告诉我，党的群众组织虽然是非法的，但运作良好，并不妨碍其开展工作。总书记告诉我们，合法斗争可能会使党受到限制，无法夺取政权。后来，当我和一位高级党员谈话时，他的意思是，公开斗争是重要的，但“除非不得已，否则我们不会走合法斗争道路”。

我问他们是否允许政府在当地发展民生事业。如果允许，这是否会削弱他们在当地努力建立的影响力？答案是，在他们无法对人民提供帮助的地方，他们不反对任何让人民受益的事情，无论是健康、教育、就业保障，等等。然而，在他们控制地区他们自己会进行改革，让人民受益。

我们被告知，毛主义者并不反对政府任何对人民有利的改革，比如在那些他们无法提供援助的地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争取实施这些改革。我记得贾坎德邦的毛主义者邀请政府的规划委员会来与他们讨论农村的脱贫问题。然而，在他们进行管理的地方，他们自己承担改革工作，那就是“通过鼓励合作运动来加强人民经济”。通过这样的改革，鼓励民众依靠集体的力量，提高人民的经济水平。我想起了规划委员会专家组提交的“极端主义影响地区发展的挑战”报告，里面承认：“报告的目的是，帮助政府通过宪法和法律手段消除动乱的根源，重建受影响地区的人民对政府治理的信心”。规划委员会表示，政府往往通过一些暂时性的措施来拉拢民众，而毛主义者则是发动群众，让群众主导自己的命运。这两条道路之间有着巨大的鸿沟。

有人告诉我，虽然他们欢迎改革，但他们意识到政府可以通过“改革”削弱“叛乱”的影响力。首先，政府恐吓民众，让他们开始相信改革是出路，开始相信政府正在做的事情。这也被称为“赢得信心和思想”，在这之下政府正在推出各种方案。因此在一些试点地区，不同项目正在推动。同时政府也在宣

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是过时的，是失败的意识形态，革命不会胜利。一位资深党员说，很明显印度政府正在宣传自己有必要使用暴力来拯救陷入共产主义危险的人民，根除毛主义者威胁。他说，这是让印度人民去接受政府的暴力。这也发出一个信号，印度政府是非常强大的，摆脱这个“安全威胁”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但是，他们已经准备好了，党把“和平行动”当成政府大举进攻的第一阶段。

索努指出“和平行动”的目的是剿灭毛主义者，“政府认为我们将要完蛋。”他说，早些时候当党使用“法西斯”这个词的时候，人们不能理解它是什么意思。但随着“和平行动”展开，人们就理解了。因此“和平行动”毫无疑问成为一个好老师，它帮忙清除了民众的疑惑。当许多党的反对者看到民众流离失所，村庄被焚毁，还伴随着抢劫和强奸，他们改变了过去的观点，他们开始意识到“和平行动”旨在消灭群众运动，把民众的土地移交给企业。看看一个官方报告在这个问题上的说明，农村发展部撰写的《土地关系委员会和土地改革未完成的任务》（2009），解释了“和平行动”运动背后的原因，这和获得采矿权有直接关系：

“征用土地和迁移居民的政策遇到了部落居民的反抗（2000）。政府在激烈的抵制下撤回了计划。如果政府要开发丰富的铁矿石资源，就得有新的方法。新的方法来了，就是‘和平行动’。‘和平行动’由马亨德拉·卡尔马领导，成员主要是当地人，有些曾经是印共（毛）的干部和地方领导人，在他们背后是商人，承包商。‘和平行动’主要的资金来源是塔塔和埃萨公司。‘和平行动’的首先攻击的是那些支持印共（毛）的村民们，这变成一场同胞之间的残杀。按官方统计 640 个村被夷为平地，350000 人，即丹特瓦达地区总人口的一半，被强制迁移，妇女被强奸，年轻人被杀害。那些无法逃入丛林的人们被集合到由‘和平行动’运行管理的难民营。其他人继续躲在森林里或迁移到附近的马哈拉施特拉，安得拉邦和奥里萨邦部落地区。铁矿资源丰富的村庄被政府腾空，交给出价最高的企业。最新流传的信息是，埃萨钢铁和塔塔钢铁都愿意接管这片空地，经营矿山。”

附带伤害

宗教团体“室利罗摩的使命”在巴斯塔地区开办了五所学校，同时在这些地方开办了健康中心和平价商店。截至目前，学校还在运转，但平价商店已经关闭，健康中心现在只提供基本服务。事实上，一位医生过去每个星期三都去健康中心工作，但是自从 2005 年以来，就不去了。为什么？因为政府声称，毛主义者在使用这个医院，医生在治疗叛乱分子。我问医院的管理人员，他们有没有告诉政府，治病救人并不是犯罪，而且根据最高法院的命令，即便某人被指控为极端/恐怖分子，也应该对其提供医疗服务。他苦笑：“这可能是真的，但最高法院和我们之间的距离有几千公里。”

政府还进行了经济封锁。为了确保对粮食和物资供应的控制，政府把集市从居民区转移到了武装营地，平民进出受到了管制。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学校工作人员告诉我，自 2008 年 9 月以来他们进出地区就需要特别通行证，由警察总监签授。在检查站，他们必须记录他们的名字，他们的去向和原因，展示携

带的物资，然后进行搜查。在营地购买的物资，必须按照名单提供口粮。在营地，警察往往仅凭一两句话就可以殴打，拘捕任何人，只有贿赂后才能被释放。人们告诉我一件事，有两个卖牛乳的商人被逮捕，官员向他们索取 2000 卢比，才给他们自由。但是他们只有 500 卢比，于是官员“宽宏大量”的拿了这 500 卢比后放他们走了，并且警告他们，他们最好做“良民”，不要相信毛主义者。我问村民们他们怎么得到口粮？很多人都说他们不喜欢前往营地购买，因为会被骚扰，而且他们能够买的口粮总是远远少于按规定他们有权买到的，因为警察认为他们在为毛主义者购买口粮。要前往营地，他们说，他们必须通过一个只能单人通行的索桥。学校人员也说即便当他们的宗教首领前来访问，也必须从车上下下来接受检查。“你们为什么不抗议？”我问，他们说：“我们必须小心。如果我们抗议，他们会说你像毛主义者，让你闭嘴。如果我们坚持抗议，他们就告诉我们，我们知道你们与毛主义者的联系，我们会监视你们。不要表现得太聪明等等。”我说：“那毛主义者怎么样，他们会威胁你们吗？”他们说：“当我们受他们牵连时，他们没有麻烦我们。事实上，当我们请求他们不要来，因为我们会被当局指控为毛主义者，他们就不来了。”难道他们没有寻求帮助吗？“没有，”他们说，“因为他们知道，我们的供应已经被削减，健康中心和平价店被关闭。毛主义者告诉我们，他们不会为难我们，只要我们不让他们把营地设在学校里。”

事实上，他说，官方对“室利罗摩的使命”的一个指责是：“怎么是你们而不是政府来办学校。”我说：“是的，我也很好奇。”他说：“你看到政府办的学校是什么样子的吗？其中有些已经不能叫作学校了，大部分教师领了工资，却不在学校教书。”我说，你的意思是说，毛主义者威胁了他们吗？他说：“你会给我惹麻烦的，但我要说的是，他们什么也不干却领取工资，只是借口毛主义者威胁他们，政府发现这有利于攻击毛主义者，于是声称毛主义者不允许政府学校运作。”但他补充道：“我不会责怪老师，”他说，“因为一些学校只是名义上是学校。”我问，据说在过去的四年中，在巴斯塔有 385 所寄宿学校被毛主义者摧毁，是真的吗？他笑了，转身离开，“我不知道在巴斯塔有这么学校。”我还是不太明白，但没有再纠缠他了。但我想起了《印度快报》（2009 年 12 月 5 日新德里版）上的一个故事，里面引用了一位贾坎德邦选举期间部署在选区的政府武装人员的话。他说：“我们曾听说，这个地区是毛主义者的巢穴。我们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他们。但是我们寄宿的学校里到处都是蚊子。没有饮用水。我们只能把水用泵抽上来煮开。”那些指责毛主义者毁掉学校，或者同情士兵遭遇的人们，应该稍稍想一想那些在这样恶劣条件下学习的孩子们。此外，如果这些学校被用作军事人员的营地，那么他们的职责是什么？

从那里回来，我禁不住思考，在战争地区，以当权者的立场来看，什么样的行为是违抗他们的意志的。然而，从“室利罗摩的使命”的学校人员谨慎的言论那里我了解到了如此多信息！可以肯定的是，“室利罗摩的使命”是承受着政府巨大的压力的。但是，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那些相信神的人们会害怕政府的胁迫？毕竟政府也是由凡人组成的。难道是他们的物质财产，使他们容易受到政府的压力？我的意思是，如果神要求他们“为人们服务”，为什么

“室利罗摩的使命”的长老，或者是基督教和其他传教士不抗议在战争地区削减医疗服务和关闭平价商店的行为？

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

我碰到和听到的每一件事情，都燃起了我想要了解这场运动起初是如何在这扎根的欲望，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他们这 30 年来取得的成就。自 2004 年以来，党的势力已超出丹达卡兰亚地区，从老巴斯塔地区（包括恰蒂斯加尔邦的五个地区）和马哈拉施特拉邦扩展到马恩普尔和曼尼普尔邦的平原地区。为了方便党开展工作，这些地区被分为十个部分：巴斯塔（包括巴斯塔，康克尔，比贾布尔，丹特瓦达和杰格德尔普尔五个地区）被分为 6 个分区，而马哈拉施特拉邦被分为 2 分区。这些连同马恩普尔和曼尼普尔邦，一共组成 10 个分区。在整个丹达卡兰亚区域，原住民主要是科亚、多拉部落，其他还包括亥比，巴特拉和普拉丹部落。这一区域也有相当数量的达利特（贱民）群体以及马哈拉施特拉邦的马哈尔部族居住，除此之外还有一些非原住民群体。科亚和多拉部落一起被归为冈德人。冈德人总人口约 700 万，分布于印度中央邦、恰蒂斯加尔邦、马哈拉施特拉邦、安得拉邦和奥里萨邦。这场运动影响的范围大约有 6 万平方公里，党控制了丹达卡兰亚的 8 个分区，约有 4.5-5 百万人口。高级领导人索努告诉我们，在其整个历史中，这个地区的人民都在为反对剥削，为土地和生计抗争。相对印度其它区域，这个地区保留了相对民主的部落传统。他们从来没有屈服于压迫，一直在抗争。事实上从 1825 年到 1964 年，在不同部落领袖领导下，被官方记录下来的起义有 10 到 11 次。大约在党进入这一区域 16 年之前，1964 年，巴斯塔人民在首领的带领下起来反抗政府。“在这之后的 15 年，我们在 1980 年进入这一地区”。1980 年两队毛主义成员进入丹达卡兰亚地区。这就是这场运动如何开始的。

穆拉里是 1980 年代第一批进入丹达卡兰亚的连队成员。他说：“在 1978 年纳萨尔巴里运动受挫后，安得拉邦的卡里姆讷格尔和阿迪拉巴德地区出现了农民运动。于是在 1977 年，党决定‘进入农村’。因此，在 1978 年，在安得拉邦沿海的特伦甘纳地区，党的干部为‘进入农村’运动组织了十天的政治课程。在农村层面，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被提上议程，党制作了各种小册子、海报，组织各种集会来吸引农民。当时的任务是对该地区进行阶级分析。在加德奇罗利，高利贷剥削并不多，剥削主要来自政府的林业部门，主要矛盾的是政府与人民的矛盾。在巴斯塔，主是土地问题，矛盾主要存在于森林居民与森林部门之间，这里剥削程度比阿迪拉巴德要轻一些，虽然部落中存在阶级分化，但不如特伦甘纳平原那里那么明显，因为这里虽然已经是阶级社会，但由于部落的传统，首领对部落民的剥削不是很厉害。”语言障碍呢？在他们第一次进入的地区，在巴斯塔以及加德奇罗利两侧，泰卢固语是主要语言。然而，作为纳萨尔巴里运动的一部分，学习当地人民的语言，例如冈德语是必须的。学习这种语言需要花费一些功夫，但是如穆拉里说的，如果你渴望在民众中工作和生活，那么你学起语言来很简单。

调查之后，党决定把重点工作放在主要矛盾上，也就是民众和政府林业部门之间的矛盾。索努该告诉我们，最初他们为了让当地民众信任党，着实花了

一番功夫。那时党做了一件事，第一次赢得了人们的好感，那就是教会民众烧开水，使得婴儿的死亡率降低了 50%。于是民众开始愿意倾听党的话。

接下来党如何进一步获得信任？既然当地主要问题在于土地和森林产品，那么党在这一地区开展的斗争，主要是针对政府森林部门的。政府林业部拥有大量的土地，还控制了森林产品，例如罗望子、竹子。索努说：“虽然我们也知道部落首领和民众之间存在矛盾，但人们还不愿反对他们。民众对我们不太了解，他们担心党如果抛弃了他们，他们将面对部落首领的报复。”因此，在最初的几年，索努说，他们把整个部落与森林部的矛盾作为主要问题。而要反对政府，必须动员民众，党最先动员部落中的最贫穷的民众，这些最受压迫的民众不仅最容易动员，而且在运动中往往最积极。党帮助农民建立了自己的群众组织，妇女也参加了，但是后来为了解放妇女，建立了单独的妇女组织。在动员民众的时候，党发现当地民众反映的一个主要的问题是，他们为承包商采集烟叶，砍伐竹子所获得的报酬极低，甚至低于政府规定的报酬。于是，1981年起党开始组织当地民众改变这一情况。

在这场斗争的过程中，民众看到了在针对森林部门和承包商的运动中的党的干部们所做的工作，于是增加了对党的信心。穆拉里说，在加德奇罗利区域，巴拉尔普尔造纸厂租赁了一片竹林，雇佣民众为其砍伐竹子，报酬为每六捆（每捆 20 支）竹子支付 1 卢比。他说，过去，实际是公司的代理人将与部落首领会面，然后私下协议决定报酬水平，普通的民众没有发言权。这一持续持续到 1983 年，党开始发动民众把报酬提高到 1 卢比三捆，然后在 1984 年是 1 卢比两捆，现在是 7 卢比每捆。同样，过去承包商为一捆烟叶（70 片叶子一捆）支付 3 毛，而现在每捆报酬超过一卢比。这些斗争的成功帮助党赢得了人民的信任。这些行动都具有工资斗争的性质。今天，穆拉里自豪地说，在这一地区，民众的工资都高于当地规定的最低工资。

我问，他们是如何应对公司经理或承包商的？他说，“经理们”花了好几年才确信他们不可能绕过党，来达成对自己更有利的协议。于是他们开始行贿。在一次会议上，一个“经纪人”告诉他们，党的干部们已经为部落争取了利益，现在为什么不想想自己的利益。穆拉里说，党的干部反过来问经纪人：“你们也只是为你们的雇主工作，为什么你们要对雇主如此忠诚？你们给原住民支付公平的报酬对你们会有什么不好吗？如果你有足够的钱来向我们行贿，那么你们肯定有足够的钱向民众支付公平的报酬。”在那之后，这些经纪人不再试图贿赂他们。

这些成功为党影响力的巩固和扩张奠定了基础。索努指出，当原住民加入他们时，不是单个人一个个的加入，而是整个村庄一起加入，这是部落集体活动的传统。此后人们开始向党声诉他们与部落酋长的矛盾。1984 年丹达卡兰亚地区建立了森林联络委员会以指导当地运动。在 1987 年，一个政府委员会被选出，但由于没有一个中央级别的委员会，它在安得拉邦委员会下工作。在 1989 年，一个全丹达卡兰亚地区的土著农民组织——丹达卡兰亚原住民农夫和劳工协会成立了，今天它拥有超过 100000 名的成员。在这组织中，民众特别是失地农民为土地权益而抗争，他们统一的口号是——耕者有其田。

土地问题

土地问题是最大的问题。土著农民不仅要受政府部门的掠夺，还受到他们的部落酋长的压迫，部落首领拥有更多的土地，他们必须先耕种首领的土地，然后他们才能耕种自己的土地，如果农民未能遵守义务，那么他们就要以酒，山羊等支付罚款，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会被驱逐。在那些游耕的部落，情况也是如此。当农民在首领的田地里忙完之后，才能耕种自己的土地，而当他们耕种自己的田地时，雨季已经过去，这就使得他们的收成受损，进一步恶化他们的处境。此外，无地和少地的原住农民人数众多，土地的缺乏和低产，迫使许多人沦为农业雇工。他们要么作为“自由劳动力”按季领取的工资，要么成为大地主的附属劳动力，以食物代替工资。此外，除阿布杰马德，林业部门禁止了游耕，但是却没有相应的推动定居农业，许多党的干部向我指出，这导致土地产量低下，并使农民受到奴役。

索努自豪地说：“当初有相当数量的失地农民，现在已经没有了。我们争得了 300000 亩林地。村庄内部的第一次斗争是围绕土地运动展开的。部落首领过去有大量的土地。现在民众获得了这些土地，他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多。在最初的年份里，经常村民有经常吃不饱，现在他们可以一天吃两顿了。因此，反对森林部门的斗争是与反对部落首领的斗争结合在一起的。”

但是，分配土地是一回事，发展农业又是另一回事。那时在整个巴斯塔和加德奇罗利地区，被灌溉的田地只有 2%。于是毛主义者开展运动，组织民众在村庄建造灌溉水渠。与此同时，他们引入了互助合作的发展模式。3-4 户家庭一起耕种土地，建造房屋或做其他工作。“人民政府”的宪法中提到：“虽然土地是私有的，但政府鼓励集体劳动，鼓励农民平整土地、耕作、移植、除草、收割、种植蔬菜、种植水果、养鱼、饲养牛及其他农业或与农业有关的工作中开展互助合作。通过发展合作运动，力争提高农业产量，满足人们对粮食的需要。集体土地、集体种植园、集体池塘、养鱼等，以及这类工作都应该在这个（农业）部门的指导下进行。”

这些劳动互助组，是按阶级成分组建的。“如果把贫穷农户和富裕的农民组在一起，就意味着当贫农耕种自己的土地时，季风就已经过去了。”合作制度使得农民逐渐有了集体和团结的意识。现在农民有土地了，还有了一些灌溉设施，这样就可以显著改善农民的生活水平。提高农业生产是非常重要的，而且还要克服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有些地区比较发达，而在另一些地区比较落后，需要党的干部做更多的工作。此外，在一些地区游耕仍然在实行，而有地区已经使用拖拉机用于耕作，还有一些地区缺少耕牛。（伴随我到 MAAD 的小队中，有两个成员从来没有喝过新鲜牛奶或酸奶，因为他们那里没有牛）。作为发展农业政策的一部分，人民政府给 MAAD 买了 106 头水牛，现在死了 14 头，剩下 92 头。现在，转向定居农业的村民们被教会如何耕作，也学会了如何利用牲口来耕作。当地革命人民委员会的成员纳辛和库玛，带我看了几个合作农场，告诉我他们发现当地游耕比初级的定居农业更好。游耕的一个优点是，不仅产量更高，而且可以种植多种作物。

女性：反对迷信，父权和政府与土地问题连在一起的，是妇女解放问题。妇女没有土地所有权，结婚后她们也不可以参加典礼或宗教仪式，也不能从一

个村庄搬迁到另一个村庄，在月经期间还被迫待在村外，而且不能参与村里的会议。毛主义者鼓励妇女起来反对这些不公。经过六年的不懈宣传，部落内的女性拥有了婚姻自主权，部落首领或富农，以及森林部门和警察人员，再也不能随意欺辱年轻的部落妇女。

一个题外话，我们在 MAAD 的时候一名士兵问我：“你看到前面那块地了吗。”“是的。”我说，“这是什么呢？”“这片土地被我们清理干净，我们修建了围墙，然后让村民们将它作为一个集体农场耕种。这里适合种水稻。但村民们吓坏了，他们说，这土地是‘天神’的，如果他们在上面耕种他们会生病。那么谁耕种了呢？我们做了，现在我们希望，村民们会看到在我们身上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下一次他们能够自己种植水稻。同样，尼蒂，一个地区革命人民委员会的党代表说，通常当人们生病时，他们就要去找‘欧嘉’（婆罗门种姓）人治疗我们。我们不阻止他们。我们告诉他们可以去找‘欧嘉’但也带上我们的药片。他们这样做了，如果他们把他们的痊愈归功于‘欧嘉’，我们也无所谓，只要我们能用药物帮助他们就行了，因为我们知道只有药物才能治好他们。”

在运动中妇女非常善于表达自己的观点，她们的人数增长了很多，但还不到参加运动的民众一半，大致在 40%至 45%之间。但看到年轻女性成为指挥官和人民政府的干部，是令人印象深刻的。但是，并不是所有妇女遇到的问题，都已经解决。并不是她们提出的所有要求都被满足了。其中一件事是，人民政府的宪法中关于农业的第三条规定“财产以家庭的名义，以丈夫和妻子的名义共同所有。这遭到民众反对，但他们正在推进这件事。在任何情况下，任何在人民政府地区旅行的人都会看到妇女在运动中的突出作用。我所有的谈话都不是只与男人进行，也包括妇女。人们在人民政府地区到处都可以看到进步的思想，在那里人们公开质疑和反对性别歧视和父权制。

还有许多问题我想弄清楚，比如同族群内的爱情婚姻问题，因为我已被告知，党支持这样的婚姻，而这违背了部落的习俗。我还想知道，夫妻是否共同分担家务事。我还需要知道，如果妻子和丈夫都是党员，而妻子要参加会议或做党务工作，丈夫是否帮忙做家务。不幸的是，除此外，我还要去阿布杰马德看看那里的发展情况，二者只能选一。我选择了后者。

白色恐怖

到 80 年代末，农民和妇女组织在丹达卡兰亚地区已经发展到了很高水平，涵盖许多邦的部落地区，民兵数量不断增加。但是政府的镇压也在增加。这个阶段，农民已经把农会当作他们自己的组织，并对其充满信心。由于部落的集体传统，每个村民开始参加这个组织。索努说：“在最初几年，党利用部落的集体活动的老传统来进行革命。现在，他们开始了解组织和党的优势，它提高了人们的意识水平，以至于他们已经可以明确区分人民和部落首领之间的矛盾以及人民与政府的矛盾。所以，谁是敌人谁是朋友也很清楚了。当党和人民团结起来的时候，部落首领站在了政府的一边，人民越来越意识到，要保住自己的土地，就必须组织起来战斗。否则，国家和首领们将抓住任何机会重新拿回土地。这样党就指明了方向，如果你们组织和武装自己，那么你们将能够保护

你们。”结果是，党的干部数量急剧增长。就在那时，中央邦政府在 1990-91 年发起了“一月觉醒”运动。部落首领失去了土地以及他们的传统地位，农会逐渐取代了他们。“因此自然的，政府和部落首领一起密谋，组织了第一个白色恐怖运动。”1991 年，在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加德奇罗利和安得拉邦的巴斯塔地区，镇压开始了。在 1991-1994 年很多党员被杀。来自加德奇罗利一个村庄的苏克莱尔，告诉我，他的村庄被袭击了 15 次。那时他还是青少年。就在这个时候，索努说党决定了要反抗政府。自那时起，党开始对政府军队采取行动。形成游击区的过程就这样开始了。所有村庄的问题都被提交到了农会。无论是传统的部落首领和还是政府村委会都失去了支持。“这是一种以最明确的方式进行的权力转移。”即使城市的税务官也不再来村里征税了。然而，党察觉到了权力的真空，意识到农会无法填补这个空白。于是在 1994 年，党正式决定要建立人民的政权。在 1995 年举行了全印度的特别大会，党批准建立权力机关的决定，称为“公社委员会”，由所有 18 岁以上的村民选举产生，主要专注于农业的发展。

部落首领的传统特权和政府的农村机构开始失去影响，他们和新生的人民政权之间不可避免的要发生碰撞。随着人民政权的巩固，政府在 1997 年再次发动了“白色恐怖”运动，称为“一月觉醒运动”。在这场运动中，许多当地的同志被杀害，许多房屋被烧毁，人们被威胁投降。政府在一次集会上公开杀害一名同志，以此创造一种恐怖的气氛。党发展了小股军事力量并展开行动了吗？是的。一个村的首领据说是一个残忍而臭名昭著的人，他被当成人民的敌人消灭。陆续的这样的一些人被找出来杀掉。这个阶段持续了 6-8 个月。然而于 2005 年 6 月 5 日开始的，被称为“和平行动”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与上两次运动不同。上两次运动基本上是当地政府组织的，而这次运动则是当地政府，邦政府和中央政府协调规划的产物。邦警察和中央准军事部队，以及当地暴徒分子都被派来对付民众，并且将持续很长时间。

自 2004 年在印共（毛）成立以来，人民运动不断发展壮大，于是他们成为政府的主要目标，而且一个统一的毛主义党的出现，使他们能够形成一个强大的力量抵制政府对森林土地的掠夺。虽然 1998 年印度政府对纳萨尔派的立场有些转变，人民党全国民主联盟政府的内政部长 L·K·阿德瓦尼，仍将纳萨尔派和毛主义者提升为对“内部安全”的威胁。而且，等到 2004 年由曼莫汉·辛格领导的国大党团结进步联盟上台后，政府进一步趋向镇压政策。正是在曼莫汉领导的 UPA 政府下，毛主义党被定性为“最大的内部安全威胁”。在 2004-2005 年毛主义者在安得拉邦受到严重的打击，根据党的估计，他们失去了 1800 名干部。安得拉邦的镇压毛主义者的行动于 2004 年十月开始，并贯穿了 2005 一整年。紧接着，就是“和平行动”于 2005 年六月正式开始，这次行动是政府早有预谋的，目的在于铲除“人民政权”，让恰蒂斯加尔邦、奥里萨邦和贾坎德邦政府和企业签署的发展矿业的的协议得以执行。从 2005 年 6 月 5 日到 12 月，白色恐怖达到了顶峰。特别是巴伊拉姆加和比贾布尔是主要的袭击目标，整个过程中至少有 644 个村庄被摧毁，民众流离失所。“按照政府的记录，35 万人失去居所。只有 5 万 6000 人占被安置在 33 个‘集中营’或所谓的‘救济营’中。”索努说道。35000 个部落到安得拉邦寻求避难。索努说：“大部分

民众支持我们。”这个破坏性的运动将人民抛进集中营，过着悲惨的生活，而回到村庄的民众也不敢回村，大部分住在森林中，因为政府军警暴徒的抢劫、杀人和强奸仍在持续。

那么党怎么做？

2006年1月，一个具体的反击“和平行动”的计划开始执行了。政府把“和平行动”宣传成一场民众独立的自发的运动，一次民主革命，但是党通过开展反击“和平行动”的行动，揭穿了政府的虚假宣传。这场战斗是为了原住民的生存。党号召群众为了生存参加民兵组织。作为其中的一部分，科亚·邦卡尔民兵组织成立于2006年，于当年2月10日举行仪式，把这与1910年邦卡尔起义联系起来。根据党的说法，成千上万的民众加入民兵组织，为他们的生存与“和平行动”开展斗争。“人民、解放军、党、群众组织、各种运动形成了一个总的大运动，在国内和国际上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党将此归功于国内的民主力量。”他们估计，和平行动在2006年5-6月停止了。

据索努说，“和平行动”是政府发起的，旨在于掠夺这一地区的自然资源。随着人民党在2004年执政，到2005年已经签署了几百个协议。例如在恰蒂斯加尔，德克萨斯电力公司已经投资了500亿卢比。在罗汉迪古答，塔塔公司已经获得了大量的土地，在金达莱集团在班西也是如此。最终，这将威胁土著社区的生存，这是过去经验证明的，比如1970年政府引入日本企业开采拜拉迪拉矿山，结果是日本公司获得了利润，而土著群落的生存环境却受到了损害。政府这一掠夺自然资源的政策是萦绕在土著社区的最大威胁。“曼莫汉·辛格称毛主义者最大的威胁，但是真正面临威胁的是原住民。”这就是为什么这么多民众反抗和平行动。事实上，远到那加兰邦和米佐拉姆邦的民众都在抗议政府将他们的部队部署到这片地区。

2009年十月，政府终于公开声明废止“和平行动”。然而根据党的说法，“和平行动”只是战争的第一阶段，虽然这运动失败了，但是“政府马上开始动员其镇压性力量，对人民掀起了另一波更加强大的攻势，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绿色狩猎行动”。在“和平行动”期间，政府部署了18000-20000名部队。而今天，有超过二十万部队已被集结来对付毛主义者。所以“绿色狩猎行动”只不过是“和平行动”的进一步扩大。此外，这样的运动不仅仅针对丹达卡兰亚地区，也针对比哈尔邦，奥里萨邦和贾坎德邦。

索努说：“整个原住民地区被矿藏和自然资源环绕着，虽然这片区域被外界称作‘红色走廊’，实际上是一个资源走廊。他们（政府）感觉受到了崛起的人民力量的威胁，因此，他们正在发动了一次又一次攻势。和平行动失败了，现在我们看到绿色狩猎行动又来了。总结一下，白色恐怖开始于1990-1991年，那之后我们决定成立人民政府，紧接着是在1997年第二次白色恐怖。这之后，我们巩固了革命人民委员会，形成了人民政权的具体形式。然后是和平行动，自那时以来，我们逐渐形成了各级的政府权力机关，通过这些年的发展，在军事上，我们的规模已经从排级扩充到连级，并正朝着营级的规模发展。”

革命人民委员会

2001年，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提出了建设人民军队和根据地的主张。经过详细的考虑后，党决定建立游击根据地。用索努的话来说：“2001年，经过充分讨论，第一个根据地开始建设。人民政权拥有了具体的形式——革命人民委员会（RPC），每个革命人民委员会的辖区根据当地地形和人口进行划分，辖区内有500到3000名村民。人们认识到，没有人民军队，就无法保护人民的权力，人民军队和人民政权是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进步的认识，对人民军队和人民政权的发展有着很大的帮助。每个分区有2到3个据点，10-12个据点组成游击根据地。MAAD地区成为中央游击根据地。”

“游击区”和“游击根据地”并不是只有字面上的区别，还有实际意义的区别。在游击区内一些区域，仍然存在政府的军事力量，这些地方的控制权经常易手，但是游击区内另外一些地区，这些地方被毛主义者武装完全控制，党可以不受干扰的开展工作。这些很难进入和被渗透的地区就是“根据地”，革命人民委员会就设立在这些区域，这可以看作解放区的雏形。

第一步是创建村级的革命人民委员会，最多可以由15个村庄组成。第二步是在每个地区的根据地创建地区革命人民委员会（ARPC），每个ARPC由3-5个RPC组成。2004年的12月，他们建立了第一个ARPC，到了2005年2月，第二个ARPC形成了。从2005年开始，直到2008年ARPC覆盖了所有据点。党决定在每个分区建立最少一个ARPC，目前还在建设中。为了加速这一过程，他们建立了分区的政权筹备委员会，第一个分区政府成立于2007年3月。在起步阶段，游击根据地对应的是排级的武装力量。现在，随着分区政权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连级规模的武装。随着军队规模的增加，营级的武装正在形成。2009年8月10日他们成立了第一个营。

在村一级政权，每个成年村民都参与管理。在更高层级的RPC，就由各村选取代表参加。同样，ARPC由低一级的RPC选出的代表组成，分区革命人民委员会也是如此。考虑到该地区的部落民对这种政权组织形式比较陌生，党在2008年2月举办了一次交流会，党的干部和民众自由的交流经验和观点，据索努说这是极富有成效的。另一方面，由于较高级别的人民政权的建立，党积极号召民众抵制政府的议会选举。比如党号召民众抵制2008年11月的恰蒂斯加尔议会选举，以及在2009年4月的第15次人民院（下议院）选举和2009年10月马哈拉施特拉邦议会选举。所有的RPC在村庄举行公共会议，告诉村民们，他们已经选举了自己的政府，因此不能同时再选举另一个政府。

政府的军事部队，在过去选举期间被部署在选区，威胁群众投票，但是现在被人民解放游击队和民兵有效地阻止了。在整个游击区只有2-5%的投票率。例如，在戈贡达，有700选民，却有1000准军事部队驻扎在那。尽管政府精心安排，但只有10人投票，即使第三次重新投票也是如此。

在吸收人员方面，人民解放游击队从2001年来一直在进行招募活动。不同的是，2005年后，招募工作已经移交给RPC。现在人民政府要对人民军队负责了。RPC鼓励人们加入人民军队。我们被告知，例如，在2008年12月，在甘加卢地区ARPC在两地举行了两次集会，有一万多村民参加。ARPC的主席迪亚斯号召人民加入人民解放游击队。集会后，有107名青年自愿加入人民解放游

击军和党，其中的 65 人通过筛选被吸收进来。

现在推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是人民政府的责任了。RPC 最初有 7 个部门，后来增加了工贸部和公共关系部。为了确保妇女参与人民政府，设定的目标是政府女性成员要达到 50%，这个目标还没有达到，现在女性干部据说占 40% 左右。其中一个问题是，和党或人民解放游击军的专职工作不同，在政府工作的女性往往还要做家务。除非男性分担这些家务，否则妇女很难承担行政工作。

人民政府开设了流动学校和流动医疗站。令我感兴趣的是政府是如何解决医院和医生缺乏的问题。有人告诉我，他们在游击区内举办了培训班，向 RPC 的学员提供基本的医疗培训。由于疟疾、霍乱和象皮病是三个当地主要的疾病，医生向学员讲解了这些病的症状，并把相应的药物配发给他们，每种药物都有不同的颜色，这样，受过培训的医疗人员就可以向病人提供一些治疗。

“这些‘赤脚医生’不会把这些药物混淆吗？”“不能保证这种情况不会发生。但我们可以通过加强培训或让几个赤脚医生一起诊断来降低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

到目前为止，流动学校是设在营地里的，每一个地方的学生一次上 15 到 20 天课程，这取决于当地局势的紧张程度。每门课 90 分钟，一天 4 门课。大概有 25-30 个学生和 3 个老师。他们已经开始使用一些教学设备，比如在上历史和科学课的时候会播放 CD 影片，他们通过播放影片的方式展示生物进化，日月食的发生等现象。但在教授科学课程的过程中，他们遇到了一个问题，他们教授的有关进化论，宇宙，太阳，月亮等等的知识与当地的民间信仰起了冲突。教育部门利用一切可利用的资源，努力应对教学的挑战。

革命人民委员会是如何运转的？

创建一个政权是一回事，运作它则是另一回事。人们告诉我，RPC 的选举每三年举行一次，由这些 RPC 再选举 ARPC 的成员。平均每 15 个 RPC 组成一个 ARPC。RPC 举行全体会议，审查和讨论政府工作报告。同样，ARPC 举行包括所有 RPC 的扩大会议，讨论工作报告，如果有需要，RPC 和 ARPC 可以召回任何官员。但我想知道 ARPC 的预算是怎么样的。在我们所在的地区，有 14 个 RPC，每个 RPC 有大约 160 户居民，因此在 ARPC 大约有三千多个家庭。在 ARPC 有 15 个成员。一个女同志尼蒂是委员会成员，西弗纳特是主席，巴尔马蒂是副主席。财政部的负责人是纳雷什，苏希拉是公关部部长和党的地区委员会成员。每个 ARPC 有常务委员会，主席、副主席、财政部以及武装部的负责人是成员。我要求看 2009 年的预算。是这个样子：

收入方面，2009 年一共收入 1010000 卢比。其中 360000 卢比是承包商缴纳的税收，500000 卢比由上级政府拨派，250000 卢比由该地区家庭缴纳。在支出方面，预算显示，他们花了 506935 卢比，军事、农业的花费一共是 140250 卢比，卫生事业花费 100000 卢比，10000 卢比用在了教育事业，贸易方面是 60000 卢比，公共关系是 5000 卢比。我问，为什么军事支出这么高而教育支出这么少？尼蒂解释说，自 2004 以来，人民政府开始承担为人民解放游击军和民兵提供装备（三件制服、油、肥皂、牙膏、肥皂、梳子、火药、弓箭、和食品）的责任。那么教育支出呢？西弗纳特说支出少只是因为他们这里没有薪水

很高的“大师”，因此人员费用很低。教学人员都是党的干部，工资很少，开支主要用于维持学校运转。我问他们，我是否可以看一下在农业领域的开支细节。农业支出主要是发展渔业，收购农作物、种子，以及木瓜、芒果、番石榴、柠檬等水果。政府收购农民产品，部分转售出去，部分赈济贫民，政府也购买渔业用具、种子，用于发展养殖业（这个 ARPC 有四口用于养殖的池塘和 7 口井），和为买不起种子的农民提供种子。

ARPC 也有司法部门。他们平时要处理一些什么事情？主要是家庭成员之间的土地纠纷，特别是兄弟之间。过去，弟弟分得的土地比哥哥少，女人也比男人少，现在不这样了。RPC 推行平等原则，同时他们也处理一些破除迷信的事情。

司法部门遇到的一件棘手的案件是三名商人被杀害的事件。这三名商人随身带了 20000 卢比，失踪了。一开始这起失踪的案件被提交到当地政府警察局。但是警察无所作为，于是失踪商人的家人找到了 RPC。三个月后，他们的遗体被发现。司法部调查后发现，他们是被抢劫后杀害的，尽管流言说他们是被野兽袭击致死的。嫌犯被带到人民法院审判，有 1500 人出席，其中 115 人是遇难者家属。遇难者的家人想杀死罪犯。但经过协商，他们最后要求罪犯赔偿 60 只牛犊，40 只山羊，15 头猪，20 只鸡，300 公斤大米。罪犯最后支付了 80000 卢比赔偿金，死者的遗骨被交给了受害者的家属，进行了安葬。我问为什么对罪犯如此宽大，有人告诉我，80000 卢比在森林地区是一个巨大的数额，而且罪犯家庭越富有，支付的罚金越高，假如富裕的农民要支付 20000 卢比，中间阶层就支付 15000 卢比，而穷人只支付 10000 卢比。此外，他们说，他们的宪法并不采取以命抵命的原则。他们的宪法第 5 条（h）说：“人民法院遵循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根据司法程序进行工作。司法部门帮助解决人民群众的问题，通常并不采用惩罚手段。但是地主，僧侣，统治阶级的党派首领，政府官员、警察、武警、军队、警察、阴谋者、破坏者、骗子、暴徒、盗贼、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类似的人，将被区别对待，进行惩罚，惩罚行为包括没收他们的财产等。要通过群众来遏制犯罪行为。那些犯下反革命罪行的人会被判处死刑，在实施死刑之前，地方人民政府必须得到高级法院的许可。除了反革命罪，犯下蓄意谋杀，谋杀未遂，对妇女施暴等罪行的人将被送进劳改营。在这些营地里，他们被强制劳动，还被要求学习政治理论。当然司法部门在进行审决时也会顾及当地的传统风俗。

第五条（i）说：“每一个案件都必须由法官进行表决，判决必须依据多数人的意见做出。即便只是轻微多数。但是重要的案件的判决必须有三分之二的多数。由司法部委员会主席或主审法官宣布判决。他们必须给予必要的解释。”

因此，与批评者认为毛主义者喜欢滥杀相反，他们是只保留了“反革命罪”的死刑。“反革命罪”是什么意思？从我所了解到的这是一种极严重的罪行，如给政府部队带路，伏击游击部队，导致有人员牺牲，这可以招致死刑。不是每个告密者甚至杀人犯都会判处死刑。我曾多次被告知，死刑是罕见的，在判死刑之前会至少会有好几次警告。即使这样，即便是法律上允许他们判某人死刑，除非得到更高级部门的批准，往往要上到邦或分区一级司法部门的批

准，否则仍然不会判决死刑。这是为了进一步核实事实，制衡权力的滥用。

战争动员

尽管我很熟悉毛主义者把政治工作当作“人民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的说法，但是在讨论的过程中，这种“政治性”才清晰起来。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的谈话转向了一些由他们完成的令人瞩目的行动。我问了他们在奥里萨邦讷亚格尔的行动，总书记说：“军事行动只是行动的一部分。在这之前我们已经在有关地区做了8至9个月的政治工作。几个月来，党员在讷亚格尔的群众中工作，建立他们的信心，让他们组织起来。政治动员是成功的，但是军事上并不太成功的。比如，他们的目的是袭击政府军械库，获得武器，但是他们低估了军械库的武器数量，根据侦查他们原来预计军械库里面有400-500件武器和30000-40000串子弹，而实际上军械库有1200件武器和超过100000串弹药。结果是，预先准备的突袭力量不足以完成任务。同样原先计划是在晚上行动，游击队员必须保持隐蔽。而实际行动的时间较晚，结束时已经到了早上，而且有居民看到了游击队的撤退方向。最后他们只能携带300件武器和50000串子弹离开。然而，行动总体是成功，那是因为毛主义者成功进行了政治动员，使得其影响力扩展到一个新的地区。这里的关键是，要让每一个军事行动都能扩大党的政治影响力。政治工作这是一个方面，但是还有其它方面。

当我参观巴斯塔的时候人们告诉我，人民政府开始试验合作农业，这是增强“人民经济”的一个方向。应该记住的是，人民战争不只是军事行动。它最主要的是非军事工作。毛主义者组织民兵进行经济生产，来满足个人生活需求以及战争补给。因此从事生产活动也是人民战争的内在组成。这是必须仔细理解的，否则人们可能会误解，把人民战争和国家军事化混淆在一起。

如上所述，人民战争也意味着调动资源进行发展经济民生事业，如教育，医疗，给饥寒的民众分发粮食和衣服等。人民政府给民众分发种子，提供农业信贷，还进行了土地改革，我记得2007年7月在《人民进行曲》的增刊上记录了在恰蒂斯加尔邦丹特瓦达地区巴伊拉姆加的土地改革运动，那里是“和平行动”的主要中心，人民政府夺取了地主的768亩土地分给农民，这些村庄分别是：塔基洛德、萨特瓦、达摩、贝尔纳、普索尔、尼勒姆、皮迪亚科特、波利瓦亚、帕利亚、科坦卡、帕克利、马卡帕尔、欧利萨普拉和欧西亚。因此，党对民众支持自己很有信心，因为经历过土改的民众，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会保卫这个成果，组织起来抵抗政府。巴斯塔地区的农村，经历了五年“和平行动”的破坏，但是毛主义者运动没有被削弱反而增强了，这就是明证。在这样的背景下，他们在人民政权区域内引进了合作农场模式，以发展的观点来看，这比土地改革更高了一个层次。

村民在革命人民委员会提倡下清理出一块属于革命人民委员会的土地。村民抽出时间在这片土地上劳作，然后分享收获。合作农场是一种实践，最终将导向集体农业，这种模式下所有土地将归革命人民委员会所有。村户一起耕种，共同收获。大约两年前MAAD地区就引入了这种制度。在一个这样的合作农场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绿辣椒，在种植蔬菜的土地上，有四分之一面积种植了辣椒，其余土地上种植了八角、洋葱、茄子、丝瓜、手指饼、花菜、香

蕉、玉米、菠菜、西红柿和冬瓜等……我问种植这些需要多少劳动投入。人们回答首先需要 28 个农民一个工作日来清理土地，然后附近村里的每户人家都出一个人来播下种子，接着每八天需要有两个人来浇一次水，最后每一天都要有人轮流站岗防止野生动物毁坏农场。

农业专家纳辛哈向我展示了一块水稻田。那是一块一英亩半的土地。谷物已经成熟，过几天，村民们将要来收割。他认为这可以使他们自给自足，减少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更重要的是在需要的时候，政府要给民众提供食物。这样的农场的收成是如何分配的？“收成根据阶层来分配，首先分给贫农，然后其他阶层。”蔬菜是供村民自己消费还是用于在市场交易？“原先我们计划在集市出售部分蔬菜，但市场已经转移到了政府的营地，所以已经无法出售了。所以，菜地可能要改成稻田了。”

让我引用一下 2009 年 MAAD 地区某个革命人民委员会的农业部门有关作物产量的记录：

水稻：产量共 2610 公斤，面积三英亩，收获花费 60 人两个工作日

干豆：15 公斤，半英亩。收获花费三人一个工作日。

查夫里（蔬菜）：30 公斤当作种子，100 公斤用于消费。

巴尔巴蒂（蔬菜）：半英亩，26 公斤，收获花费一人一个工作日。

芥末：半亩种植 150 公斤。收获花费三个工作日，人数不知

油菜：138 公斤，三亩土地，花费 10 个劳动力

芝麻：15 公斤，不到半英亩的土地，花费 2 个人劳动力

南瓜：100 公斤，三英亩

红薯：300 公斤

番茄：40 公斤

黄瓜：200 公斤

茄子：20 公斤

玉米：870 公斤。

赖哈德干豆：10 公斤

菠菜：10 公斤

甘薯：15 公斤

谷物被存储起来以度过夏季，或者分发给穷人。2009 年 MAAD 地区的杜姆纳革命人民委员会将 817.5 公斤稻谷发给了 10 个村的 109 名村民，这个革命人民委员会在季风期又分发了 243 公斤谷物。2009 年他们还提供了 622.5 公斤稻谷给维达梅塔的革命人民委员会。

人民政权区域内有多少这样的农场吗？我无法找到这个数据，但近两年来这样的农场正在在每个村庄和地区的革命人民委员会下推广，因此，数量不会少。在 MAAD 我被告知每个革命人民委员会辖区内至少有一个这样的合作农场，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更多。但是我遇到的都是成功的例子，也肯定有失败的实践吧？答案是，没有一个合作农场是失败的。但我想，几年以后，我们就会知道这个势头能否一直保持。不管怎样，这些农场在保证粮食安全方面将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党员在讨论中指出巴斯塔土壤较贫瘠，需要化肥来改良，或许这有助于加快农业发展步伐，以满足战争中可能出现的

粮食短缺现象。

我需要一些答案。

我们谈到党反对印度政府的强制迁移居民，掠夺土地的政策，这使我自然的提出了一个问题，既然这里资源丰富，那么毫无疑问采矿业终究要发展起来，因此，如果他们反对企业的土地掠夺行为，那他们是不是也反对工业化呢？

正因为如此，拉朱说：“我们很快就会出台自己的矿业政策。”

那么他们的矿业政策的要点是什么？

这得等 RPC 正式发布才能知道，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印度政府现在规定的企业为开采铁矿石所支付的费用太低了，根据品位，开采每吨铁矿石，企业仅支付政府 10 到 50 卢比，而在国际市场，铁矿石价格每吨已超过 10000 卢比。他提到了一本在恰蒂斯加尔邦出版的小册子，那里面着重指出了政府偏袒外国和国内大企业的不公平政策。他说，印度国营铁矿公司供应日本的铁矿石价格是 400 卢比每吨，本地制造商购买铁矿石的价格是 5800 卢比每吨。恰蒂斯加尔邦工厂的工人已经举行过示威游行，要求雇主施压政府改变铁矿石的价格歧视政策，增加工人的工资。

根据拉朱的说法，党坚决反对把采矿权租赁给跨国企业，也反对将矿产出口而不是供国内产业使用。他说，采矿业应该进行严格的管制。

那么规模生产，能源节约和生态恢复这些问题怎么办？“所有这些问题都将得到解决，我们党并不反对在当地发展工业。”我问他这是否意味着党会把矿山租赁给国内私人企业，如果这样的话，这些企业要遵守什么样的标准，做出什么样的保证？拉朱微笑地说，我必须耐心等待细则出台。

虽然我会等待，但是，党已经意识到向公众推出自己的矿业政策的重要性，这就够了。他们似乎已经考虑过这件事。拉朱说，党不反对工业化，但他们坚决反对大工业，他们认为，应优先考虑发展森林制造业如余甘子，竹子、木材等。

另一个困扰我的问题是，党从哪获得财源来满足上述这些所有要求？

他们给了我一份文件，题为“我们的财政政策”，上面这么写道：

“我们主要有三种资源用于满足经济需要。一是党费和人民的捐献，二是没收敌人的财产收入，三是在游击区和根据地按照累进制征收的税收。目前，通过我们自己生产获得的收入还不是主要的收入来源（重点补充）。这只有在根据地建设完成之后才能实现。

我们的收入来源是有限的，但我们的区域正在扩大。战争的强度正在增加，而运动的地域正在扩大。所以我们的需求和支出也在增加。不同地区的收入不同，因为这些地区的运动发展程度也不同，这是自然的。事实上，我们的收入并没有开支增长的快。因此，我们有必要努力实现收支平衡。

要实现上述平衡，满足不断增长的军事和政治工作的开支，以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就必须增加财源，同时规范支出。因此，实行集中的财政政策和计划是十分必要的。这意味着所有的收入和支出都应该纳入统一的计划，财政政策和计划需要各级政府严格执行。

尽管实行了集中的财政政策，但要在印度次大陆这样广阔的地域内进行革

命战争，财政上依然捉襟见肘。而要进行持久的人民战争，实现各区域自给自足也是十分重要的。在实施统一的财政政策时，我们必须考虑到上述所说的因素。因此，只有一方面努力让各地区自给自足，另一方面又能正确地实施统一的财政政策，才能有效地满足战争的需要。为此，国家和区域委员会应该在计划、资金筹措和支出管理中发挥关键作用。”

这是就党的财政政策，我想知道他们一年的财政收入是多少？是印度政府声称的 140 亿卢比？拉朱笑说如果有这么多，他们能够做更多的事情。事实上，如果在和平环境，而且他们能够实现各种建设计划，那有确实可能达到这个数字。大多数的财政收入来自烟叶，山竹，罗望子等森林产品的专利费。依靠抢劫银行或没收财产是远远不够的。他们也对一些在“游击区”内的公司或承包商征税。印度官方称这是一种勒索，而他们称之为税。这种争论总没有结果的，他们的收入来自本地而不是外部，因此印度政府也被迫承认。

还值得一提的是，党三十年不断的干预带来了工资的明显变化，最直接的表现是民众采摘/收集烟叶，山竹和罗望子获得的报酬的显著上涨，因此党对民众的征税并不是很重的负担。有一些未经证实的传言或许可以帮助我们估计他们从鱼类养殖业获得的收入，据说南丹特瓦达的一个革命人民委员会从养殖业获得了 500000 卢比！这可能意味着其他革命人民委员会也或多会少也有这样的收入？而在我所在的地区革命人民委员会，来自养殖的收入却不到 100000 卢比，看起来在整个地域内各革命人民委员会的收入不是平均分布的，但是肯定都有收入。这和市场流通也有关系。由于战争封锁，许多本来可以在集市上出售获得收入的商品现在只能内部消费，这肯定影响了人民政府的收入。

我被告知，因为购买和运输纸张现在已经比较困难，所以人民政府正在考虑建设一个造纸厂以满足其需要。纸张原料比如竹子和水在这个地区是很丰富的，他们可以不用或者较少使用漂白剂，唯一的困难是电力的缺乏。如果他们能够确保电力供应或通过建造小水电（技术上不是问题，建设也不困难）发电，这个问题也能克服。他们的这种创新，进取的精神让人印象深刻。

一次匆忙的会面

当我从 MAAD 地区返回，我遇到了负责文化工作的伦杰同志和歌舞艺术团的领导成员 尚德吕。我读过《人民进行曲》几年前对伦杰同志的采访记录，他们现在有一系列活动要参与，因此我们交谈的时间很短暂。我问他自上次采访（2006 年 8 月-9 月）后这里的情况发生了什么变化。他告诉我，自那以后他们的党员人数已经超过了 10000 人。他说他们当前一件主要的任务是撰写丹达卡兰亚特区三十年文化事业的历史。他们的工作涉及文学、艺术、音乐和舞蹈。他们的成员在过去两年里创作了 204 首歌曲。“Jhankar”杂志是他们自己写的故事。他们既可以在街头，也可以在舞台进行表演。我问他们这些歌曲的主题？主题主要是宣传革命，讽刺政府，提倡辩证唯物主义，反对“和平行动”等等，他们采用传统乐器以及其它乐器，还使用“kikirh”，这个乐器类似早期的小提琴。他们自己制作音乐磁带，还有一个流动的编辑站。但他说，那次采访中他所说的大部分情况目前仍然是有效的。以下摘录有关内容：

“我们培训艺术团的所有成员。从 10 岁儿童到老人都是艺术团的成员。我

们正在尝试教儿童有利于培养科学思维的简单歌曲和舞蹈。但是我们更专注于训练年轻男性和女性。我们目前面临着严峻的安全形势，尤其是在加德奇罗利（马哈拉施特拉邦），训练是一个大问题。我们去村庄，动员村民参加艺术团。我们根据人们的工作安排，制定 4、5 天或 2 天的计划。我们和他们一起参加生产工作并给他们培训。我们并不会一口气教他们许多歌曲，舞蹈，乐器。我们每次教一首歌或一个舞蹈或一种乐器。我们根据他们的天赋，兴趣和学习能力来进行教学。这带来了很好的成果。有些时候也作为训练的一部分，我们也教他们写歌。比如在 2002 年我们在南部巴斯塔举办五天的训练营。我们专注于鼓励他们创作歌曲，这里的人都擅长即兴演唱。

丹达卡兰亚特区的乐器非常古老。他们有 18 种乐器。现在只有少数还在使用。我们使用这些老乐器和一些现代乐器。乐器的重要性不可低估。我们把各种乐器组合起来，根据表演的需要使用现代和当地的乐器。我们最常用的是‘Dappi’（一种打击乐器）和‘Melam’（一种管乐器）……

Jhankar（艺术团杂志）是 1994 年七八月开办的……在杂志上人们使用冈德语、印地语、马拉地语，孟加拉语，泰卢固语，这是 Jhankar 的一大特点。他们用各种能够表达自己的语言写作。在丹达卡兰亚从事运动的人们，来自不同地区和民族，有原住民、非原住民，孟加拉人、泰卢固人、马拉地人和奥里亚人等。所以 Jhankar 是一个多语言杂志。我们要让作者不仅出自民众，也出自干部……他们在歌曲中很好的表现了他们面对的问题，情感，痛苦，欢乐……文艺团成员现在也在学习读写。我们正在校对和发表他们的作品。在这方面也有一些不足，因为我们不能完全专注于新作家的写作，并帮助他们提高……”

但有一件事我强烈的想问他，就是党内讨论的要使用冈德字母的事。我们被告知，目前他们使用梵文字母书写印地语和冈德语。然而，现在他们认为必须单独发明一套字母来表达冈德语。“为什么？”扬·米尔达问道，他说自己的母语瑞典语使用罗马字母，只另外增加了三个字母。通过保留通用的字母，有利于进行跨文化的交流和学习。如果瑞典单独使用一套字母，可能导致孤立隔离。我同意他。但我们被告知，这可能是事实，但是片面的。因为现有的字母无法发出很多冈德语的发音，如“gh”或“sh”。因此，如果人们有自己的一套字母，能够表达出他们语言的语音语调，那么他们会更加容易学习。这会不会使人们无法进行跨文化的沟通？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对错；而在于外界对毛主义者军事化和暴力化的刻板印像，与那些从事各种文化、经济，政治和社会事务的毛主义者的真实形象并不相符。

我相信什么？

我的总体印象是什么？我怎么看待丹达卡兰亚丛林的毛主义运动？

我相信，这场战争和印度政府在过去 63 年中所进行的任何其他战争都不同。这场战争将前所未有的考验印度政府的忍耐力。因为民众是在自己的土地上为了他们的土地、森林、水、矿物不被掠夺而战斗，他们深信他们有另一个愿景，不只是为自己，为原住民，也为了整个的印度人民。当某些人感受到命运召唤他们去解放自己，并激励其他人团结在他们周围，效仿他们，这样就会

产生巨大的力量。

虽然在印度没有哪个运动有这么大影响力，但是有关这场运动的著作却很少，赞扬这场运动的更少，多的只是污蔑中伤。我们这些抱有“平等与自由”理念的人，看到毛主义者带来的令人瞩目的进步以及展现的“为人民服务”的卓越精神，应该由衷的感到欣喜。他们不是圣人，当然更不是罪人，但他们作为凡人，向我们展现了坚韧不拔的努力可以给社会带来怎样的转变。批评者可以发现并且放大他们的缺点，统治者可以尝试消灭他们，但是不可否认，他们扎根于民众中，穷苦人相信他们，因此他们不仅生存了下来，而且政治影响力在扩大。不仅毛主义者在争取民众，民众也在寻找毛主义者，请他们到新的地区，帮助他们进行日常的斗争。

因此，我认为即便他们遭遇了挫折甚至失去根据地，这场运动也不会被消灭。我认为，即便政府将他们从一个地方驱逐出去，他们也能够其他地方扎根。他们不是仅仅关注于当下，而是着眼于 50-60 年的长期发展。他们只是暂时在这里停留。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

所以，人们不应该贬低他们的成就。当学者和活动家谈论替代发展的模式的时候，毛主义者已经在几百万的印度人中实践了三十年。他们不仅发展农业，进行社会和经济改革，革新社会习俗，还要进行自己的工业化，发展矿业……是的，考虑到印度的广阔，这只是很小的成就。但是，有没有其他的政治组织取得了能和他们相提并论的成就？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无论我们在阅读某个材料文件或进行对话时，他们总是谈及自己的缺点和失误。虽然我认为他们是诚实的，但我相信这些缺点不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夸张。让我惊讶的是，在其他地方人们往往喜欢吹嘘自己的成就，但在这里，党取得了很大成就却很谦虚。他们总是不断地谈论他们所面对的问题或者需要改进的地方。例如，我问他们为什么有关他们运动的书面材料比如游记，报道，文献这么少？只有很少几本印地语的书籍，而且是从泰卢固语、旁遮普语翻译过来的，目前虽然已经出版了一本英语和印地语的小册子介绍党在丹达卡兰亚丛林的工作，但仍然不够。P·尚卡尔的作品《这片森林属于我们》需要更新，因为它是 1997 年用泰卢固语写的，后来被翻译成印地语。不知怎的，他们的回答是没有时间这样做。

为什么？难道他们不知道他们的诋毁者正在利用这点污蔑他们？

在“和平行动”初期，当他们被指责带来“白色恐怖”时，他们曾经加大过宣传。那时候他们被指控阻止原住民采摘烟叶。而真相是，“我们只是反对政府公布的不到 50 卢比一捆的收购价格，私人承包商的收购价格是其两倍。那时我们意识到一些知识分子不加分辨的听信‘和平行动’者污蔑我们的话，并以此指责我们。”但是他们为什么不宣传他们的成就？在这里，他们实践了“替代”发展，促进了土著社会的经济，卫生、教育和语言的发展（发明了新的字母），保护了部落文化……他们为什么不宣传一些他们在这里的工作？除了腼腆的微笑，我得不到满意的答案。

我自己的理解是，丹达卡兰亚丛林多年来一直被视为安得拉邦运动的附属。当它扎根下来，人民政权开始巩固的时候，已经近二十年过去了，直到千年之交，他们才开始邀请作家访问和写作。与此同时的是毛主义者政党的成立

和活跃，以及安得拉邦运动的挫折。

值得注意的是，在丹达卡兰亚丛林，党坚定的依靠贫穷的原住民和妇女。紧紧扎根于地方的战略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优势，而印度政府对此却长期视而不见。就资源利用效率而言——印度政府每拨一卢比，只有 0.12 卢比能到达民众手中，而在这里，几乎每一分钱都服务于人民——党员和解放游击军节俭的生活，团结一致的精神，为人民服务的承诺和决心，使得他们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没有调查他们在利用资源时，是否讨论了公平和效率的问题，但很明显的，他们强调物尽其用。每一张废纸，每块废料都会被反复利用。生活是清苦的，斯巴达式的。而党也面临越来越多的问题：一方面是政府的包围和进攻，另一方面人员和物资不断受到损失。

然而，问题是，虽然他们面临这些问题，但是他们也夸大了自己的不足。例如，如果读一读党的整改文件，就可以发现这里面他们引用的大多数例子都是来自丹达卡兰亚以外的地区，主要是安得拉邦。让我举例说明：

(a) 在一些地区，地主的土地被分给农民，但是由于政府的镇压，这些土地闲置了下来；地主想要卖出这些土地，而富农和中农则买入这些土地。在这样的情况下，党应该动员拥有这些土地的贫农去阻止地主，富农和中农买卖这些土地，而实际情况是几个班的战士自己前去殴打威胁这些买卖土地的富农和中农。

(b) 在根除不良习惯例如饮酒的运动中，不懂得教育民众，缺乏长远的意识；在阻止酿造酒类时，不是团结民众尤其是妇女，而是使用武力，滥用肉体惩罚。

(c) 当男女之间出现问题，特别是婚姻问题时，做出评判的时候没有考虑到女性面临的社会问题。

(d) 在各种民众“村务委员会”中，遇到纠纷，往往不是听取双方的意见，从其他村民那了解信息，而是在宗派主义的影响下只听取一方的片面之词，并做出决断。

(e) 当群众中某些人犯了错误，当他们反对我们的群众组织，或当他们被怀疑是间谍，给予他们的惩罚远远超出合理范围……

就队伍规模而言，排连已经取代了班组，马上要发展到营级。在巴斯塔经历过土改的地区，地主被没收的土地被人民政府分发给贫穷的原住民。这与安得拉邦发生的情况相反。在安得拉邦，没收的土地被闲置，地主试图出售这些土地但是被游击队阻止。事实上在“和平行动”的顶峰时期，丹达卡兰亚地区的一些土地也是闲置的，但现在土著农民已经开始恢复耕种田地，撂荒的土地少了很多。在巴斯塔，人民政府提供信贷和种子给贫困农民，鼓励他们使用耕牛取代人力。此外，在丹达卡兰亚地区，已经没有商店出售烧酒，不过仍然允许酿造传统酒类。因此，曾经在安得拉邦运动初期动员妇女反对饮用烧酒的方法，在这里已经不需要了。发生醉酒的情况已经减少了很多。而处罚也不超过人们所犯下的错。事实上，人们都很骄傲，普通的犯罪行为减少了。最后，一个土著同志说：“不像这里，安得拉邦的党员已经有些懒散了。这是真的。”他说在丹达卡兰亚地区，“我们自己做所有的工作，我们自己去集市购买和运输补给。在安得拉邦，他们使用手机下订单，然后物资将由拖拉机或吉普车送

达。”他说这样做非常容易暴露。

这些整改文件中所提到的事是不是都在暗指安得拉邦运动中出现的問題，提醒这里的干部吸取教训？我认为就是这样。事实上正是党在丹达卡兰亚的影响力和民众的信任，使得在罗汉迪古答，无论印共（马）的地方领导人如何诋毁毛主义者，威胁支持毛主义者的民众，仍然无法让许多农民向塔塔公司出售他们的土地。这是印共（马）态度的一个很大的转变，直到最近，印共（马）总书记 B·巴丹谈到“绿色狩猎行动”时，还认为这场运动是要消灭“共产主义者”和“所有举着红旗的人”。

从这可以看出，在巴斯塔毛主义者被视为唯一为原住民的利益而斗争的力量。虽然并没有毛主义者支持率的具体数字，但是在民众眼中，只有他们才是受民众信赖和认可的。从民众的角度看，腐败的政府林业部被赶走，开展提高工资的斗争，进行土地改革，扎根于贫穷和最受压迫的民众尤其是妇女当中，与他们一起斗争……这样就可以意识到为什么毛主义者被原住民视为一体。值得注意的是，城市知识分子对毛主义者的污蔑和中伤，最早来自于部分原住民，他们是过去在他们同胞当中拥有特权的群体，在 30 年毛主义运动中已经被边缘化。这不是说，原住民被夹在政府和毛主义者之间难以抉择，特别是，毛主义者自己也是原住民！所以指责毛主义者是“外来人”的观点是荒谬的，反而政府的安全部队，政府官僚，警察，企业老板却都是来自外部……

一个不断被提出的问题是，他们打算如何把毛主义者运动从森林中的根据地，扩展到外面的世界？

在我们的采访中，总书记说，这“无疑是我们面前的一个挑战，但我们有信心，虽然短期内这个目标可能难以达到，但长期来看，我们拥有优势。敌人想要在短期内结束战争，但我们想延长它，逐渐形成对革命有利的形势。”从这我得出，他们希望迅速扩大这场加诸他们身上的战争。在“一月觉醒”和“和平行动”期间，他们认识到，只要他们能够保护他们的核心组织，那么无论在这里承受多大的损失，他们都能够在其他地区重新发展起来。这种观点是符合实际的吗？他们在《印度革命的战略与策略》中写到，无论各国的革命战争的具体形式如何不同，本质总是一样的，即通过武装革命夺取政权，但这么说是一回事，如何做到又是另一回事。

让我解释这点。我认为关于暴力和非暴力的争论是没有意义的。我捍卫人民武装反抗政府的权利，因为为了反抗压迫，任何方式都是合理的。我还认为，除非民众有武装，否则就没有办法阻止统治阶级通过对民众使用暴力而攫取利益。我们应该知道，据国际轻武器网统计，在印度，估计存在四千万件私人武器。[9]难道需要什么复杂的思考才可以得出，这些数千万的武器，大多属于那些拥有权力和特权的阶层？这就是现实，不厌其烦的提倡非暴力的印度政府，无论从装备还是军队数量来看，都是一个武装到牙齿的政府。强大的武力和法律的掩护使得统治阶级能够实施慢性“种族灭绝”政策。刺耳的话，但不一定是错误的，如果你意识到 6 岁以下的儿童 45%患有营养不良，发育迟缓，但是只要把卡路里摄入标准从 2400 降到 1500-1800，在统计上就可以大幅减少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民众的数量，从而减少成千上万印度人的食品安全保障！这将把我们的民众带入灾难中。[10]那些认为暴力不会发挥作用或者没有价值的

观点，是完全错的。这倒不如告诉人民只要耐心等待，果子就会掉到他们的口袋里。这种精神可能令人感动，但经过 63 年的实践，那些相信这一切的人们已经变得绝望。别忘了，即使政府也不否认，毛主义者代表了“穷人中最贫穷的”。

关键是，只要政府垄断了暴力，他们就将奴役民众。自由是中产阶级的特权。劳动人民却饱受压迫；一旦他们成功动员了民众，并开始质疑不平等和不公正的制度，他们就成为国家压迫的目标。

当政府取缔一个政党，宣布他们的意识形态是非法的，不允许他们动员民众，宣传他们的政治观点，并动用大量军事力量进行镇压的时候，他们进行武装反抗是理所应当的。1971 年，当他们对政府还没有任何威胁的时候，政府就开展了“清除障碍”行动，部署了三个师 45000 名士兵的军队镇压他们，这表明任何试图将印度人民从压迫和剥削下解放出来的运动都将受到政府的强力镇压。因此，如果毛主义者没有拿起武器反抗，他们早就会被清除，很少有人会注意到他们，更别说哀悼他们。我不知道这么说是否合理，正是毛主义者的存在，使得印度政府内的改革者和许多持不同政见者能够对政府的政策拥有一定影响力。

尽管如此，但我不认为在印度任何一个地区推动社会转型都必须使用暴力。事实上在军事上，他们是弱小的，10000 解放游击军和 50000 民兵，只能发挥有限的军事能力。这也意味着他们必须更多的采用政治手段。武器只有在人的手中才会发挥作用。而且印度幅员辽阔，各地区差异很大。一些人口稠密地区的情况和毛主义者影响力较大的那些区域的情况并不相同。因此必须把这些差异考虑在内。

马克思说，革命时“当和平手段是可行的就不使用暴力，但是如果有必要就采取暴力手段”，他也没有意识到，也许这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两者的结合，毛主义者在尼泊尔就成功展示了这种方式。所以和平和暴力，哪个优先取决于具体情况。这也不仅仅取决于毛主义者，而主要取决于取缔毛主义者并要消灭他们的政府。

但要从森林的据点拓展到外面的平原地区，光靠军事胜利是不够的，关键在于政治。在一个地区适用的工作方法不一定在新的地区适用。因此我仍然对他们选择的道路持保留的态度。我还认为，一旦他们接触到印度其它地区的现实情况，他们将改变他们的方法和理论。当然现在争论这个问题为时过早，他们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但是他们已经深刻认识到，选择留在体制内斗争，就像其他左翼运动做的那样，是一条不归路，无法取得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对自己运动的评价是，尽管很弱小，但民众却仍然对这场运动抱有希望。他们抱着这种观点，因此他们相信这场斗争需要从长远角度来看待，成功或失败与否，只有将来才知道，现在是无法确定的。

所以可以肯定的是，毛主义者不会放弃他们为之奋斗半个世纪的的社会变革目标。有人开始鼓吹，毛主义者应该和平的实现国家和社会的转变，那么他们就必须说明印度的政治精英是否允许毛主义者公开的活动，而不是把他们视为威胁。同时，和平宣传是否只是一种策略，目的只是要消灭毛主义者，就像在 2004-2005 年安得拉邦发生的那样？事实上，毛主义者在恶劣的形势下，不

仅存活下来，而且巩固和扩大了自身的影响，他们的实践，让印度其它左派组织相形见绌。因此，相比于其它左派组织，毛主义者往往被放置在显微镜下观察。就像成功会带来仰慕者，部分的成功却会带来批评者，但是今天的批评者也可以成为明天的仰慕者。

尽管如此，他们将不得不找寻适合印度国情的道路。他们可以获得军事上的胜利，但革命的胜利最终要在政治战线上取得。而没有民主，就不能在二十一世纪的印度获得革命的胜利。民主不是一个策略问题，形式民主是不可取的，而实现真正的民主应该是所有革命的中心问题。但什么是“新”民主主义，仍有待观察，这是毛主义者真正面临的挑战。革命人民委员会是这种新民主主义制度的雏形，在这制度下的民众直接进行自我管理。这是一个进步。但是丹达卡兰亚地区有它的特殊性，几个世纪以来它都被印度政府排除在外。而在其他地方，他们必须知道，一百多年的斗争为已经为印度农村和城市的工人阶级赢得了各种自由和权利。这些自由和权利虽然已经写进了法律中，但是很多只是存在于纸面上。然而，如果毛主义者想要在他们目前还没有影响力的地区赢得这些劳动群众的支持，他们将不得不考虑到这些。那么他们将如何去做呢？印度中产阶级已经习惯了对一切事务进行公开辩论，并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党如何争取他们？当党的总书记说党需要在亿万民众中工作时，他意识到了这些实际情况吗？

因此，政治多元化和文化多样性一样，已成为印度的标志。那么，如果让毛主义者领导印度，他们可以接受和尊重政治多元化这个事实吗？人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期待改变，期待真正的民主。他们想要另一种民主模式，即毛主义者在自己的根据地展示的那种民主制度。然而，制度的优越性，并不能为他们的滥杀辩护，即便道歉也缺少说服力的。例如，科拉普地区工会领袖托马斯蒙达因为无视毛主义者的罢工要求，就被斩首，这样就很难赢得人们的支持。我知道在一场群众运动中或多或少总会出现一些错误和犯罪行为。然而，对我来说关键是，他们是否愿意从错误中吸取教训，并尽快改正他们的错误。不仅仅是因为暴力让我恶心，而且这些革命者犯下的罪行会丑化整个运动，让成千上万普通毛主义者干部的无私努力付诸东流，让那些对毛主义者有较高的道德标准的民众不再支持他们。

列宁曾写道：“革命不可能如特快列车般平稳地驶入车站。”但也不可能意味着回到从前。总书记在采访中告诉我们：“一般来说，民众和毛主义革命者不希望发生任何暴力行为或武装冲突。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们才拿起武器抵御敌人。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一场自卫战争。”是的，我同意他的说法。但是这面临着很大的风险。所有的游击战和反游击战中，战术错误会导致战略失败，而且，尽管印度大批民众反对，但政府对毛主义者的战争不会很快结束，因此，决不能把平民或非战斗人员当成暴力袭击的目标。正是因为革命是为了民众的生存，所以必须用纪律约束暴力。毛主义者通过勇气和无私已经唤起了这么多希望，他们前进的道路不能被这些纪律散漫的行为所阻碍。因此，除非党能够实践民主，解决政治发展不平衡问题，在他们的理念和实践之间搭建桥梁，并实现从丹达卡兰亚到其他地区的跨越，否则他们通过努力和牺牲所实现的给人民带来希望的社会变革，很可能会破灭。这对他们和印度人民

都是极其可悲的。

后记

我醒来时，月光照在我的脸上。这十五天旅程，每晚我们都看到月亮的变化。从新月到满月，两个星期即将结束。今晚将是满月。这是早上 3:30，我睡不着了，因为这是我们返回的日子。我感到沉重，我听到扬在我旁边翻了一下身。他问我：“有什么事吗？”我说，我睡不着。我在想我是否能够再见到他们。那时候这些年轻的男女还会在吗？那些和我们进行过坦诚的交谈，讨论和争辩的党员们，那时候还在吗？他说：“是的，与他们在一起的经历令人印象深刻，我被他们当成长辈看待，对于像我这样一个来自瑞典的人，这是很奇怪的感觉。”“但是听着，”他说，“尽管我因为太老或者不被允许可能无法再回来，但是你还可以回来。”我们坐着小声交谈。但是我的这种沉重感没有消失。所以当在“边界”告别的时候，尼蒂走过来对我说：“兄弟，今天你们离开，我很难受。”我说，我们也是如此。她说：“我们在谈论，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扬了，但是你会再次来，是不是？”我告诉她，相信我，我会尽一切努力再回来看看他们，我是认真的。如果有一天这些男女都悄无声息的死去，却没有人知晓和理解他们的理想和信念，那将是多么悲哀，所以应该让外面的人们了解，党对他们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他们拿起武器，他们取得了什么成就，他们因为什么而战斗，他们的梦想是什么。以及为什么我们不能辜负他们，为什么我们要抗议政府对他们（和我们）的生命的摧残。

【致谢：有许多人读过我的书稿，并分享他们的意见。伯纳德和苏曼托给出了细的书评，其他如沙米拉给出了较简略的评价。很多人没有把书稿寄回来，或许因为他们太喜欢它了。我也感谢我的同事以及朋友，我向他们分享我的感想，他们刨根究底的问题，帮助我整理了思绪。感谢我的孩子内哈和萨拉尔，以及前妻英格丽德对我的信任和鼓励，让我没有很多的负担。我向所有人表示衷心的感谢。特别是萨巴，她从始至终和我一起工作，尽管我们政治分歧很尖锐。前几天，我会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出门，当想起什么后又会在半夜回来叫醒她，当我想念那些同志，或是失眠的时候，她都一直陪在我身边……不用说，我个人承担这本著作和我本人“支持毛主义者”所带来的一切责任。】

2009年12月

注释：

[1]政府部队装备有轻型迫击炮、机枪、火箭筒、INSAS 步枪、FN35 和格洛克手枪，赫克勒-科赫 MP-5 机枪和卡尔古斯塔夫无后坐力狙击步枪……除此之外，他们有空军提供直升机在战区投送部队，进行空中监视……毛主义者声称他们拥有 INSAS 步枪、AK47 步枪、自动步枪和许多炸药。印度斯坦时报 2009 年 10 月 10 日。

[2]政府对纳萨尔派和毛主义者的镇压有着悠久的历史。比如警方自己承认 1970 年 3 月到 1971 年 8 月在加尔各答和郊区有 1783 名印共（马列）的支持者被杀。单 1971 年 8 月 21 日在加尔各答附近的伯勒讷格尔，就有 1000 名年轻人可能在一个地方被屠杀。到 1973 年，超过 32000 名印共（马列）的领导人，活动人士和支持者被判入狱。仅在西孟加拉就有 17787 名囚犯，其中有 12016 名年轻人，其中 1399 名在 18 岁以下。1970-1972 年，在监狱内发生了 20 起枪击纳萨尔派的事件。1970 年 12 月 17 日米德那波中央监狱的枪击事件造成 8 个囚犯死亡，60 人受伤，1971 年 2 月 21 日在北汉坡监狱的枪击事件造成 10 名囚犯死亡，62 人受伤，这是其中两起最严重的枪击事件。（摘自《低烈度冲突》，印共（毛）内部流通，出版时间地点不详）

[3]“很显然，镇压纳萨尔派的行动正在这些地区展开（东辛格布姆、西辛格布姆、昆蒂、古姆拉、波卡罗、吉里迪、恰特拉、拉特哈尔、兰姆伽和哈扎里巴）那里的村民反对政府发展钢铁业，采矿业，电力，修建水坝的计划……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所谓的‘绿色狩猎行动’或反纳萨尔行动与其说是为了清洗毛主义者，不如说是为了企业的利益掠夺原住民和其他当地居民的土地。看来，政府是打击在毛主义者的名义下为企业攫取利益，政府不是在创造和平，而是增加了国家的动荡。”（摘自《贾坎德邦人民阵线给中央内政部长奇丹巴拉姆的公开信》，日期 2010 年 3 月 19 日）

[4]是指新德里警方出示 2009 年 9 月 20 日的科巴德·甘迪案件记录，作为 2010 年 2 月 18 日庭审的依据。然而，这案卷记录是不准确，没有说服力，官员只是随意编造罪证，将犯罪意图强加到嫌犯身上。警方指控说：“高塔姆·纳夫拉卡先生非常支持印共（毛），科巴德·甘迪被逮捕前在新德里和孟买和他见过很多次面。高塔姆·纳夫拉卡在还德里的提哈尔监狱见过他。”“非常支持”和“见过很多次面”就被认为是“非法的”。换句话说，一旦你取缔了一个政党，禁止该政党传播其思想，以及宣布其为非法的恐怖组织，那么你可以将任何正常合法的行为认定为非法。如果法律说，与一个被取缔的组织成员进行会议，或者只是几个人的会面，都是非法的，那么他们就有理由剥夺一个人的自由。一个被取缔组织的成员是罪犯，因此和这些人交往也是非法的。这些法规增加了警察和检察官的权力，同时放视频那个了他们在收集、处理和使用证据的标准。

[5]让我举两个例子：2010 年 2 月 8 日最高法院要求莎布·索蒂等 12 名失踪的原住民于 2010 年 2 月 15 日出庭。这些原住民是 2009 年 10 月 1 日发生贡帕德村屠杀事件的受害者和证人。但是自 2010 年 1 月 2 日起莎布·索蒂就失踪了。在最高法院的命令下，她被恰蒂斯加尔邦警察带到德里，任何人包括律师都无法与她见面。等到法院下令她的律师可以在警察不在场的情况下与她见面的时候，她又一次失踪了。针对这一情况，2010 年 1 月 29 日法院下令，在 2010 年 2 月 15 日前必须将她和其他 11 个原住民带回到德里。然而，2 月 9 日最高法院获悉，其为了执行其命令，2 月 8 日晚一支 300 人的警察队伍在特警哈里·拉姆的带领下前往甘查帕利带回失踪的十二名原住民中的七人。2 月 9 日上午 5 时警察队伍到了廓尔喀村，他们遇到地雷袭击，特警哈里·拉姆失去了双腿，还有另一名人员受伤。然后警察遭到毛主义者的射击。在最高法院出示的传真说，甘查帕利是纳萨尔派的

活跃地带。由于没有媒体和社会人士被允许进入“战区”，因此这件事情没有其它途径的消息。然而，一个民权组织的调查小组发现，恰蒂斯加尔邦声称的二月九日两个特警被杀害是不真实的。这个小组在 2010 年 2 月 13 日拜访了贡帕德村，村民表示，没有这样的事件发生。反而在 2 月 10 日，警察和特警袭击了贡帕德附近的甘查帕利村，逮捕了 10 名村民，把他们带到多纳帕尔营地。村长普迪亚姆·拉克西迈亚告诉调查人员，卡迪蒂·穆塔亚（35）、卡迪蒂·文凯（25）、昆贾姆·维莱亚（35）、昆贾姆·奇拉凯亚（32）、帕里西·文凯（25）、帕里西·维莱亚（20）、万贾姆·达摩（34）、马迪维·艾迪玛（32）、波瓦西·艾迪玛（30）和索蒂·波迪亚（45）被特警和警察强行带走，至今没有消息。很明显，恰蒂斯加尔邦当局在内政部和各机构的纵容下竭尽全力阻止真相被揭开。这不是全部。2010 年 1 月 6 日一群社会活动家被 Maa Danteshawri Swabhiman Manch 成员阻止徒步前往丹特瓦达，这个活动由 Vanvasi Chetna Ashram 组织的。Maa Danteshawri Swabhiman Manch 组织的成员袭击了 VCA，把鸡蛋和石头扔向社会活动家，辱骂他们。这件事被媒体报道成原住民对有亲毛主义者倾向的社会活动家的示威。事实上，1 月 6 日对社会活动家的袭击是由索亚姆·穆卡领头的，而他是一名涉嫌在 2008 年 3 月轮奸原住民少女的逃犯。袭击社会活动家的事件就发生在恰蒂斯加尔邦警察的眼前，而他们声称无法追踪到这八名强奸犯。显而易见，国家机构和媒体宁愿包庇强奸犯，杀人犯和抢劫犯，也不让真相公之于众。他们刻意压制其它声音，不允许出现任何独立的观点，另一方面纵容强奸犯，杀人犯和抢劫犯，意图把这场“肮脏的战争”变成“警察行动”。

[6]南巴斯塔分区：Pituri（《起义》）；西巴斯塔分区：Midangur（《火种》）；达尔巴分区：Moyil Gudrum（《闪电》）；加德奇罗利南北分区：Poddhu（《太阳》）；MAAD 和北巴斯塔联合分区：Bhoomkal（《地震》）；东巴斯塔分区：Bhoomkal Sandesh（《起义消息》）除了人民政府出版了一本叫做 Janathana Raj（《人民的国家》），党也出版自己的杂志，叫作“viyukka”，其武装组织的杂志叫“padiyora”，还有艺术团的“Jhankar”等。组织民众练习唱歌也很常见。

[7]加木伊屠杀事件指 2 月 17 日在比哈尔邦加木伊地区普尔瓦利亚·科拉西村，有 12 名部落民包括妇女和儿童被杀害，还有 50 人受伤，据称是毛主义者所为。据报道这是毛主义者对二月 1 日八名干部被杀害的报复，这些毛主义者干部被警方逮捕和处决。

[8]2009 年 11 月 20 日，毛主义者武装人员在西印度的贾坎德邦的默诺赫尔布尔火车站附近造成塔塔比拉斯布尔客运列车脱轨，使得两人包括一名二岁儿童死亡，51 人受伤。据说这起脱轨事件源于十一月 19-20 日的罢工，根据当地的毛主义者领导人说，他们要求他们的一个被逮捕的领导人在法庭上出庭。据印共（毛）的比哈尔-贾坎德-奥里萨地区委员会书记萨马吉说，这起“失误”是由“过分热心的新兵”造成的。

[9]据估计，在南亚有约 7500 万的枪支，其中 6300 万是在平民手中。印度和巴基斯坦占了绝大部分（各占 4000 万和 2000 万），当地也生产枪支，而在尼泊尔和斯里兰卡还有 300 万件武器。该地区平民拥有的枪支远远多于军队，警察和武装分子。数据来源于轻武器国际行动网络 www.iansa.org/regions/scasia/scasia.htm。

[10]自由人民联盟的比纳亚克·森博士在阿里格尔穆斯林大学的 I·G·汗纪念仪式上所做的题为“我们时代的暴力与正义”的演讲。他说，对毛主义者的镇压只会恶化在部落地区民众的营养不良问题。据他说，营养不良问题应该是政府最为迫切关注的问题，一个人的身体质量指数低于 18.5 就是营养不良。根据国家营养监测局的统计，33%的印度成年人体质指数小于 18.5。如果再细分，超过 50%部落民众体质指数小于 18.5。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标准，一个社区如果超过 40%的人口体质指数未达到 18.5，那么它就处于饥荒状态。按这个标准，印度的许多社区都生活在一个饥荒的状态中。奥里萨邦，其 40%的人口营养不良，也符合这种情况。”

他强调，镇压毛主义者和迁移部落的军事行动只会使事情更糟。“政府将大量民众强制迁移出他们赖以生存的地方。而仅仅使用‘附带伤害’这种措辞，这是危险的。”

与同志们同行*

阿兰达蒂·洛伊
2010年3月19日



阿兰达蒂·洛伊在采访人民解放游击军战士



人民解放游击军战士

*本文由红色文献翻译组翻译，收录时在一些具体译法上对原文进行了修改。阿兰达蒂·洛伊，印度女作家和政治人物，被福布斯评为“全球30位女性典范”中的第二名，其自传体色彩浓厚的《微物之神》被认为是在《午夜的孩子》之后印度最杰出的文学作品，曾位列《纽约时报》畅销排行榜长达49周，被译成40种语言，出版600万册。在2010年的二月，阿兰达蒂·洛伊暗暗决定去拜访印度中部丹达卡兰亚森林的禁区，各种部落居民的家园，他们在那片禁区中拿着武器保卫他们的同胞，并反抗被政府支持的反动军阀和资本势力。她以详实的记载，记录了第一次与武装游击队及其家人、同志的对话，为此，她在森林中冒着风险逗留了几个星期。这篇文章于2010年3月19日星期五发表在德里的《瞭望》杂志上。卡萨玛计划呼吁，所有读者需密切关注并广泛传播这篇文章。

(一)

这个打印出的便条被装在一个密封的信函里，它被顺着我的门缝扔了进来。这封信中安排好了我与“印度最严重的国内威胁”会面，而他们的来信我已经等了好几个月了。

两天时间，任意四次机会，我可以到恰蒂斯加尔邦丹特瓦拉地区的丹提斯瓦里女神庙去会见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这是为了应对糟糕的天气、袭击、封锁、堵车和单纯的坏运气。纸条上写道：“你需要带着相机和椰子，额头点上提卡，接头人会拿着杯子，印地语的《瞭望》杂志和香蕉，接头暗号是：“Namashkar Gu-ruji”。Namashkar Gu-ruji，我在想，这个迎接我的人是不是觉得他自己会碰见一个男人，那样的话，我就应考虑是否需要给自己带上小胡子了。

描述丹特瓦拉的方式有许多，就像一个矛盾修辞法。丹特瓦拉是坐落于印度中部的一座边陲小镇，丹特瓦拉是战争的中心，丹特瓦拉是一个黑白颠倒无比荒诞的小镇。

在丹特瓦拉，警察身着便衣，反叛者却穿着制服；狱警身在监狱，囚犯却无法无天（两年前，三百名囚犯从旧镇监狱逃跑）；被强奸的妇女遭到警方的拘留，强奸犯却在闹市摇唇鼓舌。

穿过印德拉瓦提河，警察将被毛主义者控制的区域称为“巴基斯坦”。这里的村庄空无人烟，但丛林里却熙熙攘攘；本该在学校的孩子无人照看；在美丽的丛林村庄里，混凝土校舍要么被炸得七零八落，要么到处是警察。这场正在丛林中进行的残酷战争既令印度政府引以为豪又令其羞于启齿。

绿色狩猎行动在被宣布的同时又被否认，印度的内政部长 P·奇丹巴拉姆，同时也是这场战争的首席执行官，宣称这次行动并不存在，只是媒体的编造。但无数被分配的资金，成千上万为此调动的军队又恰恰说明其中有鬼。战争尽管发生在印度中心的丛林中，但仍会给我们所有人带来严重的灾难。

如果幽灵是业已逝去的某人某物的游荡魂灵，那么穿过森林的新四车道高速公路可能就是幽灵的对立面。这大概就是一种前兆吧。

森林里的对手在各方面都是天差地别的，一方面是有着狂妄自大的新兴大国的资金，火力，媒体支持的准军事部队。

另一方面是得到了严密组织且斗志高昂的毛主义游击队，和受到他们支持的那些手持传统武器的当地居民。毛主义游击队有着非同寻常的武装割据历史，它们与准军事部队是老对手，他们在之前就有过多次交锋：五十年代在特伦甘纳邦；六十年代在西孟加拉邦、比哈尔邦和安得拉邦的斯里卡库兰县；七十年代又在安得拉邦和比哈尔邦；八十年代至今一直在马哈拉施特拉邦。

他们对彼此的战法知之甚详，更仔细研究过对方的作战手册。毛主义者（或者他们的前身）尽管似乎每一次都被击败乃至被彻底地消灭，可每一次又能东山再起且以比以往更加严密的组织，更加坚定的决心，以及更具影响力的面貌出现。如今，起义再一次席卷了恰蒂斯加尔邦、恰尔肯德邦、奥里萨邦和西孟加拉邦的那富含矿藏的森林。那个既是上百万印度部落民的家园，也是商界梦寐以求的原料产地的地区。

自由主义者很容易相信一场战争正发生在丛林里，这是印度政府与毛主义

者之间展开的战争。而毛主义者则宣称选举是骗局，议会是猪圈，要推翻印度政府。让人忘记印度中部部落民的反抗比毛主义者要早好几个世纪是很容易的（这当然不言自明，没有部落民的反抗，毛主义者也没有存在的基础）。特霍人、奥朗人、科尔人、桑塔尔人、蒙达斯人和冈德人在之前都多次进行过对抗英国人、地主和放贷人的起义。起义被残酷镇压，成千上万的人被屠戮，但人民从未被征服。甚至，独立之后，在西孟加拉邦的纳萨尔巴里，部落民仍是第一次毛派起义的后盾（这就是纳萨尔派分子这个同等于毛派分子的词语的来源）。自从那时纳萨尔巴里政治就不可避免地 与部落民起义交织在一起，这就是二者之间的关系。

这一源自之前起义的遗产创造的愤慨人民被印度政府故意孤立和边缘化。印度宪法，这一印度民主的根基于 1950 年被采用，对部落民来说却如同晴天霹雳，因为它批准了殖民政策并且通过了国家是部落领地的保管人的决议。短短一晚，部落民拥有的土地被变为非法占有，部落民的传统的森林生产权利被否认，他们全部的生活方式都定为犯罪。作为投票权的交换，宪法剥夺了他们生存和拥有尊严的权利。

最近，内政部长表示了他的“担忧”。他表示，他不希望部落民生活在落后的文化中。然而，作为一个代表主要的几个矿业公司利益的律师，似乎部落民的福祉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不那么重要。因此，探寻他焦虑的原因可能会是一个好办法，一个搞清为何印度政府会如此对待部落民的好办法。

过去的五年左右时间里，恰蒂斯加尔邦、恰尔肯德邦、奥里萨邦和西孟加拉邦的政府与一些大企业秘密签署了数百份总价值高达价值数百亿美元的备忘录，这些谅解备忘录都是与钢铁厂、钢铁加工厂、发电厂、铝精炼厂、水坝和矿厂签订的。为了使这些条约变成真正的财富，部落民必须离开他们的家园。

于是，战争来临了。

当一个自称民主的国家发动了一场内战，会是什么情况呢？反对派是否仍有机会，或者说它是否该有机会呢？毛主义者是什么样的人呢？他们只是一群虚无主义者，一群把过时的意识形态强加给部落民，然后煽动部落民进行无望起义的虚无主义者吗？他们从过去的经验中学习到了什么？武装斗争本质上是不民主的吗？普通的部落民是夹在政府和毛主义者中间的所谓“三明治”吗？当毛主义者和部落民这两个概念被创造出来时是互相完全独立的吗？他们的利益一致吗？他们从彼此身上有何借鉴呢？他们是否对彼此有所改变呢？

在我离开的前一天，我的母亲打电话过来，在电话中，我感觉她十分疲惫。“我一直在想，”她凭借一种母亲式的奇特直觉说，“这个国家需要一场革命。”

一篇网络文章说，摩萨德正在用目标暗杀技术训练三十名高级警官，然后让他们刺杀毛主义领袖，以使毛主义组织陷入混乱。据媒体报道，有很多从以色列进口的装备将被或已被投入使用，其中包括：激光测距仪，热成像装备，以及深受美军欢迎的无人机。这些装备都是对付穷人的绝佳武器。

从赖布尔到丹特瓦拉，穿越“毛主义温床”大概需要十个小时的车程。“毛主义温床”并不是随意创造的称谓，温床是滋生疾病与害虫的，而疾病必须被治愈，害虫必须被消灭，毛主义必须被根除。通过这种春秋笔法，我们已

经接受了这种种族灭绝的词汇。

为了保护高速公路，安全部队对一条狭窄林带的两侧进行了“安保”，进一步说，这就好像是英属印度时期的达达艺术展（译注：达达艺术，1916-1924年在欧美许多城市兴起的一种虚无主义艺术运动。是战后欧洲一些年轻的艺术家厌倦战争、彷徨、失望以及在艺术上否定理性和传统文化、崇拜虚无主义的精神产物。其创作方法主要通过照片剪接或与纸片、抹布拼贴，去追求艺术表现的偶然性。作品怪诞奇特，令人惊惑不解）。

在赖布尔的郊区，一个巨大的广告牌上写着的是吠檀多（我们的那位内政部长曾经与之合作）癌症医院的广告。在开采铝土矿的奥里萨邦，吠檀多正在资助一所大学。矿业公司们就这样以一种渐进温和的方式，在我们的脑海中变成了新的形象——一个温和负责的巨人。这叫企业社会责任，它使矿业公司像传奇演员、前首席部长或者南达默里·塔拉卡·拉马·拉奥，那个经常在同一部有关泰卢固神话的电影里既唱红脸又唱白脸的家伙。企业社会责任遮盖了支撑印度矿业部门的反常经济状况。比如最近洛卡尤塔报告组织对卡纳塔克邦的报告显示，私营企业每开采一吨铁矿石，政府就能得到 27 卢比的矿区土地使用费，而矿业公司能得到 5000 卢比。在铝土矿和铝矿部门，这个数字会更加令人瞠目结舌。这数十亿美元的公然抢劫，用于贿赂选举，贿赂政府，贿赂法官、电视媒体、非政府组织以及广告商是绰绰有余的。那么，那些比比皆是的吠檀多临时癌症医院到底是什么呢？

我不记得我看见过吠檀多集团的名字在恰蒂斯加尔邦政府签署的备忘录上，但我十分怀疑每个有癌症医院的地方都一定会有一座平顶的铝土矿山。

我们路过卡恩凯尔，它因丛林反恐作战学院而出名，它的创立者 B·K·庞瓦尔准将，肩负着将腐败、懒散的警察变为丛林突击队员（就像把稻草变成黄金）。“要用游击队打败游击队”，这是作战学院的座右铭，它被刻在了一块石头上。

学校教学员奔袭、爬行、登降直升机、骑马（出于某些原因）、生食以及丛林求生。准将以能训练流浪狗打击“恐怖分子”而自豪。每六周就有八百名警察从于作战训练学院毕业。全印度计划建立二十所类似的学校，警察力量正逐渐转变为一支正规部队（在克什米尔，情况正好相反，那里的军队正在变为一支臃肿的行政警察力量）。但无论如何，人民都是他们的敌人。

夜深了，杰格德尔布尔也进入了梦乡，但许多画着拉胡尔·甘地的广告牌仍在向着人们招手，邀请人们加入青年国大党。在最近的两个月里，拉胡尔·甘地去了巴斯塔两次，但却从未透露过有关战争的事宜。可能对于人民的王子而言，插手此事会十分难办，他的媒体经理们一定也决心对此只字不提。事实上，由立法会议员马亨德拉·卡尔马发起的和平行动组织，也称“净化狩猎”，这个由政府资助的恐怖组织，这个曾犯下多起强奸、屠杀、毁烧村落以及将成千上位的人赶出家园的始作俑者，可并没有在关于拉胡尔·甘地的精心宣传中占有多少笔墨。

女游击队员在后方看守着一年一度的地震节（Bhumkal，指纪念在 1910 年，于今日恰蒂斯加尔邦附近发生的原住民反抗英国殖民者的起义，也是印度烈度最强，规模最大的起义）大餐。

我准时到达了丹提斯瓦里的神庙赴会。我带了相机和一个小椰子，在前额上点了一个粉末状的红色提卡。我那时候想，会不会有人正在看着我哈哈大笑。几分钟内，一个男青年靠近了我，他带着一顶帽子，背着双肩包，指甲上有红色的指甲油，没有印地语的《瞭望》杂志，也没有香蕉。“你是那个要跟我来的人么？”没有 Namashkar Guruji，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张湿漉漉的纸条，并把它交给了我，上面写着：“找不到《瞭望》杂志。”

“那香蕉呢？”

“我吃了。”他说，“饿了。”

他可真是个安全威胁。

他的背包上写着查理·布朗——不是画了个史努比。他说他叫曼图。我很快了解到在我即将要去的丹达卡兰亚森林里，人们都有着多个姓名或身份。这对于我来说是一种欣慰——暂时成为别人而不用受困于自己的身份，这将是多美好的一件事啊。

我们走到了距离神庙只有几步路的公交车站，那里已经人满为患了。有两个人骑着摩托车，电光火石之间，在沉默中只是一个确认彼此的眼神，一次重心的转移，随后是引擎的加速，我不知道我们要去哪里。我们穿过警司的房子，我之所以认识他是因为我上次拜访过那里。他是一个坦诚的人，他说：“坦白说，女士，这个问题我们的警察或者军队都解决不了，真正的问题在于那些部落民不知道什么是欲望。除非他们变得贪图享乐，否则我们是没有任何希望的。我跟我的上司说过，撤走军队，给每个人家里装上一台电视，所有问题都会自动解决的。”

不到一会，我们就开出了镇子，而且没有人跟着。这条路很长，我估计起码要骑三个小时。行程在一个偏僻的地方突然中断了，空荡荡的道路两旁是森林。曼图和我下了车，摩托随后开走了。我拿上我的背包跟着这个小“内部安全威胁”进了森林。那是晴朗的一天，阳光从林间倾撒而下，森林的地表披上了金色的外衣。

过了一会，我们出现在了一条平坦宽阔的河流边上，河岸的沙土呈白色。很明显，这是季风造成的。河床几乎变成了一片沙地，只有在中央有一条小溪，河水仅仅有脚踝深，很容易就能蹚过去。穿过小溪就是“巴基斯坦”（毛主义者占领区），“女士，”那位坦率的警司说，“我们的孩子在外面开枪杀人。”在我们渡河时，我想起了这句话。我发现我和领路人正在警察的瞄准中——在他们视野中的小小人影儿，很容易瞄准。但是曼图似乎毫不担心，而我从他身上也找到了这种自信。

在河岸的另一边，禅杜正在等着我们，他穿着打着好立克广告的淡绿色衬衫，那是一个稍微年长一点的“安全威胁”，大概二十岁。他对我露出了灿烂的微笑，并递给我了一辆自行车，一个装有开水的汽油桶，和许多袋葡萄糖饼干，这些是来自印共（毛）的礼物。我和小“安全威胁”喘了口气，再次启程。原来自行车只是一个障眼法，在我们真正的路线里完全用不上自行车。我们爬上陡峭的山丘，又顺着松动的岩架沿着岩石小径向下。当他骑不下去的时候，禅杜就把自行车举过头顶，举重若轻。我开始对他身上那股傻乎乎农村男孩气质感到怀疑。我发现（虽然那是很久之后了）他几乎可以运用所有武

器，“除了轻机枪！”他骄傲地告诉我。

三个裹着头巾，头上插着花，醉醺醺的帅气男性和我们一道走了半个小时，直到我们分开。日落时分，从他们的背包里传出了打鸣的声音。原来，他们在包里装了公鸡，本来是要带到市场上去买的，可惜没有卖掉。

黑暗似乎并没有影响禅杜的视觉，但我必须用火炬了。林里的昆虫们开始鸣叫，鸣叫声很快汇聚成了交响乐，我们被这美妙的声音笼罩着。我想仰望星空，但并不敢，我必须紧盯着地面，一步一步地小心着走。

我听见了犬吠声，但我不知道它距我到底有多远。地形变得平坦了，我偷偷地看了天空一眼，这让我心醉神迷。我希望很快就能到。“快了。”禅杜说，结果过了一个多小时，我终于看见了一些大树的轮廓——我们到了。

村子的面积似乎十分广阔，每座房子之间间隔很远。我们进入的房子十分漂亮。那里生了一团火，更多的人坐在外面，在黑暗中，我数不清有多少人，只是刚刚能看见罢了。周围响起窸窣窸窣的低语。“红色敬礼，同志。”“敬礼。”我说。我实在太累了。女主人让我进屋并且给我做了用四季豆烹制的咖喱鸡和红米饭，美味极了。她的孩子在我身边睡着了，银制的脚镯在火苗的跳动中闪烁着点点银光。

晚饭过后，我拉开我的睡袋。有一个奇怪的声音传来。原来，有人把收音机放到了我的睡袋里，它正在播放 BBC 印地语台。英国圣公会已经从吠檀多集团的奈彦吉利山项目中撤资，理由是环境以及对东加里空部落权利的侵犯。我能听到牛铃声，鼻息，脚步声和牛喘气的声音。岁月静好啊，我闭上眼睛沉沉地睡去。

五点钟，我们起床了。在几个小时后我们穿过了另一条河，徒步走过一些美丽的村子。每个村子都有一排罗望子树守望着村庄，一如高大、仁慈的神灵。多么美丽的巴斯塔罗望子树。到了十一点，太阳高悬，步行已经失去了乐趣，我在一个村庄里停下来吃饭。

禅杜似乎认识房主人——一个美丽的小姑娘，她和禅杜打情骂俏。禅杜看上去有点害羞，也许是在旁边的原因。午饭是生木瓜配木豆，红米饭以及红辣椒粉。我们要等到太阳不再那么毒辣的时候再出发。我们在凉亭里小憩了一会，这个地方有一种特别的美感，每一件景物都泾渭分明而又不可或缺，没有任何画蛇添足。一只黑母鸡在矮泥墙上踱步，竹方格稳定着茅草屋的椽子，并兼作储物架。这里有一把扫帚，两只鼓，一个芦苇编制的篮子，一把坏了伞，一堆被压平的空瓦楞纸箱。有个东西吸引了我的注意，我需要我的眼镜。我看见，箱子上面印着：标准功率 90 高能乳化炸药（2 级）SD CAT ZZ。

我们在两点继续出发。在我们要去的村子里，我们会见到一个女同志，她知道下一个目的地在哪而禅杜不知道。这里也有信息经济，没有人无所不知。但当我们到达村落的时候，那个女同志并不在这，这里没有她的消息。我头一次看见禅杜脸上笼罩着阴霾，我心中也是阴云密布的，我不知道他们的交流系统是什么样的，万一出了什么差错呢。

我们停在一座废弃的教学楼外，在离村落的不远的地方。为什么这些政府的村庄学校就像一个个独立的堡垒呢？为什么每所学校都给窗户安上了铁栅栏，装上了滑动折叠钢门？为什么不是像普通的村落一样用泥和茅草搭房子

呢？那是因为这些学校也用作兵营和仓库。“在阿布胡珈地区的村落里，”禅杜说，“像这样的学校……”他在地上拿树枝画了一个建筑平面图。三个八角形彼此连接在一起，形成了蜂巢状。“所以他们可以向任何方向开火。”他画了一个箭头来解释他的话，就像板球比赛里击球手的得分分析图（译注，指一种被用来分析击球手表现的图表，可以表现出击球手如何通过跑位得分，由多个箭头组成，形似作战地形图）。这些学校里都没有老师。他们都跑光了。你们把他们赶走了？不，我们只赶警察。那为什么教师会来到这里，来到丛林，他们明明坐在家里都能拿到工资。问得好。

他告诉我这是一片革命新区，毛主义者最近刚刚进入这里。

大概二十个年轻人到了这里，有男有女。禅杜解释说这是村一级的民兵，是毛派武装的最基本单位。我之前从未见过这样的人，他们穿着莎丽服，裹着头巾，还有一些人穿着磨损的橄榄绿迷彩服。男生们带着珠宝，帽子，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一把前装枪，被称为巴马尔，还有些人拿着砍刀，斧头和弓箭。

一个男孩带了一门土制迫击炮，用三英尺长的镀锌管制成，里面被塞满了火药和弹片，随时可以开火。它的噪声巨大，并且是一次性的。但这仍能吓到警察，他们咯咯地笑着说。

战争似乎不是他们最关心的事情，也许这是他们所在的区域在“和平行动”民兵组织的基地以外。他们刚刚完成了一天工作：帮忙在一些村社周围修建栅栏，让山羊无法进入农田，们十分欢乐并且充满好奇心，女孩们都很自信并且同男生相处的十分融洽。我对这样的事情很敏感，而且印象深刻。禅杜说他们的工作是巡逻并且保护周围的四五个村庄，并且在农田里帮闲，清理水井或者修理房屋——简而言之，就是做任何需要的事情。

仍然没有找到那个女同志。现在应该做什么？答案是什么也不做，只有在等待之余帮忙做个刀工。

在晚餐之后，所有人都静悄悄地排起了队，显然，我们要行进了。我们带上了所有的东西，包括大米，蔬菜和锅碗瓢盆，离开了学校并且列队走进了森林，在一个半小时之内到达了一处林间空地，并准备在此地休整。这里鸦雀无声。几分钟内，所有人都铺好了他们蓝色塑料布，这东西无处不在（没有它就没有革命）禅杜和曼图共用一张，他们分出了一张给我并且为我找到了最好的位置，靠着一块最舒适的灰色岩石。禅杜说他已经发信息给那位女同志了，如果她收到了那她明天一早就到这，如果她真的收到的话。

这是我睡过的最美的房间，宛如身处万千星辰化作的宫殿，周围是这些陌生却可爱的孩子，他们总是对新鲜事物报以强烈的好奇心。确切无疑，他们都是毛主义者，但他们都会死吗？等待他们的是丛林作战学校吗？还有还有武装直升机，热成像和激光测距仪吗？

为什么他们必须要死？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仅仅是为了把这一切都变成矿石？我仍然记得我当时访问奥里萨邦的基耶哈尔露天铁矿。那里也曾有一片郁郁葱葱的森林，也曾有这样天真烂漫的孩子。而如今只留给大地的只有一道鲜红的裂痕，以及直灌口鼻的红色尘土。红色的水，红色的空气，红色的人，他们肺被灌满了红色尘土，连头发也被染成了红色。日日夜夜，卡车一辆接着一辆地隆隆驶过村庄，成千上万的卡车将矿石运往帕拉迪普港，从而到达

中国。在那里，它会被变为汽车、烟雾和一夜之间突然出现的城市，变成让经济学家目瞪口呆的增长率。

除了一个半小时轮班一次的哨兵以外，所有人都入睡了。终于，我可以凝望星空了。我是在米那夏尔河的岸边长大的，过去我总是觉得在薄暮时分响起的蟋蟀声，是天上的星星迫不及待准备照耀大地的歌声。我惊讶于自己是多么热爱这里，在这世界上再也没有另一个地方能让我留下来。我今晚应该是谁？星空下的喀穆赖杜·瑞海儿？也许那个女同志明天会来。

他们下午早些时候到达了这里，我能从远处看见看见他们。他们中的十五个左右的人穿着橄榄绿的制服向我们跑来。即便距离很远，从他们奔跑的样子，我也能看出来他们是重要人物——人民解放游击军。热成像仪，激光瞄准步枪以及丛林作战学校都是为这些人准备的。他们携带着真正的利器，英萨斯步枪，SLR 步枪，还有两个人拿着 AK47。这个小队的领导是马德哈瓦同志，他来自安得拉邦的瓦朗加尔，九岁时就跟着印共了。他十分沮丧并且向我道歉，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说这其中出现了沟通失误，而这通常是不会发生的。我本该在第一天就到达主营地，有人在这场接力赛中把接力棒掉了，摩托车本来应该停另一个地方。“我们让你等了这么久，让你走了这么多，当听到你在这里的消息之后我们一路赶了过来。”我回答说没关系，我来的时候做好了去等，走走，去听的准备。他想让我们立刻离开，因为在营地的人都在焦急地等待。

走到营地花了几个小时。当我们到达时天更黑了。这里有数层哨兵以及成同心圆状巡逻的巡逻兵。这里得有上百个同志排成两列。每个人都手持武器。他们笑着，开始唱歌：“Lal lal salaam, lal lal salaam, aane vaaley saathiyon ko lal lal salaam（向到来的同志致以红色敬礼）。”歌声悦耳动人，就好像这是一首歌唱河水潺潺或林树花开的歌曲。伴随着这首歌，同志们交相庆贺，相互握手，握拳示意。人们彼此祝贺，低声说着：“Lal salaam, lal salaam, lal salaam……”除了一大片铺在地上的蓝色塑料布外，在大概十五英尺的范围内没有任何“营地”的痕迹。我的房间有一个塑料布的屋顶，这是用来过夜的。可能是因为对我步行一天的奖励，也可能是因为即将到来的一切而对我的照顾，或者两者皆有。无论如何这是我在整个旅途中最后一次拥有屋顶。在晚饭时我遇到了讷尔默达同志（她是原住民妇女革命组织的负责人同时正在被通缉悬赏）、人民解放游击军的撒萝雅同志（她刚刚和 SLR 步枪一样高）、梅斯同志（在冈德语里是黑姑娘的意思，同时她也在被悬赏）、萝比同志（技师）、拉朱同志（她是我刚刚穿越的那片分区的负责人）和维努同志【或者穆拉里、索努、苏希尔，想怎么叫都可以】，显然他是这些人中级别最高的，可能是中央委员会的成员甚至是政治局的。他们没说，我也不去问。在我们之间有人说冈德语、亥比语、泰卢固语、旁遮普语和马拉雅拉姆语，只有梅斯会说英语（所以我们都用印地语交流）。梅斯是一位体型高大又十分安静的同志，她似乎不善言辞。但从她拥抱我时的反应能看出她酷爱读书，并且想在丛林里有书可读。当她愿意向我敞开满载悲伤的心房时，会向我诉说她的故事的。

坏消息来了。送信的带着“饼干”来了。手写的字条被叠起来并钉成小方块，有整整一袋，像薯片一样，这是来自各处的消息。警察已经在翁戈纳尔村杀害了五个人，四个是民兵一个是普通村民，他们是：山都·波泰（25）、菲

奥洛·瓦迪（22）、坎德·波泰（22）、拉莫利·瓦迪（20）、达尔赛·科拉姆（22）。他们本可以住在昨晚的星空之下的。好消息来了，一支小型分遣队带着一个胖乎乎的男青年，他也穿着迷彩，但看上去是全新的。所有人都对他们表示了钦佩，并对这次合作表达了意见。那个男青年看上去既羞涩又开心，他是到森林里给同志们看病的医生，而距上一次医生拜访丹达卡兰亚森林已经过了很多年了。

收音机里播放着新闻，内容是内政部长同受“极左势力影响”的邦首席部长的有关战争事宜的会谈，恰尔肯德邦和比哈尔邦的首席部长故作姿态没有出席。所有坐在收音机旁边的人都笑了。选举前后，他们说，在竞选的过程中以及可能在邦政府组建一两个月之后，主流的政治家都会说类似于“纳萨尔派是我们的孩子”这样的话。你可以用表定个时，看看他们什么时候会改变想法，露出獠牙。

我被托付给卡姆拉同志。我被告知不能在不通知她的情况下离开自己的床铺哪怕五英尺，因为每个人都会在黑暗中失去方向感，然后彻底迷路（我没有叫醒过她，因为我睡的很死）。第二天早上，卡姆拉给了我一个被剪掉一只角的塑料袋。它曾经用来装阿比斯黄金精制大豆油。现在它是我的方便袋。在通往革命的路上什么也不能浪费。

（即便现在我也总是想着卡姆拉同志，她 17 岁，腰上总是别着一把土制的手枪。还有男孩们，他们的笑容多么灿烂。但如果她被警察碰到，她就会被处决，他们可能会先强奸她，而不会询问任何问题，因为她是一个“内部安全威胁”。）

（二）

吃过早饭后，我发现维努同志（穆拉里、索努、苏希尔）正等着我呢，他盘腿坐在蓝色塑料布上，看上去与一个瘦弱的乡村教师无异。我要去上历史课，或者更确切的说，是一次关于关于丹达卡兰亚森林过去三十年的历史课，这段历史一直持续至今日，并在今天的战争中达到高潮。当然，这只是党的一家之言，但是又有哪部历史不是这样的呢？无论如何，要对这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进行质疑、讨论，而不是仅仅被谎言蒙蔽（这正是正在发生的事情），就要将它公之于众。

维努同志总是那样平静，令人安心，他的声音温柔，在今后的日子里它总是在我完全失去信心的情况下出现。这个早晨他几乎毫不停歇地讲了几个小时的话，他像一个小商店的经理，拿着一大把钥匙，能打开迷宫般的储物柜，那里装满了故事、歌声和独到的见解。

维努同志隶属从戈达瓦里河到安得拉邦的七支武装中的一支，并且他早在三十年前的 1980 年六月就进入了丹达卡兰亚森林（党内称为 DK）。他是最早的四十九个人之一，他们是人民战争集团的成员，该组织是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分支，即最初的纳萨尔派。在康达帕利·西西拉马耶的领导下，人民战争集团在同年四月被宣布从印共（马列）脱离成为独立政党。他们决议要建立一支常备军，为此需要一个基地，丹达卡兰亚森林就将成为这样的基地。第一批小队被派遣至丹达卡兰亚森林，以勘察当地情况并开展建立游击

区的活动。关于共产党是否应当建立常备军，以及“人民军队”的概念是否存在矛盾的争论由来已久。人民战争集团建立军队的决定来自于其在安得拉邦的经历，在那里，“耕者有其田”的运动同地主爆发了冲突，并引来了警方的镇压，这让他们发现没有一支听党指挥的、素质过硬的军队就无法抵抗这种镇压。

【到 2004 年，人民战争集团融合了其他印共（马列）的分支，包括：党统一和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其活动在比哈尔邦和贾坎德邦的大部分地区，最终成为了今日的印度共产党（毛主义）】

丹达卡兰亚森林，用英国白人的话说，就是所谓的冈瓦纳的一部分，意思是冈德人的土地。今天，这座森林位于中央邦、恰蒂斯加尔邦、奥里萨邦、安得拉邦和马哈拉施特拉邦的交界，将一个麻烦的民族分成不同的行政区是他们的老把戏，但是毛主义者和毛主义冈德人可不管这些。他们脑海里的地图和这个完全不一样，就好像森林中的其他生物一样，他们有着自己的道路。对于他们而言，有道路不意味着顺路前进，反而意味着要跳过他们，否则，在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会被伏击。尽管冈德人（被分为科亚部落和多拉部落）是绝对多数，但也有一些其他部落的定居点。那些非部落民的社群、商人和定居者，住在森林的边缘地带，靠近道路和市场。

人民战争集团并非第一批进入丹达卡兰亚的思想传播者。1975 年著名的甘地主义者老爹安特在瓦罗拉开设了他的布道场和麻风病院；同时，罗摩克里希纳传教团也已经开始在阿卜胡马德的偏远森林里开办乡村学校；在北巴斯塔，巴巴·比哈里·达斯发起了一场极端运动，要“把部落带回印度教的怀抱”，其中包括诋毁部落文化，诱导自我厌恶，并带来了印度教的丰厚大礼——种姓制度。第一批改变信仰的人是那些乡绅和大地主，比如马亨德拉·卡尔马，那个和平行动民兵组织的建立者，被授予了杜维杰（即出生了两次的人）的地位的人，也就是婆罗门（当然这件事情肯定是一个骗局，因为没有人能变成婆罗门，如果他们能，我们现在就会有一个全是婆罗门的国家了）。但即使是这种冒牌的印度教也足够满足他们了，就好像饼干、肥皂、火柴和油等在村集市上出售的所有其他假货能满足村民一样。作为印度教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村子的名称也在土地记录中改变了，结果是大部分村子现在有两个名字，人和政府的名称也是一样。举个例子，英纳村被改为了钦纳里，选民名单上，部落民的名字被改成了印度名（马萨·卡尔马变成了马亨德拉·卡尔马）。而那些没有投入到印度教怀抱的人被称为“贱民”（意思是不可接触者），在这之后他们成为了毛主义者天然选民。

人民战争集团一开始在南巴斯塔和加德奇罗利地区活动。维努同志向我描述了他们刚到第一个月的一些细节：村民开始是如何不信任他们，不让他们进屋子，没有人给他们食物和水，警察传播谣言说他们是小偷，女性把他们的珠宝藏在木材炉的灰里，环境被搞得十分压抑。1980 年十一月，在加德奇罗利，警察对着村民议会开火，并且消灭了一整只小队，这是丹达卡兰亚第一次发生枪杀。这一次巨大的挫折，同志们被迫淌过戈达瓦里河撤回阿迪拉巴德。

但在 1981 年，他们又回来了。他们开始组织起部落民，使得部落民们在天度烟叶（译注：天度树又名科罗曼德尔乌木，是一种大型灌木，多见于奥里萨

邦的中西部)的交易中索取更高的价格(这些烟叶被用来制作卷烟)。那个时候,大概五十片一捆的烟叶商人只需付3派萨。将完全不熟悉这种政治的人组织起来,领导他们斗争是一项极为艰巨的任务。

最终,斗争成功了,价格翻了一倍,涨到了一捆6派萨。然而,对于党而言,他们真正成功的是向人们展示团结的价值和采取政治谈判的新方式。今天在多次的斗争和组织下,一捆天度烟叶的价格涨到了每捆1卢比(似乎以如此快的速度涨到这个价格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天度烟叶的交易额到达了数十万卢比)。每一个季度政府招标时都会允许承包商采集一定数量的天度烟叶,通常在1500到5000标准袋之间,这被称为玛纳克博拉斯,每一单位的玛纳克博拉斯有1000捆烟叶。

(当然没有办法确保那些承包商不会拿走比他们应得的更多的烟叶)当天度烟叶进入市场的时候是以千克为单位交易的,但随后狡猾的计算和称量系统将捆转化为玛纳克博拉斯,再变成千克,整个过程是控制在承包商手里的,而这就留下了操作空间,并且是最糟糕的那种。在最保守的估计下,每袋天度烟叶能盈利大约1100卢比(这还是在付给甲方每袋120卢比的情况下)。即使按照这种标准计算,一个小承包商(能采1500袋的那种)也能在每季度获利160万卢比,至于那些大承包商(能采5000袋的那种)的盈利则达到了550万卢比。

如果以现实标准估计那会是这个数量的几倍。同时,“最严重的内部安全威胁”们直到下个季度才勉强站稳脚跟。

我们被一阵笑声打断。尼勒什,一位人民解放游击军的年轻同志一边拍打着自己,一边快步走向炊事区,当他靠近时我看见他正拿着一个大个的红蚁巢,蚂蚁爬在他身上到处都是,咬着他的胳膊和脖子。尼勒什仍然在笑着。“你吃过红蚁甜酸酱么?”维努同志问我。我小的时候在喀拉拉邦就见过红蚁,我还被它们咬过,但是我从没有吃过(甜酸酱的味道居然还不错,味道很酸而且富含叶酸)。

尼勒什来自比贾布尔,那是和平行动的中心地带。尼勒什的弟弟加入了和平行动组织,参与了烧杀劫掠的活动,并成为了特种警察。他和他的母亲住在巴萨古达的营地,他的父亲拒绝同行并且留在了村庄里。事实上,这家人已经老死不相往来了。

后来,当有机会和他聊天的时候,我问尼勒什,为什么他的弟弟要做那些事情。“他那时候非常年轻,”尼勒什说,“他有了一个放纵自己的机会,一个烧杀抢掠的机会。结果他疯狂了,做了很多罪大恶极的事。现在他陷入了困境,他再也回不去村子里了,没有人会原谅他,他自己也知道。”

我们回到了历史课上。维努同志说,党的下一次斗争是对抗巴拉尔普尔的造纸厂。政府和塔帕尔财团签了45年的合同,以高额补贴开采15万竹子。(和铝土矿相比是九牛一毛,但也很高了)。每捆竹子会付给部落民10派萨,一捆竹子有20根(这和塔帕尔财团获得的利润是天壤之别)。在长期的组织和斗争后,部落民和造纸厂进行了公开谈判,让每捆竹子的价格翻了两番,到了40派萨。对于部落民而言,这是巨大的成就。其他政党也做了承诺,但都没有兑现。这时候,人们开始接近人民战争集团并且询问能否加入。

但是烟叶、竹子和其他森林特产的政治活动都是季节性的。真正长期的问题，以及人民痛苦的真正来源，是森林部门这个最大的地主。每个早晨，部门官员，甚至是他们中最年轻的会如同梦魇一般出现在村庄里，阻止人们耕作他们的土地，捡拾柴火，采摘叶子，收获水果，和放牧，简单来说就是阻止他们活下去。他们把大象带到杂草丛生的土地上，当它们经过的时候会洒下阿拉伯胶树的种子以此损毁土壤。人们会被殴打，逮捕，羞辱，他们的庄稼会被破坏。当然，从森林部门的观点来看，这些都是参与到违宪活动中的非法分子，并且森林部门是唯一一个贯彻法治的部门（至于他们对女性的性剥削只是他们自认为在艰难境遇中的一点小福利而已）。

人民对于这场斗争的参与使得印共更有底气，他们决定共同与森林部门进行斗争，这鼓励了人们占领森林并在此耕作的行动。森林部门为了报复，烧毁了在森林地区建立起来的新村庄。在 1986 年，政府宣布在比贾布尔建立一个国家公园，这意味着 60 个村庄将被驱逐，它们中超过一半已经迁出，当共产党进入的时候国家公园的基础设施建设已经开始，这让森林部门无法进入该区域。有几次，森林部门的官员被村民抓到，并被绑在树上殴打，这是对于几代以来剥削的宣泄性报复。最终，森林部门落荒而逃。在 1986 到 2000 年间，印共重新分配了三十万英亩的林地，维努同志说在丹达卡兰亚森林里再也没有无地的农民了。

对于今日的年轻一代而言，森林部门的记忆已经淡去，母亲讲故事讲给孩子，那是一个屈辱而饱受奴役到难以置信的过去。对于老一辈而言，从森林部门中解放意味着真正的自由。他们能触碰到它，品尝到它，甚至比印度独立的自由还要真实。他们开始团结在党的周围，并同党一起奋斗。

第七小队取得了很大进展。他们的影响现在遍布 6 万平方公里的森林中，成千上万的村庄里，和上百万的人民中间。

但是森林部门的离开只是警察来临的先兆，这引发了一轮流血事件——警察的伪装遭遇战和人民战争集团的伏击战。而伴随着土地再分配而来的是其他责任：灌溉、农业生产和人口增长导致的滥砍滥伐的问题。为此党决定将群众工作和军事工作分离。

今天，丹达卡兰亚森林被一个精心设计的人民政府管理着。它的组织原则来自于中国革命和越南战争。每个委员是由几个村子共同选出的，他们的人数在 500 到 5000 之间。它有九个部门：农业部、工商部、经济部、司法部、防卫部、卫生部、公共关系部和文化教育部，当然丛林是这一切赖以实现的前提。一组人民政府的委员隶属于区域委员会，三个区域委员会组成了一个区，在丹达卡兰亚森林有 10 个这样的区。

“我们现在有森林保护部门了。”维努同志说，“你一定知道政府报告里说纳萨尔地区的森林数量增长了吧？”讽刺的是，维努同志说，首先从党反抗森林部门斗争中获益的是那些乡绅——那群杜维杰。他们用他们的人力和资源，攫取了尽可能多的土地，并且进展十分顺利。后来，有人建议将党关注点放在他们的“内部矛盾”上，正如维努同志说的那样，当它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部落内部的公平、阶级和正义的问题上，大地主们感到大祸临头。随着党影响力的扩展，他们开始衰落，越来越多的人将问题诉诸党而非乡绅，旧的剥削

模式开始受到挑战。在第一个雨天，人们传统上应当去耕作乡绅的土地而不是他们自己的，这种形式不复存在了，他们再也不用上交第一天从马府油树上收获的作物或者其他林业产品。显然，有些事非做不可了。

马亨德拉·卡尔马是当地最大的地主之一，而且，在那个时候是印度“共产党”的成员。在 1990 年他联合了一群乡绅和地主开始了一场名为“民众觉醒”的运动。他们“唤醒”“民众”的方式就是组织一支狩猎队，搜林，杀人，烧屋和强奸。那时的中央邦政府（恰蒂斯加尔邦尚未被建立）给警察提供了援助。在马哈拉施特拉邦，也是类似的情况，所谓的“民主阵线”开始了它的暴行。人民战争以其真正的方式回应了暴行，他们处决了几个最臭名昭著的地主，在几个月后，一月觉醒计划——也就是白色恐怖（维努同志这样称呼它）消失了。1998 年，已经加入国大党的马亨德拉·卡尔马试图复兴“民众觉醒”运动，但这一次它失败得甚至比上一次还快。

然而随后，在 2005 年的夏天，他撞上了好运。四月，恰蒂斯加尔邦的人民党政府签署了两份谅解备忘录，计划建立综合性钢铁工厂（协议条款保密）。一个是在拜拉迪拉与埃萨钢铁进行的 7000 亿卢比的合作，另一个则是在罗汉迪古答与塔塔钢铁进行的 10000 亿卢比的合作。同月，曼莫汉·辛格总理做了最著名的声明，表示毛主义者成为了印度最严重的内部威胁（在这个时间点上说这样的话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因为事实恰恰相反，因为议会政府刚刚击败、削弱了毛主义者。他们损失了 1600 名干部，并且陷入了完全的混乱中）。总理的声明使得矿业公司的股票有了保障，同时也给媒体一个信号——任何人都能对毛主义者下手。在 2005 年六月，马亨德拉·卡尔马在库特罗村召开了一个乡绅之间的秘密会议，并宣布“和平行动”（净化狩猎）展开。这个有趣的名称混合了部落的质朴和杜维杰/纳粹情绪。

不像一月觉醒计划，和平行动是一个地毯式扫荡工作，目的是把人们从村庄转移到路边的营地，在那里，他们会被监控和管制。在军事上，这叫做战略村。它由哈罗德·布里格斯爵士将军于 1950 年提出，用于同马来亚共产党人的作战。布里格斯计划在印度军队中十分受欢迎，在那加兰邦、米佐拉姆邦和特伦甘纳邦都在采用。人民党恰蒂斯加尔邦政府的首席部长拉曼·辛格宣布，对于他的政府来说，没有搬进营地的居民都将被认定为毛主义者。所以在巴斯塔，对于一个普通村民而言，仅仅是待在家中，过着普通的生活也等同于参与了危险的恐怖活动。

作为特殊的招待，有人递给我一杯红茶和一副耳机，并打开了 MP3 播放器，这段嘈杂的录音记录了 D·S·曼哈尔先生（时任比贾布尔的警司）通过无线电通知他的下属关于国家和中央政府给予那些“觉醒”的村民们的奖励和鼓励措施。但是对于那些拒绝投降的村庄，他明确的指示应该将之烧毁，而想要报道纳萨尔派的记者应该被击毙（我很久之前在报纸上看到过这个，当事情败露，作为惩罚——谁也说不上来这是对谁的惩罚，警司的权力被移交给了国家人权委员会）。

和平行动组织焚烧的第一个村庄（在 2005 年 6 月 18 日）是阿姆贝利。在 2005 年的六月到 12 月之间，该组织对着南丹特瓦拉的村庄一路烧杀淫掠。他们的行动核心是比贾布尔和拜拉姆加尔地区，靠近拜拉迪拉地区，那里就是埃

萨钢铁提议建立新工厂的地方。无独有偶，这里恰好也是毛主义者的据点，革命人民委员会在这里做了许多工作，尤其是在建设灌溉设施上，革命人民委员会因此成为和平行动组织的重点目标，上百人被以最残忍的方式杀害。大约六万人迁入了营地，有些是自愿的，其他人则是出于恐惧。在这里面大概有 3000 人被任命为特种警察，每个月工资是 1500 卢比。

为了这点蝇头小利，像尼勒什弟弟这样的年轻人就把自己永远的关进了铁丝网的围栏里。尽管如此残忍，他们也可能成为这场残酷战争中最可悲的受害者，因为最高法院无法为他们的罪行提供豁免。

剩下的数十万人逃离了政府的监控。（但是这 644 个村庄的发展基金却没有，这些钱都去哪了？）他们中的许多人去了安得拉邦和奥里萨邦，他们通常在辣椒收获的季节里过去当合同工。但是还有上万人逃进了森林，无家可归，仅能在白天返回家园。

在和平行动的推动下，出现了一批警察局和营地，其目的是在毛主义者“缓慢再占领”的土地上建立地毯式安全，他们假设毛主义者不敢攻击如此大规模集中的安全部队。毛主义者意识到如果不打破这种地毯式安全，就等于放弃那些他们赢得了信任并与之生活，为之奋斗了二十五年的人民。为此，他们在安全网络的核心进行了一系列的反击。

2006 年 1 月 26 日，人民解放游击军进攻冈加拉乌尔的警察营地，并击毙七名警察；2006 年 7 月 17 日，击溃埃拉博的和平行动组织营地，击毙 20 人，击伤 150 人（你可能读到过：“毛主义武装袭击了省政府为因恐惧纳萨尔派而逃离村庄的村民设立的救济营地”）；2006 年 12 月 13 日，他们袭击巴萨古达的“救济”营地，并击毙 3 名特种检查和一名巡警。而在 2007 年 3 月 15 日，他们进行了最大胆的一次行动。

一百二十名解放游击军战士袭击了拉尼博蒂卡女士修行所，它已经变成了营房，其中屯驻着 80 名恰蒂斯加尔邦警察和特种警察，但那些女性旅客仍然以人肉盾牌的身份住在里面。人民解放游击军首先进入旅馆的院子，封锁了女性居住的建筑，随后袭击了营房。55 名警察和特种警察被击毙，没有女性受伤（丹特瓦拉的那位“公正”的警司曾给我看过他幻灯片里面的骇人照片，照片上是被烧焦且内脏被掏出的警察尸体以及被炸毁的校舍。这些恐怖的照片令人难以直视，而他看上去对我的反应十分满意）。

对拉尼博蒂卡的袭击引起了国家内部的骚乱。人权组织谴责毛主义者不仅因为其使用暴力，更因为其反对教育和袭击学校，但在丹达卡兰亚森林，这场袭击成为了传说，无数的诗歌喜剧依此创作。

毛主义者的自卫反击卓有成效地打破了地毯式安全并给人民以喘息的空间。警察和和平行动组织的成员躲进了他们的营房里，仅仅在午夜才出来，通常以 300 到 1000 人一队在村里进行封锁和搜索的行动。渐渐地，除了特种警察和他们的家人，和平行动营地中的其他人都开始陆陆续续地返回他们的村庄。毛主义者也欢迎他们的回归，并宣布特种警察也可以选择回归，只要真诚并公开地忏悔他们的罪行。年轻人成群结队的涌入人民解放游击军（人民解放游击军在 2000 年 12 月才正式成立，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它的武装以十分缓慢的速度发展为分队，又发展为排，再由排发展为连，但是在和平行动对人民掠夺

下，解放游击军迅速地扩大到成营的军事实力）。

和平行动不仅失败了，而且适得其反。

正如我们现在所知的，和平行动不仅仅是由不入流的小角色发动的地方性质行动，尽管他们在媒体宣传中弄虚作假，我们还是清楚，和平行动是一项恰蒂斯加尔邦政府和在中央掌权的国大党发起的一场联合行动，他们决不允许它失败，毕竟那些谅解备忘录仍然等待被执行，就像在婚恋市场上萎靡不堪的剩男剩女一样。政府面临着极大的压力，他们不得不制定新的计划。于是，绿色狩猎行动的计划被提出了。和平行动的特种警察现在变为科亚突击队，同时部署了部署了恰蒂斯加尔邦武装部队、中央后备警察部队、边境安全部队、边境警察部队、中央工业安全部队、灰狗小队、蝎子小队、眼镜蛇小队。这项政策被亲切地称为“赢得了人心”的政策。

重要的战争通常发生在不太可能的地方，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在深山中击败了苏维埃共产主义，而在丹特瓦拉森林里，一场为了争夺印度灵魂的战斗正在激烈地进行。人们总是在说，印度的民主危机不断加深，大公司、主要政党和安全机构之间如何勾结等待。但是如果你想看看这一切到底是怎样的，丹特瓦拉森林会是一个好去处。

一份关于国家土地关系和未完成的土地改革任务（第一卷）的报告草案中写道，塔塔钢铁和埃萨钢铁是和平行动的第一批资助者。由于是政府报告，当它在媒体上被报出的时候，引起了一阵骚乱（这一事实在最后的报告中被删除，我们不得而知这究竟是一个错误还是有人收到了“善意”的提醒）。

2009年10月12日，塔塔钢铁工厂的强制听证名义上是在当地人都是可以前往的罗汉迪古答召开的，但实际上却是在几英里之外的，被大量安保力量封锁的杰格德尔布尔税区的一间小厅里进行。五十名被雇来的部落民由吉普车护送至地点。会议结束后，当地税务官庆祝“罗汉迪古答人民”合作愉快。当地报纸报道了这个谎言，即使他们清楚这一切（毕竟广告会因此滚滚而来）无视村民们的反对，该项目的征地工作已经开始。

毛主义者不是唯一一个想要推翻印度政府的势力，印度政府已经因印度教原教旨主义和经济集权主义改朝换代好几次了。

罗汉迪古答，距丹特瓦拉五个小时车程，这里在过去从未成为纳萨尔派的根据地，但现在它是了。我吃着蚂蚁甜酸酱，在这里工作的乔里同志坐在我旁边。她说在那些写着“纳萨尔派来救救我们”的涂鸦出现在村舍墙上之后，她就转移到这里来工作。几个月之前，村务委员会的主席维姆·梅什拉姆在集市被击毙。“他是塔塔集团的人。”乔里说：“他那时强迫村民放弃自己的土地，接受与公司的交易，他被处理掉是一件好事。但我们也失去了一位同志，他们枪杀了他。你还想听更多么关于卓别里的故事吗？”她才二十岁。“我们不会让塔塔集团进入这里，人民不想要他们。”乔里不是解放游击军的战士，她是雀塔那文工团的成员，该组织是毛主义的文化部门，她来自阿布胡伊马德，唱写俱佳（她和马德哈瓦同志结了婚，当马德哈瓦第一次带着文工团来演出的时候，她就因歌声与他坠入爱河）。

我觉得我应该说些什么，我并不认为暴力有任何用处，而轻率的处决则根本是草菅人命。但是我该让他们怎么办？去法院吗？新德里的筒塔曼塔有静坐

（译注：指 2012 年 12 月 30 日在新德里简塔曼塔爆发的抗议示威，呼吁政府制定更严格的惩治强奸犯的法律，并且要求为在周六死亡的遭受轮奸的 23 岁女孩讨回公道），难道有用么？我是让他们集会抗议还是绝食抗议？这听起来太可笑了。新经济政策的倡导者们，那些总是在说没有选择的人，应该给出一个可替代的反抗方式。对于这群人，这片森林而言这就是个现实的问题。此时此刻，他们应该投票给哪个党派？他们应该接受这个国家里哪一个民主机构？拯救讷尔默达运动（译注：指讷尔默达居民反对讷尔默达水坝计划的人民运动，该计划是印度政府在世界银行资助下拟定的，预计建设 30 个大型、135 中型和三千个小型水库，估计会淹没 245 个村庄，4000 万人需要搬迁。本文作者也参与了反坝运动）爆发的那些年里，在反抗讷尔默达建立大坝的运动中，哪个机构他们没有寻求过帮助？

（三）

天色已暗，营地里有很多活动，但光线太暗我什么也看不见，只有几点灯光零星闪烁，辨不清是星光，是流萤，还是绰绰人影。曼图小同志不知从哪儿冒了出来。我了解到他是第一批共产主义青年流动学校的十名学生之一，他们正在接受听和写的教育，并接受共产主义基本原则的指导（“向青年人灌输思想！”我们的企业媒体大声疾呼，那些电视广告在孩子们甚至还未拥有思考能力之前就对他们洗脑，然而这却被视为理所当然）青年共产党员不能带枪或者穿制服，他们只能跟在解放游击军队员的后面，他们眼中星光熠熠，就像见到了摇滚明星的狂热粉丝。

曼图以温和的主人气场接待了我，他装满我的水壶说我该收拾东西了。哨声响起，蓝色的塑料布的帐篷在五分钟内收好，又一声哨响，所有的 100 名同志已经排好了队，他们站成五行，拉朱同志是行动负责人。开始点名，我也站在队列里，当站在前面卡姆拉同志提醒我时，我也报出了自己的编号（我们数到 20，然后从 1 重新开始，因为多数冈德人只能数到这么多，二十对他们来说已经够用了，也许对我们来说也够用）。禅杜现在身着迷彩，手持司登冲锋枪。拉朱同志低声用冈德语向队伍下了命令，我什么也听不懂，但我一直听到 RV 这个词，之后拉朱告诉我它是集结地的意思。“我们设定了集结地，以便在遇到火力袭击，不得不分散的时候知道到哪里重新集合。”他不知道这几句话在我心里引起了多大的恐慌，我不怕遇袭，我怕的是迷路，我是个大路痴，卧室和厕所之间我都能迷路，那在 6 万平方公里的森林里呢？无论如何我要抓紧拉朱同志。

在我们前进之前，维努同志找到我说：“那么，我向你告辞，同志。”我大吃一惊，他看上去像一只戴着羊毛帽，穿着皮制凉鞋的小蚊子，他身边围着他的警卫，三男三女，全副武装。“我们非常感谢你从这么远的地方赶来，同志。”他和我再次握了手，随后又握紧拳头，“红色敬礼，同志。”那个身负诸多秘密的人消失在了森林里，好像从未出现过一样，我有点失落。但我还有几个小时的录音要听。并且在之后的时间里，我还会遇到很多人，他们会在维努同志告诉我的故事骨架上增添生动的细节。我们开始向反方向移动。拉朱同志在一英里以外闻到了爱多些碘药水的味道，他高兴地对我说：“我都感觉不

到我的膝盖了，我得吃一把止痛药才能走路。”

拉朱同志说得了一口流利的印度语，还能一本正经的讲着最好笑的故事。他在赖布尔做了十八年的律师。他和他的妻子，马尔蒂都是党员，是城市工作网中的一部分。在 2007 年末一名工作网中的关键人物被捕，在严刑拷打之后成为了告密者，他被一辆封闭的警车载着，在赖布尔周围转悠，并被要求指出他之前的同事。

马尔蒂同志就是被指认出的一员，2008 年 1 月 22 日她和其他几名同志被捕，他们的主要罪行是将载有和平行动暴行视频证据的光盘邮寄给几名国会议员。她的案子没有被移交法庭，因为警察知道他们的指控难以成功。但是新的恰蒂斯加尔邦特别治安法案允许警察在没有保释的情况下拘留她数年。“现在政府已经增派了几个营的恰蒂斯加尔邦警察来‘保护’那些可怜的国会议员，免受他们自己邮件的‘伤害’。”拉朱同志说。他一直没被抓住，他的两个上学的孩子单独待在家里，受到了警察的严格询问，最后他们不得不收拾东西搬到叔叔家去。

仅仅在几周之前，拉朱同志才第一次收到他们的消息。是什么给了他这种力量，是什么还能让他保持这种辛辣的幽默？除了他们过去所经历的，是什么让他们仍然在坚持？是对党的忠诚、希望，还有爱。我一次又一次地见证了它，以最刻骨铭心的方式。

解放游击军是毛主义武装力量中的脊梁。

我们现在成一列移动。我和一百名冷酷无情的暴力分子，嗜血的叛乱分子在一起。在离开之前我环视营地，除了火焰燃烧过后的灰尘之外几乎没有任何痕迹了，完全看不出有上百号人在这里扎营。我对这支军队的所作所为感到难以置信，就碳消费而言，他们比甘地主义者更甘地主义，他们碳足迹比任何鼓吹气候变化威胁的人都要少。就目前而言，哪怕是破坏的手段，也很有甘地主义的风格。比如，在一辆警车被焚毁之前，它的所有零部件都会被拆下来，它的方向盘被拉直，做成枪管，人造皮的内饰被剥下做成子弹袋，电池用作太阳能充电（来自最高指挥部的指示是被缴获的警车应该被埋起来而不是烧掉，以便将来能在需要时再次利用）。我是不是该写一出戏剧，叫《当甘地拿起枪》？或者《我会被绞死吗》？

我们行走在漆黑和死寂之中。我是唯一一个拿着手电筒的，我把它指向地面以便看清卡姆拉同志的光着的脚后跟，她穿着破旧的黑色女式凉鞋，我借此可以知道在何处落脚。她的负重是我的十倍。她背着一把步枪，头上有一个装满补给的大袋子，一口大锅和装满蔬菜的背包。她头上的袋子放的很稳，她不用怎么碰它就能在斜坡和光滑的石头路上爬下，她简直神了。结果我们走了很长一段路，我很感谢历史课，除了别原因的以外，它让我在一天的行军中可以得到一点修整。

在夜晚的森林中漫步是最惬意的事情。我每晚都这么做。

我们要去庆祝 1910 年邦卡尔（Bhumkal）起义（译注：见之前地震节注）一百周年。在这场起义中，科亚人奋起反抗英国人。Bhumkal，意思是地震。拉朱同志说人们会花好几天一起走上街头庆祝。森林里一定有很多人在庆祝，所有的丹达卡兰亚森林分部都有庆祝活动。我们很荣幸，因为仪式的主持人凌

(Leng) 同志和我们走在一起，在冈德语里，Leng 的意思是“声音”。

凌同志是安得拉邦的一个高个子中年男子，是加德尔的同事，加德尔是一位歌星、诗人，他在 1972 年创立了激进的文化组织“群众戏剧论坛”，传奇且受人爱戴。最终，“群众戏剧论坛”成为了人民战争集团的正式组成部分，在安得拉邦吸引了数万观众。

凌同志于 1977 年加入“群众戏剧论坛”，以自身的能力成为了一名受欢迎的歌手，他生活在安得拉邦，经历过最严重的镇压，几乎每天都有朋友死去的虚假“遭遇战”的屠杀时代：一天晚上，一位女警察局长化装成医生，把他带离医院，带到瓦兰加尔郊外的森林里去“遭遇意外”。但是，凌同志说，幸运的是，加德尔得到了这个消息，并对他发出了警报。1998 年，人民战争集团决定在丹达卡兰亚森林成立一个文化组织，在那个时候，凌同志被派去领导“意识戏剧论坛”。现在他来了，和我走在一起，穿着橄榄绿的衬衫，不知什么原因，他的紫色睡衣上面还有着粉红色的小兔子。“‘意识戏剧论坛’现在有 10000 名成员。”他告诉我，“我们有 500 首歌，印地语、冈德语、恰蒂斯加尔语和哈尔比语。我们印了一本有 140 首歌的书。”

“每个人都会写歌。”我第一次和他说话时，他看起来很严肃，很专一。但是几天后，他仍然穿着睡衣坐在火炉旁，告诉我们一位非常成功的主流泰卢固语电影导演（他的一个朋友），总是在自己的电影中扮演纳萨尔派。“我问他，”凌同志用他那有吸引力的泰卢固口音的印地语说，“你为什么总是认为纳萨尔派这样？”——他巧妙地模仿了一个蹲着迈着大步的，被猎杀的人带着 AK-47 从森林里出来，这使我们大笑不已。

我并不确定我期待不期待地震节的庆祝活动，因为我恐怕会看到传统的部落舞蹈会被毛主义的宣传、鼓舞人心的演说和一个个目光呆滞、唯命是从的听众所僵化。我们很晚才到达会场，一个临时的纪念碑，用红布包裹的竹制脚手架建成，在顶部，毛主义党的锤子和镰刀的上方，是用银箔包裹的人民政府的弓、箭，恰当的层次体系。舞台很大，但也是临时的，在一个坚固的脚手架上，被一层厚厚的泥灰泥所覆盖。已经有小火堆分散在地上，人们陆续到达做他们的晚饭。他们只是黑暗中的轮廓，我们穿过这些“lal salaam, lal salaam, lal salaam”，继续走了大约 15 分钟，直到重新进入森林。

在新营地，我们又得进去，又一次点名，然后是关于岗哨位置和“发射弧”——决定谁将在警察袭击的情况下覆盖哪个区域的指示，再次确定集结地点。

一个事先就开始计划的宴会已经准备好了，卡姆拉给我带来了一种野生番石榴当做甜点，她在散步时摘了下来，为我保存了起来。

从拂晓时分开始，越来越多的人聚集在一起庆祝这一天，兴奋的嗡嗡声越来越响亮。很久没见面的人又见面了，我们能听到测试麦克风的声，旗帜、横幅、海报、彩旗正在升起，一张海报出现了，上面有我们到达时在翁戈纳尔村遇害的五个人的照片。

而我在和讷尔默达同志、梅斯同志和鲁皮同志一起喝茶。讷尔默达同志谈到她在加德奇罗利工作多年，后来成为了革命部落妇女组织的丹达卡兰亚森林领导人。鲁皮和梅斯是安得拉邦的城市活动家，她告诉我，妇女在党内的长期

斗争，不仅是为了她们的权利，而且是为了让党看到男女平等是公正社会的一个梦想核心。我们谈论到 70 年代纳萨尔巴里运动中妇女的故事，她们对那些自认为是伟大的革命者，但却被同样的父权制度、同样的沙文主义所捆绑的男性同志们大失所望。梅斯说，从那时起，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不过他们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还没有妇女）。

午时左右，另一支人民解放游击军分遣队抵达，那是一个由高个子、轻快、孩子气的男人领导的小队，这位同志有两个名字：苏克德夫和古萨·乌森迪，但这两个名字都不是他的，苏克德夫是一位深受爱戴的烈士的名字（在这场战争中，只有死者才可以安全地使用他们的真名），至于古萨·乌森迪，许多同志都曾使用过古萨·乌森迪这个名字。所以即使苏克德夫接下的旅行都和我在一起，我也不知道要如何再找到他，不过至少能在各种地方听出他的笑声。他说，他是 1988 年来到丹达卡兰亚森林的，当时人民战争集团决定将三分之一的部队从北特伦甘纳派遣到丹达卡兰亚森林。他穿着考究，穿着“文职”（冈德语是“文职服”）而不是“正装”（毛主义者的“制服”），可以冒充一名年轻的执行官。我问他为什么不穿制服。

他说他一直在旅行，刚从卡恩凯尔附近的高止山脉凯什卡尔段回来。有报道称，一家名为瓦达塔的公司所关注的铝土矿储量有 300 万吨。

果然，我的直觉是正确的。

苏克德夫说他去那里测量人们的体温，来看看他们是否做好了战斗准备。

“他们现在想要小队，还有枪。”他把头往后仰，大笑起来，“我告诉他们这可真不容易，老兄。”从聊天的主题和携带 AK-47 的轻松自如里，我可以看出他也对人民解放游击军很有信心。

丛林哨兵到了。有一块“饼干”要给我！是维努同志寄来的，他在一张折好再折好的小纸片上，写下了一首他答应寄给我的歌词。讷尔默达同志读到信时会心一笑，她知道这个故事。故事可以追溯到 80 年代，大约在人们刚刚开始信任党的时候，人们带着他们的问题（如维努同志所说的），他们的“内部矛盾”来到这里。妇女们是第一批来的。一天晚上，一个老太太坐在火炉边，然后站了起来给达达的记录唱了一首歌。她是一个玛蒂亚人，在玛蒂亚人中有妇女在结婚后脱掉上衣，保持胸部裸露的习俗。

他们说我们不能保留我们的衬衫，达达，达科尼利，
他们让我们把它们脱下，达达，
我们犯了什么罪，达达
世界已经改变了，对不对达达
但是当我们去市场的时候，达达，
我们得半裸的去，达达，
我们不想要这样的生活，达达，
去告诉我们的祖先，达达

这是党决定解决的第一个妇女问题。这个问题必须用外科手术工具小心地处理。1986 年，党建立了部落妇女组织，然后发展成为了革命部落妇女组织，

现在有 9 万加入的成员，它很可能是印度最大的妇女组织。（顺便说一下，她们都是毛主义者，共有 9 万人。她们会被“消灭”吗？那么“意识戏剧论坛”的 10000 名成员呢？他们也是吗？）革命部落妇女组织反对部落民中的强迫婚姻和诱拐传统，反对让月经期的妇女住在村外森林小屋里的习俗，反对重婚和家庭暴力。但是它还没有赢得所有的战斗，但是哪个女权主义者有呢？例如，即使今天，在丹达卡兰亚森林，妇女也不能播种。在党的会议上，男人们认为这是不公平的，应当予以取消。但实际上，他们根本不允许这样做。因此，党决定，妇女可以在属于人民政府的公共土地上播种。在那片土地上，她们可以播种，种植蔬菜，修建拦水坝。这是一次半胜，而不是一场完整的胜利。

随着警方的镇压在巴斯塔的不断加剧，革命部落妇女组织的妇女已经成为了一股强大的力量，她们成百上千地聚集在一起，与警察进行物理对抗。革命部落妇女组织的存在，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态度，并且减轻了针对妇女的许多传统歧视。对于很多年轻女性来说，加入党，特别是加入人民解放游击军，成为了她们摆脱社会窒息的一种方式。苏希拉同志，一位革命部落妇女组织的高级干部，她谈到了“和平行动”民兵对革命部落妇女组织的愤怒。她说他们的口号之一是“我们将有两个妻子！我们会的！”许多强奸和野兽般的性侵都是针对革命部落妇女组织的成员的。但是许多目睹了野蛮行为的年轻女性加入了人民解放游击军，现在女性占其干部的 45%。讷尔默达同志派人去请她们中的一些人，她们一会儿就加入了我们。

弗琳克同志的头发很短，用冈德语来说叫鲍勃头，她很勇敢，因为在这里，“鲍勃头”的意思是“毛主义者”。对警方来说，这是足够执行即刻处决的证据。2005 年，弗琳克同志的村庄——科尔马遭到了那加营和“和平行动”民兵的袭击。当时，弗琳克是村里的一个民兵，她的朋友露基和苏基也是革命部落妇女组织的成员。在烧毁村庄后，那加营抓住了露基、苏基和另外一个女孩，轮奸并杀害了她们。“他们在草地上强奸了她们，”弗琳克说，“但是在这之后，就没有草剩下了。”已经好几年了，那加营已经走了，但是警察仍然会来。“他们需要女人或小妞的时候就来。”

阿吉塔也有一个鲍勃头。“和平行动”民兵来到格尔西——她的村子，把三个人淹死在纳奥捞河里。阿吉塔曾经是民兵的一员，跟着朱杜姆走到一个离村子很近的叫做巴鲁·那·度迪克的地方。她看到他们强奸了六个女人，并射中了一个男人的喉咙。

拉克希米同志是一个漂亮的长辫子姑娘，她告诉我，她看到“和平行动”民兵烧毁了她的村庄——沈吉奥的三十栋房子。“那时我们没有武器，”她说，“除了看着，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她之后很快就加入了人民解放游击军。拉克希米是 2008 年那会儿花了三个半月穿越丛林到达奥里萨邦讷亚格尔的 150 名游击队员之一，她们在那里突袭了警方的一个军械库，缴获 1200 支步枪和 20 万发弹药。

在 2004 年，“和平行动”民兵开始猖獗之前，苏米特洛同志加入了人民解放游击军。她说，她加入人民解放游击军是因为她想离家出走。“女人在各个方面都受到控制，”她告诉我，“在我们村里，女孩不允许爬树，如果做了的

话，她就得付 500 卢比或一只母鸡的罚款；如果一个男人打了一个女人，而女人还手打男人的话，她就得给村里一只山羊；男人们一起上山打猎的几个月时间里，女人不允许接近猎杀；最好的肉留给男人吃，女人甚至不允许吃鸡蛋。”这难道不是加入游击队的好理由吗？

苏米特洛讲述了她曾在革命部落妇女组织工作时的两个朋友，迪拉姆·帕尔瓦蒂和卡姆拉的故事。迪拉姆·帕尔瓦蒂来自南巴斯塔的巴里卡亚村。和其他人一样，她也看到了“和平行动”民兵烧毁了她的村庄，然后，她就加入了人民解放游击军，在高止山脉凯什卡尔段工作。2009 年，她和卡姆拉在该地区组织了 3 月 8 日妇女节的庆祝活动。她们一起呆在瓦迪勾村外的小茅屋里，警方在夜间包围了小屋并开火。卡姆拉进行了还击，但仍不幸遇害。帕尔瓦蒂逃跑了，但第二天就被发现并处死。

这就是去年妇女节所发生的事情。然后这里有篇来自一家全国性报纸关于今年妇女节的报道：

巴斯塔叛乱分子为妇女争取权利

（阿尔汗·凯姆，《今日邮报》，赖布尔，2010 年 3 月 7 日）

政府可能已经停止一切行动，以打击国内的毛主义威胁。但是，恰蒂斯加尔邦的一部分反叛分子有着比生存更紧迫的任务。随着国际妇女节的临近，巴斯塔地区的毛主义者呼吁举行为期一周的“庆祝活动”，以倡导妇女权利。海报也张贴在巴斯塔地区的比贾布尔。自称妇女权利拥护者的呼吁让州警察大吃一惊，巴斯塔地区的 T·J·朗库默总检察长说：“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纳萨尔派的这种呼吁，他们只相信暴力和流血。”

然后报告继续说：

“我认为毛主义者正试图反击我们非常成功的群众宣传活动。我们开展这项活动的目的是赢得公众对绿色狩猎行动的支持，这项行动是由警方发起的，旨在根除左翼极端分子。”总检察长说。

这种恶意和无知的混合体并不罕见。古德萨·乌森迪，党目前的编年史家，比大多数人更了解这一点。他的小电脑和 MP3 录音机里充满了新闻报道、否认、更正、党内文献、死者名单、电视剪辑和音频和视频资料。“成为了古德萨·乌森迪最糟糕的事情”他说，“就是宣布从未发布的澄清。我们可以拿出一本厚厚的书来说明我们未发表的澄清，以及他们所说的关于我们的谎言。”他说话时没有一丝愤慨，实际上是带着某种乐趣。

“你不得不否认的最荒谬指控是什么？”

他回忆过去。“2007 年，我们发表了一份声明，说‘不，兄弟，我们没有用锤子杀死奶牛’。2007 年，拉曼·辛格政府宣布了一项‘奶牛计划’，一项选举承诺，每一个部落民都被提供了一头奶牛。一天，电视台和报纸报道说纳萨尔派袭击了一群牛，用锤子把它们打死，因为他们反印度教反印度人民党。你可以想象发生了什么，我们发布了否认。几乎没有人传播它。后来发现，分发奶牛的那个人是个流氓，他把它们卖了并说我们伏击了他，杀了牛。”

“那么最严重的是？”

“哦，有很多个，毕竟他们正在进行一场运动。当‘和平行动’民兵开始的第一天，他们袭击了一个叫厄姆比里的村庄，烧毁了它，然后所有的人，‘和平行动’特种警察、纳加营、警察，都向高筑巴尔移动……你一定听说过高筑巴尔吧？这是一个著名的村庄，它因拒绝投降而被烧毁了 22 次。当‘和平行动’民兵到达科特拉帕时，我们的民兵正在等待他们。他们准备好了一场伏击。民兵杀死了两名‘和平行动’特种警察，俘虏了七名士兵，其余的逃走了。第二天，报纸报道说，纳萨尔派屠杀了可怜的部落民。有人说我们杀了数百人。即使是像《前线》这样受人尊敬的杂志也说我们已经杀了 18 名无辜的部落民。即使是对事实一丝不苟的人权积极分子 K·巴里古巴尔，他也这么说。我们发了一份澄清函，没有人发表它。后来，在他的书中，巴里古巴尔承认了他的错误……但谁注意到了呢？”

我问被俘的七个人发生了什么事。

“地区委员会召集了一个人民法院。有四千人参加了。他们听了整个故事。其中两名‘和平行动’特种警察被判处死刑。有五个人被警告然后被放走了。人民做决定。即使是告密者——现在正在成为一个大问题——人们也会倾听案件、故事、供词，然后说‘我们不准备承担信任这个人的风险’或‘我们准备承担信任这个人的风险’。新闻界总是报道那些被杀的告密者，从不报道那些被释放的人。所以每个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嗜血的过程，每个人都会被杀死。这不是复仇，而是关于生存和拯救未来的生命……当然也有问题，我们犯了严重的错误，我们甚至在伏击中杀死了错误的人，以为他们是警察，但这不是媒体描述的那样。”

令人害怕的“人民法院”。我们如何接受它们？或者赞成这种形式的粗鲁正义？

另一方面，“交锋”的假象和其他——最糟糕的简易司法形式——从印度政府那里得到警察和士兵的勇敢奖章、现金奖励和无休止的晋升？他们杀得越多，得到的回报就越多。他们称之为“勇敢的心”，即“交锋专家”。我们被称为“反国民”，是敢于质疑他们的人。那么关于最高法院明目张胆地承认它没有足够的证据判处穆罕默德·阿夫扎尔（2001 年 12 月议会攻击中被指控）死刑，但还是进行了处决该怎么说呢？因为“只有对罪犯判处死刑，社会的集体良知才会得到满足”。

至少高筑巴尔人民法院的案件中，全体成员是亲自到场作出决定的。这不是那些很久以前就失去了与普通生活的联系，自以为是代表一个缺席的集体发言的法官所做出的决定。

我想知道高筑巴尔的人民做了些什么？叫警察来？

鼓声开始变得非常响了。是庆祝的时间了。我们走到平地上。我不敢相信我的眼睛。这里一片人山人海，最狂野、最美丽的人民，穿着最狂野、最美丽的衣服。男人似乎比女人更加关注自己。他们的头上饰有羽毛，脸上有纹身。很多人都化了眼妆，在脸上涂上白色的粉末。这里有很多民兵，姑娘们穿的纱丽服，有激动人心的颜色，肩上漫不经心地挂着步枪。有老人，孩子，还有红色的彩旗划过天空。

凌同志在讲话，还有几位人民政府的其他干部。纳艾缇同志是一位非凡的妇女，自1997年以来一直在党内工作，她对国家构成了巨大的威胁，2007年1月，因为听说她在因纳尔村，超过700名警察包围了那里。纳艾缇同志被认为如此危险，被如此拼命追捕，并不是因为她指挥了许多伏击（尽管她确实这么做了），而是因为她是一个为村里人所热爱的部落妇女，是一个真正鼓舞年轻人的人。她肩扛着AK（这是一把有故事的枪。几乎每个人的枪都有一个故事：从谁那抢的，怎么抢的，谁抢的）说话。

“意识戏剧论坛”的一个剧团表演了内容关于邦卡尔起义的戏剧。邪恶的白人殖民者戴着帽子和金色的稻草做的头发，被阿迪瓦西斯人欺负和殴打——这在观众中引起了无穷的乐趣。另一个来自南根加拉奥的剧团表演了一个名为《血猎的故事》的戏剧。约利为我做了翻译。这是两个老人去寻找他们女儿的村庄的故事。当穿过森林时，他们迷路了，因为所有的东西都被烧毁了，无法辨认。“和平行动”民兵甚至烧毁了鼓和乐器。这里没有灰烬，因为一直在下雨。他们找不到女儿，只能开始悲伤地唱歌，听到他们的歌声，女儿从废墟里向他们歌唱，她唱道：“我们村的声音被压制住了。不再有淘米声，不再有井边的笑声。不再有鸟，不再有咩咩叫的山羊。我们幸福的结实的细绳已经被折断了。”

她父亲唱到：“我美丽的女儿，今天不要哭泣。每个出生的人都必须死亡。我们周围的这些树会倒下，花开花落，总有一天这个世界会变老。但我们为谁而死？总有一天，我们的劫掠者会学到，总有一天真理会盛行，但我们的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几千年都不会忘记你。”

之后是几次演讲。然后鼓声和舞蹈开始了。每个人民政府都有自己的剧团。每个剧团都有自己的舞蹈。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到来，拿着巨大的鼓，跳出狂野的故事。每个剧团唯一的共同特征就是糟糕的矿工，戴着头盔和墨镜，经常抽烟。但是他们的舞蹈没有任何僵硬或机械的地方。他们跳舞时，尘土飞起，鼓声震耳欲聋。渐渐地，人群开始摇摆起来，然后跳起舞。他们以六七排的队伍跳舞，男人和女人分开，双臂搂着对方的腰。有着上千人的阵势。

这就是他们来这里的目的，为了这个。在丹达卡兰亚森林森林里，幸福被很严肃的对待。人们要走上好几英里，好几天，来一起欢宴、唱歌，在头巾上插上羽毛，在头发上插上鲜花，搂着手臂，喝着马华酒，整夜跳舞。没有人会独自唱歌或跳舞。这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更能表明他们对于一个企图消灭他们的文明的蔑视。

我不敢相信这一切都是在警察的眼皮底下发生的。就在绿色狩猎行动中。

一开始，人民解放游击军的同志们看着舞者，拿着枪站在一旁。但是，一个接一个地，就像那些不能忍受站在岸边看其他鸭子游泳的鸭子一样，他们也加入进去开始跳舞。很快就出现了橄榄绿舞者的队伍，与其他所有的颜色一起旋转。然后，几个月、几年不相见的兄弟姐妹、父母、孩子和朋友，有时会相遇，这些队伍会分散并重组，橄榄绿分散在旋转的纱丽、鲜花、鼓和头巾中。这无疑是一支人民军队，至少现在是这样。毛主席所说的“八路军是鱼，老百姓是水”，在这一刻，是真的。

毛主席，他也在这里，也许有点孤独，但出席了。在红布屏幕上有一张他

的照片，马克思也在，纳萨尔派运动的创始人和主要理论家查鲁·马宗达也在这，他直白的言辞崇尚暴力、鲜血和殉道，而且经常使用一种粗糙的语言，这种语言几乎要灭绝了。站在这里，在地震节，我忍不住想，他对这场革命的结构如此重要的分析，已经从它的情感和图像中移除了。当他说只有“一场歼灭战”才能产生“一个敢于面对死亡、不受任何利己思想影响的新人”——他能想象，在夜色中跳舞的古老的人们，会是那些肩负着梦想的人们吗？

(终)

这里发生的一切清晰地向外界表明了一个从过去脱胎换骨的政党其所坚持的不懈斗争的理论。当查鲁·马宗达说出“中国的主席就是我们的主席，中国的道路就是我们的道路”这句著名的话时，他准备把它扩大到当叶海亚·汗将军在东巴基斯坦（孟加拉国）犯下种族灭绝罪时，纳萨尔派保持沉默这一议题上来，因为当时中国是巴基斯坦的盟友。

对红色高棉和其在柬埔寨的镇压，也保持沉默；对中俄两国革命中的过激行为，也保持沉默。在纳萨尔派运动中，也存在着过激的暴力行为，他们的所作所为很难得到辩护。但是，他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能与国会和人民党在旁遮普、克什米尔、德里、孟买、古吉拉特邦等等地区的肮脏“成就”相比吗？然而，尽管存在着这些可怕的矛盾，查鲁·马宗达在他的著作中所言的都是十分有远见的。他创立的政党（以及许多其分裂的团体）使印度实现了革命的梦想。想象一下没有这个梦想的社会吧！就这点而言，我们不能过于严厉地批判他，尤其是在我们用甘地那“虔诚”的空话来谈论“非暴力行为”的优越性和他的托管概念时：

“富人将拥有自己的财富，其中他将合理占有其所需要的财富，然后会作为受托人，将剩余的财富用于社会福利。”

然而，奇怪的是，当代的印度沙皇，这个无情地要粉碎纳萨尔派的国家的具体代表，现在居然说出了查鲁·马宗达很久以前的话：“中国的道路就是我们的道路。”

上下颠倒。内外翻转。

中国的道路已经变了。执政党的名字没变，党的路线却已经完全改变。

当党是一个政权夺取者（就像现在在丹达卡兰亚一样），寻求人民的支持，关注他们的每一个需求，那么它是一个真正的人民的党，它的军队是一支真正的人民军队。但革命之后，这段爱情很容易变成痛苦的婚姻。人民军队很容易背叛人民。在今天的丹达卡兰亚，党希望把铝土矿留在山上。但明天它会改变主意吗？但是，对未来的担忧是否该阻碍我们继续前行呢？

舞会将持续一整夜。我走回了营地。马泽在那儿，仍然醒着。我们聊到了深夜。我把收藏的聂鲁达的船长诗集副本给了她（我带来了，以防万一）

她不断地问着：“外面的人们怎么评价我们？学生们怎么说？请告诉我现在关于妇女运动还有什么大问题吗？”她问起了我的作品。我试着如实地向她讲述我的混乱思想。然后她开始谈论自己，她是怎样入党的。她告诉我，去年5月，她的搭档在被敌人伪造的遭遇战中死亡。事实上是在纳西克被捕，并被带到瓦朗加尔杀害。“他们一定对他进行了十足的折磨。”她是在去见他的路

上听说他被捕了，从那以后她就一直呆在森林里。在长时间的沉默之后，她告诉我她几年前结过一次婚。“他也在一次遭遇战中被杀了，”她说，并以令人心痛的准确性补充道，“但这次是在真正的遭遇战中。”

我躺在我的 Jhilli 上，思索着马泽长期以来的悲伤，听着从地上传来的鼓声和持久幸福的声音，思考着的查鲁·马宗达的持久战争思想——毛主义政党的中心思想。这就是为何人们认为毛主义者提出的进入“和平谈判”是一个骗局，是一种获得喘息空间重新组织、重新武装自己并重返持久战的手段。什么是持久战？恐怖取决于其自身还是取决于战争的性质？如果丹达卡兰亚的人民在过去三十年里没有发动持久战，他们现在会在哪里呢？

毛主义者是唯一相信持久战的人吗？从印度成为主权国家的那一刻起，它几乎就变成了殖民大国，吞并领土，发动战争：它毫不犹豫地利用军事干预来解决政治问题——克什米尔、海得拉巴、果阿、纳格兰、曼尼普尔、特伦甘纳、阿萨姆、旁遮普。纳萨尔派在西孟加拉、比哈尔和安得拉邦起义，现在已经跨越了印度中部的部落地区。数以万计的人被杀害，数十万人遭受酷刑，但施暴者却不受惩罚。

所有这些都隐藏在慈祥的民主面具之后。这些战争是针对谁的？穆斯林、基督徒、锡克教徒、共产党人、达利特人、部落民，尤其针对那些敢于质疑命运，不接受嗟来之食的穷人。很难不把“印度”视为“属于上层种姓的印度教国家”（不管哪个政党执政），它和“其他国家”之间互相怀有敌意。而且，他们还以真正的殖民方式，派那加人和米佐斯人去恰蒂斯加尔邦作战，派锡克人去克什米尔，派克什米尔人去奥里萨邦，派泰米尔人去阿萨姆邦等等。如果这都不是“持久战”，那还会是什么？

在一个星光璀璨的美丽夜晚。苏克德夫同志的脸被电脑屏幕照亮了，他正对着屏幕里的自己微笑。他是个重度工作狂，我问他这样做什么有意思呢。他说：“我在想去年来参加邦卡尔起义庆典的待了一两天的记者们，其中一个人和我的 AK 合影，拍了照，然后回去后叫我们杀人机器之类的。”

天亮了，舞蹈还没有停止。队伍会继续前行，数百年轻人仍在跳舞。“他们不会停止，”拉朱同志说，“除非我们收拾行李了。”

在路上，我遇到了医生同志，他在舞池边上架起了一个小小的医疗营地。我想亲吻他的胖脸颊。为什么他不能有至少三十个人的团队而只是一个人呢？为什么他不能有一千人的团队呢？我问他，丹达卡兰亚人的健康状况是什么样子的。他的回答令我毛骨悚然。他说他所见过的大多数人，包括人民解放游击军的人，都只有 5 到 6 个血红蛋白（印度女性的标准是 11 个）。这里有着由两年多的慢性贫血引起的肺结核，幼儿患有二级蛋白质营养不良，医学术语称为夸希奥科病（后来我查了一下。这个词来源于加纳沿海地区的非洲土语，意思是“新生儿出生时患上的疾病”。基本上，这个婴儿不再喝得到母乳，也没有足够的食物来提供营养）。“这是一种流行病，就像在比亚法拉一样。”医生同志说道，“我以前在农村里工作过，但从未见过这样的事。”

除此之外，还有疟疾、骨质疏松症、绦虫、严重的耳部和牙齿感染以及原发性闭经（青春期营养不良导致女性月经周期消失，或者根本就没有出现）在这里肆虐。

“除了加德奇罗利的一两个诊所外，这个森林里没有其他诊所，没有医生，没有药物。”

他现在和他的小队出发了，长途跋涉八天去阿布杰马德。他，医生同志，也穿着“正装”。所以（白匪）如果发现了他们，就会立刻杀了他们。

拉朱同志说我们继续在这里扎营很不安全，该前行了。离开邦卡尔需要很多时间说再见。

Lal lal salaam, Lal lal salaam,

Jaane waley Sathiyon ko Lal Lal Salaam,

(向离去的同志们敬红色的礼)

Phir milenge, Phir milenge Dandakaranya jungle mein phir milenge

(总有一天，我们会在丹达卡兰亚森林再见面的。)

开幕和结束的仪式从来不是轻而易举的，因为每个人都知道，当他们说“我们会再见面”时，往往意味着“我们可能再也不会见面了”。讷尔默达同志、马泽同志和萝比同志会各奔东西，我还会再见到他们吗？

我们再一次地启程。每天都变得更热。卡姆拉为我摘下了第一个天度果实。尝起来就像 chikoo（印度特有的热带水果，状似土豆），我成了罗望子果的粉丝。这次我们在小溪边扎营。男女轮流地分批洗澡。晚上，拉朱同志收到了一整包“饼干”。

新闻：

2010年1月底，在马恩普尔分部被捕的60人尚未出现在法庭上。大批警察已经到达南巴斯塔，开始无差别攻击。

2009年11月8日，在卡切鲁姆村，比贾布尔·杰拉、迪尔高·摩迪卡（60岁）和高瓦西·苏克鲁（68岁）被杀害。

11月24日，迈达维·巴门（15岁）在潘高迪村被杀害。

12月3日，来自高利扎特的迈达维·布哲姆也被杀害。

12月11日，7人在达尔巴地区的古米尔帕尔村死亡（姓名待定）。

12月15日，在高筑巴尔村，维高·松姆巴和迈达维·马蒂（两人都是革命部落妇女组织成员）被杀害。

12月30日，韦杰巴尔村的布宁·潘杜和布宁·毛图（父子）被杀。

2010年1月（日期未知），凯卡村的人民政府领导人甘格劳尔被杀害。

1月9日，扎甘贡达地区的塞邦古鲁村有4人死亡。

1月10日，在帕姆布拉迪村有3人死亡（目前还没有名字）

1月25日，因拉瓦迪地区的塔卡劳德村有7人死亡。

2月10日（地震节），古姆丽在阿布杰马德的杜马尔村被强奸和杀害，她来自一个叫帕埃沃的村庄。

2000名边境巡逻部队驻扎在拉杰纳恩德加奥恩森林，

5000名额外的BSF部队抵达卡恩凯尔。然后接下来：

人民解放游击军已满员。

一些过时的报纸也有关于纳萨尔派有很多新闻报道。一条特大的叫嚣着地标题完美地概括了政治气氛：Khadedo, Maaro, Samarpan Karao（消灭，击杀，让他们投降），在那句话下面：Varta ke liye loktantra ka dwar khula hai（民主的大门总是为谈判敞开着）。第二种说法是毛主义为了赚钱而种植大麻。第三篇社论说，我们现在所扎营和经过的地区完全被警方控制了。

年轻的共产主义者拿走一些片段去练习阅读。他们在营地走来走去，用广播播音员的声音大声朗读反毛主义的文章。

新的一天。新的地方。我们在乌塞尔村外的一颗巨大的马华树下扎营。马华树刚刚开花，它的淡绿色花朵落在森林的地面上就像一颗颗宝石一样。空气中弥漫着轻微的刺鼻气味。我们在等来自拜德派尔学校的孩子们，在翁戈纳尔遭遇战后那所学校关闭了，到了现在已经成了一个警察营地，孩子们被送回家了。这种情况同样适用于那瓦德、姆恩朱迈达、埃德卡、韦德马克德和特纳尔等地的学校。

拜德派尔学校的孩子们没有出现。

尼蒂同志（受到通缉）和维诺德同志带着我们走了很长一段路，我们参观了当地人民政府建造的一系列集水建筑物和灌溉池。尼蒂同志谈到了他们必须解决的农业问题。只有 2% 的土地是有灌溉的。在阿布杰马德，犁耕在十年前才被人听说。另一方面，在戴德克里，杂交种子和化学农药正逐渐引入。“我们需要农业方面人才的紧急帮助，”维诺德同志说，“我们需要了解种子、有机杀虫剂、可持续栽培的人。只要稍加帮助，我们就能做很多事情。”

拉穆同志是负责人民政府地区的农民，他自豪地带我们参观了种植水稻、茄子、gongura、洋葱和卷心菜的农田。然后，他以同样的骄傲，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巨大，但非常干燥的灌溉池。这是什么？“这个灌溉池连雨季都没有水，挖错地方了，”他说着，脸上挂着微笑，“它不是我们的，它是被强盗政府挖掘出来的。”这里有两个平行的政府系统，人民政府和强盗政府。

我想起维努同志对我说的话：他们想粉碎我们，不仅是因为矿物，还因为我们为世界提供了一种可选择的模式。

带枪的格拉姆·斯瓦拉杰的想法是，这目前还不是一个选择。虽然这里有太多的饥饿和疾病，但它无疑为另一种选择创造了可能性。不是为了全世界，不是为了阿拉斯加，也不是为了新德里，甚至也不可能是为了整个恰蒂斯加尔，而是为了自己，为了丹达卡兰亚。这是世界上最保守的秘密，它为这个行将毁灭自己的世界奠定了拯救方法的基础。它蔑视了历史，以最大的几率相比来说，它已经构建了一个为自己生存的蓝图。它需要帮助和想法，它需要医生、教师和农民。

它不需要战争。

但如果被施加战争，它将会反击。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遇到了多名妇女，她们有的在部落妇女组织革命部落民妇女协会工作，有的是人民政府的办事处的总负责人、丹达卡兰亚部落民劳农协会的成员、被害者的家属，以及在这个恐怖年代里试图应付生活的普通人。

我遇到了三个较年老的姐妹，苏克亚丽、苏克戴和苏克爱丽，可能 40 多

岁，来自纳里恩普尔地区。她们在革命部落妇女组织呆了 12 年了，村民们依靠她们来对付警察。“警察两三百人分成一组，他们偷了所有的东西：珠宝、鸡、猪、锅碗瓢盆、弓箭，”苏克爱丽说，“他们连刀子都不会留下。”她在纳里的房子被烧毁了两次，一次被那加营烧毁，一次被中央后备警察部队烧毁。苏希赫曾经在贾格达尔普尔被捕，并判处入狱 7 个月。

“有一次他们把全村的人都带走，说男人们都是纳萨尔派。”苏希赫和所有的妇女儿童跟随着。她们包围了警察局，直到男人们获释后才离开。“无论他们带走谁，”苏克西说，“在他们录完口供之前，你必须马上去把人抢回来，一旦他们录完口供，一切就会变得非常困难。”

苏克亚丽小时候曾被拐走，并被强迫嫁给一个老人（她跑了去和她姐姐住在一起），现在她会组织群众集会并在会议上发言，人们依靠她来获得保护。我问她党对她意味着什么。“纳萨尔意味着我们的家，当我们听到袭击的消息时，就像我们的家人受到了伤害。”苏克亚丽说道。

我问她是否知道毛是谁。她害羞地笑了笑：“他是一个领袖。我们为他的愿景而努力着。”

我遇到了索马瑞·盖乌德同志。二十岁，而她已经是在贾格达尔普尔服过两年刑。

2007 年 1 月 8 日，740 名警察在纳里村周围设置警戒线，因为他们知道尼蒂同志在那里（她曾经在那里，但在他们到达时已经离开了）。但是索马瑞是当时驻扎在那里的乡村民兵。警察在拂晓时开火。他们杀害了两个男孩，苏克莱尔·盖乌德和卡乔·高德。然后他们抓到另外三个人，杜什利·萨拉穆和拉内这两个男孩，还有索马瑞。杜什利和拉内被绑起来射杀了。索马瑞离她生命终结只有毫厘之差。警察找到一辆带拖车的拖拉机，把尸体装进车里。索马瑞和尸体坐在一起，然后被带到纳拉因布尔。

我遇到了占瑞，她是于 2009 年 7 月 6 日被枪杀的迪利普同志的母亲。她说，在他们杀了他之后，警察把她儿子的尸体像动物一样绑在柱子上移动着（在其他人参与杀戮之前，他们需要制造出尸体来获得现金奖励）。占瑞跟在他们后面，一直跑到警察局。当他们到达时，尸体上已经没有任何衣服了。占瑞说，在路上，他们在 dhaba（即“街头大食堂”的意思）停下来喝茶吃饼干时，把尸体留在路边（他们没有为那些付钱）。想象一下这个母亲，跟着儿子的尸体穿过森林，在远处停下来等着杀人犯喝完茶。他们并没有把她儿子的尸体还给她，让她可以为她儿子举行一个适当的葬礼，只让她把一大把土扔进埋藏他们那天杀死的所有人的坑里。占瑞说她想要复仇，以血还血。

我认识了六个马斯高乐人民政府的民选成员，他们可以管理村庄。他们描述了一次警方的劫掠行为：警方有时 300 人，有时 400 人，有时 1000 人，在晚上来。他们在一个村庄周围设立警戒线，并埋伏等待。黎明时分，警方抓到第一批去田里的人，把他们当作人肉盾牌，然后进入村庄，来告诉警方陷阱（“booby-traps”）在哪里（“booby-traps”已经变成了一个冈德语词语。每个人说或听到时都会微笑。森林里到处都是陷阱，有真的有假的。即使是人民解放游击军也需要指引来经过村庄）。一旦警察进入村庄，他们就抢劫，偷窃，烧毁房屋。他们带着狗来，狗会抓住那些试图逃跑的人。它们追逐家畜，

而警察会杀掉家畜，把它们装在袋子里带走。特种警察会和警察一起来，他们知道人们把钱和珠宝藏在哪里。他们抓住人，把他们带走，在他们释放他们之前先把钱拿走。他们总是随身额外携带一些纳萨尔派“正装”，以备他们找到可以杀的人。他们杀死纳萨尔派分子就可以得到钱，所以他们批量制造了一些纳萨尔派“正装”。村民们害怕不敢呆在家里。

在这个宁静的森林里，生活似乎完全军事化了。警戒线和搜索、射击、前进、后退、倒下、行动等词被人熟知。为了收割庄稼，他们需要人民解放游击军来执行哨兵巡逻。去市场也是一种军事行动，市场上到处都是警察用金钱（一个月 1500 卢比）从村庄里诱惑出来的 mukhbirs（告密者）。我听说在纳里恩普尔有一个 mukhbir mohallah——告密者的聚集地，至少有 4000 名告密者在那里。男人们不能再去市场，只能女人们去了，但她们被严密监视着，如果多买一点，警察将控告她们是为纳萨尔派买的。药剂师们收到命令，除极少量药品外，不能让人们随意购买药品。来自公共分配系统的低价配给，糖、大米、煤油被存放在警察局或附近，大多数人无法购买。

联合国预防和处罚种族灭绝罪公约第 2 条将其定义为：

以下任何一种都是蓄意全部或部分摧毁国家、民族、种族或宗教团体的行为：杀害组织成员；对组织成员造成严重的身心伤害；故意打击群体性的生活条件，企图使其全部或部分受到物理上的破坏；采取措施打算阻扰在组织内分娩；【或】强制将组织的孩子转移到其他组织。

我开始吃不消了这几天的步行。我累了，卡姆拉给我弄来了一锅热水。黑暗中我在一棵树后中沐浴。但我不能吃晚饭，或爬进睡袋里睡觉。拉朱同志宣布我们必须移动。

当然，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但今晚很艰难，因为我们听到远处有炮击声。当时，我们在一片开阔的草地上扎营，听到远处有炮击声。在那里有我们的 104 个人，再一次，一条纵队通宵徒步。在我们周围有蟋蟀声，还有像薰衣草般的气味。到了我们要过夜的地方，已经是十一点多了。在露出地面的巨石块，我们站队，点名。有人打开了收音机。BBC 说，在西孟加拉的比卡内尔，有一个东部边境步枪营地遭到袭击，60 个骑摩托车的毛主义者参与，其中，14 名警察被杀，10 个人失踪，武器被抢夺。队伍里一阵欢呼雀跃的低语。毛主义者的领导人基尚吉正在接受采访。你什么时候才会停止这场暴力并来谈判？当绿色狩猎行动被取消时。任何时候，告诉奇丹巴拉姆我们会谈谈的。下一个问题：现在天黑了，你已经放置了地雷，增援部队已经被召集进来，你们还会攻击他们吗？基尚吉：是的没错，否则人民会揍我的。队伍里有笑声。苏克德夫同志解释道：“他们总是说地雷。我们不使用地雷。我们使用简易爆炸装置。”

又一套“千星级”酒店的豪华套房。我感觉不太舒服。天开始下雨了，我听到咯咯笑。卡姆拉朝我扔了一个 jhilli。我还需要什么呢？其他每个人都只是爬进自己的 jhilli 里。

到了第二天早上，比卡内尔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 21 人，另外还有 10 人失踪。

拉朱同志今天早上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晚上再进行移动。

一天晚上，人们像飞蛾一样挤在一个光点周围。这是苏克德夫同志的便携电脑，由一块太阳能电池板供电，他们正在观看《印度母亲》，只有他们的步枪枪管映衬着天空。卡姆拉似乎不感兴趣。我问她是否喜欢看电影。“不看舞蹈（didi，印度舞蹈），只爱看伏击视频。”

后来我向苏克德夫同志询问关于这些伏击录像。他眼也不眨一下，就为我放了一个。它从丹达卡兰亚河流、瀑布的镜头开始，然后是一棵光秃秃的树枝的特写，一只普通鹰杜鹃在叫。突然，一个同志在给简易爆炸装置接线，用干树叶把它藏起来。一队摩托车被炸毁了。有残缺的尸体和燃烧的摩托车，武器被抢走了。三名看上去惊呆的警察，被捆了起来。

谁在拍摄？谁在指挥行动？谁向被俘警察保证，如果投降，他们将被释放？（他们被释放了，我稍后了解到）。

我认识那温柔又安心的声音。是维努同志。“这是库杜的伏击。”苏克德夫同志说。

他还拥有一个视频档案，关于一个被烧毁的村庄的情况，以及目击者和死者亲属的证词。在烧焦的房子的烧焦的墙上写着“那加！为杀戮而生！”有一个小男孩的镜头，他的手指被砍了下来，为绿色狩猎行动的“巴斯塔”一章揭幕（甚至还有和关于我的电视采访，我的著作，我的书，奇怪）。

晚上，收音机里有另一次纳萨尔派袭击的消息，这一次是在比哈尔的加木伊。报告说，125名毛派分子袭击了一个村庄，杀害了10名高尔部落的人，以报复他们向警方提供了导致6名毛派分子死亡的信息。当然，我们知道，报告可能是真的，也可能不是真的。但如果是真的的话，这就是不可原谅的行为。很明显，拉朱和苏克德夫同志看起来很不舒服。

来自恰尔肯德和比哈尔的消息十分令人不安。警察弗朗西·因杜瓦所组织的恐怖斩首行动对每个人都是记忆犹新的。它提醒人们，有纪律的武装斗争是多么容易掺杂充满暴力的流氓犯罪行为，或是种姓、社区和宗教团体之间丑陋的身份战争。通过将不公正制度化，印度政府已经把国家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火药桶。如果政府认为通过实施“有针对性的暗杀”使印度共产党（毛主义）“群龙无首”进而结束暴力，那就大错特错了。相反，暴力会蔓延和加剧，政府将没法和任何人进行谈判。

在和同志们在一起的最后几天里，我们沿着河流穿过郁郁葱葱的、美丽的因拉瓦迪山谷。当我们沿着山坡行进时，我们看到另一排人朝着同一个方向走，但是是在河的另一边。我听说他们要去参加库杜村的反对大坝的会议。他们手无寸铁地在当地山谷的平地上举行集会。我跳进船里，加入了他们。

布恩德咖德大坝将淹没我们已经行进了几天的整个地区。所有的森林，所有的历史，所有的故事，100多个村庄。那就是计划吗？把人像老鼠一样淹死，这样罗汉迪古答的综合钢铁厂和西高止山脉的铝土矿和铝精炼厂就能拥有这条河吗？

在会议上，来自数英里之外的人们，依旧说了以往的陈词滥调。然而尽管我们会被淹死，但我们绝不移动！他们很高兴某个来自德里的人与他们在统一战线上。我告诉他们德里是个残忍的城市，既不知道也不关心他们。

就在我来到丹达卡兰亚的前几周，我访问了古吉拉特邦。萨达尔萨罗瓦尔

大坝现在或多或少已经达到其最高点。拯救讷尔默达组织（Narmada Bachao Andolan，简称 NBA，反对在讷尔默达建立水坝）预测会发生的事几乎全部都发生了。不言而喻的，流离失所的人没有恢复正常生活，运河还没有钱去修建。因此，讷尔默达河的水被分流到萨巴尔马提河的空河床上（很久以前就筑了坝）。大部分的水被城市和大工业所吞没。下游效应——咸水进入没有河流的河口——正在变得无法缓解。

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们认为的大坝是“现代印度的寺庙”的观点是错误的，但也许可以理解。但是今天，在所有这些发生之后，当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一切时，必须说，大坝是对人类的犯罪。

布恩德咖德大坝在当地民众抗议后于 1984 年被搁置。现在由谁来阻止？谁来阻止铺设奠基石？谁能阻止因拉瓦迪被偷走？有人必须挺身而出。

最后一天晚上，我们在陡峭的山脚下扎营，早上我们会爬上去，然后出现在路上，一辆摩托车会在那里接我。与我第一次进入森林不同了，Chironjee（印度特有的树种）、丝棉和芒果树已经开始开花。

库杜的村民们把一大壶刚捕获的鱼送到营地来。还有一份给我的清单，上面有 71 种水果、蔬菜、豆类和昆虫，都是从森林里采来的，生长在自己的田地里，还有市场价格。这只是一张清单。但也是他们的世界图谱。

到达了丛林哨所。有两块饼干给我。来自讷尔默达同志的一首诗和一朵压花。一封来自马森的情书信（她是谁？我会知道吗？）。

苏克德夫同志问他能不能把我 iPod 里的音乐传到他的电脑里。我们聆听了在齐亚·哈克（译者注：巴基斯坦军政府总统，1978 年至 1988 年）疯狂镇压时期，伊克巴尔·巴淖在拉合尔著名的音乐会上所演唱的法伊兹·艾哈迈德·法伊兹的《我们将见证这一天》。

Jab ahl-e-safa-Mardud-e-haram,
Masnad pe bithaiye jayenge
当异教徒和被辱骂者将坐在高处
Sab taaj uchhale jayenge Sab takht giraye jayenge
所有的皇冠都会被抢走
所有的王座都会被推翻
Hum Dekhenge

在巴基斯坦，5 万观众开始高呼：Inqilab Zindabad！ Inqilab Zindabad！（革命万岁！革命万岁！）在许多年后，这首歌谣在这片森林中回响。奇怪的是，在这里建立起来的联盟。

内政部长一直对那些“错误地向毛主义者提供人才和物质支持”的人发出隐蔽的威胁。有资格分享伊克巴尔·巴淖吗？

黎明时分，我向马达夫同志和乔瑞同志、年轻的曼格图和所有同志告别。昌杜同志去组织自行车了，和我一起上主干道。乔瑞同志就不来了（攀爬会让他的膝盖很痛苦），尼廷同志（通缉犯），苏克德夫同志，坎伦拉和其他五个人将带我上山。当我们开始行走时，尼廷和苏克德夫不经意间，同时地解开了

他们的 AK 的安全锁扣，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们这么做。我们正在接近“边界”。“你知道如果我们遭到攻击该怎么办吗？”苏克德夫漫不经心地问道，仿佛这是世界上最自然的事情。

“是的，”我说，“立即宣布无限期绝食抗议。”

他坐在一块岩石上大笑。我们爬了大约一个小时。就在路的下面，我们坐在一个岩石的壁凹里，完全隐蔽着，就像一个埋伏的聚会，听着自行车的声音。时机一到时，告别就来的很快。拉尔·萨拉姆同志。

当我回头看的时候，他们还在那里招手。有一小群人。当世界其他地方生活在噩梦中时，他们则生活在他们梦想中。每天晚上我都会想起这次旅行。那时的夜空，那些森林小径，我看到卡姆拉同志穿着磨损的印度凉鞋的鞋跟被我的火炬照亮，我知道她一定在行进。前行，不仅是为了她自己，而是为了我们大家保持希望。

附录

印度的春雷*

1967.07.05

霹雳一声春雷，震撼着印度的大地。印度大吉岭地区的革命农民，起来造反了。在印度共产党革命派的领导下，一块农村革命武装斗争的红色地区在印度诞生了！这是印度人民革命斗争的一个重大的发展。

几个月来，大吉岭地区的农民群众，在印度共产党革命派的领导下，打碎现代修正主义的枷锁，冲决了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向地主和种植园主夺粮、夺地、夺枪，惩治土豪劣绅，伏击“进剿”的反动军警，显示了农民革命武装斗争的巨大威力。什么帝国主义，什么修正主义，什么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什么反动军队和警察，统统都不在革命农民的眼里，统统要把它们踢翻，打倒在地。印共革命派做得对，做得好！中国人民为印度大吉岭地区的农民的革命风暴而热烈欢呼！全世界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的人民，都为印度大吉岭地区农民的革命风暴而热烈欢呼！

印度农民起来造反，印度人民起来革命，是势所必然的，是印度国大党的反动统治逼出来的。国大党统治下的印度，形式上虽然获得了独立，但是，它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国大党政府所代表的是印度封建王公、大地主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利益，它对内残酷地压迫和敲骨吸髓地剥削印度人民，对外除了继续依附于原来的宗主国英帝国主义之外，又投靠新的主子美帝国主义及其头号帮凶苏修集团，竭尽卖国之能事。这样，帝国主义、苏联修正主义、封建主义、官僚买办资本主义这几座大山沉重地压在印度广大人民，尤其是工农劳苦大众的头上。近几年来，国大党政府变本加厉地镇压和剥削印度人民，推行卖国政策，使得印度连年饥荒，饿殍遍野，印度的广大人民再也活不下去了，特别是印度广大的农民再也活不下去了。现在，大吉岭地区革命农民终于起来造反，起来进行暴力革命。这是印度全国亿万人民起来进行暴力革命的先声。印度人民一定会推倒这几座大山，彻底翻身。这是印度历史的总趋向，是不可抑止，不可阻挡的。

印度革命应该走什么道路，这是关系到印度革命成败的根本问题，是关系到五亿印度人民命运的根本问题。印度革命必须走依靠农民，建立农村根据地，坚持长期的武装斗争，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这是毛泽东的道路，是中国革命所走过的胜利的道路，是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

*本文是《人民日报》1967年7月5日关于印度纳萨尔派起义的社论，来自哗哩哗哩专栏文章《人民日报1967年社论“春雷隆隆”》。

的革命胜利的必由之路。

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远在四十年前就指出：“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无论什么大的力量都将压抑不住。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一切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他们葬入坟墓。” [1]

毛主席早就明确地指出了农民问题在人民革命中占有极端重要的地位。农民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民族民主革命的主力军，是无产阶级最可靠最广大的同盟者。印度是一个五亿人口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农民又占全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一旦几亿印度农民被发动起来，就会形成印度革命的不可战胜的强大力量。印度的无产阶级同几亿农民结合起来，就能够在印度广大的农村出现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动，就能够通过一场惊心动魄的人民战争，去战胜任何强大的敌人。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说：“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是普遍地对的，不论在中国在外国，一概都是对的。” [2]

印度革命的特点，同中国革命的特点一样，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武装斗争的道路，是印度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舍此没有任何其它的道路。什么“甘地主义”，什么“议会道路”，统统都是印度统治阶级麻醉印度人民的鸦片烟。只有依靠暴力革命，走武装斗争的道路，才能拯救印度，才能取得印度人民的彻底解放。具体地说，就是要放手发动农民群众，建立和壮大革命的武装力量，用毛主席所亲手制订的一整套人民战争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去对付暂时比革命力量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武装镇压，坚持长期的武装斗争，一步一步地去夺取革命的胜利。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根据中国革命的特点，指出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毛主席教导说：为了坚持长期的武装斗争，战胜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的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 [3]

印度幅员辽阔，广大农村是反动统治的薄弱环节，那里有着革命者纵横驰骋的广阔天地。只要印度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革命路线，依靠农民这支伟大的同盟军，完全有条件在印度广大的落后的农村创建一个又一个先进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起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这样的革命根据地，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和曲折，终将由点到面、由小片到大片地波浪式地发展起来。这样，印度的革命就能够逐步地形成农村包围城市的局面，为最后夺取城市，取得全国的胜利开辟道路。

大吉岭农村武装斗争的发展，已经使得印度反动派惊慌失措，感到大难临头了。他们惊呼，大吉岭的农民暴动“将会变成全国性的灾难”。帝国主义和

[1]见《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一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3 页。

[2]见《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41 页。

[3]见《毛泽东选集》第二版第二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635 页。

印度反动派正在千方百计地把大吉岭农民的武装斗争镇压下去，力图把它扼杀在摇篮里。丹吉叛徒集团和一小撮印共修正主义头目们，都在起劲地诽谤和攻击印共革命派和大吉岭革命农民的伟大的壮举。西孟加拉邦的所谓“非国大党政府”，也公然同印度反动派一起，对大吉岭的革命农民实行血腥镇压。这只能进一步证明，这伙叛徒和修正主义者，都是美帝国主义和苏联修正主义的走狗，是印度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奴仆，所谓“非国大党政府”，不过是印度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工具。

但是，不管帝国主义、印度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如何配合起来，进行破坏和镇压，印共革命派和大吉岭革命农民所点燃起来的武装斗争的火炬是熄灭不了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吉岭的星星之火，终将燎原，一定要燎原。一场席卷全印度的革命武装斗争的伟大风暴，终将到来，一定要到来！尽管印度革命斗争的道路是长期的、曲折的，但是印度的革命，在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

毛泽东在《关于同印共左派米斯拉联系问题的请示》上的 批示*

(1967年11月17日)

康生^[1]同志：

此种学习是我方建议的，不是印方主动，往返危险甚大，似宜缓办，请酌。

毛泽东 11月17日

*本文选自《机密档案中新发现的毛泽东讲话》，宋永毅编，国史出版社2018年7月，进行了注释。维诺德·米斯拉是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解放派的领导人。

[1]1898-1975年，时任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文革小组顾问。

毛泽东主席接见印共左派大吉岭县委第二批学习代表团谈话记录*

(未经毛主席本人审阅)

时间：1967年12月13日10时25分至11时45分

地点：人民大会堂

参加人：

中方：毛泽东、周恩来、康生、杨成武[1]、刘宁一[2]

印方：卡努·桑尼亚尔[3]、迪帕克·比斯瓦斯、阿卜杜尔·哈密德、库丹·马立克

翻译：李光辉

速记：姚世根

毛主席（以下简称主席）：卡努·桑尼亚尔是哪一位同志？

康生（以下简称康）：就是这位同志。

主席：那一位同志叫什么名字？

卡努·桑尼亚尔（以下简称桑）：迪帕克·比斯瓦斯同志。

康：他是个大学生。

主席：迪帕克·比斯瓦斯同志是大学生，那你（指卡努·桑尼亚尔）呢？

桑：我不是。

主席：读了几年书？

桑：学了大学预科。

主席：你叫什么名字？

桑：他是阿卜杜尔·哈密德同志。

主席：你没有上过学？

阿卜杜尔·哈密德：学得非常少。

主席：学多了也不见得好。那一位呢？

桑：他是库丹·马立克同志。

主席：你们两位（指阿卜杜尔·哈密德和库丹·马立克）都是农民吗？

*本文选自《机密档案中新发现的毛泽东讲话》，宋永毅编，国史出版社2018年7月，对原文进行了整理、注释。

[1]1914-2004年，时任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办事组组长。

[2]1907-1994年，时任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代部长。

[3]1932-2010年，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始人之一。

桑：是。

主席：这一回你们是怎么跑出来的？从哪里来的？

桑：先通过印度的西孟加拉邦，然后再通过尼泊尔。在印度西孟加拉邦那个地方坐火车，到了尼泊尔坐公共汽车，然后从加德满都到中国这一段路，有时乘汽车，有时骑马。

主席：你们还爬过喜马拉雅山。

我们站在你们这一边，跟你们一起反对南布迪里巴德[1]、孙达拉雅[2]和左蒂·巴苏[3]。左蒂·巴苏是不是到过中国？

康：到过，和高士[4]一块儿来的。

主席：他们是搞合法主义的，跟政府搞妥协，思想上和他们是一致的。他们对人民进行欺骗，要搞什么联合政府，搞什么议会过渡，这样就可以和平过渡，将来搞社会主义，那是一些假话。

印度现在是一个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统治的国家。统治一直到什么县政府，一直到什么乡政府，都有警察。印度人民要把这一套统统搞掉，建立自己的政权机关。现在你们力量还小，印度这个国家那么大，人那么多，也不晓得政府何时建立，你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

桑：我们有信心，只要沿着毛主席思想这条路走下去，我们最后一定能够得到解放。

主席：真正的革命开头规模是比较小的。如果开头很大规模，那是不可设想的。

现在西孟加拉邦不是有个联合政府嘛。

周恩来（以下简称周）：被国大党政府解散了。

主席：喀拉拉邦呢？

桑：到现在为止，据我们所知，喀拉拉邦还是联合政府。

主席：没有国大党的联合政府，好像有八九个吧？

桑：有九个邦的联合政府是非国大党的。

主席：印度一共是十四个邦？

桑：十四个邦。

主席：印度有四亿多人口，十四个邦，那每一个邦都相当大了。

周：孟加拉邦是个很大的邦。

主席：你们四位同志是不是一个民族？

桑：是不同的民族。

康：他们三位（指桑尼亚尔、比斯瓦斯和哈密德）是孟加拉族，他（指马立克）不是孟加拉族，哪一个少数民族我不记得了。

[1]1909-1998年，时任从印度共产党分裂出来的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政治局委员、喀拉拉邦首席部长。

[2]1913-1985年，时任印共（马）首任总书记。

[3]1914-2010年，时任印共（马）政治局委员、西孟加拉邦内政部长，曾下令镇压纳萨尔巴里运动。

[4]1909-1962年，阿·库·高士，曾任印度共产党总书记，4次访问中国。

周：你的家是不是在和锡金接境的地方？

库丹·马立克（以下简称马）：在马吉莫附近。

周：挺接近。他有点像我们黄种人。

桑：他住的那个地方，有两个族，完全和黄种人一样，一个叫吉美吉，一个叫德马克。

主席：他们也许是元朝蒙古进入印度时留下来的。

你们在路上走了多久？什么时候到北京的？

桑：从孟加拉邦大吉岭县到拉萨花了五天时间。

主席：那也走得很快嘛。

从拉萨到北京呢？

桑：坐飞机一天就到了。

主席：到北京多久了？

桑：9月15日到。

主席：10月15日，11月15日，12月15日，80天了。你们在北京就没有出去？

康：主要是在昌平军事学校学习军事。

主席：他是总参谋长杨成武同志，管军队的。（向杨成武）你也是从小当兵的吗？

杨成武（以下简称杨）：是，16岁当红军。

主席：你们从推翻地方政权，夺取地方权力机构，夺取土地这样的方式开始时，赞成你们计划的还是少数吗？

桑：我只能谈谈我们县的情况。开始进行武装斗争时，我们县只有二十来人。

主席：那后来呢？

桑：后来人数增加了，从开头的两个区发展到4个区，到后来发展到4万人。

主席：革命是有起有伏的，像波浪那样前进的嘛，是会受到挫折的。你们对中国党的历史清楚不清楚？

桑：到中国后学了一点。

主席：开始在城市里头搞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学生运动，这靠不住。后来资产阶级叛变了，杀了人，把工会、农会和学生团体通通扫光了，我们的同志才知道要搞武装斗争。开始力量也很小，打了一些败仗，也打了一些胜仗。因为那时我们党里头出了几次机会主义，所以结果把大部分的根据地都搞掉了。这时日本人打进来了。以后我们在日本占领的后方又建立了许多根据地。日本走了，又和蒋介石打，结果打败了蒋介石，他逃到台湾去了。像中国，像印度这样的大国，帝国主义是很注意的。要使自己队伍里头不犯错误也是很难的。你们刚换了丹吉^[1]，南布迪里巴德、孙达拉雅这些人好像比较好一些嘛。

[1]1899-1991年，时任印度共产党主席，1964年印共分裂后，以他为首的一派仍称印度共产党。1981年4月，丹吉因支持英迪拉·甘地政府推行私有化、自由化经济政策与党内发生分歧而被开除出党。

结果他们是右的。

康：特别是达斯·古普塔，原来以为他是左的，到赫鲁晓夫下台以后，就完全变右的了。

主席：他们脱离群众，群众根本不和他们站在一起。现在大雪封山，你们还能过去吗？

桑：要过去的话，就要努力。

周：有公路可走吗？

桑：因为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到中国，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情况。

刘宁一（以下简称刘）：12月以后才封山，现在有的地方还可以通。沙尔玛就是走山路回去的。他走了两个礼拜。他过去不晓得怎么组织游击队，到了中国，在昌平学了两个月，学习怎么组织游击队。回去后，他现在正在开训练班。

主席：在他们哪里开？

刘：在他们本地区开。

他们有计划地一批一批地来，现在一共来了三批。互相都不知道走哪一条路来的，什么时候动身也不知道。

主席：第三批有多少人？

康：8个人。

主席：你们准备什么时候走？

刘：明天乘飞机到成都，然后由成都乘飞机到西藏，大概后天就可以走。

主席：成都有到西藏的飞机吗？

周：拉萨南边有个新修的机场。

康：乘飞机到拉萨的情况是这样的：从北京到拉萨一个礼拜一次，从成都到拉萨一个礼拜两次。

主席：我们很欢迎印度同志到我们这里来交换意见。

办的训练班有多久了？

刘：不到两个月，在北京正式学习了一个多月，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群众工作、农民工作。到了昌平以后，就学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和建立根据地。

主席：不学打枪、投手榴弹这些？

刘：本来要在昌平实习，据说那里有武斗，就准备到西藏去实习。

康：你们在昌平学过爆破技术和制造手榴弹没有？

桑：学过。

主席：训练班顶多办两、三次。要注意休息，准备斗争。大多数不学也可以，就打，打仗就是一次很好的学习嘛。书读多了，像丹吉、南布迪里巴德和孙达拉雅，学了有啥用！

康：库丹·马立克同志打过仗吗？

马：打过。

周：会打枪？

马：稍微会一点。

康：迪帕克·比斯瓦斯同志也参加过战斗？

桑：参加过。

康：你们四人都参加过？

桑：都参加过。

康：用什么武器？

桑：弓箭，另外从地主手里夺来的打猎用的枪也用上了。

主席：从警察手里抢些枪没有？

桑：我们和警察较量过，但是枪没有抢到。

主席：用突然袭击的方法抢。用多数人对付小股警察，就可以消灭那一小股警察。

中央政府的正规军队还没有参加进来和你们打仗吗？

桑：在我们县里，正规军队还没有参加，中央政府只派了半军事武装的部队在那里驻扎。

主席：怎么叫半武装部队？

桑：在这个部队中，有一部分是警察，有一部分是军事干部。

主席：这样的军队有多少人？

桑：大概有 12000 人。

主席：有这么多呀！

康：恐怕是连地主的武装在内。

桑：没有。

周：大吉岭地区有一个军，军部在大吉岭。这个军有两个师，一个师就在那个地方。

你们离大吉岭有多远？

桑：25 英里。

周：那很近。

主席：运武器、手榴弹和物资到那里去现在还很难。

杨：我们国境到大吉岭只有 80 公里。

周：80 公里两天就能走到。

刘：北边最难过，因为那个地方军队驻扎得多。

主席：你们对麦克马洪线怎么看法？

桑：我们并不承认麦克马洪线。中印边界冲突时，我们曾经起来反对印度政府，认为中国政府所说的那些话是对的。

主席：我们现在把这个问题拖着，拖到印度人民，就是你们这些人组成了中央政府，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断绝了关系，那时和你们订一个条约，把这条线以南九万平方公里的那些地方给你们。如果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政府，不管是尼赫鲁政府也好，现在的英迪拉·甘地政府也好，或南布迪里巴德的政府也好，我们一寸土地都不让。将来印度革命人民建立了政府，那么全部给你们。你们看这样做好不好？我们就这么一个方针。

桑：我们认为中国党和政府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主席：我们并不想要这九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这些话我和高士也讲过。高士实际上是替尼赫鲁打交道的。我们告诉他，他有一点好处，他在莫斯科会议上还说了中国的好话。

康：他比丹吉好一些。

主席：你们这种来往的办法比较好，不要什么护照，也不要什么政府许可，就自己走来。

康：从印度到尼泊尔不要护照。

主席：到东巴基斯坦呢？

桑：要护照。

周：从尼泊尔到西藏算半公开的。

主席：我们加德满都使馆怎么安排你们来的？

桑：我们先到尼泊尔的加德满都，找到了中国大使馆，然后由大使馆同志给我们安排，派了一个向导，指定我们走那一条路到边境。

周：给不给条子？

桑：我们晚上走的，没有给什么条子。

康：你们坐汽车，人家问你干什么，你怎么回答？

桑：通过关卡时我们躲在汽车底下，关卡过后，然后我们从汽车底下出来又走。

主席：你们搞得很好。但是这不是一个长久的方法，走的人多了，印度政府就怀疑了。

康：沙尔玛就是走小路过去的。他走了两个礼拜。

主席：他不是通过尼泊尔走的？

康：他不是通过尼泊尔的首都。

刘：他走山路过去的，带了干粮，走一天就有一个村庄。

周：公路以西，香客就走山路到中国来。你们熟悉香客走的路吗？

桑：这些路不大熟悉。

刘：走山路要路熟。如果路不熟，找不到村庄就吃不到饭，所以要带干粮。

沙尔玛在路上还有这么一个插曲：他到了一个村庄，住在农民家里睡觉，农民家里夫妇两人吵架，警察去了，一看有个生人，就把他抓起来带走了；又走了一段路，到了一个地方，遇到农民和地主吵架，警察看到又有人吵架，就没有注意他，沙尔玛就乘机溜走了。

主席：印度要靠工人、农民来解决问题，就是靠你们这些人。我们不是靠什么甘地、尼赫鲁和南布迪里巴德来解决问题的。他们都是暂时性的人物，只有工人、农民的英雄们，这才是将来的领导者。所有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都消灭了，才能在全世界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现在嘛，它们在多数地方还很“兴旺”，比如在你们印度，就是一个大吉岭县政府就了不起了。

康：《参考消息》上转登了一篇印度人写的文章，说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1]上台三年对印度反动派的援助超过了赫鲁晓夫的十年。

周：价钱比西方贵 20%。

康：黎笋[2]在车上对我说，他同苏联的勃列日涅夫、柯西金讲，苏联对印

[1]1904-1980 年，时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2]1907-1986 年，时任越南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

度的援助比对越南的援助要多得多。不晓得他是真讲还是假讲，但是事实是这样的。

周：援助阿联也比援助越南多。

主席：那些援助是有利息的。所以现代修正主义跟帝国主义差不多。

周：苏联在安全理事会上放弃了自己的提案，可以把英国的提案接过来。所以现在加深了阿拉伯国家的统治者和苏联之间的矛盾，国家之间也有矛盾。

主席：看来也门政权有危险。

周：皇室那一派过去逃出去了，住在沙特阿拉伯的边境地方，现在在进攻共和国派。

在阿拉伯国家中，阿联也有大国沙文主义。

主席：（向印度客人）我们讲的是阿拉伯国家的事情。

康：苏联现在相当紧张，勃列日涅夫到捷克去，乌布利希^[1]到莫斯科，葛罗米柯^[2]到波兰，大概西德问题有点紧张。

主席：怎样紧张法？

周：西德复仇主义不承认边界。北大西洋的布防，美国要撤兵，英国也要撤兵，结果边界第一线陆军里头有很大数目是西德的部队。

康：另外，捷克内部有问题，诺沃提尼^[3]有些危险。

周：罗马尼亚政府改组了，更倾向和苏联宣战。因为苏联不给它工业原料，铁是靠苏联供给的，所以现在改组政府和它宣战，把亲苏的换了。斯托伊卡过去是比较亲苏的。

康：斯托伊卡由国务委员会主席变成了书记处书记。

周：齐奥塞斯库既是第一书记，又是国务委员会主席。斯托伊卡没有权了。现在党政军变成一元化了。

康：特别是阿波斯托尔，他过去是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实际上是管党的，现在和谢列平^[4]一样，管工会去了。另外，搞警察特务机关工作的德勒吉奇也撤职了，改任部长会议副主席。

主席：过去有四个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

康：现在只有一个年轻的，准备代替毛雷尔^[5]的。

它采取一个办法，党政合一，党的机关同政府机关是一个，文教和宣传也是一个。

主席：搞两套也没有多少道理。

康：他们觉得重复了。

[1]1893-1973 年，时任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

[2]1909-1989 年，时任苏联外交部长。

[3]1904-1975 年，时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

[4]1918-1994 年，曾任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主席，策划了推翻赫鲁晓夫的政变，本有可能成为苏联最高领导人，却被勃列日涅夫排挤出政治局。

[5]1902-2000 年，时任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

主席：（向印度外宾）我们讲的是罗马尼亚政府改组的事情。它和苏联有冲突。据他们（指周总理、康生）说，苏联、东欧、波兰这些国家对西德复仇主义起来有些害怕。那个边界我看靠不住。

周：他们把普通军队摆在第一线，把核装置和空军都摆在后头。如果边界发生冲突，可以拿普通军队打，不能动用核武器，这个规定很特殊。这是刚得到的初步材料，还要研究。

康：英国也借口财政困难要撤兵。

周：美国有四个师，英国本来就不多，法国也撤了，所以西德就更自由了。

主席：苏联在东德、波兰和匈牙利有一点军队，捷克没有了。

康：美国在越南等问题上压苏联。

看来他们很紧张，十月革命节时，那些家伙都到了莫斯科，现在有的到莫斯科去，有的出去，看来相当紧张。

周：他们困难重重，所以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率领一个代表团正式访问苏联，讲条件去。

主席：今天就谈到这里。[1]

[1]毛泽东主席给卡努·桑尼亚尔的临别赠言：“忘记你在中国学到的一切。一旦回到纳萨尔巴里，就制定你们自己的革命战略，牢记那里的实际情况。”

印度共产党（毛主义）《党的纲领》*

印度共产党（毛主义）

二〇〇四年

前言

目前的这份文件初稿，经联合中央委员会广泛探讨后，已在 2004 年 9 月最终定稿。联合中央委员会是由前身是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人民战争集团和印度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两党合并成立的中央委员会。两党高级代表团 2003 年 2 月至 2004 年 9 月举行了一系列双边会谈，经过激烈讨论后起草了五份初稿文件。联合中央委员会召开会议深入研究了这五份初稿文件，坦诚地互换 30 多年以来革命实践生涯的丰富经验，并在当今国际社会变化发展的背景下，就印度革命需要面对的一系列棘手问题达成了共识。

目前的这份文件——《党的纲领》——综合了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人民战争集团和印度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两党文件的精华，同时吸收了发动人民战争，反对印度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存在的修正主义与左右倾机会主义倾向，以及在印度各个地区建立稳固连续的革命运动的经验。

这份党纲文件将会下达至我们新联合成立的印度共产党（毛主义）的广大党员中，以便立即作为党的行动指南，得到贯彻实施。同时，也应牢记这是一份为即将到来的统一的党的代表大会准备的文件草案，因此，这份文件需要所有党员的参与以丰富党纲内容，并在必要时提出修改意见。由此，这份党纲文件应该成为我们党解决印度革命遇到的基本问题和将印度革命推向胜利的有效武器。

印度共产党（毛主义）中央委员会

2004 年 9 月 21 日

引言

在与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几十年以来根深蒂固的修正主义决裂后，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1970 年的党纲和印度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 1969 年的文件已为印度革命提供了正确的革命总路线。基于印共（马列）和印毛共中心在领导印度人民战争的过程当中积累的丰富经验，联系国内外形势的主要变化，两党召开了代表大会和其他各种形式的会议，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这两份文件所提出的革命总路线。

印共（马列）和印度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是印度毛主义运动的两大主要党派代表，两党的历史深深植根于 60 年代轰轰烈烈的纳萨尔巴里运动。当时，在将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应用于印度的具体实践，同时对印度共产党和印度共产党

*本文选自《印度共产党（毛）文献集》上册，收录时在一些具体译法上对原文进行了修改。

（马克思主义）由来已久的修正主义倾向进行揭露和反对，并与之决裂的过程中，我们两党涌现出了两位最杰出和重要的领导人——查鲁·马宗达同志和卡奈·查特吉同志。1967年5月由查鲁·马宗达同志领导的伟大的纳萨尔巴里运动标志着印度吹响了“印度的春雷”的号角。

在此后时期内，我们两大毛主义政党不仅继承了我们敬爱的领袖的遗产，而且通过持久人民战争，重建和推进了武装土地革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新时期的“春雷”再一次回荡在安得拉邦、比哈尔-贾坎德邦、丹达卡兰亚地区和我们国家的其他地区中；在整个印度甚至在更遥远的地方人们越来越能感受到这革命的春雷。

今天，作为世界总体危机的一部分，印度政治经济危机正在不断加剧，这为人民运动包括我们统一的党领导下的新一波革命高潮的来临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全国性的人民运动迫切需要领导，而我们党将会满足这一需求——这必然会加速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在全国范围的发展。在此背景下，我们有信心，这份新的党纲将让全体党员更为清晰地认识我们党的总路线，帮助党担负起领导不断高涨的人民斗争浪潮的任务，并在全国范围内推进人民战争。

党的纲领

一、我们亲爱的祖国印度，居住着近 11 亿人口，是世界上最古老、面积最大和人口最多的国度之一。我们国家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像劳动力、动物、土地、水、矿产和森林等。印度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由各种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民族和部落构成，还包括有不同信仰的人民。我国的绝大多数人口主要依赖农业。因此，本质上，印度还是一个农民为主体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人民是勤劳和智慧的，这块土地上的文明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总而言之，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继承了灿烂的文化遗产并且富有优良的革命传统。

二、在经历数千年的封建统治后，英国殖民主义者开始利用东印度公司对我们国家实行干预。此后，以 1757 年普拉西战役的胜利为开端，英国殖民者开始占领整个印度并在随后的几十年中成功建立了对印度的直接殖民统治。当时，印度封建经济正在孕育着商品经济的萌芽，贸易、商业、家庭手工业日趋繁荣。但是，来自英国殖民主义者的剥削压迫残忍地摧毁了印度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他们也残忍地摧毁了本土手工业和商业。农村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起初遭受了某种程度的瓦解，此后在很大程度上已瓦解。英国殖民者使印度沦为其原材料的供应地和工业产品输出市场。将近 200 年的直接殖民统治和剥削，使印度经济完全沦为帝国主义的附庸经济。印度经济因此以从属的、受支配的地位并入世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经济体系中，随后，印度被打造成仅仅满足英帝国主义金融资本主义需要的附庸国家。

为了巩固统治和实行残酷剥削，英殖民主义者保留印度封建势力的同时，通过实行柴明达尔、马哈瓦尔和莱特瓦尔土地制度，收取固定赋额。由此，英国统治者使原本独立的封建的印度沦为了殖民地和半封建的印度。

三、无产阶级从贫农和破产农民当中诞生了，并由此登上了印度历史舞台。他们在英国殖民主义者开办的铁路、矿山、船坞厂、种植园和一些产业中出卖劳动力。同时，在英帝国主义的庇护下，买办商人、放高利贷者、封建统

治者和地主按照英帝国主义的规划和需求，对纺织业、黄麻、钢铁、造纸和种植园业等进行投资。在这些买办商人、放高利贷者、封建统治者和地主们中又诞生了现在的买办大资产阶级，他们的生存和发展完全依赖帝国主义。同时，受过教育的小资产阶级也从英国殖民者为满足其管理和统治需要而引入的教育系统当中诞生了。

四、从英国统治印度开始，英国殖民者就不得不面对印度人民伟大的民族解放斗争。英殖民者占领印度后，印度的历史就成为一部印度人民不断反抗英帝国主义及封建剥削与压迫的历史。这段历史也是一部光荣的农民革命斗争史，一次次反抗英帝国主义及其封建代理人的农民反抗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从1854-1856年的桑塔尔人起义，到1857年第一次独立战争达到高潮，这标志着印度民主革命的开端。全国范围内的农民、爱国民众以及军队的起义点燃了燎原的星星之火，使英国殖民主义者遭受了诸多耻辱性的失败并由此动摇了其统治的根基。但后因封建势力领导人的背叛，起义以失败告终。

此后，大量反抗英国殖民者及其封建代理人的农民武装斗争和部落叛乱不断发生。然而，此时的工人阶级既没有强大到提供领导，也没有形成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以及以这种意识形态为基础的革命党，这些斗争和反抗都遭遇了失败。

五、国大党及之后甘地在国大党中的领导被英殖民主义者创造出来并加以利用，以瓦解和破坏不断高涨的反帝民族解放运动，并借机剥夺人民对革命的领导权。由于帝国主义危机和世界大战，劳苦大众的生活状况变得越发地令人难以忍受。拿起武器起来反抗英帝国统治的农民、工人和其他劳苦大众越来越多。一部分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也一次次地拿起武器进行英勇的斗争。人民英勇的斗争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而剥削者和压迫者也因此感到恐惧。然而，以比哈尔邦的坎巴兰农民斗争为开端，甘地主义宣扬非暴力、消极抵抗以及“非暴力坚持真理”的思想，将正在蓬勃发展的民族解放运动从斗争和革命的道路上转移到屈服和谈判的道路上。甘地主义斗争的实质是代表了买办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利益，是忠实于英国殖民者的。英国殖民者为了保护自身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在政治经济上向买办大资产阶级和地主做出一些让步，以确保买办大资产阶级能继续成为英帝国主义统治印度的牢固支撑。

六、1917年在列宁同志领导下俄国取得了伟大的十月革命的胜利，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我国迅速传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影响下，印度无产阶级反抗英帝国主义并不断向其发动英勇的武装斗争。在此背景下，印度共产党于1925年诞生了。尽管有无数次机会，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未能掌握解放运动的领导权。印度共产党领导人一直未能认清甘地主义的实质，因此未能与之做斗争并划清界限，并采取正确的革命道路和抓住革命的主动权。更确切地说，印度共产党一直尾随甘地领导而未能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印度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印度共产党也未能与勇敢的印度人民，尤其是农民相结合。印度共产党也拒绝向毛泽东同志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成功的中国革命学习。在民族解放运动中印度共产党没有走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道路。虽然当时印度的客观革命形势非常有利，但是印度共产党中奉行机会主义的领导人不愿意走持久人民战争和武装民族解放战争的正确革命道路。实际上，在印度共

产党的领导下，反抗帝国主义的人民激进运动脱离了正常的轨道，印度共产党甚至还与甘地主义结成了机会主义联盟，从而引导革命群众尾随甘地的领导。最重要的是，印度共产党领导层背叛了伟大的特伦甘纳农民武装起义，并且以利用议会的欺骗性名义深深地陷入了议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泥淖之中。同样地，当时的客观情况也对推进土地革命和采取持久人民战争的光明道路空前有利，这条道路的正确性已经被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已经取得胜利了的中国革命所印证。尽管如此，印度共产党中英勇的革命派仍站在战斗的人民一边并领导了许多革命斗争。他们中的很多人将自己的宝贵生命献给了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一部分的印度革命。

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之后，伟大的斯大林同志领导世界人民和苏联红军彻底打败了法西斯势力；因为这场战争，帝国主义力量被大大地削弱了；人民民主力量在东欧国家崛起，伟大的中国革命在毛泽东同志的领导下取得了惊天动地的胜利，这照亮了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的解放道路；在世界1/3的土地上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的出现连同空前高涨的民族解放斗争在世界上建立了新的力量平衡。更重要的是，中国革命的胜利给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备受帝国主义剥削压迫的民族和人民指明了解放的道路。在当时的世界形势下，中国革命的胜利为改变力量平衡做出巨大贡献。

这样严峻的形势逼迫帝国主义必须立即改变它们旧有的直接殖民统治方式，而采取另一种新的殖民统治方式，即精心挑选和训练代理人来进行殖民统治和剥削，来拯救帝国主义自身，因为新出现的情况已经极大程度地削弱了它们。帝国主义者已经培训了他们精心挑选的代理人，这些代理人所代表的是帝国主义的忠实统治阶级——大买办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由此，帝国主义者改变了旧有的剥削和统治的殖民方式而代之以间接地统治、剥削和控制的新殖民主义方式。

八、在二战时期以及二战结束后不久，印度次大陆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革命形势。爆发了要求释放被囚“印度国民军”的强大抗议运动；激烈的全国范围的学生反帝游行；孟加拉“三一”减租运动，巴卡诗特运动以及在土邦中爆发的激烈反封建运动；邮政和电报员工罢工；在孟买皇家印度海军爆发的光荣兵变以及印度士兵对英帝国忠诚度的丧失；比哈尔邦警察起义；工人阶级团结斗争以及历史性的特伦甘纳农民武装斗争的开始；这些都让帝国主义在印度的统治大厦摇摇欲坠。

在这样的形势下，英帝国主义利用其忠实的买办代理人——国大党和全印穆斯林联盟的领导人来维护其剥削、控制和间接统治，镇压印度人民的革命浪潮。他们实施了阴谋诡计，造成集体大屠杀，国家在宗教的基础上遭到划分。英帝国主义把权力移交到了它们的忠实代理人，即代表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利益的国大党手中，英帝国主义走向幕后。本质上，1947年的“独立”宣言只是谎言。实际上，英帝国主义的直接殖民、半封建制度被间接的帝国主义统治、剥削和控制的新殖民主义形式所取代，印度成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九、在印度宣布正式独立后，这些官僚买办大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仍继续忠实地服务于帝国主义，从本质上说，印度独立是假的。形势的确发生了变

化，除了英国、美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剥削者，苏修剥削者也开始向我们国家渗透。在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苏联复辟了资本主义。印度统治阶级屈从于帝国主义者，向帝国主义势力打开大门供其劫掠，同时，印度统治阶级也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实现自己的利益。

十、在直接殖民统治结束之后，帝国主义者采取了间接统治的新形式，剥削和控制附庸于他们的民族和国家，这就是新殖民主义——更具欺骗性并且比原来的殖民主义统治方式更加邪恶。现在帝国主义的金融资本通过帝国主义国际机构，如向其他国家强加苛刻条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并以贷款和“赠款”的方式，不受限制地向附庸国输入资本。通过这样的方式，帝国主义国家的金融资本不受限制地向附庸国大幅流入，并由此增强对附属国的控制。除此之外，跨国公司对附属国的直接投资也一直在增加。

帝国主义国家的金融资本在我们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生活的各个领域的主导力和控制力正不断增强。事实上，帝国主义国家控制了印度经济甚至是政府的关键领域和部门。帝国主义金融资本的全方位渗透和控制体现在帝国主义对印度投入的金融资本总额的惊人增长，成千上万的技术和资本的大举进入，对印度大量不平等的、羞辱性协议的签订上，同时也体现在印度对帝国主义的“援助”、赠款和贷款，以及资本品、技术情报、农业投入、军用物资和军火工业等的依赖上。近年来，世界贸易组织和帝国主义全球化致使帝国主义金融资本对印度农业部门和其他部门的控制仍继续在加强。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根本性原因是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对帝国主义的屈从。因此，印度仍然是帝国主义通过新殖民主义施行间接统治、剥削和控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十一、遵照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的命令和计划，印度大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统治阶级继续实行服从于帝国主义国家全球战略需要的反动外交政策。

十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帝国主义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也突出地成为世界上被压迫人民、民族和世界无产阶级的主要敌人。

在斯大林同志逝世后，尤其是苏共二十大后，苏联变成了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到 1970 年代，苏联进一步成为社会帝国主义国家，从而成为了一个超级大国。苏联一直披着社会主义的外衣，将东欧国家变成其卫星国。而且，苏联开始剥削许多被压迫国家和民族，成功建立了对这些被压迫国家和民族的主导和控制。苏联在拥有核武器的同时成为世界人民极其危险和邪恶的敌人，同时也成为美帝国主义重新瓜分和霸权统治世界的主要竞争对手。在这场重新划分世界、争夺霸权的对峙中，无数无辜的生命丧失在一次次的代理战争中，甚至在某些情况下，世界又濒临爆发世界战争的边缘。同样地，对于印度来说，两个超级大国一直是印度人民最大的压迫者和剥削者，在印度展开竞争。而在 1970 年代后，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在印度维持了 20 多年的主导地位。在超级大国苏联解体后，印度统治阶级开始投靠超级大国美国，目前美国仍主导着印度。

十三、印度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是帝国主义剥削和控制印度的主要工具之一，其生存和发展完全依赖帝国主义，其利益与帝国主义在各个领域的利益是紧密相连的。印度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相联系，与封建主义结成同盟

关系。这些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或者大资产阶级或者国家垄断资产阶级）是极其反动、反人民和反民族的，他们使广大的印度人民——无产者、农民和小资产阶级遭受残酷的剥削压迫，这也成为印度经济独立发展的障碍。在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的联盟中，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发挥着领导作用。官僚买办资产阶级限制了小的和中等的资产阶级的发展，同时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结成同盟，维持衰败的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因此，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也是印度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之一。

十四、由于对农民起义所展现出来的愤怒的惧怕，尤其对伟大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特伦甘纳农民起义感到恐慌，印度买办大资产阶级和封建统治阶级在 1947 年以后根据帝国主义的需要和计划，以废除封建主义的名义对土地关系进行了一系列变更。在支付巨额补偿之后，“土邦”和农业耕种的中介行为被废除。但是，大地主仍继续垄断土地，而广大的农村贫困农民的土地仍然遭到掠夺。

即使在今天，我们国家仍有 2/3 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从根本上来说印度还是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家。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也是受剥削压迫最为严重的阶级。他们被迫生活在最为悲惨的和极其贫困的状况下。纵使在那场土地改革的骗局下，总土地的 30% 仍然集中在占总人口 5% 的地主手中，而在农村人口中中农大概占了 20%，富农占了 10%。农民总人口的 65% 是无地农民和贫农，他们要么一点土地也没有，要么仅有一点贫瘠的土地。在农村地区，半封建的极端剥削形式仍然存在。主要流行的剥削方式是通过分成租赁制度、抵债性劳动、高利贷和商人资本还有其他额外的经济胁迫强夺农民的劳动成果，光分成租赁制度造成的掠夺就高达 50%。

土地分散，农业落后，在一些地方主要依靠原始的方式来生产，甚至只能靠天吃饭的情况正使大部分农民包括绝大多数的中农生活悲惨。农村地区受到地主、高利贷者、商人和宗教机构的控制。这些剥削者就是维持印度半封建生产关系的中坚力量。所有这些因素都表明我们国家是一个半封建国家。这一封建地主阶级保护和煽动种族主义、教派主义、迷信，豢养私人武装或暴徒，使对农村群众的中世纪压迫长期存在，通过经常的屠杀和强奸等压迫达利特人（即贱民）、部落民和妇女。在广大的农村地区，正是这类剥削阶级掌握了社会和政治权力，确保了腐朽的封建文化得以延续，并鼓励种姓、宗教狂热、男性统治，包括父权制和不民主的威权主义思想等。这就是印度农村社会中占主导的方面，也是解放生产力和国家进步的主要障碍。高利贷者、商人和大地主阶级是极其反动的，是帝国主义统治社会的工具，是印度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对象之一。

十五、在 1947 年权力移交之后，印度统治阶级为了服务帝国主义，实行了一些发展计划，这些计划替代了“耕者有其田”的激进土地改革的发展模式。首先，他们提出了乡村发展计划、农村合作社和集约农业发展规划等——这都是在福特和洛克菲勒基金、世界银行和其他帝国主义机构的援助下，以及根据其需求和计划的情况下提出的。此后，为了延续这些计划，20 世纪 60 年代，他们在旁遮普邦以及印度的一些乡村地区引入了所谓的“绿色革命”。这一“绿色革命”实际上是有意为帝国主义商品提供垄断市场，同时也试图消除日

益明显的红色革命威胁和解决长期的粮食危机的尝试。

尽管生产力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增强，粮食产量增加，但是这场“绿色革命”很快就暴露出负面影响。它极大地增加了农业投入的成本而农产品价格仍然滞后或者几乎处于停滞状态。这种不断拉大的差距导致农业结余不断减少，因此，农民的生活状况仍持续恶化而没有得到改善。然而，帝国主义国家的产品如农业机械、化学肥料、高产种子、农药等市场在印度却不断在扩大，获得的利润也在不断增加。除了一小部分大地主（包括一些亲资本的新兴大地主，从原来的老富农中转化而来）获利之外，绝大多数农民，尤其是贫农和雇农，以及相当大一部分的中农，在步步紧逼下，不断落入高利贷者、商人、亲资本大地主的控制之下，而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对其的控制也一步步加紧。

帝国主义金融资本不断渗透，对印度的控制在不断加强。某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被进一步引入，但是这种资本主义是非常扭曲和脱节的。同时，土地问题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毫无疑问，因为绿色革命，一些新的阶级势力已开始出现，这种所谓的资本主义发展除了给绝大多数的农民带来不幸和不公外，其他什么也没有。尽管“绿色革命”带来一些变化，但是对印度整体的半封建生产关系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十六、出现于 70 年代初的帝国主义危机现在仍持续恶化，尽管帝国主义因为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解体获得了短暂的喘息时间，但是它们不可能渡过这一危机。因此它们更加强制性地推行私有化、自由化和全球化的帝国主义政策。这样的政策不仅更加公开地加紧了帝国主义金融资本的控制，而且还加快了帝国主义对受剥削和压迫人民和民族的掠夺速度。尽管如此，自二战以来，帝国主义危机在近几年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严重程度了，而解决帝国主义危机的通常手段也已经毫无效用了。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美帝国主义已经穷途末路并设法尝试公开地采用军事手段来摆脱这场根深蒂固和涉及面广阔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

今天，在印度和其他落后国家，帝国主义国家无数的大型跨国公司正在公开地运作。帝国主义正通过这些政策，在半殖民地国家采用新殖民主义的方式，越来越把所谓的主权践踏在脚下。各种各样的限制被取消以满足帝国主义金融资本的独裁控制、扩张和剥削。而为了误导民众舆论，在以社会主义这样具有欺骗性的名义设立的所谓的国营部门也已经被送给了买办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跨国公司。这些政策进一步使农民的生活状况日益恶化，尤其是对于无地的和贫困的农民，包括很大部分的中农和一部分富农而言。其他劳苦大众，尤其是工人阶级、农民、学生包括妇女、雇员和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条件也越来越恶化，甚至挣扎在生死危机当中。这为出现对帝国主义及其忠实的统治阶级走狗反抗的浪潮创造了肥沃的社会土壤。

根据帝国主义的需要和计划，印度统治阶级盲目地实行工业化。在实施工业化的过程中，自然法则被践踏于脚下，自然资源遭到大肆地不合理开发，生态平衡遭到威胁，国家利益被牺牲了。

十七、印度统治阶级不仅从其英帝国主义主子那里继承了残暴的国家机器，而且近 55 年以来在维持其原有水平的基础上还加强了国家机器的建设。这种国家机器仅仅只是镇压的工具，代表了对帝国主义唯命是从的买办资产阶级

和地主阶级的独裁专制。这种高压统治试图隐藏在具有欺骗性的议会制度背后。这种国家体制是帝国主义实行间接统治、剥削和控制即新殖民主义下的一种半殖民半封建制度。在近几年，买办封建联盟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不仅把这种国家制度的镇压爪牙磨得越来越锋利而且还越来越趋向集中化。这种嗜血统治的主要武器是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现代化军队，预备军队和各邦的警察部队，反人民的司法机关，以及沉沦于腐败的强大官僚系统。这种国家机器是极其反动和反人民的。如果不砸碎这种国家机器，那么为获取基本权利，为解决人民面临的问题和改善社会的任何斗争都不可能超越现有水平向前推进。

十八、帝国主义者认为印度在整个南亚处于支配地位，所以一直支持、鼓励和煽动印度买办统治阶级实行扩张主义政策，以利于帝国主义者继续为所欲为地控制利润巨大的市场。根据帝国主义者的计划和需要，印度买办统治阶级不时将他们的武装部队作为帝国主义的雇佣军派遣到世界各地，如索马里、南斯拉夫、刚果、卢旺达等国家。通过这样的侵略扩张统治，印度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洗劫和抢占这些国家的资金、原材料和市场等，在主要服务于帝国主义的同时，也在上述地区获得了自己的利益。

由于印度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支持下有了扩张野心以及参与了干预和颠覆的活动，再加上其大大优越于其他国家的军队和强大集中的国家机器，印度扩张主义已经给南亚各国人民造成了极大威胁。印度统治阶级干涉尼泊尔内政，包括意欲向尼泊尔派遣驻军，就像在 1971 年向东巴基斯坦（现在的孟加拉国）派遣印度军队以及在 1987 年向斯里兰卡派驻印度军队以镇压泰米尔伊拉姆猛虎解放组织一样。印度统治阶级已经成为帝国主义剥削控制南亚国家，尤其是剥削控制南亚国家人民的重要工具。因此，更加紧密地团结南亚人民，揭露、反抗和挫败印度扩张主义及在其背后进行支持的帝国主义的扩张阴谋，就成为印度无产阶级和印度毛主义力量最为重要的任务之一。

十九、印度面临的四大主要矛盾：

- （一）帝国主义与印度人民之间的矛盾；
- （二）封建主义和广大的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
- （三）资本与劳工之间的矛盾；
- （四）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

在这四大主要矛盾之中，前两大矛盾是基本矛盾。这两大矛盾必须要在当前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解决。在现阶段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必须解决这两个矛盾。在为现阶段印度革命制定总体战略时主要或首要考虑这两大矛盾。

在这两大基本矛盾当中，第二大矛盾即封建主义与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是当前的主要矛盾。武装土地革命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核心，在通过武装土地革命，亦即持久人民战争解决这一矛盾的过程中，其他矛盾也会随之解决。除了这两大基本矛盾，另外两大主要矛盾在决定今日印度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战略和战术时也起着重要作用。

除了这几大矛盾以外，印度也面临着其他一些矛盾，但这些矛盾必须在基本矛盾或者主要矛盾的解决过程中作为次要矛盾来解决。

二十、印度是一个多文化、多民族、多语言的国家。印度的民族和部落正在经历不同的发展阶段。在对待民族问题方面，帝国主义一直采取的政策是，

利用发达民族阻碍其他欠发达或者正在发展中的民族的发展，并试图消除欠发达民族的认同感，进而巩固对欠发达民族的剥削和压迫。同样在印度，屈从于帝国主义的统治阶级在所谓的国家“统一和完整”口号下，已经使得这个国家沦为各民族的囚牢。在这样的背景下，今天印度各地接连不断地出现包括武装斗争在内的各种形式的民族斗争。克什米尔人、那加兰人、阿萨姆人、曼尼普尔人和活跃在东北部地区的其他民族的斗争已经采用了武装斗争的形式。这些被压迫民族的人民不仅是为了他们的身份认同在战斗，而且也为实现民族自决这一最为正义的事业在战斗，其中民族自决权中包括脱离权和脱离的要求。

民族问题归根到底是阶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民族斗争只有成为无产阶级领导下反抗印度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掠夺者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各受压迫民族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我们党坚决支持受压迫民族的斗争，坚决反对印度统治阶级利用军事力量镇压民族解放斗争的恶毒尝试。我们党也必须抵制印度统治阶级单方面强制向他民族推行印地语、英语或者其他语言。在任何情况下必须支持并且突出强调，各受压迫民族的民族自决权，最高包括脱离权。我们党也必须支持这样的观点立场，即民族问题真正地最终解决在于砸碎代表并保护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利益的国家机器之后，建立新的人民民主共和国联盟。

二十一、该受到谴责的是种姓制度和种姓主义，尤其是婆罗门种姓主义，这是印度半封建制度的特色并盛行于印度社会。种姓制度和种姓主义实际上是一种影响受压迫种姓的社会压迫和剥削的特殊形式，几千年来，统治阶级延续了令人厌恶的种姓制度和种姓主义。种姓主义创造出社会等级制度，让一个等级的人看不起另外等级的人，击垮个体自尊，把低种姓看成下等人。这是印度统治阶级和帝国主义使用的一种武器，以煽动和分裂穷人和被压迫者。被压迫种姓当中的大多数人是穷人，他们除了要承受阶级压迫外还得承受残酷的种族压迫。种姓主义也被用来破坏反帝、反封建和反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的斗争。

达利特人处在种姓制中的最底层，遭受着来自在他们之上的各个阶层尤其是封建势力的严重社会压迫。将达利特人标记为“不可接触者”（即贱民）身份的野蛮习俗在今日仍然被延续和保留下来。因此，达利特人被当作次等公民。甚至在今天，90%至95%的达利特人要么是无地贫农，要么是农村雇工。

即使在今天，达利特人长期反抗封建压迫、争取社会平等地位的斗争仍困难重重，达利特人已经成为统治阶级及国家机器的庇护下封建原教旨主义印度教势力残忍攻击的目标。这些攻击的内容包括大规模屠杀和集体轮奸。

达利特人的问题本质上是一个阶级问题。我们党应该领导达利特人及其他落后种姓的反抗斗争，为其争取在社会各个生活领域的平等地位，并最终废除种姓制度。这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部分。

我们党必须为达利特人和其他落后种姓争取平等权利、保留权和其他特权而斗争。同时，我们必须揭露统治阶级和国家针对上述问题所采取的政策是毫无意义的。我们也必须揭露达利特领导人的机会主义，他们以解决达利特人问题的名义建立自己的票仓，谋求个人利益。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必须拥有我们自己的单独纲领，通过我们建立的群众和阶级组织领导达利特人进行反抗，而不是单独设立以种姓为基础的组织。我们党同时也需要在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

领域开展反抗种姓主义和废除达利特人身份的斗争，斗争将持续到种姓思想完全被清除。

二十二、自从阶级分化的社会出现以来，女性就不断遭受社会、经济、文化和政治歧视以及各种剥夺。这些令人厌恶的传统一直在延续。除了帝国主义封建剥削压迫外，占我国人口一半的女性还遭到父权机构，如家庭、种姓制度、财产关系和文化等持续统治和压迫。尽管法律规定妇女有权拥有财产，但是在实践操作中，这被证明不过是一纸空文。虽然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了生产领域，但是她们获得的报酬却微薄得可怜。为了避免各种骚扰，女性只局限于各种以性别差异为基础的职业。近几年，针对女性的性骚扰行为和暴行越来越多，尤其是在帝国主义的全球化、自由化和消费主义的背景下。而且，由男权意识造成的对女性的深深歧视已经使男女比率失衡。统治阶级对教派主义和原教旨主义尤其是印度教原教旨主义的煽动使女性的痛苦进一步加剧。强奸被作为一种抵制女性合法诉求的武器。这种武器也被国家作为一种最为卑鄙的镇压手段来对付参加各种斗争的女性。在包括国家在内的统治阶级各政党支持下，各种封建势力的私人军队将强奸作为一种邪恶的镇压手段。

“妇女能顶半边天。”如果不释放妇女积压已久的革命怒火，革命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令人感到自豪的是，妇女群众尤其是来自无地贫农家庭的妇女群众越来越踊跃地参与到推进土地革命的武装斗争当中，扮演着积极的角色，有时处在斗争前列。因此，在推进反帝反封建的人民战争的过程中，对妇女群众的发动是必不可少的。除了阶级斗争，我们必须为妇女争取在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域的平等权利。只有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和推进社会主义事业整体改造的过程当中，才能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因此，我们党必须特别注意唤醒、动员、组织和帮助妇女积极参与到妇女革命组织和各种各样正在进行的斗争当中，尤其要参与到人民战争当中来。我们也必须致力于在妇女同志中发展立场坚定且富有远见的共产党领导人。

二十三、在具有欺骗性的世俗主义的外衣下，印度教教派主义在印度社会中仍占有支配地位。几乎所有统治阶级政党仍然利用国家机器来煽动教派主义。在某些情况下，印度国家甚至公开表达亲印度教的倾向。这种教派主义不仅直接针对其他宗教少数群体和少数民族，而且还针对达利特人，包括部落民和妇女。这种教派主义也用于煽动婆罗门教、种姓主义和父权意识。

宗教少数群体占印度人口的 15%。统治阶级通过煽动印度教教派主义，甚至利用国家机器对宗教少数群体公开表达歧视、进行骚扰和施行公开的残酷镇压。印度教法西斯主义团伙常常有系统地组织反宗教少数群体的大屠杀，从而强制推行印度教民族主义的教派概念。他们袭击的主要对象是穆斯林。统治阶级利用印度教教派主义作为一种有效工具，以宗教为基础对劳苦大众进行分化。印度教教派主义已经成为在这个国家建立法西斯主义的一种重要意识形态和政治纲领。

我们党应该反对、揭露印度教原教旨主义，并在思想上、政治上与其日益增长的威胁做斗争，同时也要采取适宜的手段在地方层面与之斗争。同时，我们也必须继续揭露其他宗教原教旨主义。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印度教原教旨力量的真正意图是分化和转移人民中日益高涨的反抗浪潮，削弱人民的阶级意识。

因此，党必须继续致力于推进实际的阶级斗争，即持久人民战争，这最终会终结原教旨主义势力的威胁。

二十四、印度大约 7%的人口由部落民或部族构成。他们与其余印度人在经济、社会制度和文化特征上有着显著的差异。大多数部落民正处在向民族发展的过程当中，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在印度社会中遭受到最为严重的压迫。大部分部落民的土地早就遭到剥夺，其传统的谋生方式也遭到破坏，但政府并未为其提供任何替代谋生方式。部落民传统拥有的林木产品和矿产资源正在遭受帝国主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封建阶级、放高利贷者、不法商人和其他外来垦荒者的掠夺，这导致部落民赖以生存的传统经济的土崩瓦解。采矿、采石等其他的工业活动和大坝的建造也摧毁了部落民的生活和生计。此外，他们长期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遭到忽视。

我们必须制定特殊政策，使绝大多数部落民积极参与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洪流当中。我们党尤其要长期关注部落民地区——那些地区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同时又被统治阶级完全忽略。不仅如此，鉴于部落民反帝反封的光荣斗争传统，我们致力于从部落民当中培养士兵和革命领导人。

我们的任务是在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语言和教育状况的基础上把他们组织起来，以确保其政治自治。我们的任务还包括领导其进行斗争，使其最终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彻底解放。

二十五、印度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决定了印度革命将不得经过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任务是通过解决当前印度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即印度人民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和广大人民群众与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使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为独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另外，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延续，第二阶段的任务是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朝着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目标继续革命。第一阶段是第二阶段的先决条件。印度将会通过完成民主革命到达社会主义阶段，为了到达社会主义阶段，印度必须经历新民主主义革命。

我们的社会性质决定了我们的革命阶段。我们国家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这一阶段的核心内容是土地革命。自从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以来，民主革命就不是旧式的而是新式的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印度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开始于伟大的俄国十月革命。这场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为资本主义开辟了道路，另一方面，又为社会主义创造必要条件。

我们的革命目标是打倒帝国主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大地主阶级。这是压在人民身上的三座大山。这三座大山已经阻碍了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发展。因此，印度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共产党——当前的基本纲领是，通过武装斗争推翻大地主-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以及在背后支持他们的帝国主义及其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打碎反动独裁的国家机器，代之以人民民主国家即新民主主义国家。新民主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国家。这样的新民主主义国家在对极少数剥削者实行专政的同时保证绝大多数人的真正民主。党的终极纲领是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然后朝着在世界范围内

实现共产主义的目标前进。

因为印度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以印度既不存在真正的独立，亦不存在真正的民主。因此，新民主主义革命将彻底铲除帝国主义的奴役、剥削和控制以及封建专制，从而实现民族独立，建立人民民主。实际上，彻底铲除帝国主义的民族解放斗争和彻底铲除封建专制的民主斗争任务是紧密相连的。由于封建主义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所以反封建斗争同时就是反帝国主义斗争。但这并不意味着就没有必要建立单独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战线。这场革命将建立一个自由、独立、发展中的新民主主义经济以此取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这将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

二十六、今天，堕落的、腐朽的、反民主的、反人民的、令人厌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正在控制着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帝国主义及其买办利用他们的宣传机器正在进行大规模宣传，对民众施加腐朽思想的影响：憎恶劳动，父权制，迷信，专制，帝国主义奴役，民族沙文主义，教派主义，种姓主义，盲目贪婪，自我中心，饮食、婚姻的消费主义，以性为中心的文化。宗教狂热主义和反科学思想也正在被大力煽动起来。不仅如此，修正主义、改良主义和经济主义，所有这些反动思想被高扬和鼓吹并大规模地侵蚀着民众，散播这种有毒思想的目的在于试图破坏革命运动。

我们党必须揭露这些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与文化的腐朽性和危害性，同时必须与之进行不懈的斗争。我们党应该提出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文化，使之成为人民的替代选择。新民主主义革命将摧毁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在建立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同时，高扬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旗帜。

无产阶级伟大的意识形态，即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将指导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发展。这种文化将展现其与全世界正在进行的争取民族解放、民主和社会主义的革命斗争的国际团结精神，并与之一同为弘扬人民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文化进行斗争。这种文化将高举最科学和最先进的马克思列宁毛主义鲜红旗帜，战胜各种类型的修正主义意识形态。

二十七、我们国家的议会制度是英帝国主义强加给我们的。况且，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印度也从未完成。因此，印度并不存在资产阶级民主。极端落后、贫穷和文盲问题伴随着不公平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仍然持续存在。在这种背景下，以“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这样极具欺骗性的名义存在的议会民主其实是彻头彻尾的谎言，所有机构如议会、立法议会和执行委员会[包括所谓的潘查亚特制度，（*panchayati raj*，印度乡村传统的政治制度，又称“五老会”，译注）]只是轻轻地掩盖了对帝国主义唯命是从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的独裁统治。

事实上，对于人民面临的基本问题，任何议会机构都不可能拿出可行的解决方案。不仅如此，55年以来的经验已经充分证实，以策略的名义参与选举的任何人，或早或晚，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会深深地陷入议会政体和修正主义的泥潭中不能自拔。今天，所有的议会机构和议会制度本身，包括统治阶级的所有议会政党，都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暴露在人民面前。因此试图利用议会来批判议会制度的想法本身就是一种妄想。任何利用它的企图都是幻想。

实际上，以利用议会的名义参与选举的策略相当于放弃了建立和推进武装斗争。事实是如果人民没有政治权力，一切都是幻觉。人民唯有通过持久人民战争道路方可建立和发展政治权力。议会道路和参加选举与在具体条件下印度所采取的持久人民战争是完全不相容的。甚至人民政治意识的真正进步与持久人民战争是紧密联系的。更重要的是，力量的积累，包括党自身的发展和布尔什维克化，都与之密不可分。这就是为什么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党的工作“重心”是武装斗争。所以在这种大环境下，“抵制选举”口号的提出，虽然是出于策略考虑，但是在印度具体环境中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同时大规模提出“抵制选举是一项民主权利”也是正确的。

二十八、印度是一个发展极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农民占印度人口的绝大多数。在广大落后农村地区中，阶级矛盾尖锐，民主匮乏，敌人及国家机器的统治也相对薄弱。我们阶级的敌人，即帝国主义、官僚买办大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已经在大城市建立了牢固的军事基地，其军事武装力量异常强大。在这种形势下，无产阶级别无他法，只能效法中国革命，走持久人民战争的道路，首先解放农村地区，进而扩大根据地——农村建立民主政权的中心，然后通过包围和占领城市夺取全国的胜利。

只有建立人民的武装力量——人民解放军，扩大和发展游击战，才能在战略有利的地区建立游击区和根据地。在这些地区我们在“耕者有其田，一切政治权力归革命人民委员会”这一土地革命口号下，发动、组织和武装广大的农民群众。

为了实现上述目标，我们必须彻底砸碎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和其他所有的权力中心，在工农联盟的基础上建立人民民主政权。我们的革命将追随中国革命道路。

二十九、由于我们国家独特的社会经济发展情况，城市斗争也非常重要，尤其是对于那些城市工人阶级来说。由于公共部门和私营企业、服务行业和各种行政机关在移交权力后的显著增长，城市人口大幅增加，尤其是工人阶级。在组织部门和非组织部门中的工人阶级人数将近七千万。

印度是最早诞生工人阶级的欠发达落后国家之一。随着工业的设立，印度工业无产阶级于 19 世纪第二个五十年诞生。印度工业无产阶级拥有光荣的斗争历史，在先进科技和组织化的大工业中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而且，他们的数量也已大大增加了。大多数工人出身于农民，因此工人和农民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相互影响。他们具有丰富的斗争经验，例如曾经发动和领导了包括印度全国大罢工在内的诸多斗争。印度工业无产阶级是一股强大的力量，这股力量将给予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沉重的打击。

然而，由于修正主义领导层的背叛和阴谋，工人阶级运动主要被局限在经济主义、改良主义和合法主义的框架内。工人阶级当中的一小撮人成了收受资方贿赂的工会官僚。我们党必须揭露和反对修正主义、修正主义领导人以及各种形式的经济主义和改良主义，并与之进行决绝的斗争。只有如此，才能为工人当中植入真正革命的阶级意识提供基础，建立和发展强有力的工人阶级运动。工人阶级将通过其先锋队组织——无产阶级政党，来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通过进行这样的运动和在国内外的问题上开展斗争，工人阶级将发挥它的

领导作用。工人阶级也将通过发动军事行动来团结和支持阶级革命斗争，尤其是农民斗争；派遣先进分子进入领导农村地区武装斗争的共产党中，组织和推动农村地区斗争的发展。

除了工人阶级，还有大量城市贫困人口和小资产阶级，如学生、青年、知识分子、手工业者、专家、中等阶级雇员等居住在城市。这一群体的数量也在不断增加。学生、青年和知识分子也具有丰富的斗争传统。

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应该组织他们开展阶级斗争。我们应该建立强有力的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运动以支持土地革命。所有这些运动必须直接或间接地指向土地革命的目标，并配合或者无条件服务于土地革命。这一斗争也需要通过与武装土地革命战争合作以持续推进。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后阶段，我们要夺取敌人的要塞——大城市，因此，从一开始我们就要在城市里执行有明确目标导向的工作。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取得胜利。这意味着，首先，我们必须在工人阶级和人民的其他劳动部门以及学生和知识分子中，建立一个广泛而巩固的的党和其他群众组织的地下网络。其次，我们也必须通过避免决定性的战斗来建立一个秘密军事组织的必要网络，以保存我们的力量。只有通过这样目标导向性的工作，我们才能积聚、加强和继续巩固我们的力量，从而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大规模的政治组织准备和军事准备。在大城市中，我们的工作最为重要的一点是我们的所有活动不能孤立地进行，在行动中要牢记“一切为了战争”的原则。

三十、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农民。依靠无地贫农和雇农，工人阶级将坚定地团结中农和争取一部分富农，对其余富农采取中立的态度。这样的话，将只有一小部分富农成为革命的敌人。在我们国家，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间阶级的革命知识分子是革命的力量，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将成为革命的可靠盟友。中间贸易商和中小资产阶级本质上是民族资产阶级，他们是革命摇摆不定的和临时的盟友，我们应当在某些条件下和某些时候团结他们。

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我们必须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基于工农联盟建立由四大阶级组成的统一战线，这四大阶级包括工人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推进武装斗争夺取政权的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团结所有被压迫的民族、遭受迫害的宗教少数群体和其他受压迫的社会阶层。

三十一、在印度，代表革命队伍的真正的革命力量仍继续与印度共产党以及后来的印共（马）所代表的机会主义、修正主义错误路线及其领导的背叛行为做斗争。到了 50 年代末和 60 年代初，这一斗争达到一个新的高度。由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大论战标志着新的革命阶段的开始。直到这场斗争愈加激烈并最终在翻天覆地的文化大革命时达到高潮。这场斗争不断加剧直至最后的转折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始正是这一过程新的转折点，在这一过程的直接影响下，代表与印度共产党以及后来的印共（马）的领导层的修正主义做斗争的力量，在理论上，尤其是在革命实践上开始拥护并吸收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现在是毛主义。因此大批毛主义力量，包括最为杰出和站在最前沿的领导人，例如查鲁·马宗达同志和卡奈·查特吉同志站出来，谴责印共（马）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的党纲是修正主

义式的。1967年5月查鲁·马宗达同志领导了伟大的被誉为“印度革命春雷”的纳萨尔巴里起义。从那时起，印度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根本性的历史转折。这场起义除了标志着真正的革命力量与修正主义的最终决裂外，还标志着印度真正的革命力量第一次有意识地运用马克思列宁毛主义指导印度革命实践，通过走持久人民战争的道路夺取政权。这条由毛泽东同志引领的光辉革命道路正式出现在印度次大陆上了。

虽然运动遭遇了暂时性的挫折，但是在印度共产党（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印度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的领导下再次前进，经过数次起伏，从过去汲取经验，英勇地抵抗敌人的镇压。这两股毛主义革命洪流通过采取正确的革命路线并与各种形式的修正主义进行不懈的斗争，继承了印度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革命遗产。

作为印度无产阶级的联合先锋队，新成立的印度共产党（毛主义）将会领导印度新民主主义革命走向胜利。在印度革命完成后，印共（毛）将坚持不懈地斗争，直至在世界范围内取得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胜利。

三十二、为取得革命的胜利，从一开始我们就必须逐步地加强三大法宝的建设。

（一）建立一支以马克思列宁毛主义为指导意识形态的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这支革命政党训练有素，是通过革命的理念和方法建立起来的；这支革命队伍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批评与自我批评；紧密联系群众，坚定地依靠群众；坚定站在阶级路线、群众路线和武装斗争中。

（二）党领导下的是一支强大而又纪律严明的人民军队；在根本上，我们的人民军队是在发动武装土地革命的斗争过程当中，从无地贫农、雇农和工人阶级中建立的。

（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遵守人民民主革命总纲的所有革命阶级的统一阵线。该统一阵线在推进武装斗争的过程中建立，而目的是以武装斗争夺取政权。

三十三、印度无产阶级先锋队，印度革命的共产党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立场上。修正主义，尤其是右倾机会主义是当今世界无产阶级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主要威胁。如果不与之斗争并击败它们，任何一个国家的革命都不可能前进一步。因此印度无产阶级在阶级斗争和革命战争中必须与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做斗争。我们党从过去的革命以及后来俄国和中国资本主义复辟中汲取了经验。在革命斗争，特别是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中，我们党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新经验的意义。因此，我们党必须与当今世界上所有真正的马克思列宁毛主义政党、团体和力量建立团结。我们党也必须与全世界无产阶级、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建立团结。通过团结世界革命力量和彼此间的相互学习借鉴，印度革命将成为消灭帝国主义与反革命力量的全球斗争的一部分。

三十四、人民民主国家将执行如下任务：

（一）没收帝国主义的所有银行、商业企业和资本公司，废除所有帝国主义债务。废除与帝国主义国家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和协议。

（二）没收所有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企业资本、动产和不动产。在节制资

本原则的基础上，人民民主国家必须接管所有垄断产业和贸易的职权和管理部门。新民主主义国家将不会占有其他私人财产，也不会妨碍没有力量控制公众事务的那些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

（三）没收地主和宗教机构的所有土地，并将所没收土地在“耕者有其田”的口号下，重新分配给无地贫民和雇农。妇女享有平等拥有土地的权利。取消中农和一切劳苦大众的债务。进行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保证农产品的合理价格，尽可能鼓励和推进农业合作社的发展。因此，它将以农业为基础，朝着建设强大的工业经济前进。

除此之外，新民主主义国家将会结束放高利贷者、投机商和不法商人的剥削。鼓励合作社向人民提供比要资本，控制商业和贸易。

（四）在确保生态平衡和遵守环境标准的同时，发展国家的工业经济。

（五）保护小型产业，限制和规范中型产业，即民族资产阶级产业的发展；通过发展合作社促进家庭手工业和手工艺的发展，并改善手工业者、工人和手工艺者的境遇。

（六）取消所有重税和各种类型的债务还款，废除现存的税收体系，并实施良好的、系统化的和简单的税收体系。

（七）实行八小时工作制，提高工资待遇，废除合同工制度和禁止雇佣童工，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和社会保障；保证同工同酬，取消以性别为基础的薪资歧视。

（八）确保人民的工作权利是一项基本权利，朝着消除失业的方向前进。发放失业津贴和建立社会保险制度，并确保人民的生活条件得到改善。

（九）消除种姓歧视和差别，朝着彻底废除不可接触和种姓制度前进。到那时，人民民主国家将保证包括提升达利特人和所有社会被压迫种姓权利在内的特殊特权。

（十）努力消除针对妇女的一切形式的歧视，废除男性中心主义和父权制。人民民主专政国家将会把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使之参与到各种社会生产和其他活动中来。保障妇女平等拥有财产权；推行特殊政策以加速消除妇女遭受到的不平等。使从事卖淫的妇女回归正常的生活轨道，并使其得到社会的认可。

（十一）确保部落民拥有各种形式的自治权，以使其获得充分发展的，并相应地实行特殊政策。

（十二）在各个民族拥有同等的地位，以及承认各个民族拥有包括脱离权在内的自决权的基础之上，团结各个民族。建立一个自愿加入的印度人民民主联邦共和国。

（十三）消除所有以宗教为基础的社会不公和对宗教少数群体的迫害。施行特殊政策，推动宗教少数群体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确保人民民主国家的世俗化，防止利用宗教达成政治目的。结束国家对宗教事务干预。保障个人有信教自由，也有不信教的自由。鼓励人民拥有科学的、理性主义的世界观，并将破除迷信和盲目信仰，以及反对各种形式的宗教原教旨主义。

（十四）创立革命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以取代腐败的、封建文化、殖民文化和帝国主义文化，并在此基础上，拓展社会主义文化道路，并将朝着实现共

产主义文化的方向继续前进。

（十五）废除现存的教育制度，根据民主印度的需要，与社会生产相联系，建立一种科学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大众教育体系。

（十六）在人民民主国家，各个民族的语言具有同等地位。国家将帮助没有文字的民族发展语言文字。人民民主国家不会以国语或通用语的名义或其他任何形式向其他民族强加某种语言，但是会尝试在全体一致的基础上推行普遍可以接受的语言。

（十七）大力促进落后地区的发展，努力消除区域间的不平衡差异。

（十八）以人民民主宪法为依据和基础，新国家将通过各级革命人民委员会和人民管理委员会建立人民政权。除主要反动派外，每一位年满 18 岁的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以及投票罢免各级人民代表的权利。新民主主义国家将确保所有人民的民主权利，如发言权、集会权、结社权（包括罢工和示威的权利）。确保人民群众管理国家的权利，决不允许此项权利遭到贬低。

（十九）基于进步的、民主的和人民导向的观点，以改造一切不良倾向为目的，施行一套公正的司法程序和体系。

（二十）武装人民，保卫国家。根据人民解放军烈士家属和战士的需求，对其进行重新安置并为其分配土地。

（二十一）为肢体残疾者、智力残疾者、老人和孤儿及所有其他残疾者提供适当的社会经济保障，并为其营造健康的社会文化环境。推行面向人民群众的医疗体系，确保人民群众，尤其是为工人、农民和其他劳苦大众享有良好的保健条件和免费医疗。

（二十二）尽力保证和平、公正地解决与邻国的边界、水资源和其他争端问题，并与邻国发展和平友好的关系。承诺永远不会向邻国采取任何的扩张主义行为。

（二十三）在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交往时，遵守五项原则：互相尊重主权与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二十四）人民民主国家将团结各国无产阶级和被压迫的国家，并尽一切办法支持和帮助革命斗争和革命战争，尤其是在各毛主义革命力量领导下的正在进行的反对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反动力量的斗争。在革命取得胜利后，新民主主义印度，之后的社会主义印度将作为推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根据地。它将紧密团结革命力量和毛主义力量，尤其是南亚地区的革命力量和毛主义力量，谨记印度与南亚次大陆人民的历史关系。

三十五、我们党正向人民提出印度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并致力于这场伟大的革命事业。党的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我们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在人民民主革命完成后，在消除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阶级差别的过程中，将逐步变革生产关系。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它将继续前进，从而继续巩固社会主义社会，使印度作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强大根据地。社会主义国家将是无产阶级专政，它保证绝大多数人民的民主，同时对少数剥削者实行专政。根据不间断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马克思列宁毛主义原则，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依然存在的。它将继续推进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并通过它来抵抗和粉碎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走资派复辟

资本主义的一切尝试。同时，通过这一过程，它将继续与社会主义制度引入的畸形，尤其是官僚主义做斗争，确保人民参与国家事务，而不会脱离社会主义国家和无产阶级政党。它必须创造性地消除残留的不平等因素，解决存在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在这个过程中，走向阶级社会的消亡，从而走向国家的消亡，也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共产主义。我们的党承诺通过完成人民民主革命，消除我们千千万万的亲爱的人民正在遭受的无穷无尽的不幸与苦难。我们党也承诺在各个方面都遵循阶级路线和群众路线，时刻警惕帝国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分子邪恶的阴谋诡计，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最终消灭剥削与压迫，向着实现社会主义，以及之后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前进。

印度共产党（毛主义）《党的章程》*

第一章 总纲领

印度共产党（毛主义）是印度无产阶级坚强的政治先锋队。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主义是其在各领域活动中的指导思想基础。共产党的近期目标或纲领是推翻新殖民主义间接统治、剥削和控制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打倒革命的三个目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官僚大资产阶级，在印度进行和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而这又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党的最终目标或最高纲领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场新民主主义革命将通过武装农民革命战争，即巧妙地夺取区域政权为中心任务的持久人民战争来进行和完成。持久人民战争将通过农村包围城市进行，并最终夺取城市。因此，农村和持久人民战争从一开始就是党的工作重心。在这场革命的全过程中，党、军队和统一战线将是发挥作用的三大法宝。在它们的相互关系中，党将发挥主要作用，军队和统一战线将成为党手中的两大重要武器。由于武装斗争将是这场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军队将是这场革命的主要组织形式，因此武装斗争将起决定性作用，而统一战线将是在推进武装斗争和为武装斗争服务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群众组织和群众斗争是必要的和不可缺少的，但其目的是为战争服务。党当下和最紧迫的任务是通过发展和改造游击区和游击基地，建立健全的人民解放军和根据地。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之后，党将毫不拖延，绝不停止脚步，而是立即朝着建立社会主义的方向前进。因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已经为社会主义奠定了基础，因此这里不会有任何停顿。此后，党将通过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继续向实现共产主义前进。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始终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些矛盾，只能靠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来解决。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发起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政治大革命。

党将继续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继续坚定不移地团结世界范围内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主义力量。我们党也将与一切形式的修正主义做斗争。在团结马列毛主义力量的同时，我们也将团结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继续同他们一起为打倒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完成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进程，为在世界范围内实现共产主义铺平道路而共同奋斗。

在整个事业进程中，全党同志要有敢于反潮流的革命精神，坚持要搞马克

*根据知乎用户无弋爱剑的文章《历史资料：印共毛章程》，以及王静《印度共产党（毛主义者）的理论与实践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年 1 月第 1 版，第 183-198 页相关内容整理而成。

思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的原则，要于正确区别和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要发扬理论联系实际、坚决与左右倾机会主义和各种非无产阶级倾向做斗争，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

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誓为世界范围内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我党党员，要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

第二章 党、党旗、宗旨

第一条 党的名称：印度共产党（毛主义）

第二条 党旗：党旗面为红色，中间为白色锤子和镰刀；镰刀柄将朝向旗杆一侧；旗面长宽比为 3：2。

第三条

(a) 印度共产党（毛主义）是印度无产阶级的坚强先锋队，以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和毛主义为指导思想。

(b) 党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将处于地下状态。

第四条 宗旨和目标

党当前的目标是，通过唯一的途径——持久人民战争来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官僚资本主义，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实行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人民民主专政。它将进一步为建立社会主义而斗争。党的最终目标是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通过继续革命来实现共产主义，从而从世界上消灭人剥削人的制度。

印度共产党（毛主义）致力于为人民服务，为革命服务，热爱人民，尊敬人民，依靠人民，真诚向人民学习。党对一切反动阴谋诡计和修正主义伎俩保持警惕。

第五条 党将继续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旗帜，为实现马列毛主义力量在国际层面上的团结作出应有的贡献。

第三章 成员资格

第六条 年满十六周岁的印度居民，身份为工人、农民、劳动小资产阶级群众或任何其他革命者，接受马列毛主义作为其日常活动指导思想，接受党纲和章程，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遵守纪律并积极参加党的活动，准备好面对在该过程中遇到的危险，并同意按期缴纳党费和由党组织决定的党税，可以成为党员。党员身份每年都会续签。

第七条 党员一般通过基层党组织以个人身份入党。每位申请入党者必须由两名党员推荐；他们必须对他/她有透彻的了解，并向党提供所有必要的信息。申请入党应该正式进行。

第八条 有关基层组织将在党内和群众中对于申请人进行秘密审查。一般来说，申请人必须在由有关的党小组/基层组织推荐，并由上级党委发文批准后，申请人才会以预备党员身份接纳入党。预备党员入党后，如果出身工人阶级、无地贫农和农业工人，观察期应至少为六个月；如果出身中农、小资产阶级或城市中等阶级，观察期为一年；其他阶级出身者观察期则为两年。从区域委员会到所有其他上级党委也都有权按照相同方法接纳新成员。

第九条 剥削阶级不得入党，除非他/她将财产交给党，并彻底融入群众。

第十条 证据确凿的叛徒、敌人特务、野心家、品行不良者、蜕化变质分子等阶级异己分子不得入党。

第十一条 一般接纳党员，是在党组织指导下组织起来，为党工作的积极分子团体中进行的。他们必须参加由有关党组织决定的党的活动至少六个月，然后才能被接纳为预备党员。

第十二条 在预备党员接受考察之后，在预备期结束前，相关党组织讨论并决定申请人是转为正式党员还是延长六个月的预备期，若延长预备期应解释原因。决定须报上级党委，上级党委可以变更或者修改下级党委所作出的决定。分区/县接收新党员须由分区/县党委批准并最终获得特殊区域委员会/邦党委的批准。

第十三条 定居国外且符合所有入党所有必备条件的印度人可以入党；在印度拥有永久居住权的外国人在符合入党所有必备条件的情况下也可以入党。

凡脱离其他马列主义组织加入本党者，需经上级党委批准后方可入党。如果他/她是原来组织的重要成员，经分区党委/县党委批准后，他/她应以成熟党员的身份入党。若申请人是原党区域委员会委员，则必须经邦/地区党委的批准后，方可入党。如申请人系原党县/地区委员会级别成员，如申请人系原党地区委以上级别成员，他/她须经中央委员会批准，方可入党。（译者注：英文原文如此，疑有一句未录入）

凡脱离原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政党申请加入本党者，如系其他政党之普通党员，须有两名正式党员介绍，介绍人中的一人须具有两年以上党龄；他/她的预备党员资格必须得到上级党委批准。同样地，如申请人原系资产阶级或修正主义政党党员，并担任区域以上级别负责人，则必须由两名党员介绍，介绍人中的一人须具有五年以上党龄，并须得到邦委员会或者中央委员会批准，方可入党。

第十四条 党员每年须缴纳 10 卢比党费。在邦委员会的指导下，在评估党员经济状况后相关党组织决定每位党员每月须缴纳的党税。

第四章 党员义务和权利

党员必须履行下列义务：

第十五条 须学习并运用马列毛主义。在印度具体条件下，党员必须具有创造性、坚定性和实践能力。党员应设法从党的意识形态、政治和组织路线以及工作作风和方法中教育自己。

第十六条 积极捍卫并努力发展党的思想政治基础，坚持与各种非无产阶级倾向、修正主义政策、倾向和工作作风、“左”右倾机会主义、经济主义、自发主义、议会主义、合法主义、改良主义、自由主义、宗派主义、经验主义、主观主义、教条主义以及无政府主义思想和倾向做意识形态和政治斗争。

第十七条 必须定期学习党的机关刊物、文件、杂志，主动开展党的文字宣传和党的募捐工作。

第十八条 党员必须积极、定期地参加所属党组织和其他组织的日常工作。他们必须遵守党的路线、纲领、政策、原则、指示和决定。

第十九条 每个党员都应该准备好参加武装土地革命战争，即持久人民战争和其他形式的革命群众斗争形并在阶级斗争中发挥先锋作用。他们必须准备参加战争并领导持久人民战争以夺取政权。

第二十条 个人利益必须服从党和人民利益。党员必须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而奋斗，必须与广大群众相结合，向群众学习，依靠群众，加强党同广大群众的关系。他必须真正为人民服务，为人民牺牲一切，必须到人民群众中去解决人民群众的问题，即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去”的原则。他/她要关心群众的问题并想办法解决，及时向党说明这些情况，向群众说明党的路线和政策。如果他/她来自无产阶级以外，应该通过参加土地革命的任务，采取无产阶级的生活方式，以使用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来武装自己。

第二十一条 不得擅自行动，应以无产阶级的阶级观，反对基于性别、种姓、民族、宗教、种族、地区和部落的歧视，反对统治阶级的分而治之的政策。

第二十二条 为了互相帮助，他/她必须通过同志式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开展集体工作方法。他/她必须以工作的态度对待提出批评和不同意见者，包括反对过自己反对错了并且认真改正错误的人，能够团结大多数人。

第二十三条 必须在理论和实践上坚决接受党的团结、党的委员会职能和党的纪律。

他/她必须保守党的秘密。他/她必须保卫党，坚持党的事业，抵御敌人的进攻。他/她必须维护党的团结，反对宗派主义。他/她必须培养对革命工作的专业态度，必须提高他/她的技能水平、知识和无产阶级风貌。

第二十四条 党员的权利：

(a) 在所在本级党委中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b) 获得党刊、文件、通知等的权利，在党的会议和党的机关中，就党的政治和组织路线、政策和决定以及在执行中出现的问题进行自由讨论的权利。

(c) 对党委或者党组织的决定如持有不同意见，相关党委或党组织党员必须在忠实执行决定的同时，可以保留不同意见并在后续会议中要求重新讨论相关问题，或者通过所属党组织向上级党委直至中央委员会提出自己意见；当相关委员会在六个月内未能解决问题时，他/她有权直接提出意见，也有权得到答复。但是，是否重新讨论此事由委员会决定。

(d) 任何一名党员都有权向上级党委汇报对其他党组织中党员的批评意见。任何党员都有权向上级党委中对任何一级党委直至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决定提出批评意见和建议。

(e) 除了没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投票权，预备党员同正式党员的义务和权利是相同的。

(f) 涉及惩罚任何一个党的组织或者党员时，必须在当事人在场时对相关具体事件进行详细的说明和讨论，相关决定信息必须以书面形式汇报给上级党委。

第五章 党的组织制度

第二十五条

(a) 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党的结构和内部生活也遵照这一原则。民主集中制意味着党内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党内民主。通过开诚布公地讨论，以及工作中紧密团结，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只有在这样的局面中，民主集中制才能成功实行。

(b) 对于党组织结构来说，民主集中制是最重要的原则，必须在民主讨论的基础上强制投票选举党的各级领导机关。会议、全体会议以及当选的各级委员会需要经过上级党委批准。从根本上说，全党必须服从统一的纪律：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

(c) 各级党的领导委员会在代表大会/会议或者全体会议上必须做组织报告。各级党的领导委员会要听取党内外人民群众的意见并对他们做出答复。党员有权提出批评意见和并向上级党委提出他们的观点或解决办法；甚至任何一个党员只要有不同观点，他/她都可以向上级党委甚至向中央委员会提出意见。

(d) 领导委员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要承担对某一个特定领域和某一个战线进行党的领导的责任。他们将直接从中汲取经验，从这些经验中获得的知识可以帮助指导其他委员会，但上级委员会赋予的特殊职责除外。中央委员会可以赋予包括中央委员会在内的所有领导委员会的任何成员以特殊职责。

(e) 领导委员会必须定期向其下级委员会提交报告，并及时通报他们的决定。所有下级机构同样有责任定期向上级委员会报告各自的活动。

(f) 除被赋予特殊任务者外，每名党员均是党其中某一个组织的成员。

(g) 在作出决定之前，每个党员都可以在有关党组织内自由充分地讨论。他/她可以就党的政策和各种问题发表其意见，或者拒绝发表最终意见并解释原因。不过在做出决定之后，每个人都必须严格遵守。但是，如果党员仍有不同意见，他/她有权保留。在大会/会议上讨论并做出决定后立即就这些问题再次要求进行讨论是不允许的。

但是，任何成员均可在有关委员会中就新问题提出讨论。如果他/她觉得该问题关系到全党，他/她可以通过他/她所在委员会向中央委员会提交其提交意见，特殊情况下可以直接提交给中央委员会。如果三分之一的中央委员会成员也这么认为并希望召开全会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该问题将至少通知给各邦委员会。如果大多数邦委员会同意这一要求，那么中央委员会将召开全会。在这种特殊情况下，中央将确保按照民主方式解决问题。

(h) 结合策略和方法的不同，各单位可以自由地主动制定就贯彻党的总路线和上级委员会任务的新方法。

(i) 如果会员被逮捕，他/她将被免除所有责任，并对其进行观察。根据其在被敌人拘押期间、监狱中或释放后的行为，决定是否保留或取消其党员资格。如果保留，他/她将被他/她在被捕前所属的党委接纳进入，除非该党另有决定。

各级党委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必须与委员会工作中的官僚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极端民主化倾向、多中心宗派主义倾向和趋势进行无情的斗争。委员会应在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的基础上工作。

(k) 在纠正他人的错误过程中，同志式关系和相互合作应得到发展。评价

一个党员的工作，要从他/她在党的生活中的整体实践出发，而基于一些小错误和琐事上。

(l) 只有中央委员会才有权决定国内和国际问题。各级有关地方问题和问题的决定，由各委员会作出，但不得违背上级委员会的决定。

(m) 当党员被调到另一地区时，他/她应该在新的地区承担与原地区相同级别的职务。当某位党员被调离至另一地区时，关于这个党员的所有具体信息都应该以书面形式向相应的党组织汇报。

第六章 党的纪律

第二十六条 党的纪律是维护党的团结、增强党的战斗力和实行民主集中制政策的保证。如果没有铁的纪律，没有任何一个革命政党能够胜任在战争中领导人民群众并地完成革命。党的纪律对所有党员，包括领导人一样适用。

第二十七条

(a) 拒绝或违背党的宗旨和目标，党章或组织结构将视同违纪，参与此种活动的党员或者组织将会受到纪律处分。

(b) 若党员违反党的纪律，相关党组织要采取适当的纪律处分，例如警告、严重警告、停止党内职务、撤职、暂停或取消党籍、开除党籍等，惩罚内容要经上级党委批准。取消或者开除党籍只有在上级党委批准后方能生效。若暂停党籍的，期限应明确说明，期限不应超过一年。暂停党籍需上级党委批准。

(c) 若任何一个党组织违反了党的纪律，上级党委采取的处分措施有，批评该组织、责令该组织部分改组等。若要解散该组织，则必须经过上级党委批准。

(d) 若中央委员会成员严重破坏党的纪律（充当敌人特务或者公开从事反党活动），中央委员会有权开除其公职或党籍。但是，处分决议只有在中央委员会 2/3 的成员同意的情况下才能生效。

(e) 受到处分的党组织或党员要预先提交一份控诉表。如果党组织或者党员认为处罚是不公正的，可以提出反对意见，要求复议或者向上级党委申诉。有关的下级委员会应立即将这种诉求提交上一级委员会。每位委员均有权在其所在的委员会/组织上就对其纪律处分为自己辩护或向上级委员会提出书面说明。

第二十八条

(a) 只有在讨论和说服其改正错误的所有办法均失败后，才能对相关党员或党组织实施惩罚措施。即使在实施惩罚措施后，仍然需要为使其改正错误而做出努力。在这个过程中必须遵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在特殊情况下，为了维护党的安全和捍卫党的尊严，惩罚措施可以被尽快实施。

(b) 下级党委不能对上级党委任何成员作出纪律处分的决定。他们可以将其对上级委员会成员的指控和建议以书面形式发送给有关委员会。

(c) 对于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对党造成严重破坏的党员，如果对其党籍或者党内职务仍进行保留，党员也应被立即暂停党籍，由他/她所在委员会或上级委员会取消其党内职务，并等待控诉表写作并得到该党员的解释。在采取此类

纪律措施时，有关委员会应指定对此事作出最终决定的期限。

(d) 任何一名党员或预备党员（或任何级别的党员）无正当理由连续六个月不参加党的活动或不执行党的决定的；为能续签党籍、不缴纳党费及党税的，视为自愿退党，并暂停或取消其党籍。

(e) 开除党籍或者取消党籍，是党内的最严厉处分。所以在涉及此类决定时，相关党委要特别慎重。对纠正相关党员错误的努力全部失败后，才能采用上述处分措施。上级相关党委必须认真审查党员的申诉，并且也要对致使他/她犯错误的环境进行彻底调查。经济腐败、政治堕落、品行不端或出卖党秘密的党员应受到处分。

(f) 如果被取消党籍或者退党的人表达了再次入党的意愿，相关党委应仔细地审查之后在作出决定。经过最少六个月的考察后，才能决定是否再次给予党籍。只有邦或者中央委员会可以决定曾被开除出党的人是否可以重新入党，但叛徒除外。但是，邦以下党委可以就此问题提出建议。

第七章 党的组织结构

第二十九条

(a) 党的组织根据地域划分和生产区域来组建。

(b) 党由两类党员组成：全职党员和兼职党员。

第三十条 各级党组织结构如下：

(a) 党的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机关。在前后两届党的代表大会召开的间隔期间，中央委员会是党的最高机关。在中央委员会之下依次是：特殊区域委员会（Special Area Committee/SAC）/特殊分区委员会（Special Zonal Committee/SZC）/邦委员会（State Committee/SC）；地区委员会（Regional Committee）；分区/县/专区委员会（Zonal Committee/District/Divisional Committee）；小分区/小专区委员会（Sub-Zonal/Sub-Divisional Committee）；区域委员会（Area Committee）；地方委员会如村/贫民窟/工厂/大学党委。党的主要组成部分是党支部。镇/市一级也会成立党委会，上级相关党委将决定其隶属关系。

(b) 所有委员会都将选举出党委书记。根据运动的需要和委员会的规模，所有委员会均可设立书记处。处于同一级别的所有委员会书记和秘书处，享有相同的权利。书记和书记处将承担特殊的职责和责任。

(c) 区域委员会以上的党的领导机关只由职业革命者组成。

(d) 党的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由党的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会是前后两届党的代表大会召开间隔期间的最高权力机关。

(e) 分别由特殊区域/特殊分区/邦大会选举产生的特殊区域委员会/特殊分区委员会/邦委员会，是特殊区域/特殊分区/邦级别的最高机关。

(f) 由地区会议选举产生的地区级别的最高权力机关为地区委员会。根据运动的需要，可以将邦划分为不同地区，或者将几个邦的某部分地区合并组成地区委员会。

(g) 同样地，分区/县/专区委员会以及小分区/小专区委员会由其对应级别的会议选举产生。区域委员会由区域级别的会议选举产生。

(h) 镇/市委员会由对应级别的会议选举产生。

(i) 由 1 个村庄、或者 2 到 3 个村庄、或者 1 家工厂，或 1 所教育机构，或者由 1 个局部区域或 2 到 3 个局部区域里的 3 到 5 名成员组成一个支部。群众组织机构中也可以成立支部。

(j) 在两届会议或者代表大会召开之间，各自级别对应选举产的委员会是最高机关。

(k) 在各级领导下，可以成立子委员会以及专门委员会，以便在各种条件下有效执行党的任务。

党的基本单位：

第三十一条

(a) 党支部是党的基本单位。可以以区域、行业或者生产为单位灵活组建党支部。党支部是日常活动的核心，每个党支部由最少 3 名党员、最多 5 名党员组成。党支部要由成熟的党员构成，他们履行责任和义务，享有党员的一切权利（预备党员除外）。党支部选举其支部书记。

(b) 预备党员也将按照党支部的决定工作。他们应参与讨论并遵守党的指示，但在决策时没有投票权。

(c) 在成立区域党支部时，应设法在工厂和群众组织中建立党支部。

(d) 如果一个区域有两个以上的党支部，则可以成立区域委员会以下级别的党委，即地方层面委员会（村/棚户区/工厂/大学党委）。

(e) 党支部是一个地区中广大人民群众与党联系的活纽带。党支部将会积极主动地领导广大人民群众进行革命战争。通过让激进分子和党的追随者加入反抗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专制国家制度的革命战争，来不遗余力地引领工厂、地方和农村地区的群众向党的政治路线和目标靠近。从一开始，党支部应教育群众秘密地、非法地按照持久人民战争的战略与战术从事活动。选拔 3-5 名党内积极分子，将他们组织成一个小队，对他们进行党的政治教育，把他们组织起来，是党支部的重要职责。

第八章 党的代表大会

第三十二条 全印党代表大会是否召开应由中央委员会决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 5 年召开一次。在特殊情况下，还有可能推迟或提前。相关决定由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做出。

第三十三条 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主席团主持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并且履行以下职责：

(a) 承担上届代表大会以来党的政治和组织审查工作。

(b) 采纳和修订党纲、党章，制定战略战术和财政政策，以及指定其他政策事宜。

(c) 评估国内国际形势以及制定任务。

(d) 决定中央委员会人数以及选举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

(e) 批准财务报表。

第三十四条

(a) 党的总书记由中央委员会选举产生，同时中央委员会也根据运动的需

要选举出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将根据党的路线和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在前后两届中央委员会会议召开的间隔期内作出有关政治、组织和军事的决定，决定需得到随后召开的中央委员会的批准。中央政治局还需要设立地方局、中央军事委员会、以及其他专门委员会、子委员会及部门。总书记主管政治局。

(b) 为运行党的机关报，中央委员会为每个机关报任命编辑委员会。总书记是中央理论思想机关的总编辑。中央委员会任命编辑部运行其党报党刊。总书记是中央委员会理论—意识形态机关报的主编。

第三十五条 在两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间隔期间，为解决特殊问题中央委员会可召集中央全体会议。在全体会议中可以讨论和决定与该时期党的路线和政策有关的问题。同样，中央全体会议也可以负责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成员或罢免中央委员会成员。在必要的时候，在征得三分之二成员同意的情况下，中央委员会可以改选不超过现有成员四分之一的委员。

第三十六条 特殊区域委员会/特殊分区委员会/邦委员会、地区委员会、分区/县/专区全体会议每三年召开一次。在特殊情况下，会议时间可以提前或者推迟。区域委员会会议/全体会议应每两年召开一次。在对相关问题进行讨论后并在大会/全体会议中达成决议，将党的路线和政策的意见报给上级委员会，在必要的情况下，各级委员会选举对应级别的委员会委员和候补委员。

第三十七条 在上述级别的不同会议召开间隔期间，若有必要，经上级委员会批准，可以召开全体会议。各委员会在各自的全体会议上就各委员会管辖范围内的问题进行讨论后作出决定，选举或罢免各委员会成员。任何委员会因特殊情况不能召开全会的，经上级委员会批准，各委员会可以增补各自人数的四分之一。

第三十八条

(a) 各级委员会根据党员人数以及委员会和党代会的决定来确定各种会议包括全国代表大会在内的代表人数。

(b) 各委员会有权特邀最多百分之十的代表出席代表大会和其他不同级别的会议。观察员和无投票权的代表也可能被邀请参加各自委员会的会议。

第三十九条 在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按照中央委员会决定，应给所有党员下发大会需要讨论的相关文件草案，并给予党员充分讨论的时间。下级会议和党员提出的对草案的所有修改都应送交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再把它们提交给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参加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享有提议修改文件草案的权利。审阅文件草稿后，任何代表如果想提出替代草案，那么，他/她/他们必须立即告知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将决定给予其起草文件的时间。有关委员代表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将文件起草完毕，然后提交给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有权将该文件连同自己的评论一起散发。

党代会代表有权对文件草案提出修正案。若任何委员会代表/代表想动议替代文件，他/她/他们必须立即通知中央委员会，由中央委员会决定给予有关代表/代表委员会的时间用于起草文件。有关委员会代表必须在中央决定的预定时间内起草文件，并提交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会有权将它连同自己的评论一起散发。

第四十条 即将离任的中央委员会应向全国代表大会提名一组新一届中央委

员会组成成员名单。任何一名与会代表均有权反对名单中的提名人，甚至在征得被提名人同意的情况下，可以提名另一组名单。如果没有其他替代提名方案，大会将对即将离任的中央委员会提名的委员名单进行举手表决；若有提名替代方案，那么，包括中央委员会在内的全体委员会，将通过无记名投票形式选举产生。

第四十一条 代表选任办法由中央委员会规定，下级委员则执行之。

第九章 中央委员会的权利和义务

第四十二条 中央委员会由全国党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在前后两届全国党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间隔内，中央委员会是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代表全党，可以全权代表党作出重要决定。中央委员会至少每年召开一次会议。

第四十三条

(a) 中央委员会可以成立政治局、中央军事委员会、地方局和各类子委员会，以保证党各项工作的顺利运行。同一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同级，享有相同的权利。但是，在前后两届中央委员会召开期间，中央政治局将代表中央委员会，负有特殊的责任与义务。（译者注：此处英文原文仅有（a）一条子条文）

第四十四条 对于任何有严重违反党纪、进行反党活动或进行可憎派系活动行为的委员，中央委员会可以采取措​​施并予以罢免。被处分的中央委员有权在全国党代表大会召开前进行申诉。在事件未最终决定或者未完全解决之前，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仍然是有效的。如果中央委员会三分之二的成员的同意，可以开除任何一位中央委员会委员。

第四十五条 如果任何职位出现空缺或者出于运动的需要，中央委员会可以增补任意成员进入中央委员会。必要时，在三分之二成员同意的前提下，中央委员会可以改组成员，但是不得超过现有人数的四分之一且必须经过下一届全国党代表大会的批准。改选的人员应从候补委员中选择，若无候补委员，那么中央委员会可以从其他党员中增选新成员。

第四十六条 中央委员会书记决定中央委员会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并且提前提供会议议程。如果中央委员会中有三分之一的成员要求召开会议，中央委员会书记应召开会议。

第四十七条 中央委员会或者中央政治局有权派遣其成员到任何组织或者地区检查工作。中央委员会有权解散任何级别的任何委员会，并组织成立新的委员会。

第四十八条 在前后两届全国党代表大会召开期间，如果有必要，中央委员会可以召开特别会议和全体会议。中央委员会可决定除了中央委员会委员以外，其他参加中央全体会议的人员。

第十章 党内辩论

第四十九条 为了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团结全党，改进党的工作方法，对问题进行深入全面的探讨是极其必要的。这也是党员的民主权利。在全党上下，我们要致力于在各自委员会中开诚布公、言无不尽地进行辩论，以解决有关策略问题。必要时，应当听取上级委员会的帮助和建议。但是，打着党

员民主权利的旗号，就一个问题争论不休，却只会损害党的工作。因此，任何形式的有争议的辩论或讨论，必须经有关委员会的三分之二成员同意后方可被允许。

第五十条 若任何一名党员或者某个委员会对于党的基本路线持不同观点，并且要求在党内宣传其不同观点，中央委员会有权就接受还是拒绝这一要求做出最后裁决。

第五十一条 若任何一名中央委员会成员对于事关全印度或者国际问题持有不同观点，并且他/她建议全党接受这个观点，针对这种情况，若中央委员会三分之一成员接受上述观点，那么此观点可以传达至邦/地区委员会或者任何一级的委员会。但是在未经中央委员会许可，任何一名中央委员会成员不能将其不同观点传达至下级委员会。

第五十二条 任何下级委员会或者下级委员会成员对中央委员会的政治和组织路线持有不同观点，那么他们可以根据其党委运行机制向中央委员会汇报其观点。必要时，中央委员会将把这些观点以及中央委员会的意见传达至全党。

第五十三条 党内争论必须在中央委员会的控制下进行，抑或在中央委员会引导下提交给特殊区域/邦/地区委员会直至分区委员会，或党的任意一级。

第十一章 党在人民军队中的作用

第五十四条 人民军队是党的主要法宝。因此党会利用这一法宝来唤醒、动员、组织和武装人民执行革命任务。同时，人民军队也会参加社会生产。只有通过持久人民战争，将人民军队作为最强大的武器，党才能推翻代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买办大资产阶级的现存反动国家政权，从而完成夺取政权，建立新民主主义国家的任务。人民军队将会保家卫国，捍卫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果实，向建立社会主义的目标前进。党将用马列毛主义武装人民军队。

第五十五条 党对人民军队始终拥有绝对领导权。因为党决定着革命的总体政治战略和战术，也根据持久人民战争的发展水平，决定党组织在军队中的工作和形式。中央委员会选派组成的中央军事委员会，将根据党的军事路线和中央委员会的政策、指示和决定行动。在这种情况下，将设立各级军事委员会和指挥部以执行军事行动。作为人民军队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党的各级干部将在军队事务中发挥领导和排头兵的作用。

第五十六条 人民军队由三种部队组成，即主力部队、二等部队和基础部队。

第五十七条 在我们的游击军中，排、连及以上编制都设立党委。党的分支机构由党员组成。各小队将有党支部和党的分支结构。如有必要，小队内部也可以成立党委。在民兵中也要有党员和干部，以在那里发挥领导和排头兵的作用。

第五十八条 一切军队组织成员均需在其所隶属的党委领导下开展工作。各军事组织将贯彻执行相应党委的决定。

人民解放游击军中的党员将根据级别，受邀参加党的会议/全会。排级以上军队组织中的党委一般由相应层级会议选举产生。

第十二章 群众组织中的党小组

第五十九条 在社会团体的执行委员会中应成立党小组。党小组将根据具体情况，领导群众组织中的执行委员会制定正确的工作方法。党小组应秘密进行工作。领导党小组的党委/委员的意见将被视为最后意见。如果党小组成员对最终意见持有异议，应以书面形式向相关党委/上级党委汇报他们的意见。各种社会团体中的党小组接受各级党委的指导。

第十三章 经费

第六十条 党的经费通过党员缴纳的党费、党税、捐款、罚款和由敌人处没收的财产来募集。

第六十一条 党员需要缴纳的党税数额，由其隶属的邦委员会决定并征收。

瑞典汉学家扬·米尔达：向西方讲述中国故事*

扬·米尔达（Jan Myrdal）是瑞典作家、评论家和政治活动家。他一生著作等身，心系中国，至今已发表 200 多部（篇）评析和介绍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著述，其中以 1962 年至 1994 年 5 次采访延安南郊柳林村，撰写的《来自中国农村的报告》系列论著尤为著名，至今已被翻译成多种文字，畅销各国，成为西方社会了解中国社会的必读书目之一。

“瑞典最叛逆的作家”

扬·米尔达 1927 年生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近郊罗姆马（Bromma）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冈纳·米尔达（Gunnar Myrdal）是瑞典学派和新制度学派及发展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同时也是社会学家和政治家。母亲阿尔瓦·米尔达（Alva Myrdal）是瑞典女政治家，曾任瑞典驻印度大使和瑞典教育部部长，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担任高职。由于他的父母长期关注种族问题和亚洲国家贫困问题，两人分别获得 1974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与 1982 年诺贝尔和平奖，这在诺奖史上是非常罕见的。

扬·米尔达对社会主义革命的关注，在其青少年时代已经初见端倪。他曾阅读过关于法国大革命及左翼作家的著作，深受马列主义的熏陶。加之同时期欧洲反法西斯运动和瑞典工人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他开始积极投身于瑞典进步运动。1944 年，17 岁的扬·米尔达从学校退学，担任瑞典共产党党报记者、特约通讯员，之后又加入瑞典共产党。

1958 年起，扬·米尔达先后游历了阿富汗、伊朗、柬埔寨、印度等 20 多个国家，倡导反殖民主义、反帝国主义，关注第三世界问题、民族解放斗争，他谴责美国发动越南战争是霸权主义行为。1967 年，他在瑞典组织创办了左翼评论杂志《文化前哨》，并长期担任责任编辑，宣传左翼思想。1968 年，他出版的《一个不忠的欧洲人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 Disloyal European），毫不隐晦地描述了他在美国和瑞典度过的艰难的童年岁月，反思自我和揭露社会的不公，被《纽约时报》评选为 1968 年“十大杰出书籍”之一。

扬·米尔达最近的一次国外旅行是在 2010 年 1 月，年逾八旬的他深入印度中部的丛林，在印共的游击区生活两周，采访了印共毛派的领导人。于 2012 年出版《红星照耀印度》（Red Star Over India）一书，阐述了他对印度局势的看法。由于他的观点热烈激进、直中要害，被西方称为“瑞典最叛逆的作家”。瑞典作家伊瓦·鲁·约翰逊甚至称赞“扬·米尔达是瑞典最好的作家”，“每当他出国旅行时，瑞典就会变得沉默”，“他很勇敢，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一个卫道士”。

出版多篇有关中国的著作

扬·米尔达早年阅读过斯诺、韩素音等人关于中国的著述，对中国革命的

*本文来自中国社会科学网-中国社会科学报，作者王建宏、刘运杰。

成功表现出极大的兴趣，期望切身体验和观察新兴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状况。

1962年春，扬·米尔达和摄影师妻子甘·凯丝丽（Gun Kessle）获得访华签证，这是他们首次踏上中国的土地，在访问了内蒙古、云南等地以后，扬·米尔达提出了进驻中国农村调查采访的请求，最终获准在延安南郊的柳林公社体验生活两个月。

柳林村是公社化运动时期有名的“农业示范村”，村支书李有华曾被评为省级、全国农业劳动模范。提到选择柳林村的缘由，扬·米尔达在《来自中国农村的报告》序言中写道，“柳林是一个典型的陕北村庄，在中央红军到达陕北之前就开始了共产主义实践，进行集体农业合作的最早试点”。可以说，柳林是当时农业体制改革的“样板”村。

8月初，扬·米尔达夫妇在两名翻译人员的陪同下经西安抵达延安，受到热情接待。他们通过村支书李有华和翻译的帮助，得以与柳林村民顺利访谈。在两个月时间内，扬·米尔达主要负责采访，甘·凯丝丽负责拍摄照片，他们从早上8点工作至下午6点，共采访了50户人家，近百位村民。至今，柳林村上了年纪的村民，对扬·米尔达此次来访仍然记忆犹新，时隔半个多世纪，他们第一次从扬·米尔达的书中看到自己和老一辈人的照片和文字，感慨万千。9月中旬，扬·米尔达夫妇离开柳林抵京，受到了毛泽东等领导人的接见，并应邀参加了国庆节的天安门观礼。这次中国之行长达9个月，扬·米尔达称“探访乡村和农民革命是作为中国旅程最重要的部分”。

1963年《来自中国农村的报告》的瑞典文本于斯德哥尔摩首次出版。这本描述社会主义中国农村的著作，立即在西方社会引起巨大反响，随后被陆续译成英、法、德、日等二十多种语言。1965年英译本出版后，西方各大媒体对该书纷纷作了评论，评论家们在《卫报》《芝加哥论坛报》上发表文章，对该书赞誉有加。其中，埃德加·斯诺在《新共和》杂志上评论道：“从三十多个人的自述中，人们了解了村子里几乎每个人的历史。没有一个人是国家的重要人物、党的伟大人物或是长征的老兵。然而，当他们开始回忆个人生活经历的时候，对于国情的呈现确实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新视角。”

《来自中国农村的报告》一书的成功，为扬·米尔达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声誉，使他迅速跻身于瑞典著名汉学家之列，并于1968年当选瑞中友好协会主席。之后，他又以协会主席的身份多次访华，其中在1969年、1975年、1978年、1982年、1994年专程对柳林村进行回访，出版了《回到中国农村》（Return to that Chinese village）、《柳林的盛宴》（En fest i Liu Lin）等一批反映柳林村的著作。值得一提的是，1978年6月10—20日，他来华时，还带领拍摄团队为柳林拍摄了一部长达45分钟的彩色纪录片。后来，这部纪录片在瑞典国家电视台播出，成为今天我们了解改革开放之前陕北农村的珍贵影像。扬·米尔达对延安柳林村持续关注长达20年，完整地记录了公社化时期到改革开放时期陕北农村的变迁历程。这一系列反映中国社会主义农村发展变迁的论著，不仅在西方绝无仅有，在中国也是非常难得一见的。

除柳林村以外，扬·米尔达的足迹遍布新疆、甘肃、陕西、四川、重庆、浙江、安徽等省区，出版了《华夏之游》（Chinese Journey）、《丝绸之路》（The silk road）、《中国实录：1975-1978》（China notebook: 1975-1978）

等多部介绍中国的书籍。此外，他还作了不少关于中国的演讲。由于他对中瑞关系的突出贡献，1993年，南开大学授予其荣誉博士学位。

笔耕不辍 心系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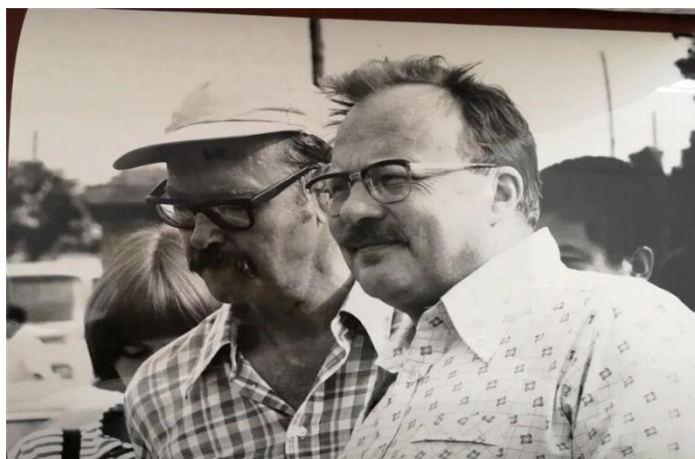
扬·米尔达现居瑞典哈兰省的海滨城市瓦尔贝里。他今年已92岁高龄，但依然笔耕不辍，经常在社交平台上发表评论。

我们通过电子邮件与他取得了联系，他非常高兴，热情地回信告知我们，他收藏的5万册书籍和档案全部保存在瓦尔贝里市中心的一栋四层楼的扬·米尔达图书馆，目前该馆由扬·米尔达协会管理。他的妻子甘·凯丝丽于2007年去世后，当年拍摄的照片和胶片交由斯德哥尔摩的远东文物博物馆收藏，他的女儿伊娃·米尔达是考古学家，在该馆任职。扬·米尔达表示，希望通过合适的渠道将自己搜集的资料捐赠给延安老区，以便让更多的人从事这项研究。

（本文系陕西省教育厅重点项目“集体记忆中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对延安市柳林村的历史学考察”（17JZ082）阶段性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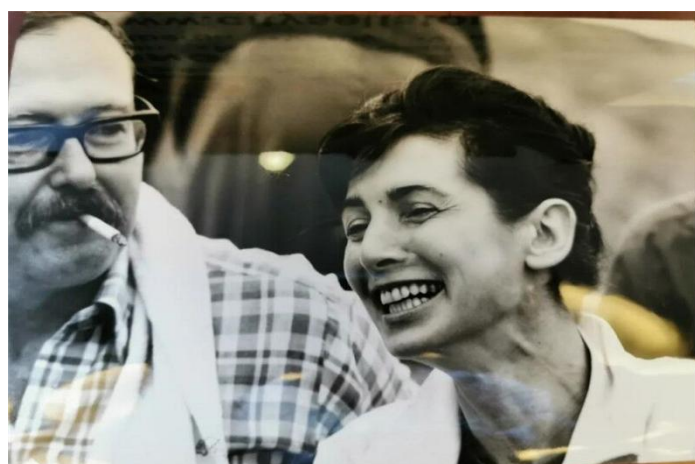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历史系）

架起中瑞民间友谊的桥梁——记瑞典友人扬·米尔达 1962 年的中国行 *



扬·米尔达（Jan Myrdal）（右）

扬·米尔达（Jan Myrdal 一译为扬·米达尔），是瑞典著名的作家、评论家，1927 年出生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近郊罗姆马的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父亲冈纳·米尔达（Gunnar Myrdal）是瑞典学派和新制度学派及发展经济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同时也是社会学家和政治家。母亲阿尔瓦·米尔达（Alva Myrdal）是瑞典女政治家，曾任瑞典驻印度大使和瑞典教育部部长，并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任职。扬·米尔达的父母都因关注亚洲事务而著名，也都是诺贝尔的获奖者，夫妻双方分别获得诺贝尔奖，这在诺奖史上也并不多见。米尔达年轻时受父母影响，始终对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的革命建设充满了同情。



*本文来自陕西档案信息网，作者尹恒。

米尔达的夫人港·凯丝莱（Gun Kessle），生于1926年，是瑞典的少数民族。她1952年毕业于伦敦艺术学校，1955年进入瑞典斯德哥尔摩皇家美术学院学习版画。1958年起，她开始和米尔达一起在亚洲各地旅行、作画、摄影，是米尔达事业上的好帮手和生活中的好伴侣。

二战以后，瑞典执行的是不结盟的中立政策。此外，瑞典还积极发展同亚非国家的关系，并对这些国家进行援助，扩大和这些国家的经济往来。与此同时，瑞典与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也有所发展。1950年5月9日，瑞典与我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它是与我国建交的第一个西方国家。由于两国距离较远，历史上也无重大利益纠纷，瑞典在联合国也是一贯支持我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因此，瑞典与新中国的关系比较友好。米尔达访问中国正是在此环境下进行的。

米尔达夫妇从1958年起，就开始在亚洲和中亚细亚进行访问，他们曾到过印度、缅甸、尼泊尔、巴基斯坦、锡兰、土耳其、伊朗以及苏联等几个国家，写了不少关于访问国家的传记。因为对我国古老的文化艺术、新旧建筑很感兴趣，而且特别想要了解我国少数民族解放后的生活情况和民族传统，以及迫切想要知道我国农村公社的基本情况。于是，米达尔夫妇二人于1962年4月15日由香港乘船到天津自费来我国进行访问。

这是他们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此次访华的目的在于以亚洲现实的知识为基础，来描绘一幅新中国发展的蓝图，报道中国文化和传统的发展情况，供更多的瑞典人去了解。米尔达先后与瑞典的几家出版社和电视台签有合约——要在1963年出版一本介绍中国情况的书，并且拍摄一些胶卷，供瑞典电视台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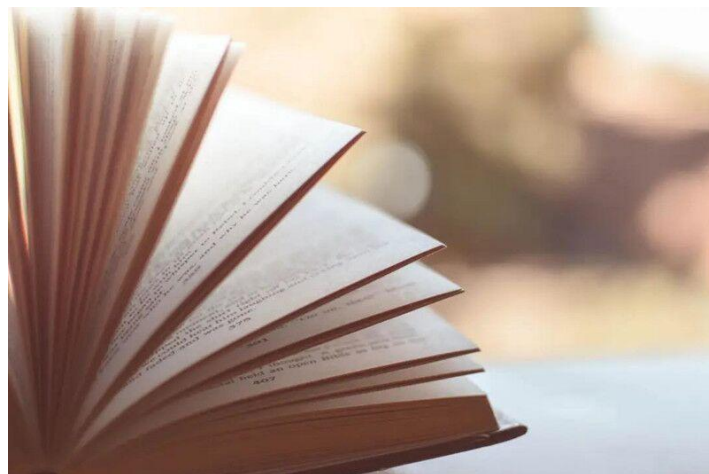
米尔达夫妇访问中国的计划是以北京为基地，在访问一个城市后，回京停留7-10天，整理材料，然后开始下一段的访问。米尔达夫妇原本拟定的计划是1962年的春、夏两季访问内蒙古自治区，了解游牧民族的文化，然后去敦煌看壁画，再去新疆了解中古时期的建筑以及当地的民俗情况，接着在秋天的时候远离城市去山区劳动一个月。在进行完上述的参观访问后，于8、9、10月份回到北京开始写作。1963年早春继续去华南做旅行，4月份结束访问行程，离开中国到达土库曼斯坦。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在首次访华中，米尔达的新疆、西藏、敦煌之旅未能成行。

米尔达在华访问期间，是自费旅行，所以一直过着简朴的生活。来到中国后，他表示希望不要住在饭店，认为这样无法接触普通群众。具体的要求是：租用能够休息和工作的房子即可，甚至不需要现代化的设备，只需要提供两个行军床、两个桌子、两把椅子，自己带有铺盖行李和气炉，可以自己做饭吃，去各地访问时，搭乘一般的交通工具即可。

1962年的“五一焰火晚会”上，米尔达夫妇同其他外宾一起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接见。5月31日，米尔达夫妇离开北京，前往内蒙古自治区参观访问，6月16日回京。期间参观了内蒙的名胜古迹、庙宇、工厂、手工业、大中小学、各级卫生医疗机构、博物馆、图书馆、托儿所、展览会，访问了国营种畜坊、两个牧业公社，并访问了几个牧民家庭。观看了蒙古族的话剧、电影、歌舞。会见了作家、艺术家，并与他们进行了座谈。米尔达夫妇在赴内蒙之前，

对内蒙的情况知之甚少，只知道历史上有个成吉思汗，却不知道对他进行何种评价。他们主观上认为内蒙比较落后，不如瑞典的牧区，经过半个月的实地调查后，思想上有了不少的转变，并且收集了不少材料，对内蒙古自治区有了更深的了解，对我国宗教信仰自由以及注重保护庙宇印象深刻，赞不绝口。认为我国少数民族和宗教的政策是正确的，十分英明。但是，米尔达也一再提起，内蒙的交通不便，运输困难，有待于解决，否则将来发展畜牧业及开发矿产资源将会受到很大影响。

1962年8月5日，扬·米尔达夫妇在我国对外文化协会工作人员的陪同下，由洛阳来到西安。访问西安以后，米尔达认为：“西安是一座古老而又美丽的城市，建设得很快，城市规模很大，是我们没有想象到的。”8月14日下午抵达延安，8月20日到达延安柳林公社生产队进行访问。对生产队50户农民进行了一般访问，又选择了21人作为重点访问的对象。谈话内容涉及非常广泛，主要有：公社的基本情况；收入分配、财政税收、贷款及困难户补助、生产队的财务制度等情况；农村商品供应的办法、数量及价格；妇女、婚姻、家庭及青年的工作；治安情况及民兵工作；监察工作及干部工作等。与生产队员结束谈话后，米尔达还与一位历史学家进行了谈话，进一步了解了延安的自然环境、考古、历史和文化的状况。米尔达夫妇在延安参观访问中，建议我们对文物加强保护工作，比如凯丝莱夫人建议文物周围最好用栏杆挡住，同时也建议我们加强对林区的保护。



扬·米尔达在柳林的访问中，工作细心认真，对每一个人的谈话都做了笔记，并将大部分和他谈了话的人都拍了照片。凭着在柳林大队访问所获得的一手材料，写成了举世瞩目的《来自中国乡村的报告》（*Report from a Chinese Village*），该书被译为多种文字，成为西方人士了解中国必读的著作之一。1965年英译本出版后，西方各大媒体对该书纷纷作了评论。其中，《红星照耀中国》的作者埃德加·斯诺在《新共和》杂志上评论这本书：“从三十多个人的自述中，人们了解了村子里几乎每个人的历史。没有一个人是国家的重要人物、党的伟大人物或是长征的老兵。然而，当他们开始回忆个人生活经历的时

候，对于国情的呈现确实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新视角。”

离开陕西后，米尔达夫妇在 1962 年 12 月 17 日至 1963 年 1 月 6 日在云南进行了 20 天的访问。先后去了昆明、安宁、大理、芒市、腾冲等地。米尔达夫妇访问云南的目的，主要是了解中缅边界协定的具体执行以及云南少数民族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情况，并请有关同志介绍云南解放以来的全面发展情况。经过 20 天的访问，这些问题都得到了较为满意的答案。

在中国为期 9 个月的访问，让米尔达意识到瑞中两国在过去更加注重的是政治和经济的交流，文化交流相对较少。在谈及如何增进瑞中文化交流时，他提出了以下建议：第一，中瑞双方互派留学生，增进对彼此的了解和友谊；第二，中国可以招收一些瑞典青年来华工作，过普通人的生活，与他们建立感情，这样以达到正确宣传中国的目的；第三，中国可以送一些书籍和报纸给瑞典工会中的一些文艺爱好者；第四，米达尔给瑞典的几家出版社去信，让他们赠送一些文学书籍给北京市图书馆，其中还包括米尔达自己写的书；第五，建议瑞中两国互相举办对方的电影周；第六，推动瑞典皇家工程技术学院邀请中方代表来瑞典考察城市规划、交流城市与建筑发展经验。

在对外文化协会会长楚图南主持的宴会上表示，他一生中有两个转折时期。第一个转折期是二战，第二个转折期就是在亚洲的五年，尤其是在中国的这九个月。这九个月使他在对待政治、生活上的态度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他还谈到，很多国家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他们封锁了社会主义国家的消息，尤其是封锁了中国的消息，但是，西方国家大部分人民对中国的态度是友好的，他们更希望了解中国。

《来自中国乡村的报告》一书的成功，为扬·米尔达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声誉，使他迅速跻身于瑞典著名汉学家之列，并于 1968 年当选瑞中友好协会主席。之后，他又以协会主席的身份多次访华，其中在 1969 年、1975 年、1978 年、1982 年、1994 年专程对柳林村进行了回访，出版了反映柳林村的著作——《回到中国农村》。从 1962 年起到 1994 年止，扬·米尔达对延安柳林村持续关注长达 32 年，完整地记录了陕北农村从公社化时期到改革开放时期的变迁历程，写下了一系列反映中国社会主义农村发展变迁的论著，这一点，不仅在西方绝无仅有，在中国也是非常难得一见。

除陕西以外，扬·米尔达的足迹遍布内蒙、云南、新疆、甘肃、四川、重庆、浙江、安徽等省区，出版了《华夏之游》（Chinese Journey）、《丝绸之路》（The silk road）、《中国实录：1975—1978》（China notebook: 1975—1978）等多部介绍中国的书籍。此外，他还作了不少关于中国的演讲。由于他对中瑞关系的突出贡献，1993 年，南开大学授予其荣誉博士学位。

2020 年是中瑞建交 70 周年。3 月底，93 岁的世纪老人扬·米尔达向陕西省档案馆捐赠了 2776 幅照片。这些照片内容涉及陕西、甘肃、内蒙等地的风景名胜及风土人情，反映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有关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状况，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米尔达委托驻瑞典大使馆表示，他和已过世的夫人对中国有很深的感情。如今自己年事已高，希望将照片赠送给中国供研究使用，如有需要，他和助手愿意向中方详细介绍照片的历史背景和相关情况。

扬·米尔达关于中国的文字和照片，留下了那个时代鲜活的记忆，就像一缕清风，吹开了上个世纪西方国家对华实行冷战而紧闭的大门，成为了更多西方人了解中国的窗口，透过这些文字和照片，我们也更能清晰地了解中国发展的脉络特征。